

当代口述史丛书

□ 广汉县农村生产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溯源

□ 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

□ 我所知道的四川调粮

□ 川西剿匪

□ 我与卢作孚先生

当代四川要事实录

当代口述史丛书编委会

◎ 编

第一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

广汉县向阳

当代四川要事实录 第一辑

当代口述史丛书编委会 编

责任编辑 谢雪
◆ 装帧设计 郭小工 陈双喜

ISBN 7-220-06996-0



9 787220 069963 >

ISBN 7-220-06996-0/K·1032

定价：40.00元

当代口述史丛书

当代四川要事实录

当代口述史丛书编委会 编

第一辑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当代口述史丛书编委会编. —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11

(当代口述史丛书)

ISBN 7-220-06996-0

I. 当... II. 当... III. 四川省—地方史—现代
IV. K2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28760号

DANGDAI SICHUAN YAOSHI SHILU

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

当代口述史丛书编委会 编

- | | |
|---------|--|
| 责任编辑 | 谢 雪 |
| 装帧设计 | 邹小工 陈双喜 |
| 责任校对 | 叶 勇 |
| 责任印制 | 李 剑 孔凌凌 |
| 出版发行 |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
| 网 址 | http://www.scpph.com
http://www.scrmcbs.com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
| 发行部业务电话 | (028)6259459 86259455 |
| 防盗版举报电话 | (028)86259524 |
| 印 刷 |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 |
| 成品尺寸 | 170mm × 240mm |
| 印 张 | 21 |
| 字 数 | 350千 |
| 版 次 | 2005年11月第1版 |
| 印 次 | 2005年11月第1次印刷 |
| 印 数 | 5000册 |
| 书 号 | ISBN 7-220-06996-0/K · 1032 |
| 定 价 | 40.00元 |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

(028) 85910167

当代口述史丛书编委会

主任 杨超 何郝炬 章玉钧
委员 宋锡仁 王治国 陈焕仁
万本根 李明志 吴畏
汪涤世 张如兰 张继禄
陈德言 黄一龙 黄友良
罗韵希 谭继和 解伟
王炎 谢雪

《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编纂人员

主编 谭继和
副主编 黄友良
编辑 王林
编务 陈宝泉

目 录

前 言 ■

第一部分 ■

4 我与卢作孚先生

何郝炬口述 / 黄友良录音整理

人民解放军在向西南进军之前，中共中央就决定要团结、争取中国航运业的知名人士卢作孚。1950年夏，民生公司准备公私合营，应卢作孚的请求，公方代表组进驻民生公司，我作为公方代表组副组长并主持公代组工作，由此开始了与卢作孚的直接接触……

口述者何郝炬系原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时任交通部驻民生公司公方代表。

11 川西剿匪

裴田夫口述 / 张继禄 邓寿明录音整理

刚解放的四川，在宣布起义的国民党军队中有少部分并不是真正投诚，有机会就又叛变。四川是大陆解放较晚的地方，有不少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他们勾结惯匪和一些地方反动势力，在川西地区大面积地发动暴乱……

口述者裴田夫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六十军司令部参谋。

24 川西北民族地区的解放

裴田夫口述 / 张继禄录音整理

1950年1月，人民解放军六十军一七九师奉命进军汶、理、茂、松地区。解放这个多民族聚居地区经历了艰苦残酷的战斗。三占懋功、两进靖化、恶战黑水，决战草地……

口述者裴田夫时任茂县军分区参谋。

目 录

42 1956 ~ 1959年阿坝平叛

裴田夫口述 / 张继禄 杨萍录音整理

1956年7月周恩来总理就四川藏族、彝族地区民主改革作了重要指示，民主改革采取和平协商方式进行。尽管政策从宽，方法和缓，但仍然遭到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上层人士的反对，且悍然发动武装叛乱。台湾国民党当局及其派遣的匪特也趁机煽动，蓄意挑起骚乱。武装叛乱的发生，打乱了原来“力争和平改革”的部署。党和政府领导各族人民群众开展了平息叛乱的斗争。

第二部分 ■

55 四川民族宗教工作二三事

杨岭多吉口述 / 邹一清录音整理

民族领导干部杨岭多吉从保护德格印经院、对“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质疑、对“新叛”平反、正确分析藏区形势、协调民族和宗教方面的纠纷等事件中，深深体会到，党中央和省委极其重视民族宗教工作，民族领导干部能够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口述者杨岭多吉系原西藏自治区政协主席。

64 我所知道的四川调粮

何郝炬口述 / 黄友良录音整理

1950年，四川省第一次向外省大规模调粮。四川再次大量外调粮食是1959年、1960年及1961年。这三年恰恰又是四川因“大跃进”而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年，尤其是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所以调粮问题成为四川人民议论的焦点之一。四川的调粮是“大跃进”全局性错误中的一个局部性错误，不能离开全局来单独强调这个局部。

69 关于四川调粮的回顾与反思

廖志高口述 / 曾庆祥整理

廖志高同志对困难时期四川人口非正常死亡率高的问题曾长期进行研究和反思。

口述者廖志高系原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78 四川“大办钢铁”始末

何郝炬口述 / 黄友良录音整理

四川“大办钢铁”自1958年9月后形成高潮，1959年对钢铁高指标曾一度有所调整，但反右倾使调整的努力受挫。四川“大办钢铁”造成的损失和后果非常严重，教训深刻。

口述者何郝炬时任四川省基本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

86 “大办钢铁”运动的回忆

张如兰口述 / 邹一清录音整理

“大办钢铁”运动是四川乃至全国经济建设中的一次很大的挫折，正像彭德怀同志在《意见书》中讲的：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确实是得不偿失。

口述者张如兰系原中共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

95 “大跃进”中在梁平

明明 陈杰 李克乾口述 / 王林录音整理

1961年，明明、陈杰、李克乾等同志由中共四川省委指派到重灾区之一的梁平县担任各级领导职务。他们在农村基层亲眼目睹了瞎指挥、高指标、高征购、浮夸风等造成的巨大灾难。

口述者明明系原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陈杰系原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李克乾系原四川省精神文明办公室主任。

101 从建设“西钢”到建设“攀钢”

杨超口述 / 杜维宣 黄友良整理

1958年四川省决定建立西昌钢铁公司（简称“西钢”），并成立了西昌建设委员会。但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全国都头脑发热，拼命扩大基本建设规模，“西钢”的建设受到影响。1964年，攀枝花钢铁开发作为“三线”建设的重要项目开始上马。

口述者杨超系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当时设第一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时任中共西昌工业区委书记。

105 攀枝花钢铁基地上马前后

程子华口述 / 李思校 黄友良整理

1964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对攀枝花的开发作过许多指示，会后中央、国家计委等有关部门就开始了厂址的考察论证工作。但攀枝花建设上马不久就遇到“文化大革命”……

口述者程子华系原“三线”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113 20世纪60年代四川工业经济调整中的五本“折子戏”

张如兰口述 / 邹一清整理

20世纪60年代初期，四川省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根据四川省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四川工交战线在这一时期采取的五个方面的措施，习惯上被称为五本“折子戏”。

第三部分 ■

126 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

廖伯康

“萧李廖事件”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大跃进”和“大抓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四川发生的一起对提出不同意见并向中央如实反映四川情况的同志实施打击报复而造成严重政治恶果的事件。

撰稿者廖伯康系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

235 附录：从一个案例看一段痛史

李锐

本文为原中组部副部长，著名学者、党史专家李锐同志对廖伯康同志《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一文的读后感言。

第四部分 ■

241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赴京告状侧记

曾庆祥

1966年11月，“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挟持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赴京告状，周恩来总理从头至尾亲自处理了这一事件。

撰稿者曾庆祥系原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主任。曾长期担任廖志高同志秘书。

254 1968年的“云阳武斗”

文荣启

1968年，万县地区发生了一场九县一市（忠县、梁平、万县、开县、云阳、巫山、巫溪、城口、奉节、万县市）造反派组织武装攻打云阳县城的大规模武斗。这场武斗，从6月2日开始，8月11日结束，历时两个月零九天。参加武斗人员达数千人（另一说约一万人）。这场武斗，造成了巨大损失。

259 段君毅同志在四川

集体座谈 / 章玉钧执笔

段君毅同志1970年奉中央之命下派到四川，先后担任四川省革委副主任及省革委生产建设办公室副主任、省委常委、书记等职。在四川的六年多时间里，他以“大智若愚”的睿智顶住“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压力，做了大量工作。

执笔者章玉钧系原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当时在中共四川省委政工组、办事组工作。

267 我与“三化”工程

何郝炬口述 / 黄友良录音整理

“三化”工程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决定从国外引进并摆在四川的三套化肥、化纤设备。该工程从项目定点到建设都经历了一番曲折……

273 川化建设工程追忆

焦成斌口述 / 王林录音整理

四川化工厂三十万吨化肥装置是20世纪70年代我国从日本引进的大型先进成套设备项目之一，施工难度和质量要求都很高。但我方仅用了二十二个月零八天就完成了施工安装并试车投产，树立了成功引进国外大型先进技术设备的样板。

口述者焦成斌系原四川省国土局局长，四川省移民办公室主任。时任四川省建工局副局长。

目 录

287 回忆泸州长江大桥建设

何郝炬口述 / 黄友良录音整理

泸州长江大桥工程是列在川汉输气工程项目下的一个子项目，1978年由于川汉输气工程停建和国民经济调整，大桥建设资金的来源中断，工程面临停工……

口述者何郝炬时任四川省革委生产建设办公室副主任。

291 升钟水库建设

何郝炬口述 / 黄友良录音整理

升钟水库建设于“文化大革命”中上马，1980年底，由于国家压缩基建项目，升钟水库被列入撤销之列，四川省决定保大坝建设……

第五部分 ■

296 广汉县金鱼公社生产责任制改革试点前后

岳忠

1977年年末，四川省广汉县金鱼公社的联产计酬试点突破农村多年来的生产责任制“禁区”，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

撰稿者岳忠系原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调研处处长。

300 广汉县农村生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溯源

常光南口述 / 张继禄 马善思 江红英整理

改革开放之初，四川广汉县委在向阳公社第一个摘掉人民公社牌子，建立向阳乡政府，彻底打破了政社合一、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

口述者常光南系原德阳市政协主席。时任中共广汉县委书记。

311 重庆市计划单列与综合改革的由来

辛文口述 / 王林录音整理

重庆市是一个地位非常特殊的城市。抗战时期它就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新中国成立之后，它曾经是中央直辖市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借经济体制改革的东风，中央批准重庆市实行计划单列……

口述者辛文系原四川省计委副主任、计经委党组书记，原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316 重庆市综合改革试点亲历记

林凌口述 / 王林录音整理

20世纪80年代初，首钢以年利润“递增包干”的方式开始了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参与这场改革的经济学家蒋一苇、林凌等认为，企业改革不能孤立地进行，而应与城市的综合改革齐头并进。并建议在重庆进行城市综合改革试点……

口述者林凌系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学术顾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前 言

中国有着悠久的口述历史传统。近年来，由访谈者与口述者合作、建立在现代声像技术基础上的现代口述史，更呈方兴未艾之势。口述史学正成为现代史学领域的一门新兴学科。

历史学的生命力和价值在于真实性。口述历史让历史的见证人直接面对“历史”说话，成果以亲历者的叙述（记述）为主体。口述史料不仅可扩大历史信息的来源，补文献之不足，而且可扩展历史研究的领域，保留历史进程真实、具体、生动的细节，使历史更加多维、立体化，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生动地得以再现。

口述历史是当代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和技术之一。我们在多年从事当代中国地方史研究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口述历史工作对于发掘史实、抢救史料、拓展史域、增进史识所具有的重要而迫切的意义。二十年前，为编纂《当代中国的四川》，就曾对当代四川省若干重大事件的参与决策者和亲历者进行采访录音。2000年，当代四川史编委会经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政府同意，正式启动四川省的口述历史工作。五年来，围绕当代四川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要事、名人，组织三个专题组，定题定人，有计划地进行访谈和整理工作。迄今已整理出口述史料五十余篇，同时征集到一些老同志对要事、名人的回忆文章（也可以说是广义的口述史料），二者合计近七十万字。其中大部分曾在内部刊物《当代史资

料》上陆续发表。

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并建立一个立足四川、面向全国的口述史交流平台，展示和积累口述历史成果，推动口述历史研究的发展，我们同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商定，启动“当代口述史丛书”出版计划，分辑不定期出版。

“当代口述史丛书”的内容既有综合性、全国性的，也有专题性、地域性的；既有要事实录，也有各界名人和普通人的忆述。稿件以口述访谈整理稿为主，亦有当事人的自撰稿，所述经历、人物、事件等均为口述者亲历、亲见、亲闻，或分类结集，或单独成卷。

丛书的要旨是存史，因此，我们将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不溢美，不文过，如实记述，信今传后。愿该丛书成为当代史研究的资料宝库，各级领导的工作镜鉴，关心共和国命运的公民喜爱的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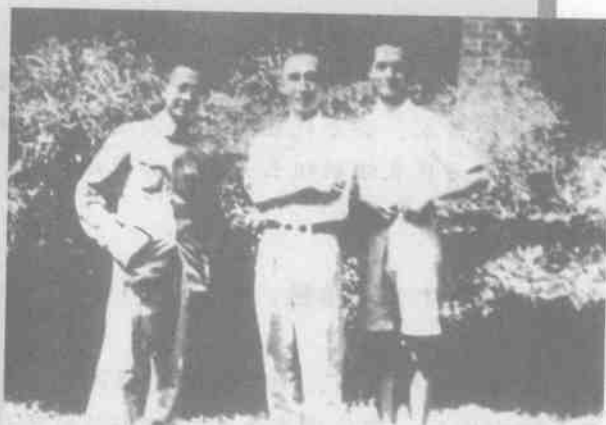
第一 部分

我与卢作孚先生

川西剿匪

川西北民族地区的解放

1956 - 1959 年阿坝平叛



卢作孚先生（中）与两个儿子在成都晏阳初先生寓前合影。



黑水叛乱头号叛匪傅秉勋（左一）、黑水头人苏永和（中）与参与叛乱的所谓“西北回民代表”马颀卿、马德福、马友豪。

我与卢作孚先生

何郝炬^① 口述
黄友良 录音整理

人民解放军在向西南进军之前，中共中央就决定要团结、争取中国航运业的知名人士卢作孚。1950年夏，民生公司准备公私合营，应卢作孚的请求，公方代表组进驻民生公司，本文口述者何郝炬即作为公方代表组副组长并主持公代组工作，由此开始了与卢作孚的直接接触……

我与卢作孚^②先生及民生公司接触，始于1950年夏，时间大约一年。

人民解放军在向西南进军之前，中央就决定要团结、争取中国航运业的知名人物卢作孚。卢作孚本人也早与中共驻港代表许涤新、张铁生有过接触。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卢作孚即被列为军政委员会委员。卢作孚亲手创立的民生公司是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私营工商集团，主要经营船业，在重庆天府煤矿有三分之一的股份，在上海大中华造船厂也有股份，涉及的行业很多，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在川江航业史上有辉煌业绩的企业。抗战时期在抢运迁川物资及军运方面有重要贡献。民生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卢作孚是一个国共双方都极为重视的人物。

^①何郝炬，1922年生。时任交通部驻民生公司公方代表。原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②卢作孚（1893—1952年），爱国实业家，航运家。又名卢思，重庆市合川县人。清宣统二年（1910年）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保路运动，“五四”运动时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925年回合川，10月在上海订购浅水小客轮一艘。1926年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任总经理，经营长江内河航运。经过艰苦创业，惨淡经营，发展成为拥有上亿元资本、一百四十多艘江海轮船和八千多职工的大企业。1940年任全国粮食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并继任民生公司总经理。

南下进军四川之前，段君毅同志对我讲，我们一起去重庆，我去搞交通，你去搞航运，那里有个民生公司，很重要，你去那里工作。当时我还很担心，说干不了，卢作孚是大人物，我怎么能去？到重庆后，我担任了西南航务局局长，就是为到民生公司工作作准备的。卢作孚当时不在重庆，住在香港。国共双方的代表都在做卢的工作，台湾方面曾派“行政院长”俞鸿钧、“外交部长”叶公超到港，劝其去台湾。1950年春，卢作孚下决心回到祖国大陆，6月秘密离港，回到北京，民生公司先后将驶到台、港的近二十艘船开回广州。卢作孚抵京后，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周恩来总理与之长谈多次，又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应卢先生本人请求，西南军政委员会全体委员名单在他抵京后发表（6月28日公布）。同年7月27~31日，卢作孚在重庆参加了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卢作孚回国，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大事，从他回国以后的安排，也可看出党和政府对他的重视和尊重。

卢作孚回到北京后，主动提出民生公司与国家合营。其中的原因，我认为有两点：一是民生公司长期有与政界密切合作的历史。民生公司初期是由民间募股组成的，无官股背景，能成功经营，挤走外轮，称雄长江航线，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与政府建立密切联系，获得支持。他本人1927年获刘湘、邓锡侯同意，任北碚峡防局长，积极参与社区建设；1929年被刘湘任命为川江航管处处长，获得刘湘支持，限制外轮在川江的业务，最终挤走外轮；曾兼任四川省建设厅长、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全国粮食管理局长，与政界关系密切，获得不少关照，得到大批贷款、补贴。如民生公司1944年在加拿大造船，由宋子文出面以国民政府名义担保，向加拿大银团贷款。二是民生公司国内业务受到内战影响，陷入极大困境，到1948年，民生公司已至“外无以偿外债，内无以供开销”，全靠借债、抵押度日的境地。1950年重庆等地私营工商业大都处于萧条状态，劳资双方都在苦渡难关。1950年9月16日，西南局就救济失业工人工作向中央报告，重庆、川东、川南、川北、川西和西康约有失业工人十四万人，不少行业生产萎缩，停工歇业。民生公司虽未停业，但在经营上困

难也很多，如不能获得政府援手，势必难办。我曾亲眼见卢作孚数次到西南军政委员会财委要求贷款，还为此找过小平同志。因此，他主动提出公私合营是有其原因的。

卢作孚提出与国家合营民生公司的方式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请求政府向民生公司派遣公方代表。后来由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决定成立公方代表组，进驻民生公司。组长（首席代表）是于眉（招商局首席军代表），代表七人，其中副组长（副首席代表）二人，我是其中之一，为西南大区方面代表；另一副组长是张平治（中央交通银行负责人）；汉口方面代表张文奇，重庆方面代表陶琦（重庆航务局副局长），北京交通部代表张祥麟、欧阳平（农工民主党）。实际驻的代表只有我、张祥麟和欧阳平三人，由我主持公代组工作，进驻时间约在1950年七八月间。交通部对派遣公方代表组的目的很明确，首先是清理股权，有无官僚股本；其次是清查民生公司内敌特残余力量，公布清查结论，为合营作准备，不是去接管民生公司，不能插手公司事务。对此小平同志有专门指示，是段君毅同志转告我的：到民生公司去，凡是卢作孚同意的事就可以干，卢作孚不同意的不能干。总之一句话，就是要尊重卢作孚。因此，公方代表组的进驻和工作一开始是很顺利的。但由于多种因素，公方代表组与民生公司及卢作孚之间很快就出现了一些矛盾。

首先，民生公司对公私合营的主要期望是政府参股，增加对民生公司的投资，缓解经营困难，而中央对公私合营的看法首先是清查、清理，不直接过问业务，在清查结束前必然不会大量投资。我进去以后与卢作孚接触不少，有的意见是当面交换，一开始也没有什么歧见，后来在两件事上发生了冲突。一件事是关于民生公司的人事安排问题，这件事不是公代组首先提起的，是进驻后民生公司工会首先提出的。工会反映卢作孚任用的几个公司部门经理营私舞弊，名不副实，意见强烈而尖锐。当时重庆工商界正在搞“社会改革”，主要是在码头搬运业及力行中推行工人当家、斗争恶霸等，民生公司虽未开展民主改革，但社会形势对工会、职工有很大影响，要求民主改革愿望强烈。这本不是公代组的工作任务，但我们又觉得不能无视群众的呼声，于是我就向

卢作孚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涉及民生公司汉口分公司经理李肇基（此人是民主人士）、邓华益（民生公司运务处经理）、李若兰（民生公司财务处经理）、何乃仁等几人。我向卢作孚建议，邓华益、李若兰是否可以换一换，李肇基、何乃仁是否可别作安排？卢作孚很为难，一直未表态，我们也无权动，这一问题始终僵持着。

另一件事是民生机器厂厂长在镇反中被杀。抓人是重庆市委统一部署的镇反行动，时间大约是1951年3月。厂长姓陶，叫什么记不清了，好像与卢作孚沾亲。人抓了以后很快就杀了。我事先并不知道抓人，人抓走了我才知道。此事对卢作孚刺激很大，受不了，但未对我当面讲。民生公司有人找到我反映此事，我觉得这是市委决定的，不能推给市委，亦不好表态说不对，就只能说是应该如此处理。结果，卢作孚认为此事是我支持的，把账记在我头上了，后来引出很大麻烦。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对民生公司上述四个人的去留问题的表态，处理得有些不妥当，毛病主要出在对李肇基的民主人士身份尊重不够，对群众意见与工作大局的协调不够好，未能更多地在群众中解释，过分地偏向支持工会方面的意见。镇反的事，我是完全不知道，也没料到后来会成为我调离民生公司的主要原因。

大约在1951年四五月间，清账已到一定程度，卢作孚与我商量，准备在清账结论公布以后，到北京交通部去正式谈合营的事。卢作孚提出他任总经理，由我出任副总经理。卢作孚先走，我过了十来天也去了北京。谁知这一去麻烦了，交通部办公厅主任、党组书记张文昂找我谈话，见面就说：“你怎么在民生公司搞出乱子来？你要检查！”我莫名其妙，一头雾水，不知事从何来。张提到民生机器厂陶某的事，问我是否同意。我说我肯定同意，因为这是重庆市委的统一行动，应该的。为此，我们在交通部招待所一住就是三个月，交通部坚持要我们三人认错检查，我坚持我们没有错，作什么检查？以后我才听人说，当时中央统战部发了一个通报，点名批评民生公司公代组和我，还有“专横跋扈”之类的评语。这事当时没有结论，后来就接着谈公私合营。卢作孚认为我今后还会与他共事，还一直在与我商量民生公司重

组的事。我也未意识到我的工作会变动，离开北京后，到上海、汉口走了一圈，了解公司合营的情况，准备回来接着干。回到重庆，西南财委找我谈话，询问民生公司合营的进展情况，碰到蔡树藩（西南工会主席），他还对我说：“姓陶的事与你有什么关系？”段君毅同志叫我去向小平同志汇报，我说：“我不去了，这是挨批评的事，还是你去汇报，让我听听就行了。”结果段君毅同志去向小平同志汇报，被小平同志狠狠地批了一顿。

1951年七八月间，交通部就民生公司合营工作给西南军政委员会发来电报，电报涉及我的部分内容是段君毅同志告诉我的，电文中明确提出“何郝炬同志不宜再担任民生公司公方代表组负责人”，并引用了我在交通部会上作检查时说到的小平同志对公代组的指示（卢作孚不同意的事不能干），指责我未能执行小平同志有关指示。段君毅同志收到电报后向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看到电文中说我未执行他的指示一段后说：“话不能这样说。”认为说得严重了，并说，“镇反的事不是他干的嘛。”最后小平同志决定，既然交通部是这个意见，我们就调他回来，分配相应职务工作，请交通部另派首席代表。小平同志还说不能说他是犯了错误离开的。后来决定调我到西南建工局任副局长，时间大约是1951年10月。卢作孚听说我要调走，急了，找到我说，他并没有让我离开的意思，还是想与我一起干，并说要去西南军政委员会，请求收回成命。我说，我是很佩服卢作孚先生的道德、人品的，也很愿意跟卢先生一起干，求情就不必了，这是组织决定的事，我是一定服从的。我随即办好手续，离开民生公司，去建工局上任。看来卢作孚只是想向北京反映情况，没料到这个结果。我离开民生公司以后，交通部先是叫张文奇接任首席公方代表，张上任没几天，就要求回汉口，说是干不了。后来交通部也未派人来，叫张祥麟暂时主持。自从“换人”风波以后，民生公司公私合营的事就搁浅了。由于卢作孚是希望很快合营的，现在搁下了，估计对他是有压力的。

我到建工局后，先在特园（鲜英住宅）借了三四间房办公。特园位于西南军政委员会旁边，卢作孚每周都要到西南军政委员会开会，每次会后都要来找我聊天，常常言及民生公司的事情，

直到他去世前，一直是这样。这一段时间卢作孚还找过小平同志要求贷款。此后不久，就发生了卢作孚自杀的事。事发突然，在海内外引起极大震动。出事以后，西南局决定在报上发消息，标题只有“卢作孚自杀”五个字，未说死因。对卢作孚的死因，我不清楚，张祥麟也说不清，但我认为，应与公方代表的工作失误有一定关系，事件的起因是“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2月1日，重庆市按照中央和西南局指示，成立增产节约委员会，作为“三反”运动的领导机构，开始动员、部署运动。1952年1月31日，中共重庆市委建立“反行贿反盗窃国家财产指挥部”，在全市私营工商业中开展“五反”运动。卢作孚大约在自杀前两天（2月6日）来西南军政委员会开会，会后来找我，说马上要“五反”了，每个人都要过这个关，情绪上表现出有些紧张，我对他说这事没有什么，政府会安排好的，你不要去过问，事后看来，他心中是有想法的。我与他不是至交，他不会完全对我讲心里话。

2月8日，民生公司开了一个“五反”动员大会，工会请了卢作孚出席，说得很客气，说是请卢先生听一听，还专门搬了一个沙发放在台上，请他坐着听。会上发言的人，开始较为和缓，但有些话牵涉卢。会开了一半，卢作孚从香港带回来的一个贴身亲随突然跳到台上，开始揭发卢作孚的“罪行”（此人名叫关槐，年龄不大，约二十来岁，成天跟着卢作孚，平日一言不发），把卢作孚的私生活细节作为材料抛出来，言辞激烈，连骂带贬。卢作孚坐在台上，当时脸色就变了，又不能走，硬着头皮听。当天晚上就服安眠药自杀，没有留下任何遗言、遗书。事后，公安、政法部门把关槐逮捕了，说他是“派遣特务”，又在民生公司内调查“敌特破坏”，并对民生公司实行军管。卢作孚的子女事后一直怀疑这件事是公方代表事先组织的，是否属实，我不清楚，但有可能是工会组织的。当时民生公司最好的一条船“民铎”号在丰都触礁沉没，死了一个最好的船长，有人认为这也是卢作孚自杀的原因之一。

1981年，我正在甘孜州出席建州三十年周年纪念活动，接到省委电话，让我马上回成都。回来后得知中央统战部来了电报，

让我参加对卢作孚的评价等工作。此事是卢作孚子女提出的，涉及对卢作孚先生的评价。统战部的意见，由四川处理，省里接待，以谈话方式对卢先生作一个评价，在《四川日报》上发表，交给卢作孚子女，作为正式的依据。省委决定让我^①出面谈话。当时民生公司还有一个老人童少生，他与卢作孚关系很深，但卢家儿女不愿见他，原因是童少生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上写过一篇民生公司的东西，卢家儿女认为对卢先生不恭，不想见他。参加会谈的有卢先生的大女儿（美籍华人），大女儿的孙儿、孙儿媳，老二卢国纪（新民生公司董事长），三女儿，小儿子。会谈气氛比较和谐，我代表省里肯定了卢先生的一生，并说明我个人是十分钦佩卢先生的道德、人品的。卢家儿女提出为卢先生扫墓、迁墓，后由重庆市协助办理完成。这次会谈的情况在《四川日报》上发了消息。

① 1984年11月，省委决定让我出面谈话。当时民生公司还有一个老人童少生，他与卢作孚关系很深，但卢家儿女不愿见他，原因是童少生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上写过一篇民生公司的东西，卢家儿女认为对卢先生不恭，不想见他。

② 1984年11月，省委决定让我出面谈话。当时民生公司还有一个老人童少生，他与卢作孚关系很深，但卢家儿女不愿见他，原因是童少生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上写过一篇民生公司的东西，卢家儿女认为对卢先生不恭，不想见他。

③ 1984年11月，省委决定让我出面谈话。当时民生公司还有一个老人童少生，他与卢作孚关系很深，但卢家儿女不愿见他，原因是童少生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上写过一篇民生公司的东西，卢家儿女认为对卢先生不恭，不想见他。

④ 1984年11月，省委决定让我出面谈话。当时民生公司还有一个老人童少生，他与卢作孚关系很深，但卢家儿女不愿见他，原因是童少生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上写过一篇民生公司的东西，卢家儿女认为对卢先生不恭，不想见他。

⑤ 1984年11月，省委决定让我出面谈话。当时民生公司还有一个老人童少生，他与卢作孚关系很深，但卢家儿女不愿见他，原因是童少生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上写过一篇民生公司的东西，卢家儿女认为对卢先生不恭，不想见他。

⑥ 1984年11月，省委决定让我出面谈话。当时民生公司还有一个老人童少生，他与卢作孚关系很深，但卢家儿女不愿见他，原因是童少生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上写过一篇民生公司的东西，卢家儿女认为对卢先生不恭，不想见他。

⑦ 1984年11月，省委决定让我出面谈话。当时民生公司还有一个老人童少生，他与卢作孚关系很深，但卢家儿女不愿见他，原因是童少生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上写过一篇民生公司的东西，卢家儿女认为对卢先生不恭，不想见他。

⑧ 1984年11月，省委决定让我出面谈话。当时民生公司还有一个老人童少生，他与卢作孚关系很深，但卢家儿女不愿见他，原因是童少生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上写过一篇民生公司的东西，卢家儿女认为对卢先生不恭，不想见他。

⑨ 1984年11月，省委决定让我出面谈话。当时民生公司还有一个老人童少生，他与卢作孚关系很深，但卢家儿女不愿见他，原因是童少生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上写过一篇民生公司的东西，卢家儿女认为对卢先生不恭，不想见他。

⑩ 1984年11月，省委决定让我出面谈话。当时民生公司还有一个老人童少生，他与卢作孚关系很深，但卢家儿女不愿见他，原因是童少生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上写过一篇民生公司的东西，卢家儿女认为对卢先生不恭，不想见他。

⑪ 1984年11月，省委决定让我出面谈话。当时民生公司还有一个老人童少生，他与卢作孚关系很深，但卢家儿女不愿见他，原因是童少生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上写过一篇民生公司的东西，卢家儿女认为对卢先生不恭，不想见他。

⑫ 1984年11月，省委决定让我出面谈话。当时民生公司还有一个老人童少生，他与卢作孚关系很深，但卢家儿女不愿见他，原因是童少生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上写过一篇民生公司的东西，卢家儿女认为对卢先生不恭，不想见他。

⑬ 1984年11月，省委决定让我出面谈话。当时民生公司还有一个老人童少生，他与卢作孚关系很深，但卢家儿女不愿见他，原因是童少生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上写过一篇民生公司的东西，卢家儿女认为对卢先生不恭，不想见他。

⑭ 1984年11月，省委决定让我出面谈话。当时民生公司还有一个老人童少生，他与卢作孚关系很深，但卢家儿女不愿见他，原因是童少生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上写过一篇民生公司的东西，卢家儿女认为对卢先生不恭，不想见他。

⑮ 1984年11月，省委决定让我出面谈话。当时民生公司还有一个老人童少生，他与卢作孚关系很深，但卢家儿女不愿见他，原因是童少生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上写过一篇民生公司的东西，卢家儿女认为对卢先生不恭，不想见他。

⑯ 1984年11月，省委决定让我出面谈话。当时民生公司还有一个老人童少生，他与卢作孚关系很深，但卢家儿女不愿见他，原因是童少生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上写过一篇民生公司的东西，卢家儿女认为对卢先生不恭，不想见他。

⑰ 1984年11月，省委决定让我出面谈话。当时民生公司还有一个老人童少生，他与卢作孚关系很深，但卢家儿女不愿见他，原因是童少生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上写过一篇民生公司的东西，卢家儿女认为对卢先生不恭，不想见他。

⑱ 1984年11月，省委决定让我出面谈话。当时民生公司还有一个老人童少生，他与卢作孚关系很深，但卢家儿女不愿见他，原因是童少生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上写过一篇民生公司的东西，卢家儿女认为对卢先生不恭，不想见他。

⑲ 1984年11月，省委决定让我出面谈话。当时民生公司还有一个老人童少生，他与卢作孚关系很深，但卢家儿女不愿见他，原因是童少生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上写过一篇民生公司的东西，卢家儿女认为对卢先生不恭，不想见他。

⑳ 1984年11月，省委决定让我出面谈话。当时民生公司还有一个老人童少生，他与卢作孚关系很深，但卢家儿女不愿见他，原因是童少生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上写过一篇民生公司的东西，卢家儿女认为对卢先生不恭，不想见他。

㉑ 1984年11月，省委决定让我出面谈话。当时民生公司还有一个老人童少生，他与卢作孚关系很深，但卢家儿女不愿见他，原因是童少生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上写过一篇民生公司的东西，卢家儿女认为对卢先生不恭，不想见他。

㉒ 1984年11月，省委决定让我出面谈话。当时民生公司还有一个老人童少生，他与卢作孚关系很深，但卢家儿女不愿见他，原因是童少生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上写过一篇民生公司的东西，卢家儿女认为对卢先生不恭，不想见他。

川西剿匪

裴田夫^①口述

张继禄、邓寿明 录音整理

刚解放的四川，在宣布起义的国民党军队中有少部分并不是真正投诚，有机会就又叛变。四川是大陆解放较晚的地方，有不少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活动非常猖獗。他们勾结惯匪和一些地方反动势力，在川西地区大面积地发动暴乱，攻占城镇，破坏交通，杀害了我大批军政人员。对此，我们估计和准备不足。后来及时调整了战略和部署，首先重点剿灭主要的土匪及匪首，迅速平息匪乱。

刚刚解放的四川，土匪活动猖獗^②。土匪分两种：一种是国民党的部队，有的宣布起义后，整师整团的又叛变；另外一种就是国民党布置的特务和惯匪及一些地方反动势力相勾结成匪。我们剿匪的主要任务就是这后一种，因为这部分量大。

一、以少胜多，歼灭叛军

国民党部队宣布起义后，成建制师以上叛变的有四支队伍，我只简单地说一下。

第一个是国民党的新一军有组织地哗变。我们六十军一八〇师的五三九团追到金堂县将其截住。那是1949年12月26日的事。这是一个以特务为骨干的军队，他们根本没有起义的准备，也不准备投降，目的是想趁我们部队还未完全合围的空隙，窜到巴山或湖北交界的山区去开辟游击根据地。

第二个就是西南游击第一路和第二路。第一路司令是王缙绪，

^①裴田夫，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六十军司令部参谋。

^②1950年2月5日，成都东北郊龙潭寺石板滩发生匪特暴乱，迅速蔓延到温江专区全境、眉山专区大部。月内，川南、川东、川北、西康省均发生匪特大规模暴乱。

他下面的部队叫治安总队，这一路在川西叛变中人数最多。而第二路我们则始终没有弄清楚他的人数到底有好多，只是他们起义后，我们安排他们待命，他们不听招呼，私自向绵竹方向跑。那里都是土匪控制的地方，那怎么行呢？我们就派部队对其实行了缴械。我们当时没有详细登记，其实他的人也不是很多。他们的司令叫唐式遵。这个唐式遵后来在西昌战役中的冕宁县甘相营被打死。

第三个就是国民党的三十八军。这是一个正规部队，在秦岭就一直和我们对着打，到四川广元还不断地和我们对着打。敌三十八军是1949年的12月11日才拨给裴昌会兵团的。裴昌会起义了，三十八军却不听他的，军长李振西，率着他的三千五百多人往茂县方向跑。我十八兵团就命令修都江堰的六十二军一八四师去解决这个军。他们是一个军，我们只有一个师，从番号讲就小了；当时一八四师又只派了一个五五二团去消灭一个军，番号就更小了。于是五五二团一路上用计迷惑敌人，在电台上用明码呼喊，营长称为师长，团部称为前线指挥部。这个指挥部就没有大小了，指挥几个师也是指挥部，指挥三五个营也是指挥部。他们的电台可以直接听到我们的呼叫，我们把联络时间等都明码喊出来。五五二团先跟着走，还有六十军一七九师派了一个侦察连，带上电台，去了两个人，一个叫袁开喜，是位老红军，一个叫乔亚，袁是接收茂县专署的军事代表，乔是接收茂县县府的军事代表。我后来到茂县后袁开喜是我的科长。

敌三十八军到茂县后，听说解放军来了就向东跑了，跑到茂县以东的土地岭。那里有个土门镇，就是绵竹县那个大山翻下来的土门镇。这是一个要隘。我们派人给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送信去，那是贺龙司令员给他写的劝降信。但李振西接到信后，并无意投降，反而想到松潘有一个国防部的突击总队司令樊廷簧，还有国民党的一三四师，另外西康省主席贺国光也在西昌，当时的康定还有三一〇师田中田的一部分人。李振西便和这些地方联系，准备联合对抗十八兵团，妄图以此来联合成立一个根据地。我们看出李振西在拖延，政委张敏说，拖起不行，必须把他打掉，就命令集中炮火打击。这下他们感到不是对手，就派人来求

降。求降可以，但必须马上办，叫他们到茂县城东门外，把武器放在那里。他们就开始缴枪。

我们的部队就摆在两边山上。我们安排把投降的部队开到灌县（今都江堰市）整顿。他们有三千五百多人，比我们一个团的人多，我们仍然不暴露目标。我们只给他们划定行军路线，要他们自己走，还对他们说：既然投降了，我们也不押送，相信你们，自己走。我们主要还是怕暴露自己人少的目标。我们每天都给他们安排好线路，规定必须按路线走。他们走到灌县后，我六十二军一八四师的师长接见了李振西，告诉他歼灭你这个军实际上我们只用了一个团。李振西当时很吃惊，他说解放军用兵如神，真是兵不厌诈，实在佩服。他是真的佩服，一个团敢去打他一个军，而且把他逼得投降，我们没有付出什么大的代价。后来还是给他们以起义待遇。我们宣布这个决定后，他们从上到下都比较高兴，很多人说，到底还是优待了。后来这支部队被合编到解放军六十二军去了，李振西被调到军区，由军区给他安排了工作。

在解决这个军时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们的部队追到汶川威州后，威州有两个团，一个团长叫杨绳武，另一个团长叫桑梓侯，桑梓侯是杂谷脑的守备，他有两千多人，旗号是“反共救国团”。这里是我们去茂县和松潘的必经之路，我们就派人和他谈判。他看了我们的《川西日报》，知道作抵抗是没有用的，就同意了起义。并且很快把牌子挂出来，把番号改成“解放委员会”。他们那么多人，我们要不了，叫他们那些人都回家去。那些兵也愿意回家，因为他那些兵多数是自己带干粮来打仗的。我们只同意他的一个团留两百人，两个团留四百人。留下的人跟我们去打三十八军，但不让他们上前线，只要他们助威。我们又分了两个连的人去带上他们。占领岷江以西，沿着岷江从威州向茂县前进，他们一路上虚张声势凑热闹，还是起了一些作用，使李振西看到河东河西都有部队，被迫缴械。我们于1950年1月24日解决了三十八军。

第四个就是二十军的一三三师和一三四师。这两个师是杨森二十军的主力部队，还有在金堂起义的二十九师、一三五师也属

二十军的主力，但真正的主力是一三三师、一三四师。这两个师很反动，在山东沂蒙山区时破坏极大。该军曾多次被我们歼灭，因为反共有功，蒋介石要杨森把部队的番号保留着。杨森在重庆收罗他的残兵败将重新组织起来，成了他在重庆任卫戍司令时的主力部队。一三三师和一三四师的装备挺好，服装枪炮都是美式的。二十军宣布起义（当时是杨汉烈任军长），可是一三三师、一三四师不起义。一三三师在金堂，师长景嘉谟、副师长何学智带着全师往什邡方向跑。驻在什邡和安县交界的一三四师，师长叫萧传伦，率着队伍往茂县跑。

我六十二军决定马上追击他们，派出五五四团去追击。那时，我们追击国民党的一个师，大部分都是派一个团，从力量和装备上是较弱的。国民党的一三三师全是美式装备，有两千多人，我们的人要少些，装备就更差了，但是，我们的精神旺，从士气上能压倒他们。五五四团的一个副团长叫杨青奎，率部追赶，没有暴露目标，沿途多造假象迷惑敌人，一直追到绵竹和什邡交界的地方。一三三师的景嘉谟和我们作战多年，知道我们的战略战术，相当狡猾。我们的部队一行动，他就知道了，他每天移动驻地，当我们马上就要追到他们时，他们就换防，要打他也比较麻烦。但我们的行动还是比他们快，追上后，马上派两个连断其后路。敌人拼死反扑无效，就在包围圈里和我们转圈。我们部队赶快收缩防线，把重要道口控制起来。后来他们又跑到绵竹和灌县交界的木瓜坪，我们立即把他们围起，叫他们投降。当时我们把他们全部消灭还不可能，我们的兵力少，接受投降时不收他们枪支，怕强迫收枪出问题，就叫他们到广汉。他们在路上走得慢腾腾的，每天走二十里，最多走三十里，每到一处驻地，他们就修工事，挖交通沟，砍老乡的树，强迫群众送粮、送款，糟蹋妇女，军纪很坏。就这样磨磨蹭蹭地走，我们也没别的法子，只有提高防备。为了防止景嘉谟下令叛变，我们派了一个连指导员，带了两个人，景嘉谟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如果有情况，就先开枪打景嘉谟。每到一个驻地，五五四团就派部队把他的指挥部包围起来，形成一个小包围圈，使当官的接触不到部队。最后我们把他们带到了广汉。

广汉有条河，我记不清名字了。一三三师的部队到了河滩，我们便叫他们集中缴械，他们不缴械，还派了一百余人的手枪队，带上二十响的驳壳枪要进广汉城，他们说要去号房。我们摸清了他们的底细，那些人进城是想控制要点，里应外合。他们一进城门，我们就把枪给缴了。外面的得不到消息，我们就命令他们投降。我们的团副政委程普哉和政治部主任李松贞给他们讲话，叫他们缴械。一三三师的一个军官下命令开枪，我们的两位领导当时就负了伤。实际上我们叫他们在那里缴枪，在周围已经埋伏好了部队。这下他们先开了枪，我们部队就开枪射击，不到一个小时，河坝就摆了五六百具尸体。景嘉谟、何学智和三个团长等两千余人投了降。

敌一三四师虽是战败之军，但是二十军的主力之一。二十军起义时，一三四师驻在北川，师长萧传伦勾结一三三师师长景嘉谟叛逃。萧传伦率三个团逃至松潘，与国防部突击总队司令樊廷簧会合。

2月初，我六十军一七九师奉命歼敌。7日，五三五团团长兼政委姚晓程率两个营到达松潘南六十里的归化关，受到松潘各界人士组成的解放委员会代表的欢迎。据代表反映，敌人已到四天，到处抓人抢物，闹得鸡犬不宁；还构筑工事，准备据守。如果敌人血洗松潘，西逃草地，对我歼敌很不利。部队下决心，争取在松潘解决敌人。但松潘城城高墙厚，易守难攻，且敌人先到，以逸待劳。我两个营一千余人要强攻一千三百余人之敌，即使克城，也要付出极大代价。于是五三五团决定智取，由第一营插入敌后，断其退路，逼敌就范；第三营正面强攻。8日晨，经过两小时激烈战斗，击毙萧传伦师长以下三十人，俘敌八百四十三人。五三五团牺牲二人，伤九人。五星红旗插上了松潘城头。残敌向毛儿盖方向逃跑。10日，我追击部队在中岩羊角塘击毙樊廷簧等六十人，俘一百三十九人。余匪逃至金川、黑水一带，多次暴乱，于1952年黑水战役被全歼。

二、川西匪乱四起

我们对川西土匪的嚣张气焰，开始估计不足，没有预料到土匪大面积地攻我们的城镇。土匪开始是破坏交通，杀害我们的人

员，我们先后共损失军政人员三千多人，比我们打一个大战役还要厉害。土匪还抢走我们许多粮食。成都的粮食当时非常困难，眼看着军队没有吃的，老百姓更困难，我们不能让人民饿死。我们的征粮政策是很明确的，对富人多征，对穷人少征或免征。刚解放，好些地方还是留用人员把持政权，他们不按我们的政策办，把征粮任务加在穷人头上。我们开始对国民党的残余部队能够成为土匪的认识也是不足的，以后我们定了几条方针：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彻底消灭土匪；合理部署部队，搜集情报，探明匪情，实施重点进剿，首先聚歼主要土匪，零星的可以暂时不顾，有的地方也可以暂时退出，这期间我们就放弃了大邑县、崇庆县（今崇州市），因这些地方不好守。在川西最早开始的就是龙潭寺的土匪暴动。我们原来也没有想到龙潭寺的土匪暴动会引起川西大面积大规模的叛乱。在川西的国民党游干班分子，大概有两千多人，由张跃明、王旭夫两个人负责。1950年2月5日的叛乱是这样起来的：有一个胡宗南委任的东山联合会会长，是个袍哥头子，洛带镇的镇长，叫刘惠安，被委任为川陕鄂反共游击第六纵队的司令；还有一个副司令是中统特务，是四川省会警察局的局长，叫刘崇朴。这就说明土匪的暴乱是有准备的，不是临时起来的。2月5日的叛乱，是由李干才、刘炳章等几人带头闹起来的。李干才是一个反动军官，三十多岁，与毛人凤的关系很密切。我们入城后，他假装起义，混在国民党新九军里面。还有一个是刘锡廷领导了一个三百人的教导队，杀了我们的副营长、军代表赵德修及指导员刘伯周。刘锡廷鼓动三百多人，四面串联、勾结。龙潭寺叛乱打死了我们负责改造国民党原三兵团的朱向离同志，那个枪手叫王荣芳，抓获后，我们在龙潭寺开了七千人的大会公审，枪毙了他。那小子才二十六岁，很坏，杀人不眨眼。

土匪起事是在成都龙潭寺，他们的目标是新都石板滩，那里是我们改造国民党军队的一个重要驻地。他们当时攻龙潭寺是怎么攻的，我的一个战友知道，但这个战友前两天已去世了，他当时就是我们派出的五三二团团长的警卫员。土匪头子把八仙桌摆起，码起银元，弄得哗哗地响，还叫嚣：谁能攻到解放军的里头，

拿下阵地，攻进去的人一人一百块。好多人在外面呵嘴连天^①地叫唤。我们部队的人并不多，枪手准备好了，看见一个起来抬手就是一枪，子弹从胸口穿过去；第二个起来又一枪撂倒了；第三个就不敢起来了。

起义的国民党原第三兵团的司令朱鼎卿，思想改造进步比较快，他给我们的部队领导提出来，能不能给发些枪，组织两到三个连队，跟解放军一块儿作战，共同来对付土匪。还说如果组织起来的部队有整连整排的叛变，由朱鼎卿来抵罪。他组织的几个连队，和我们共同作战，表现还是不错的，把石板滩的土匪剿灭后，他组织的人没有发现一个逃跑的。2月6日我们就开始派部队，派出五三二团的一部分去解围，直接到石板滩，总共才打了二百多土匪。我们去的部队很少，东拼西凑才凑了五个连队，只是把土匪打跑了。

土匪队伍形成以后，大股的有数千人，开始的时候是小股的，真正叛乱的还是胡宗南派系中的。叛乱开始时土匪就围我们的小部队，后攻城夺镇。在川西攻温江、崇庆、大邑这些县城，还攻过灌县。当时我在灌县城内带领部队守卫县城，不让敌人攻进城。土匪聚集起来在外边吼叫，我就站在东城门往下看。灌县城外的太平街，满街都是群众，土匪让群众在前面闹，他们就到后面去抢人，蹂躏妇女。我们没有开枪，土匪也没有开枪。我们当时的枪炮火力还是强大的，弹药也充足，但就是不能开枪，因为到处都是群众，土匪混在其中，难以区分。我们在城内时，就听说有一股土匪，要从城墙的一个洞钻进来，有二三百人，好里应外合。我们就命令部队去把那个洞守着，来一个杀一个。最后土匪也没有敢从那个洞钻进城。我们放哨的都是站在房上。城外的土匪晚上围着闹，白天又不见了，他们钻到竹林里、村子里睡觉去了，要打也打不得，主要是弄不清楚。真正把他们包围了，他们就把枪往水沟里一丢，说自己是老乡，是好老百姓。我们的部队当时很紧张，我们的一个山炮连守城墙，炮里面装的都是榴霰弹，这种弹一出去就爆炸，面积一大片。这是为了防止土匪冲击

^①呵嘴连天：四川方言，形容吵闹得非常厉害

我们的阵地，只有等土匪冲到面前时才用。上面指示能守多久守多久，守不住就退出来。

王缙绪的几个部队挺坏，我们叫他缴了武器，听候改编，他们说武器有呀，都在崇庆州放着，你们去把它取回来就是了。当时土匪有几千人在攻崇庆城。这些人本身就是土匪，当然不愿把枪交出来。当时川西地区非常紧张，除了成都市到大面铺这一段路交通还可以外，其他地方一出城门不远就不通了。土匪消息灵通，你是小部队出来，他就把你围起，你向东去，他东面开枪，向西去，他西面开枪，把你围在当中。如果你大部队出来，他就四面打枪，一声吆喝不见了，打也不好打。出城后，好多地方不见走路的人，真是路断人稀。偶尔有人走也是解放军的部队。还有更厉害的，我们军长坐着装甲车从成都到灌县去视察，在路上，土匪还打装甲车呢！我们立即开火，打跑他们。起义的国民党九十五军有些人 and 土匪相互勾结。以后我们就想办法，穿上便衣，化装成商人，坐着车，带着礼帽，看样子很有钱，他们就来抢。等他们一来到面前，我们就掏出手枪对着他，把他带的符号扯下来，要他回去。我们拿着这个符号到北较场，找军长黄隐看。黄一看，就说还有这种事，把下级刮一顿胡子，下面才收敛了一点，要不然土匪还凶。当时土匪嚣张，奸商也嚣张，哄抬物价，特别是粮价，涨得更快。反动分子囤积粮食，群众买不到，人民的生活十分紧张。小商小贩营业，他们又鼓动小流氓去抢小商小贩，小商贩也不敢出来做生意，铺面也不开了。

因为我们的剿匪任务很重，而兵力又不足，因此给起义部队也分配了剿匪任务。多数还是执行了的，有的执行得很好，但也有支持土匪的，有的还当了土匪。剿匪里头还有一个故事呢。我们在打土匪的时候，土匪就跑到一个起义部队驻的村子里去了，我们在后面撵，看到他们进村，于是我们就跟起义部队联系，请他们放人出来，交出来就没事。他们不交。我们一个营长叫李作军，有点脾气，问他们给不给？他们的一个营长说没有，并且顺手就给李营长一枪，子弹从其脖子上划过，擦了一点皮。李营长一怒之下命令战士们上刺刀冲，一下就冲到村子里头去了。他们看到“三八”式步枪上了刺刀冲进来便没有敢动。李营长也没有叫

我们战士用刺刀戳人，只叫他们把枪放下就算了。后来我们把这个营弄到灌县，给他们上政治课，白天上课，晚上住在房子里不让出来。有时晚上给他们放电影，群众不愿和他们一块儿坐，都愿坐在我军一边，这对他们也是一个教育。教育了八九天，上级命令说，他们也没有和解放军打，就算了，把他们全放回去，枪也还他们。

三、平息川西匪乱

1950年6月，开始重点剿匪。参加的部队，有六十二军的四个团，六十军的五三八团，一七九师的一个营，由川西军区的副司令王新亭率领，在郫县的吴家场、花园场歼灭了夏斗枢部。25日歼灭花园场、石羊场的土匪，击毙了司令黄承柱，毙土匪两百多人，俘八百多人。26日在吴家场，击毙司令陈利石等一百多人，俘六百多人，陈利石的主力基本垮了。土匪一经消灭，当时郫县的物价大幅度下降，猪肉从三万元（旧币）降到一万元。

6月初，我们还打了一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战斗。在双流、华阳、新津、彭山、仁寿一带，打的是刘苍林。这是第二次平息石板滩的暴乱。第一次是只打散了，第二次又起来，我们才正正规规地围歼，我们把他的大部分消灭以后，刘带了两百多人逃跑，跑到成渝公路线上，在那里被我们的部队消灭了一百八十多人；他们又向牧马山方向跑，又被我们的民兵打掉了十几个，这次才把这股土匪彻底消灭了，只是刘苍林跑掉了。

8月21日，我们又打夏斗枢。夏的主力在川西被消灭了，但夏逃脱了。他带着几个人钻到灌县以北的虹口山里，收容二十军、三十八军等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共有七百多人。这时的夏斗枢不再和我们成群结队地打仗了，他把大股化成小股，小股再划小，一直划到小组，不知划了多少小股，但是都在那一片活动，并和当地的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他不发饷，也不供粮，都是自己弄来自己吃，谁捞着算谁的。夏斗枢是川西暴乱的主要头子之一，这股土匪我们必须消灭。川西军区就调部队来打夏斗枢。我们分两路走，一路从灌县走，一路从彭县走。六十军五三七团带着灌县警卫营的一个连，五三五团带彭县警卫营一个连，去合围夏斗枢。合围比较困难。夏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当过

杨森多年的副军长，中将衔。我们和他打，他就和我们周旋。我们部队的速度很快，把他打散了，最后把夏斗枢的老婆捉住了。她说夏到哪里她也不知道，因为跑不动才被捉住的，谁也顾不了谁了。她说的倒是实话。我们随即对夏斗枢开始四面八方地搜呀，找呀！没过几天，我们发现一个山洞，一查，夏的指挥部的确在山洞里头。

那个山洞在山上，是一个悬崖，部队从哪里也过不去，下面枪也打不到，用炸药去炸也不行，因为有一个六十度的坡度盖过洞口，炸药掉不到洞里。夏斗枢利用洞口的石坎，在洞口还做了一个小暗堡。五三五团的三连攻那个洞，指挥所就在后面山头上，看着部队去攻打，攻了几次，怎么也接近不了那个洞。后来三连请求用炸药去爆破，通讯员来说要马上答复，指挥所同意。三连就把炸药包捆好。以前战场上当爆破手是要争的，大家争着去，这时就不允许争了，连长命令一个战士去，他叫吴志明。吴志明抱着炸药去爆破，三连用火力掩护。吴志明到洞前一看，这个洞很难炸，洞下有个石坎和洞有一定的距离，上面用石头垒了一个小碉堡，周围有一些树枝，还埋了几个地雷。吴志明绕过地雷爬到洞门前，他抱着二十公斤的炸药，可放在地下不行，因有石坎挡着，且不知石坎有多厚，可能根本就炸不了洞；放在碉堡上头，敌人在里面看得见，可以将炸药包推下去。吴志明只好用手钩住悬崖的裂口，紧紧把炸药包抵在石坎上的小堡外，一手拉导火线……在指挥所里，我们看见火光一闪，一股青烟冒出，随着地动山摇的爆炸声战士们顺势冲了上去。夏斗枢等也被震得目瞪口呆，被捉了出来。夏的师级头目就被捉了五个。

吴志明壮烈牺牲了，连个完整的尸体都没有，只有两只脚在附近。我们把凡能捡到的都捡起来，用毛巾裹起，带去掩埋了。因为我当时在指挥所，这位烈士埋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们当时没有搞宣传的人跟着去，这个烈士没有得到宣传，书上没有，文件里头没有，只有六十军的一个总结上说吴志明烈士在消灭夏斗枢时牺牲了，就这一句话。烈士牺牲的地方就是现在都江堰里面的虹口一带，我几十年没有去，那个地方能不能找到都说不清楚了。

我们在歼灭夏斗枢的同时，又派了部队去打赵洪文国。赵洪文国，传说是“双枪老太婆”，其实她不拿枪，她是双小脚，是个土匪婆。她的部队到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不清楚。反正她出来后，也没有被国民党收编为正规军，一直就是一个没名堂的杂牌部队，从东北流到中南，又从中南转到四川，一路就这样走。据说她在东北就是土匪，到底和蒋介石是什么关系我不清楚，总之，从东北到西南都当她的土匪。她的儿子叫赵连仲，跑到重庆的国民党国防部，要了三十三挺机枪、三百万发子弹、四百颗手榴弹、两部汽车、两部电台和两千元白洋，跑到川西来，组织了一个“人民救国自卫军”，就成了她的老底子。成都解放后，正规军跑了，她也跑了，跑到郫县、灌县。她看到那里不对，又纠合一些反动分子，共有两千多人，想跑到茂县去和国民党三十八军合在一块儿，共同建立根据地。后来她听说三十八军被我们缴械了，她就不敢去了。

我们为什么要先消灭这股土匪呢？因为土匪很容易影响起义部队，他们让什邡的十六兵团不要起义，反攻我们，又派人到彭县的九十五军策反。这样一个土匪头子，当然是我们要对付的首要对象。这一次我们还动用了起义部队（十六兵团的两个师），叫他们从绵竹那里合围，我们的部队从灌县、彭县、茂县去合围。合围比较成功，到了6月26日，就把这股土匪打垮了，赵洪文国就跑到山里头去了。

赵洪文国哪里受过那样的苦，吃的不行，住的不行，又不得安宁。土匪婆命令两名部下给她弄个滑竿坐上，抬滑竿的慌慌张张地把老太婆摔了个大跟斗，老太婆痛得不得了，也顾不得了，爬起来就跑。要是平时，当兵的把她摔了，那还不打死。她在和她一起的叫宋桂名的医生帮助下，跑到一个叫余华富的农民家里，逼着农民不许声张。我们开始大规模地搜查。起义部队三〇四团一营一连连长叫何建基，他们连把赵洪文国搜到了。一看她不像是当地农民，穿着也不同（当地农民穿不起那些衣服的），心想肯定是土匪婆，拿出照片一对照，果然是她。一搜身就把蒋介石任命她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的任命书、私章等都搜出来了。她看跑不脱了，但很快发现这个何建基是起义部队的，就鼓

动他说：“我们过去都是为党国效劳的，现在有困难了，你放了我，以后我们得势了，好共同为国家出力嘛。”何说：“我现在起义了，我是人民解放军，跟你走的不是一条路，我绝对不会放你的。”这样就把她押回来了，由十六兵团交给军区政治部。公安部指示把她给囚起来。后来怎样枪毙了，我们当参谋的不知道。这个起义部队立了功，我们军区还给那个师发贺电，给三〇四团一营一连每人奖励了一条毛巾。一条毛巾虽然算不了什么，但全体指战员们都感到很荣耀。

1950年2月27日~3月4日，六十军五四〇团、五三六团、工兵师、眉山军分区、七十二团，全部在温江、新津、华阳、双流之间的五县两场剿匪，打的是李泽儒。李匪共有二千零三十人。我们一下子把他们打得差不多了，打死了一百五十多人，俘虏了一千八百多人，李泽儒被俘，这是一次比较彻底的行动。李泽儒是在人民公园开公审大会镇压的匪首之一，同时还有夏斗枢等七个匪首。

1950年3月9~12日，第七军十九师在金堂消灭了一个名叫蒋正南的匪首。蒋在陕南就是土匪，我们进军四川时，他带着土匪部队从陕南跑到川北，在那里占了三四个县的地盘，嚣张一时，闹了一阵子，最后没有闹起来，他后来跑到金堂来，十九师消灭了他一千三百三十一人，把他也打死了，整个股匪就彻底完蛋了。

1950年3月30日~4月5日，我们六十军的五三六团、五三七团、五三八团和灌县的主力团，歼灭了一部分宋国太的土匪。宋是一个老土匪、老惯匪。其人数不多，总共只有五百多人，我们歼灭了他三百多人。川西大暴乱的时候，他带着他的五百人出来，当时就被消灭了两百多，这次又把他三百人消灭了。可是这个老惯匪跑掉了。据说是跑到懋功（今小金）去了，但是打懋功的时候没有找到。有的说被打死了，但未见尸首，没有发现下落。

我们打宋国太还有一些趣事。在宋国太盘踞的那个地方，经常发生瘟疫，死人，不是这家哭，就是那家号，一年四季没有断哭声。我们去后，先把村子扫得干干净净的，群众病了，我们就

给药吃。有些太苦的没有衣服穿，我们还送一点。我们采取一些简单的预防措施后，慢慢没了病号，不死人了。老百姓说，是神来了，天上的菩萨来了。我们解放军在那里说话很管用，老百姓没有不听的。我们清剿宋国太，有个人说，你们找不到的，就是宋国太从你们对面走你们也不认识，你们派那么多的部队是看不见他的。我们听后，觉得群众说得有道理，把部队撤了一部分，就发动群众隔离宋国太。宋国太的家就在卧龙的三江。当时群众发动得很好，没有给土匪送信的，没有跟土匪走的，没有抢人的。

后来就转入净化阶段，这个阶段从3月下旬开始。主要是捉了黄光辉。黄是川西叛乱的主要土匪头子之一。我们把黄光辉的队伍消灭后，他跑了，跑到哪里，我们不清楚，一直没有抓到。后来他又跑回来了，躲在他亲戚家里头，被我们部队的侦察连侦察到了。可当派了十几人去捉他的时候，屋里屋外都搜遍了，就是没有人。清清楚楚他就在这个屋子里头，但都找不到人，大家怎么也想不通。最后大家仔细看、慢慢查，发现他在粪池里泡着，只露了个鼻子和眼睛。把他弄起来，用清水冲洗一下就押走了。后来被镇压了（是和夏斗枢一起被枪决的）。

建国初期的头两年中，川西地区共歼灭土匪约十万人，把川西地区的大小股匪基本上剿灭干净后，社会秩序才好起来。

川西北民族地区的解放

裴田夫^① 口述

张继禄 录音整理

1950年1月，人民解放军六十军一七九师奉命进军汶、理、茂、松地区。解放这个多民族聚居地区经历了艰苦残酷的战斗，三占懋功、两进靖化、恶战黑水，决战草地，川西北民族地区最终全部解放。

1949年12月30日，人民解放军举行成都入城式之后数日，六十军一七九师移驻温江。1950年1月20日，师、团干部到成都参加六十军召开的军事会议，会议决定一七九师立即向汶、理、茂、松进军。会上，贺龙、胡耀邦等领导特别强调要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建设这个多民族的地区。首长还要求一七九师发扬“临汾旅”的光荣传统，解放茂县全部地区。1月26日，一七九师在温江召开誓师大会，师长吴仕宏作了关于解放汶、理、茂、松的军事报告，政委萧新春作了关于正确执行民族政策的报告。28日，一七九师部队沿岷江向茂县挺进。

一、解放汶川、茂县

开始是一八四师五五二团奉命追歼敌三十八军。三十八军是胡宗南的王牌军，由十八兵团划归七兵团指挥。七兵团在德阳孝泉镇起义后，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率其残部三千五百余人逃至茂县，准备与逃入松潘的樊廷篁勾结组织第八兵团。当时参加抢修都江堰的六十二军一八四师奉命歼敌，令五五二团政委张敏、副团长江岗率部追歼。五五二团组成茂县前线指挥部，将营称为

^①裴田夫，时任茂县军分区参谋。

师，利用报话台明码直呼以张声势威慑敌人。21月18日，该师侦察科科长任成宜率师侦察连进至汶川威州镇，接收了一支国民党的少数民族反共武装三个团，将其大部分人员遣散返乡，留部分人员在威州，协助人民解放军解放茂县。19日，侦察连进入茂县。敌主力东逃，零星人员及地方武装投降，茂县宣布解放。21日黄昏，五五二团攻占茂县以东土地岭，逼近敌军部，并派人向李振西送交劝降信。李故意拖延时间而不肯降。五五二团向敌开炮轰击。李振西率部于23日上午全部缴械。24日，三十八军按我指定路线开赴灌县。我军未随队押送。李振西直至灌县被一八四师首长接见时，始知歼其全军者只有解放军一个团，对此佩服不已。

其次是一七九师接收茂县专署和茂县县政府。五五二团歼灭三十八军之时，一七九师即派出师部直工科科长袁开喜、民运科副科长乔亚带电台一部，率五三七团侦察连为师先头部队，在友军手中接收茂县专署，袁开喜为接收专署的军事代表，乔亚为接收茂县县府的军事代表。

2月2日，一七九师率五三五团到达茂县，师部和二营留驻茂县。一七九师成立茂县军分区，师长吴仕宏任司令员，政委萧新春任政委兼地委书记，副师长张国斌任副司令员，副政委张向善任副政委兼专署专员。乔亚任茂县县委书记兼县长，五三五团参谋长李安逸任汶川县县委书记兼县长，五三五团政治部主任侯勇任理县县委书记，张振福任县长。

茂县解放时，国民党专员何本初按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成都逃跑前的计划，使用反革命两面手法，宣布假起义，暗中将茂县有名的袍哥大爷、劣绅、恶霸、反动官吏等拉在一起，组织了一个“解放委员会”，同时成立了一个“反共救国指挥部”，下设四个指挥部，公开与解放军为敌，组织武装叛乱。何本初名为“解放委员会主任”，不但不协助人民政府做工作，反而逃向水沟子，躲在张定华处不肯回茂县。张向善专员在召开第一次会议时，派人动员何本初回来办理移交手续，何推三阻四，耍阴谋只缴几件破旧武器，将好武器分散藏匿，有的还分给下属组织，嘱其以后叛乱使用。鉴于何本初的顽固态度，专署按照约法八章，将其拘

禁，使其独居交待，但何不思悔改，反而向隔墙特务转交给逃入黑水的傅秉勋写的密信，表示一旦脱身，愿与其同谋大事，望暗中接应。此信被军分区司令部参谋发现，将送信人截获。鉴于何的不可改造，专区将何交给奉命回成都的一七九师押赴成都处理。部队出发时，隐藏的特务分子假扮农民跟随，在龙溪镇宿营时，何借故如厕，特务分子接应，何乘机逃逸了。

二、解放松潘

1950年2月7日，五三五团一营、二营由政委兼团长姚晓程率领前往解放松潘，当行至城南归化关时，松潘各族人民自动组织的解放委员会已派代表前来迎接。据代表讲，敌一三四师到松潘已经四天，他们在县城及周围抓人抢东西，弄得鸡犬不宁，并有逃往若尔盖草原的企图。我军对此早有估计，要争取时间全歼顽敌，决不能让其逃跑。当晚，营长张国发率第一营提前出发，连翻几座大山，向松潘东山迂回急进。到达东山时发现有余敌，一营经二十分钟战斗将其全歼，然后急插城北堵匪逃路。9日拂晓，营长孙占海率三营进抵松潘城下展开攻击。敌发现东山无火力掩护，解放军攻城甚急，企图弃城逃窜。三营在城南攻城时，一营在城北不动声色地架人梯登上城楼，打开北城门，部队大部进入城内，一时枪声大作。敌人乱作一团，争相突奔逃命，但路已被堵死。两小时的战斗，消灭敌一三四师及国防部突击总队八百七十三人，击毙师长萧传伦，副师长李福熙、参谋长杨章华漏逃；突击总队司令樊廷簧逃向毛牛沟，被八连击毙。松潘获得解放。

三、解放理县

1950年2月，松潘解放后，五三五团三营回茂县，二营驻理县，四连进至杂谷脑。杂谷脑河西，是守备桑梓侯的管辖区。我军按照民族政策，逐步进行争取。四连驻下后，常有匪特摸哨骚扰，我军开枪伤其数人后才略为平静。解放理县，我军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争取民族上层，二是震慑匪特。

甘堡守备桑梓侯和胆扎木沟杨纯武在威州起义后，得到我们重用，但春节刚过，因听信旧薛城镇镇长袁定湘的造谣，加之对我政策了解尚少，一时心中无主，便跑到卓克基躲避。不久，上

孟屯守备仓定安也跑到卓克基。上孟屯有个旧乡长叫王家炎，我政府人员前往做他的工作，他找人假扮乡长接待，并声称要设伏袭击我工作人员。因我政策明确，态度诚恳，王不但没有设伏，还争取仓定安与我友好。

11月底，茂县专区工作团到卓克基，张承武专员亲自会见桑、杨、仓三人，讲明政策，打消顾虑，动员三人回到理县。1951年7月，川西行署召开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桑梓侯、仓定安、索观涛（卓克基土司索观瀛的妹妹）为理县少数民族代表出席了大会。不久，索观涛被理县人民政府委任为杂谷脑区副区长。

下孟屯守备沙道刚有一好友叫李清华，曾任旧理县看守所所长。我军进驻后，李对我军较为友好，我们通过李做沙的工作。沙的太太索观涛，二十多岁，能通汉语，略懂汉文，人又精明，做好她的工作，也可影响其兄索观瀛。县委书记侯勇通过李清华与沙道刚沟通关系，先派医生去给沙道刚医肺病。同时给医生交代宣传党的政策和任务。通过这些接触，沙道刚、索观涛认为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很有诚意，表示愿意合作。在争取工作有了一定基础之后，侯勇便亲自前去下孟屯会见了沙道刚，沙和索亲自出迎，并杀猪宰羊招待。沙道刚、索观涛是理县解放初期最早被争取团结而靠拢人民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

二营驻薛城期间，捕获一特务分子，携有特务机关给索观瀛、桑梓侯的信件，大意是：你们要自己解放自己，不要听解放军宣传，勿听其言上其当，要严管下属头人勿向解放军投诚，对解放军的一切要求均应拒绝，不可与之共事。我们在民族上层不了解我政策之前，以诚相待，以党的民族政策为指导，光明磊落地去做工作，用实际行动去揭穿特务分子的谎言。对于特务分子的信件，我们只作为敌特分子的罪证，对民族上层人物不当把柄责难。专署和军分区决定，将信件销毁，对携信之特务分子，以挑拨民族关系论罪，关押审判。同时，专署和军分区选派了一批懂政策、有远见、有胆略的同志，到有关民族上层人物的官寨进行民族政策的宣传工作。由于我们工作做得好，从杂谷脑河西岸营盘街到芦杆桥几户人家，共一百余里，守备、头人数十个，从

1950年2~9月，绝大多数人都在我民族政策感召下，自愿与政府和军队合作。9月，我向懋功、靖化（今金川）进军时，茂县军分区部队经过此地，从杂谷脑到米亚罗，转运军用物资都受到少数民族的保护，有许多群众还参加了支前工作，为解放懋、靖作出了一定贡献。

四、三次解放懋功

1950年8月以前，我军对平原腹心地区匪特全力进剿痛歼，少数极顽固的匪特头子率其残部窜入懋功、靖化少数民族地区，企图建立反革命根据地长期盘踞。懋、靖地形特异，处于奴隶社会末期，藏族人民受土司、守备的严酷统治，各种矛盾极其尖锐，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盼望解放。茂县地委及军分区对民族地区工作，从6月至9月初已有很大进展，进军前已设法找关系到懋、靖地区沟通，扩大政治影响，使少数民族明了我军政策，使旧乡、保长消除抵抗心理。在进军前，川西区党委决定：组成工作委员会，姚晓程为主任，吴仕宏、门国梁为委员；县以下的土司、头人，先承认其合法，照常供职，各种制度和少数民族武装维持现状，并组织统一战线形式的剿匪治安委员会，团结一切社会力量，以期早日肃清匪特。

懋、靖地区潜伏的国民党匪特情况特别严重，主要有：刘野樵，国民党中统老牌特务，调查处中将处长，中统重庆局专员，1946年曾亲自制造震惊中外的重庆较场口事件，打伤李公朴、郭沫若等人。重庆解放时他逃往成都，成都解放时又逃往懋功，以反动军官为骨干，勾结当地惯匪、恶霸、反动民族上层，组成“川康反共联盟军”，自任总司令；周迅予，黄埔四期生，军统特务，曾任成都稽查处处长，解放前夕被来蓉布置“游击活动”的毛人凤委为“川康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三纵队司令，率匪宋国太、周勉之约三千余人，在灌县、汶川地区叛乱，1950年4月大部被歼，周迅予带四十余亲信越巴郎山，经与当地反动分子勾结，将“反共救国军”扩编，下辖傅秉勋、何本初和他自己共三个纵队，新组建宋国太、张仲臣、杨春圃等八个总纵队。同年8月18日，他奉台湾电令又改编为“川康甘青边区人民反共突击军”，增加魏育生、马鹏超、杨伯常三个纵队。傅秉勋，黄埔五期

毕业，军统特务，曾任国民党一〇四师师长，1949年10月升任七十二军副军长，在七十二军起义时从内江拐骗军饷黄金一千余两，逃至灌县勾结该县三青团干事长王学崇，化装成小商贩于1950年2月15日到靖化城内摆摊，在5月匪二十军一三四师残余窜入靖化时，遂到木坡与周迅予、何本初组织“川康甘青人民反共救国会”，自任副主任，并受周委为“川康甘青人民反共突击队”第二纵队司令，用其黄金进行活动。何本初，曾先后任过蒲江、叙永等六县县长和十四区（剑阁）、十六区（茂县）专员兼保安司令。在1950年2月我军解放茂县时，何组织假“解放委员会”表面欢迎，暗中组织反共基地准备叛乱。3月致傅秉勋密信被我截获，在扣押中潜逃后又组织“四川省第十六督察区民众反共自卫救国军”并自兼司令，亲拟“游击”计划。周勉之，国民党军校毕业生，曾任军少将政治主任、《阵中日报》总编辑，其家几代都是灌县大恶霸。1950年2月他指挥郫县花园场三个纵队一千余人叛乱，4月被我军围歼，他率四十余人窜入懋功，任周迅予匪部参谋长。

我军分两路进军懋功。一路是一七九师五三七团三营担负沿途维护交通任务，五三六团二营担任进懋任务。进军前，五三七团一个连和师直、五三六团侦察连于8月下旬进至卧龙关，先歼宋国太股匪，扫除进军沿途拦路石，并查明懋功匪情。工兵营一部协助三江口、水磨沟民工补修沿途道路。9月1日，三营开始向卧龙关运粮，按军区规定三个兵配两个民工的原则，动员民工两百余人向卧龙关、邓生、日隆关各站运粮保证供给。10日，二营及师前方指挥所由师长吴仕宏亲率从灌县出发，13日到达卧龙关，17日开始翻巴郎山。巴郎山高五千零二十米，上下山各约六十里，山上气候寒冷，空气稀薄，草木不生，满目荒凉。夜宿山腰时遇阴雨连绵，部队靠每人从邓生携带的五斤干柴煮饭。18日越巴郎山进至日隆关继续前进，途经沃日土司衙门时争取杨春圃，杨表示不离开官寨，但其妻孙永贞将其强行拖走避于太阳沟，头人鸣炮迎接我军。二营直插懋功与西康的五五八团一营会合，一营一个连直插八家寨防匪北逃，另一个连由西向东配合二营攻城。19日拂晓，二营一营先后进入城垣，城内罗厚义等少数

匪被歼捕，多数匪于18日逃向八家寨，被一营拦击退入一石碛内，经两天围困，23日下午投降。张仲臣等其他匪首先后率匪三百九十三人向我投降自新。战斗中毙匪十五人，俘九十四人。这是懋功的第一次解放。

另一路是茂县分区部队，以三连沿杂谷脑、红桥山进懋，两个连攻击木坡，一个连置于两河口准备进剿靖化之匪，另外一个连分置于杂谷脑与红桥山沿线维护交通及运送粮食。分区部队由副司令员门国梁率领，9月7日由茂县出发，路过的来苏沟全系少数民族，我军纪律特别严明，并与地方政府做好民族上层工作，使我军得以顺利通过。翻红桥山，海拔五千二百米，15日下午宿营山腰。夜里狂风呼啸，大雨倾盆，电闪雷鸣，山摇地动，继而雪如鹅毛。为不使战士冻坏手脚，司令部传令就地活动，直至天明。红桥山银装素裹，分不清沟壑道路，但当指战员知道这是当年李先念率红三十军到懋功迎接党中央经过的第一座雪山时，情绪振奋。16日5时出发，踏着没膝深的雪，11时半部队顺利通过红桥山，晚20时抵达两河口。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当年见过红军的群众，对我部队非常欢迎。18日，部队轻装急驰一百一十里向木坡前进。当我军奔袭时，周迅予、何本初也率匪部逃向靖化，只有匪突击军第九纵队司令魏育生守木坡。19日我部发起攻击，魏匪溃逃。当日，门国梁派一个连赴懋功会师。周迅予、何本初、傅秉勋、周勉之以及川康边逃往该地区之地主恶霸、惯匪、特务等勾结少数民族反动上层，乘我军一七九师外调援朝兵力减少、大雪封山供应不易之机，以达维为起点，沃日土司为中心，发动了懋靖地区号称三千人的大叛乱，匪势嚣张。

11月24日，叛匪于达维袭击我执行任务的七连两个班，战斗一天，牺牲战士四人，被俘三名战士被匪用开水浇烫成白骨架；在后山作战的八名战士冲出重围回到懋功，留在达维的副连长张太山及通讯员被叛变的区武装包围，身负重伤，被匪烧死。懋功县派驻达维的工作人员全部被俘，贸易公司及银行被抢劫，大叛乱从此开始。

1951年1月14日，匪集中五百余人合击懋功城，第三连与四

百余匪激战三天，理县基干连一个排与匪三百余人战斗。根据当时情况，我军为保存实力，茂县分区前指决定暂时放弃懋功，西撤西康省丹巴县。16日夜，门国梁率部西撤。前指撤离时，掩护部队的一个排全部牺牲。懋功叛乱，我军牺牲一一九人，损失粮食四十万斤。

2月7日，川西军区派副参谋长温先星和川西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罗志敏率五三二团三营（营长边有功，简称边营）、五五五团三营（营长李生祥，简称李营），由雅安经宝兴翻夹金山向懋功前进。茂县分区部队及五五八团一营（营长刘子安，简称刘营），由门国梁指挥，从丹巴东进直向懋功，16日两军会师懋功。叛匪避我军前锋，而聚集三百余人将达维李营包围，战斗极为惨烈；背面叛匪也集中三百余人于木坡、抚边地区，攻我魏家山阵地；懋功周围部队已经分散，一时不能收回。18日，边营刘营各一个连增援达维仍未解围。因此，军区决定放弃懋功，撤出北面攻击部队，全力支援。20日，懋功部队分三路向达维前进。由于匪善爬山钻林，我集匪散，未能歼灭匪之主力。当我军集结达维之后，匪重聚三千余人于达维四周，将我军三个营另四个连及军区指挥所包围，并向五家山、洞槽沟、簸箕窝、大乌卡、豆鼓山等阵地猛烈攻击。我军与匪多次拼搏，伤亡两百余人，毙匪三百余人，夺回阵地。匪改变战术，以小股零星骚扰，昼夜冷枪不断，并有高举进攻之势。但是达维之战我必须打胜，否则懋功、四土工作难于开展。前指经过再三考虑，请求军区再增援兵。

3月下旬，军区派五三三团三营（营长周子仪，简称周营），五三四团一营（营长张富武，简称张营），公安大队一营（营长索耀宗，简称索营），由雅安经宝兴翻夹金山直趋达维。前指26日命令边营、张营攻歼胆毡坝及日隆关之匪，两营毙匪总指挥杨占福，生俘副指挥胡登科，全歼股匪两百余人。4月13日周营、索营歼击木鸦桥匪中心堡垒。匪首皆为顽固分子，据险顽抗。因我无重炮，攻击十分困难，前指批准用炸药爆破，毁据点三处。碉房被毁后匪集中在一个大碉内继续顽抗。我军连续爆破，碉燃梁垮，匪大部被压死，少数从地洞爬出投降，计压死匪首常仲福等四十余人，俘穆少华等惯匪三十八人，木鸦桥之匪无一漏网。

截至4月17日，于达维周围共歼匪一千五百七十五人。1951年4月22日，我军第三次解放懋功。

五、两次解放靖化

1950年9月下旬，茂县军分区以两个连经两河口、黑虎碛、铜厂沟、九把锁抢占庆宁断匪退路，另两个连一经大板昭、马道子，一经万里城、老马坪，与五五八团一营同取靖化。部队从木坡出发前，靖化国民党县政府派员持“解放委员会”信函前来迎接。10月2日，部队到达靖化城河东之勒乌和庆宁，分区前指派随军的靖化县县长武光华带工作人员十二名、部队一个班入城安民，靖化宣告解放。15日召开庆祝靖化解放及县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特邀了红军家属参加。

分区部队集中哥尔丹斯剿匪，经十天搜剿，捉获突击队参谋处长蔡复光、副官处长张景霄、军统特务周迅予的少将高参冯南轩等以下一百三十四人。位于崇化的一营奉命堵截并捕获敌二十军工三十四师副师长李福熙。10月7日，分区七连渡过金川河（大渡河）急驰星子沟，捉获企图逃跑的旧靖化县参议长李冠云等十余人。由于地广人稀，沟壑纵横，以及上层反动分子的有意窝藏、包庇，周迅予、傅秉勋、何本初等巨匪均未捕获。正当我军第三次解放懋功时，在懋功受到严重打击的周迅予、何本初于4月中旬逃至四土，拉拢勾结少数反动上层，组织反动武装；周迅予到黑水与苏永和协商联合组织反共武装；傅秉勋于靖化指挥胥良山、谢明远、唐耀宗诸匪二百余人于4月9日攻陷崇化，抢劫公粮四百余担，胥匪先后杀害我军政人员十人；杨章华、谭世亮、刘元镜等三百余匪4月11日占领靖化，抢我公粮一百余担。傅匪自任靖化守备司令，并在靖化组织四个大队的反动武装。至4月25日，匪已发展到十八股一千二百余人。同时，傅秉勋煽动绰斯甲、松岗叛乱，松岗土司苏希圣曾集中三百余人欲攻马尔康，卓克基土司索观瀛派罗泽民、熊则林用武力监视我工委人员。

对此情形，我军决定先歼靖化之匪，再由川西军区派出主力部队进军四土。5月5日，李营由老营出发，19日到达两河口、邓家油房地区及其两侧清剿；张营一个连于6月7日出发，越空卡

山直取粮台沟，主力经长梁子由东北进歼崇化之匪，10日进入崇化；分区部队16日、17日分两路进击，一路经两河口、梭罗寨、哥尔丹斯直取靖化城，一路经抚边翻万里城雪山合歼靖化之匪，6月18日进入靖化城。靖化获得第二次解放。

六、解放黑水

解放黑水，实质上是两大任务，政治上争取民族上层，军事上清剿顽匪。1950年2月，汶、茂、松、理解放后，专区民族工作重点，首先着眼于黑水。黑水大头人苏永和、木苏大头人公高羊平也曾派代表到专区，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党和政府先后四次派人去做争取工作。4月专区派戈一等人到黑水宣传政策，不见成效；1951年4月30日，中共川西区党委、川西行署在成都成立民族访问团，委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罗志敏、统战部副部长任景龙为正副团长，带医疗队、文工队、电影队五十余人再赴黑水工作一个多月，任景龙再三向苏讲明政策，要求其与人民政府合作，而苏白天与访问团应付周旋，夜间与匪研究对策。11月，张承武率军队科长郭子耕、营长周子仪、孙双林等人再次前往黑水，代表四土临时军政委员会进行宣传，耐心劝苏执行决议，与匪脱离关系，苏则顽固庇护匪特与政府对抗。1952年2月15日，川西区党委、川西军区派天宝、张承武带工作队到黑水，对苏晓以大义，争取其弃暗投明，但苏态度更劣。6月13日台湾对黑水空投成功，苏14日扣禁专区工作组戈一等人，并杀害赤不苏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与匪共同武装叛乱。我对苏永和仁至义尽，再无可忍，经中央与西南局批准，决定发起黑水战役，彻底剿灭黑水之匪。

盘踞黑水的匪特有两路，一是以傅秉勋为总司令的“中华人民反共突击军二四九路”，一是以周迅予为总司令的“中华人民反共突击军二〇四路”。二四九路总部下辖十五个纵队，有汉族土匪一千一百余人、土兵二千五百余人，其总部官员皆为国民党特务分子。

我军政治争取与军事打击双管齐下。政治上争取瓦解敌人，团结群众，孤立匪特；军事上打得狠，攻必克，守必坚，战必胜，由点线到面占领，占领一地，巩固一地，争取一地群众，开展一地工作。

黑水剿匪战役，西南军区、川西军区命令成立黑水剿匪前线指挥部统一指挥，西南公安司令部副政委郭林祥任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公安师师长张行忠为副总指挥，川西军区参谋长唐健伯为参谋长。以公安师师部为前指机关。茂县军分区副司令员门国梁先行，于1952年6月28日进至新康苗寺与郭林祥、唐健伯会合，正式成立指挥部。

参战部队有七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辖三个连）、五个独立步兵营，共计两万余人。茂县军分区各县公安中队、民兵、土兵共一千余人，协助守护要点，控制要道，堵击散匪。进军部队分西、东、北三个集团，主要兵力置于黑水主流。西北部队为配合黑水战役作战，部署兵力在甘南、青海边境地区堵击。西南军区电令川西、川北、西康等地区的人民武装部服从黑水前指的指挥，组织民兵协助剿匪部队歼灭空投匪特，捕歼漏匪。西线指挥所于7月15日在克尔郎正式成立，以轻装师政委段士英为司令员兼政委，茂县军分区副司令员门国梁、副师长刘权为副司令员，师参谋长阎秀文为参谋长，直接指挥轻装师一三七团、一四一团、炮兵团，公安师一团、二团，公安二十四团，五五八团一营，总兵力一万二千人。东线指挥所由茂县军分区组成，司令员吴少康、政委鲁加汉统一指挥。参战部队有：川西公安二十团，川东公安十六团，茂县军分区独立第一营，共七个步兵营，一个山炮营，共四千一百多人。北线指挥所由公安师一团政委田运通指挥，辖公安十八团三营、茂县分区独立第二、三营，参战近一千四百人，其主要任务是防止顽匪北逃。

这里只扼要谈谈西线的几次主要战斗。

一是抢占卡子桥与芦花桥。匪首吴汉章率汉匪三十余人、土兵一百余人守卡子桥，阻我西线主力前进。7月21日晨一四一团一营夺桥后，匪多次反扑，激战两小时，我军保护了卡子桥，使后续部队顺利通过。22日9时一营向芦花桥前进，当晚占领芦花桥，并与二营共同击溃企图焚毁芦花桥的吴汉章匪部，保证了西线主力部队通过。

二是歼灭打古之匪。7月21日，二团一营翻越乌波大雪山向打古急进，发现股匪立即将其包围猛烈打击，并开展政治攻势，

匪一百四十余人投降，我将其武器及粮款物资全缴，将其强征的百姓教育释放。

三是麻窝五沟围歼战。一三七团断粮三天，占领芦花后神速前进，二十团断粮两天仍英勇猛进，7月22日12时占领麻窝、老衙门。傅秉勋、苏永和各率亲信逃窜，匪总部顿时瓦解，汉匪一百余人、土兵三百余人溃潜于原始森林内作垂死挣扎。25日，西线、东线部队会师麻窝。一三七团、一四一团一个营、东线二十团，于25日开始反复清剿。麻窝是傅匪总部及主要匪首集中地。我以三分之一的兵力构成包围圈，其余部队于圈内以梳篦战术划区清剿，细察匪迹，断其水粮，逼其就范；组织火力搜索，使匪无处藏匿，迫其暴露而歼之。在猛烈的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下，27日，“麻窝太太”（苏妻）高丽华率土兵二百余人投降。到8月8日在麻窝共歼匪四百五十一人，其中击毙八十六人。

四是追歼漏逃之匪。由于麻窝围堵漏洞，傅秉勋、吴汉章等三十余匪首乘隙外逃。24日晨约2时，傅等窜至寡骨东南沟口，被一团三营八连发现。我军于拂晓集中兵力追歼击毙少校政治主任王学崇、电台总台长袁正宏等五人，俘译电员郑锦等三人，缴获电台两部及与台湾和匪各部联络之全部密码。傅秉勋钻入密林。于是三营又增加一个加强连，并调二十四团一个连进林搜剿，俘作战处长李意诚等五人。空投特务金钟、王学祥在逃跑途中被摔死。还搜出冻尸四具，为空投特务田华等。匪参谋长上官达等三人逃至琅口被驻军俘虏。8月4日，匪首傅秉勋偷渡黑水河，逃至白河泅渡被水溺死。21日起进入全面清剿阶段。

东线指挥所的主要任务是歼灭东路之匪。该匪以第八纵队司令张定华及惯匪高世荣为指挥，所辖沙坝、色耳古、石碉楼、龙坝、慈坝匪众一千三百余人，其中汉匪四百余人，布防于黑水河北岸松平沟、木苏岩至沙坝一线。南路之匪由公高羊平和陈治进指挥，辖瓦钵梁子、危古、木苏等地，公率土兵二百五十人驻守瓦岗寨、喇嘛寺、小寨子、苦树窝山一线。挺进独立支队副司令苏成开及刘高武率汉匪一百二十人、土兵三百人防守观音梁子、白溪砦。

1952年7月20日，东、西线部队同时发起战斗。东线部队分

两个纵队，齐头并进，左为二十团，右为十六团。7月19日扫清白溪砦、观音梁子、色耳古敌前哨阵地，毙匪七纵队副司令谭海云，歼匪三百余人。21日，匪三百余人乘虚突袭我瓜苏梁子至石碉楼运输线上的民工运粮队。十六团十二连与匪展开血战，为全力保护二百余民工安全和军粮，只能坚守阵地与匪对峙，没有余力向主力靠拢。后经两个连增援才将民工及十二连接出，损失军粮万余斤，使十六团断粮三天，二十团断粮两天。十六团伤亡五十四人，民工伤亡两人。东线部队7月20日攻占木苏，未能发现傅匪主力溃逃方向，令十六团向龙坝进军。23日，一连、七连沿瓜苏梁子东面腹部互相掩护前进，途中七连被阻，伤亡二十人。一连坚守三天，25日夜，团长刘光华率二连将一连接回。纳沙的土兵和汉匪潜匿山林中尚有三百余人。26日，我二十团八连、七连两个班，分路夹击。八连被匪引入包围圈内，战至28日，十六团、二十团各派两个连分路将匪击溃，八连才得以突围。八连毙匪五十余人，自己也伤亡六十二人。

东线总结了前段经验，采取重点包围，短程奔袭战术，有效地歼灭匪特，自己也大大减少了伤亡。8月上旬东线部分部队清剿散匪，维护交通，掩护运输，主力则攻占龙坝、慈坝。十六团主力于8月14日晨6时半对龙坝新衙门“龙坝太太”俄慈密匪部发起攻击。俄系苏妻，儿子苏家邦为二四九路第六纵队司令，汉匪邓永年为副司令给苏家母子两人出谋献策。该匪在我7月23日失利后，气焰特别嚣张。我集中优势兵力，夜晚迂回包围，控制山隘要道，分进合围；白天发起攻击，配备强大火力，并有空军配合进行猛烈轰击。匪遇我急袭，溃于山林中。当我发现苏家邦主力后，17日集中主力部队以迅猛动作向老衙门、哈哈寨以东山沟进剿，很快将苏家邦二百余匪包围于第二条沟内，逼使俄慈密、苏家邦、苏家贵、苏希刚及管家加齐三郎等人的代表手摇白旗请降。到8月底，龙坝战斗共歼匪三百零九名。

当我军占领龙坝、杂窝后，黑水河北岸的残匪均逃窜于慈坝地区，共约三百余人，由张定华、李德刚、冯旅萍等匪首指挥顽抗。8月19日至22日，二十团及十六团两个连在慈坝将其围歼。30日，十六团主力进占松平沟无机寨至周弓寨之线。9月1

日，二十团进驻乌木树。至此，股匪基本被全歼，东线部队进入清剿阶段。

北线部队完成了堵击任务，使匪未敢北逃。因战役进展迅速，前指命北指向主力靠拢，对匪压缩包围。

黑水剿匪战役，还有空军配合作战，这为国内剿匪首用。空八师二十四团、空九师二十七团由东北调来，与成空十三师三十九团共同参战，计有“杜2”飞机五架，“拉9”飞机四架，参战人员一百五十二名。西南空军司令部7月15日设立基地指挥所统一指挥。7月21日，空军首次出战，飞机直达傅秉勋、公高羊平木苏总指挥部上空投弹。至8月27日，共飞十七架次，对木苏、龙坝、慈坝之匪进行了轰炸，大大挫伤了匪特气焰，迫使台湾不敢派飞机支援。同时轰炸机还在松潘、阿坝、马尔康等地上空绕行，大批散发了传单，使不少群众对我军态度有显著转变。战役中，空军共投食品七十万斤，各种弹药十万多斤。空军的支援，加快了战役的胜利。

后勤工作，组织了“川西区支前指挥部”，由川西军区后勤部长冯丕成任总指挥，川西行署民政厅厅长张韶方、财政厅副厅长陈洪任副总指挥，总部设于灌县。川西民工四万人担负运输任务，完成五百四十万斤运输量，有力支援了剿匪作战。

黑水战役9月20日结束，陆空部队配合作战历时两个月，共计歼匪三千六百三十五人，纵队以上匪首三十人，缴枪三千八百二十八支，各种子弹九万发，电台四部。黑水地区解放后，剿匪前线指挥部根据中央和西南军区、川西军区指示决定大部队撤离，留少数部队重新部署清匪。1952年8月16日在芦花召开了黑水各族代表大会，建立了人民政权。

七、解放草地

1952年平息了黑水叛乱以后，1953年1月1日，阿坝藏族自治州政府在刷经寺成立。3月，中央认为解放草地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决定解放军全线进入草地。同时指出，解放阿坝和壤塘，尽量使用和平方式，解放若尔盖必须以武力全歼匪集团。部队分东西两线进军。中央指示：西北军区成立甘青剿匪指挥部，以国防骑兵第一师，西北军区骑兵第一、二团，果洛骑兵支队，

步兵三十二团，公安十一团，甘肃省军区公安团，青海省军区公安团，共九个团的兵力；西南成立川西北剿匪前线指挥部，以西南军区独立第五团、四团第三营，公安二十团第三营、十六团，骑兵第四团，四川省军区骑兵团，茂县军分区独立第一、二、三营，共四个团又五个营的兵力；以“政治争取为主，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争取草地以华尔功成烈为首的民族中上层，发动土兵助我剿匪”的总方针，发起草地剿匪战役。两个指挥部作战范围包括四川境内之若尔盖、红原、阿坝、壤塘，甘肃境内之碌曲、玛曲、迭部，青海境内之同仁、优干宁等广大地区。

西北部队以骑兵第一师和步兵三十二团组成中央纵队，一部由黑错经阿木去乎、俄拉迂回至黄河弯曲部，堵匪西窜，主力经郎木寺向色物藏前进，攻击马良股匪；公安十一团、西北军区骑兵第一团组成右路纵队，公安十一团由罗达、骑一团由洮州旧城出发，首先包围攻击江岔、车路口边仙桥股匪；骑二团与青海公安团组成左纵队，以李如卡山马元祥为目标；果洛骑兵支队进至齐哈玛执行堵击任务。以上部队统于3月26日进抵指定位置，27日发起总攻。

马良系西北军阀马步芳的幺叔，曾任马家军团长、伪参议长。西北解放后，马良虽受到重用，但暗中进行策反，纠集匪特两次在甘肃省和政县南乡进行武装叛乱，被我甘南部队击溃后，便窜至川甘边境草地，扩大武装组织，并派马得福、马硕卿到黑水与傅秉勋联络。从此，傅、马便互相勾结，准备南北同时叛乱。1952年2月，傅秉勋从黑水派电台台长游觉云携电台一部到马良匪总部。4月，马友豪、马硕卿再到黑水，准备领回电台，因台湾空投电台被我缴获，直至7月，马硕卿才领回电台两部，分别交“中华人民反共突击军一〇三路”司令马良和“中华人民反共突击军一〇二路”司令马元祥。10月，马匪已扩为九个纵队八百余人。从1952年7月~1953年3月，台湾先后给马良空投八次，计有特务十六名，还有大量军用物资器材：卡宾枪二百七十五支，“三〇”式机枪四十挺，“六〇”炮四门，“九〇”冲锋枪二十九支，“五四”手枪十六支，“七九”枪弹十三万八千发，电台十三部。马良接得台湾空投之后，扬言要发展兵众十万，在

川甘青建立黑水之后的第二个“大陆台湾”，作为台湾反攻大陆根据地。当我大军向匪包围前进时，马良奉台湾命令，避免正面与我接触而进行分散潜伏，匪特数量达三千七百七十四人，马良率七个纵队约五百余人，由色物藏南窜唐克与刘华初会合。刘华初受台湾指示由傅秉勋任命为“中华人民反共突击军二四九路独立第九纵队”司令，带领台湾空特林德铭及傅匪总部科长杨正行、阳冠元、岑文海等十四人及电台一部，于1952年7月21日由黑水以先遣之名，到草地开辟黑水以外第二政治基地。该匪数年间曾参与懋功、靖化等地四次叛乱，均遭我痛歼。

3月27日，骑一师由郎木寺兵分东西两路向南追歼马良匪部，29日在唐克地区将马良、刘华初匪部包围，战斗中歼匪二百余人。马良、马硕卿、高尚俭、董伟伦、陈世忠、颜可良等九匪首随五纵队参谋长丁尕三、政治主任敏永富于30日窜至罗日德沟、贾诺，企图潜伏。此时，我西南部队前指已达查理寺数日，将匪路堵死。骑兵师部分部队已向贾诺追击。匪首无奈，只好率残部回窜热耳。马良连夜召开匪首会议，商讨率部西窜。当过白河时，马、高、董、颜和马良的三个儿子马步华、马步长、马步贤等人，携电台两部逃走。刘匪大部被歼，刘华初、华尔谦、米长青、李德刚逃窜无路，先后向我投降。

马良离队后，匿于热耳部落森林中。为捕捉马良，我军派出侦察人员详细侦察，以两千银洋请当地和尚带路歼匪，骑一师派一个团由郎木寺出发，西南前指派一个骑兵排配合由阿西出发，于5月18日将马良残余全歼，活捉马良、马硕卿、陈世忠，击毙高尚俭、颜可良、董伟伦、敏成章。马虎山率七十余人继续北逃，4月11日在和政县罗家集被三十二团全歼，马虎山及五纵队司令张永年被击毙，一〇三路参谋长马振中以及大队长以上匪首十余人被生擒。边仙桥股匪被驻军铁布的西北剿指右纵队公安十一团全歼。

我西南部队为有力配合西北主力部队追歼马良，争取阿坝华尔功成烈，解决以阿坝为中心的草地问题，四川省军区奉命组成川西北剿匪前线指挥部，由郭林祥任总指挥兼政委，茂县军分区司令员张行忠为副总指挥，茂县地委书记任明道为副政委，以阿

坝藏族自治州主席天宝组成民族工作团随前指至阿坝开展民族工作。同时动员民工四万二千多人，牲口二万八千多头，保证粮弹运输。部队出动十一个营、两个骑兵团的兵力，配备无坐力炮二十一门，兵分两路进军草地。部队进入辽阔的草地作战，置主力于西线，并迅速控制阿坝，把握关键。西线部队骑四团于3月20日由甘孜出发，28日到达尧尔打；公安十六团于3月10日由重庆出发，18日进抵马塘，团直与一营二营于25日到达格青寺地区接替独五团防务；独五团于3月19日由刷经寺出发，23日进抵查理寺。前指率独四团三营于24日抵达查理寺，4月1日率独五团全部抵达阿坝。骑四团所抵之尧尔打位于川康交界处，为北防郎木寺，东防阿坝之匪向尧尔打逃窜，该团以三个连在驻地构筑工事，组织交叉火力，驻防两天后，奉前指命令于4月2日进抵麦昆颍进行清匪和发动群众工作，并配合青海沿黄河南下之果洛骑兵支队及索格藏南下之骑一师部队捕匪达五十天。草地战役，华尔功成烈派土兵三百人，墨洼派土兵两百人防守墨尔玛与索格藏之间，堵歼向果洛及西南逃窜之匪。独五团从4月10日起，每营组织四十至五十人的捕捉队捕匪。独四团二营在团长景长春率领下单独行动，3月20日由卓克基进至四大坝，4月3日进至日尔卡。以错尔基活佛为首的和平派战胜抵抗派，派骑兵一百余人，夹道欢迎我军。独四团二营和平进入壤塘。独四团一营留驻四土，公安二十团一营二营驻防黑水清剿散匪，维护治安。

东线部队：公安十六团三营于3月18日由毛儿盖前进，以一个连驻毛儿盖，主力前进至阿依根康布防；独立二营于24日由毛儿盖出发，至松潘南坪驻守；独立一营于25日进至折耳洞、黄胜关、两河口一线；骑兵团进驻葛利坪；公安二十团三营于24日进驻松潘布防。正当此时，马良股匪由色物藏窜至郎木寺东南之热当坝。为堵匪东窜，东线部队奉命向前延伸北进，接替西北军区骑兵第一团防务后，分别驻防达扎寺、求吉寺、包座、铁布沟。

周迅予、何本初、王旭夫为首的十一名匪首，长期潜伏阿坝，是我西南部队主歼目标。在华尔功成烈的庇护下，何本初住在官寨附近之贡登家中，周迅予、王旭夫搬到阿坝西南大山森林中。1952年8月，华尔功成烈派人将周迅予、何本初、陈懿鼎、毛兆

兴（毛人凤之侄）、周健全（周迅予之子）、张学之等十一人送到郎木寺交妻兄亚旺索郎保护，后又将诸匪转入热耳茸部落森林中。周迅予、何本初藏匿处与马良近在咫尺，华尔功成烈又觉不保险，遂于12月将周、何、陈、毛接至阿坝，其余仍留热耳林中。留热耳之周健全因殴打副官黄荣发，黄气愤逃出山林向我驻军报告，我军立即将五名匪首捉获。1953年4月1日，我军进入阿坝后，华尔功成烈将周迅予等五人接入官寨，将陈、毛两人枪毙。前指掌握实情后，郭林祥、天宝、任明道等主要领导人都给华做了工作，既批评又指明前途，华愿将匪交出，送至指定地点，由我军负责捕捉。5月22日夜，华以安全转移为由，派土兵“护送”周、何、王至麦桑附近一条小河沟内。我军捕捉队由茂县军分区作战科长席长利和独五团一营营长王洪贵率一个排等候捕捉。夜12时，土兵将匪首送到，部队立即将三匪擒获。华尔功成烈交匪有功，又将电台及密码交给前指，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军区党委对前指和阿坝藏族自治州州委进行了表扬，对华尔功成烈给予嘉奖。

整个草地战役从3月26日开始，至6月底结束，共计歼匪一千三百六十六名，其中击毙匪首三百二十六名、空投特务十五名，俘匪首六百一十八名、空投特务三名，解放大小部落四十个，面积达三万五千平方公里，占当时四川省面积的百分之十，解放各族人民八万二千人，占阿坝州人口的百分之十八。战役中民工及畜力运送物资三百一十四万斤，空投物资六十四万斤。

1956~1959年阿坝平叛

裴田夫 口述

张继禄、杨萍 录音整理

1955年12月四川省人代会通过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实行民主改革的决议。1956年7月周恩来总理就四川藏族、彝族地区民主改革作了重要指示，民主改革采取和平协商方式进行。尽管政策从宽，方法和缓，但仍然遭到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上层人士的反对，且悍然发动武装叛乱。台湾国民党当局及其派遣的匪特也趁机煽动，蓄意挑起骚乱。武装叛乱的发生，打乱了原来“力争和平改革”的部署。党和政府领导各族人民群众开展了平息叛乱的斗争。

多民族的四川藏族自治州（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自1950年7月起在汉区进行了近五年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1955年3月以后在松潘、汶川等县开始土改，在牧区主要是动员上层人物减轻对人民的苛刻剥削，发动群众努力生产，提高生活水平，于1956年开始民主改革。不甘心被消灭的一部分地主、牧主、奴隶主、宗教反动上层与国民党特务、惯匪暗中勾结，欺骗、强迫群众组成暴乱集团，先是零星破坏生产、杀害干部、破坏改革，进而搞大型武装叛乱，以图夺回他们的利益。这就是1956年发生的反民主改革叛乱。

1956年4月下旬，叛乱在若尔盖县唐克区揭开序幕，很快扩大到松潘、红原等县，毗邻的甘孜州也有数县叛乱，甘南有玛曲、碌曲、迭部、卓尼等县，青海有久治、班玛等县。叛乱总人数约十六万人。5月22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批准，成都军区决定依托茂县军分区和第四十九师平叛指挥所组成成都军区前方指挥所，由军区参谋长茹夫一任司令员，茂县地委书记兼

茂县军分区政委任明道为政治委员，分区司令员刘绍堂任第一副司令员，第四十九师师长李凤岗任第二副司令员，5月25日在刷经寺正式成立指挥所，统一指挥川西北地区平叛部队剿匪。

一、平息若尔盖叛乱

1. 唐克平叛

唐克位于黄河弯曲部，是叛匪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1956年4月22日，唐克反动上层受特务挑唆，公开组织士兵数百人进行武装叛乱。当时，我十团三营营部和七连驻唐克，炮连驻唐克后山，八连驻白河桥，九连驻埡口。九连在埡口山上修有一座小碉用于观察，右侧修有一座大碉用于驻军。天黑时，叛匪向小碉攻击，九连仍按1953年不打第一枪的规定不予还击，当叛匪接近小碉时九连才给予还击。战斗一昼夜，九连撤出小碉一班人，全连驻守大碉。两天后，九连撤回白河桥。叛匪攻击九连阵地时，另一股叛匪一百余人在白河桥以西约五里处，用骑兵奔袭我参加军分区学习的指战员，致十余人全部牺牲。

唐克地形复杂，是川甘青三省交界处，我军政力量较薄弱，匪特在别处失败后窜来这里。从1956年4月~1959年5月，匪特曾多次袭击我过路军政人员。其中有泽旺孝袭击骑二团副政委事件，我牺牲警卫排长、侦察员各一人，死战马两匹；原活动于青海的一百余名老惯匪受打击后，逃于川青交界之俄河滩。成都军区骑二团奉命会剿，王起团长、邵金旺政委率部奔袭。匪派五人哨探，被骑五连击毙四人，逃跑一人。当夜，匪一百余人轻骑前来劫营，在五连外围攻击。五连宿营地一排在外巡逻，二、三排人不脱衣，马未卸鞍。匪徒到时见无动静，便大胆前行，约二百米时，遭五连痛击，但仍拼命猛攻。一排听到枪声，在匪后夹击，激战一小时，部分匪徒逃窜。天亮打扫战场，匪阵一片狼藉，查有匪尸六十一具，死马五十余匹。白天兰州军区出动了三架飞机侦察未见匪。两个骑兵团搜索五天，缴获很多匪遗物资和马匹。从此，黄河湾才安定平静下来。

2. 多玛平叛

多玛部落距若尔盖县府所在地达扎寺三十余里，是县府南大门。来自唐克的叛匪、毛尔盖的惯匪和新来的特务分子，组成一

个顽固的叛乱集团，他们以求吉为后援，以瓦色为犄角，准备进攻达扎寺。1956年4月上旬到5月上旬，他们三次武装侦探我军情，并在我营房外五百米处开枪击伤我战士一人，救回后因伤重牺牲。以后匪徒更大规模向我外出部队进行袭击。人民政府和驻军曾多次前往劝降，但叛匪不听忠告，最后竟将县公安局藏族情报员康忠考同志打成重伤，关入马棚准备杀害，并扬言攻下达扎寺，消灭县政府和解放军。5月6日，茂县军分区和甘肃夏河军分区组成联合指挥部，围歼该股匪。7日晨，骑二团一部占领西山，以无坐力炮为号，发起全线攻击；西北骑一团迂回到多玛以南，堵住叛匪南逃。这次平叛歼灭叛匪六百多人，一部分叛匪逃脱。我方牺牲四十一人，受伤六十人，付出了血的代价。

3. 瓦色、班佑平叛

在若尔盖县以东三十余里，县政府于1954年建立了一处农牧场叫“打更沟农牧场”，到1956年底，有职工四十余人。骑二团派一个步兵排守卫。叛乱将要开始时，县政府要求保留驻军和职工捍卫这个基地。骑二团派我从4月18~25日，三次检查该排的工事，补充足够的弹药、粮食，增配火器，可供该排两个月以上的使用量。28日，班佑、阿西茸四百余叛乱分子包围农场，并进行近距离攻击。守卫排长刘霁赢将战士、职工组成统一战斗集体，击退匪对农场的六次攻击。有一次匪冲近围墙，指战员用手榴弹当场炸死四匪，余皆逃窜。匪徒白天聚数百人远距离呐喊，晚上用冷枪骚扰。该排指战员在匪徒叛乱高潮中守卫农牧场二十五天，人无伤亡，财无损失，储备弹药很少动用。全排荣立集体功，排长刘霁赢立了三等功。

5月1日，骑二团团团长李来福、若尔盖县委书记尚贵成视察农牧场，由驻军一个排又三个班掩护。当进至农场附近时遭阿西茸、班佑叛匪两百余人突然袭击，两名侦察员当场牺牲，一人负伤。团长命令撤向高地战斗，数次将叛匪击退，但归路被瓦色两百余叛匪切断。团长命步兵先撤，骑兵两个班抗击四百余叛匪，边打边撤。两位领导脱离危险后，骑兵又被多玛叛匪三百余人切断退路。两位排长带领战士在一小山包组织反击，两位副班长各携轻机枪分别掩护两位排长。其中副班长刘俊禄貌似团副政委，

叛匪呼叫要活捉，刘俊禄则乘机射击，击毙数名叛匪。当叛匪发现不是副政委时，几十人开枪射击，副班长周茂久、刘俊禄壮烈牺牲。兰圣元排长在五百余叛匪的包围中组织战斗，战士大部牺牲，兰和四名负伤战士拉响手榴弹自炸牺牲。此战牺牲正副排长各一人，战士（包括侦察员）二十二人。平叛后，正、副排长兰圣元、齐福洪和两位副班长周茂久、刘俊禄被军区追记一等功。

5月9日，联指命骑一团、骑二团合歼瓦色之匪。匪首不敢战斗，率众跪地投降。前指宣布，凡群众被迫参加叛乱杀我指战员的自去县政府坦白，将叛首阿旺达吉押送公安机关审理。

4. 求吉南洼平叛
该部落距达扎寺一百二十里，其上层人物与麦洼、毛尔盖叛匪多有来往，更与多玛、瓦色叛匪结为集团，台湾派遣特务潜入后，气焰更为嚣张。4月27日集众袭击军分区和公安九营、三营押运物资的四个步兵班。因敌我力量悬殊，且步兵在草原不能机动，经过一天战斗，我牺牲十一人，负伤七人，军用物资被抢。计有单军衣一千五百套，军用胶鞋两千双，大米四万斤，黄豆五千斤，清油一千斤，饼干、罐头各二百箱，白糖一千斤。28日下午，骑二连四个班路过，参与步兵战斗。29日天亮后，匪集中五百余人向我冲击，骑兵为掩护步兵而不能机动，边战边退，互相掩护前进，行约十余里，前两个班因山陡未占领山头，后两个班已撤离山头，当时叛匪已增至九百余人，乘机以骑兵全面攻击。骑二连王副连长明白，我方只有八十人，战斗将十分不利，急命步兵向麦洼方向突围，不准恋战；又命一排排长周立文带一班冲阵开路，冲出后不准回头再战，直奔达扎寺。周立文及全班，猛冲匪阵，锐不可当，绕过多玛，回到达扎寺。王副连长还命副排长康茂带七班就地掩护八班、九班突围，与匪肉搏。王副连长臀部负伤，战士熊兴平左手被打断，李模兴、蒋心富、杨富有三人将王副连长背出重围。五人捉鱼为食，5月6日抵达麦洼。战士袁胜洲、梁志明负伤与部队失去联系，爬行七天，躲过叛匪多次搜索，回到达扎寺，其他同志壮烈牺牲。

叛匪袭击我部队后，若尔盖县政府和骑二团遵照上级指示，多次派人与匪交涉，要其将特务和被抢物资交出，解散叛匪集

团，我们不再追究，但忠告被匪拒绝，还打伤送信人员，扬言要消灭解放军。叛匪集团由印度活佛达洛子·萨拉姆（特务）指挥，他向匪首们分析了双方力量，以为硬对解放军不能取得胜利，便计用牛羊冲击我军，并利用该部落的一千余头牛两千余只羊训练冲击。

5月23日，联指召开作战会议，决定对罪大恶极的叛匪实行合围聚歼，命骑二团由达扎寺经多玛正面攻击，骑一团经黑河迂回求吉南洼西将部队展开，待叛匪逃跑时，奔袭拦截斩杀。24日拂晓，骑二团到达作战位置，由步四连二排秘密接敌，距离二百米时被匪发现。匪先开枪射击，同时放出牛羊向我冲击。早有准备的骑二团全部轻重火器分三层封锁射击，火力密集快速，前边的牛羊被全部打死，后边的向回猛窜，将匪阵冲得七零八落。天明骑二团发起冲锋，见骑一团未到位，急命骑三连猛插西南角用火力追杀。持枪抵抗者大部被击毙，地面工事全部被摧毁，但少数顽匪仍在暗碉内垂死挣扎，达洛子躲入暗碉。当我三名战士用藏语劝其投降时，达匪向战士开枪，被我战士发现，用刺刀刺中达匪右手背，达匪夺门欲逃，被我一战士用冲锋枪射中二十余发毙命。战斗结束搜查暗碉，达匪位置有弹壳四十枚。向西南逃跑的人群中有十余名叛匪。为不伤群众，骑兵团命令三连停止追杀，放其逃命而去。骑二团在冬帐房收集烈士遗体安葬时，发现尸体被匪剁碎，有许多被野鹰叼食，部队只好捡一个头骨再配一些零碎骨头作为一名烈士入土，多数没有头骨，只能以碎骨入墓，墓前立一木牌，就算是烈士墓了。战后，追认康茂为军区一等功，李模兴被军区授予一级骑兵战士，出席了全国青年积极分子大会。

5. 求吉寺、铁布沟平叛

1956年4月，叛匪公然烧毁求吉寺区公所。政府人员撤入营区。5月下旬，十团附骑兵二连进入求吉寺。匪闻讯逃散，其中有一百余顽固分子躲入包座寺内。十团派一个班前去劝降，被匪开枪击毙，再派人前去，匪再开枪射击。在忍无可忍之下，团长景长春、政委陈化一命令集中十余挺轻重机枪封锁庙宇，然后由二营营长徐国锦率部歼匪。因当时使用的子弹配有黄磷，庙墙又

是干树枝所筑，部队以为是土墙，便猛烈射击，遂使寺庙起火，叛匪呼喊而出。我们以为叛匪施放烟雾，乘机向我冲击，部队更加严密封锁，弹如飞蝗。匪再次窜入庙内，但庙内已成火海，匪被烧得乱叫乱滚，跪着向我阵地而来。这时，才知是寺庙燃火，部队停止射击，但大火已无法扑救。十团立即电告联指，经军分区、军区直报总参。

寺庙不窝匪是我军与求吉活佛卓仓藏签订的约法，而卓仓藏不守约反助匪，这次还公开窝匪，罪该他负，而卓仓藏则造谣部队有意报复，污蔑我军要抢他的金佛未逞，烧成黑坨坨了，银圆、酥油、糌粑、枪支全被烧光了，卓仓藏层层上告，直至国务院，借机索赔本庙十倍的赔款。总参派人前来调查，令景长春停职检查。总参负责人令部队以原射击方法，设置相同目标试射，结果与起火性质一致，再经询问参战指战员，均说庙内窝匪，我死亡一个班的烈士还葬在庙前，团部没有命令烧庙。经核实后电告中央。周总理按照民族政策，亲批四万银元修庙，以照顾僧侣习惯。

铁布沟是距若尔盖较远的一个区，1956年叛乱时，有五百余人叛乱，断绝我外出交通。6月中旬，西北骑一师第一团、七十团、三十三团围歼晒银滩之后，我驻铁布沟一连指导员侯胡发带领第一排四个班参加战斗。一排原是到江岔协助护送物资的，到时，匪已烧毁了汽车，杀了人员，抢了物资，全排同仇敌忾，决心杀敌立功。一排奉命穿插匪群中心，一班近战中毙匪二十一人。侯胡发与排长景振声带三个班乘浓雾插入匪指挥中心，速战五十分钟，匪惊恐混乱，被毙五十一人。雾散后大部队发起总攻，全歼匪两千余人。搜索时有十八匪躲在险要处，一排发起攻击，用手榴弹将匪全部炸死。此战，一排只负伤一人，共毙匪九十人。

1956年10月，原六十军独胆英雄侯胡发因晒银滩战斗有功，出席了北京天安门国庆观礼，同中央领导人合了影。二班班长李国武一人毙匪三十一人，被四川省军区记一等功。

二、平息松潘叛乱

1. 毛尔盖平叛

该区叛乱指挥者是毛尔盖寺庙赵活佛，赵原系松潘汉人，毛

尔盖前活佛圆寂后，按寺规选赵为活佛。另两个指挥者，一个是毛尔盖土官如介，一个是喇嘛介科。出谋划策者是国民党特务军官贺国东。1956年4月，赵等利用群众迷信心理，预先派人潜入原始森林，在夜深人静时，用手电筒不定时发出光亮，造谣说马鸡（一种野鸟）夜里发光是凶兆，天下将会大乱，百姓将大灾大难临身，轻则舍财物，重则性命不保，菩萨指点灾祸来自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以后不要听他们的。一时间，群众提心吊胆，惶惶不安。毛尔盖区政府派李凤举（红军掉队女战士）通司（翻译）向群众宣传，用事实揭露匪特谣言，教育了部分群众，但多数仍陷于谣言中。4月下旬，武装叛乱开始。反动上层和特务分子向群众宣布，用2000块大洋购买区长任会宗的人头。任会宗是成都人，大学毕业到藏区工作，会流利的藏语和一般藏文，藏民打扮，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威信极高，领导民主改革成绩显著，这使叛匪怀恨在心。4月底，任会宗、李凤举去向群众宣传时，被一贪财分子告密，叛匪组织数人将任、李二同志枪杀。任牺牲后，松潘县委任命张少斌为区长。张赴任途中于曲定桥附近被叛匪杀害。松潘县再任命周玉柱为区长。

5月4日，毛尔盖叛匪向骑二团步二连五个班开始攻击。该排住毛尔盖寺内，只有五十四人，要与三千余匪战斗。叛匪每天四次轮番攻击，断水源，围政府，抢劫贸易公司。战斗至6日，部队牺牲二十人。松潘县副县长梁会均和男女工作人员各一人冒着枪弹进入寺庙和二连指导员李存先商量突围。7日撤离毛尔盖时，在二道桥被匪袭击，区长周玉柱牺牲。正在此时，施安庆、杨龙海带松潘县民兵赶到击退叛匪，救出其他人员。受伤的副排长张琦率七名战士在撤退中断后，他昏迷再醒后，始终坚持战斗。战士中只有班长武正清和罗少周是老兵，其余全是新兵，道路不熟，四天未食，又遭叛匪追击。武正清带领战士白天隐入森林，夜间行动又与匪遭遇，在涉过毛尔盖河后，张琦、罗少周牺牲。武正清带领战士行走两天后，巧遇前来侦察的黑水县知木林区六十名武装民兵，刚进区公所，知木林也开始叛乱。知木林没有部队，武正清六人到达，还有机枪，对保护知木林区公所起到了一定作用。

5月底，军区命十团和预五团合击毛尔盖。当我军进至龙日坝时，毛尔盖被胁迫的群众已经散伙，匪骨干分子分散流窜，其中泽旺孝逃向毛牛沟，如介逃往麦洼。我军立即向麦洼追击，经几天战斗，歼匪三百余人，缴枪三百余支。之后，预五团一营驻毛尔盖，二营前往平息知木林叛匪，三营受命讨平热务沟叛匪。

泽旺孝，原为如介跟班，1954年随如介到松潘县政协任委员，暗中多次唆使惯匪，偷袭我军政零星人员，1956年逃回毛尔盖叛乱。6月知我大军进剿，率骨干六十余人、胁从分子一百余人逃回毛牛沟、两河口，又煽动蛊惑群众二百余人逃向若尔盖县境之镰刀坝，7月16日被骑二团追剿。对这股叛匪，我们白天穷追不舍，夜晚围而不打，战斗时三面合围，网开一面，经过半个多月的追击，胁从分子有二百五十余人向樟腊区人民政府集体投诚。泽旺孝在松潘和若尔盖境无法立足，率残部逃匿于川甘青交界之黄河弯曲部，两三年间曾多次偷袭我军政过往人员，伏击骑二团副政委阎家祥、侦察排长陈友才，陈身中四弹仍向匪冲击，将匪击退，陈和一名侦察员壮烈牺牲。

1958年6月底，骑二团、青海骑兵团、公安第十团奉命清剿该股叛匪，骑二团到达黄河滩时发现十团烈士遗体九具未运走，知十团已与匪激战。7月1日骑二团泅渡黄河，泽匪隐匿后急逃唐克，被我骑二连包围于小丘。从下午战至2日晨，毙匪三十二人，俘匪一人。审俘时获悉，泽旺孝藏于水中草墩下。搜索时，泽等十二人已经逃走至松潘境内之葛利台，被松潘县中队围歼，八人被活捉，四人被毙。1958年底，匪首泽旺孝被松潘县人民政府公审处决。

2. 知木林区平叛

1955年3月，松潘县委派组织部部长张世昌、黑水县派刘晓宾为土改改正副团长到知木林区进行土改工作。1956年4月，叛乱分子公开叛乱，他们从电影中学会白天倒树为号，夜晚烧三堆火为号，哪里有土改团人员，就在哪里发信号，叛匪根据信号进行袭击。叛匪十分疯狂，很快将青郎乡包围，区政府派民兵将土改团人员接回知木林。慈坝又被围。张世昌亲率民兵解围，战斗中伤亡各十五人，终将黑水县公安局副局长李守福等二十三名干部

接出，途经石湾干部又牺牲、负伤各一名。扎窝乡损失最为惨重。叛首扎窝寺庙活佛安卜伪装保护干部，将各处干部四十三人（其中女七人）集中寺庙。进庙前有三名干部发现有诈，直向知木林赶来报信。四十名干部进庙后即被捆绑手脚，火烧、鞭打、割鼻、挖耳，受尽酷刑。受刑同志忍着疼痛用小刀在庙柱刻下叛匪罪行和“为我们报仇”等字。有二人逃离寺庙，被安卜命人追杀，砍成碎块。关在庙内的男同志，受刑数日后，安卜命人将他们绑入山沟，剁成肉酱，霎时间烈士们肝脑涂地。七名女同志昼夜遭匪轮奸、侮辱，被脱光衣服看管长达月余。预五团平叛时，安卜逃匿被捉后送回黑水，但这个叛乱组织者、血债累累的刽子手，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3. 毛牛沟、热务沟平叛

1956年毛牛沟叛匪一部分参加毛尔盖叛乱，一部分参加热务沟叛乱，均被全歼。热务沟叛首依玛塔，4月在松潘青云乡十里村偷袭县工作组，用石头砸死组长曾敏（女），装入麻袋沉入岷江。依玛塔又带人袭击松潘县法院院长兼热务区区长崔安成等同志。因崔警惕性高，行动快速机密，才幸免于难。5月底，依玛塔指挥全面叛乱。热务区既无军队和公安部队，区干部只好带领民兵与匪作战，牺牲数人，区政府被围月余。6月中旬，预五团三营奉命由毛尔盖前往剿匪，以急行军到达热务沟，立即发起攻击，经过激战，依玛塔被当场击毙，众匪被全歼。

三、平息红原叛乱

1. 贡汤平叛

1956年5~6月，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部队，从北起碌曲南至松潘的广大地区，以重兵围歼方式，平息叛匪数万，但屡遭痛歼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和民族反动上层，并不甘心失败，再次叛乱。1957年3月，东起松潘西至壤塘，匪又集股叛乱，东集团主要集中在麦洼地区，叛首是贡汤活佛贡汤仓。1953年初，贡汤仓就与活动在唐克地区的马良股匪有勾结，并向达赖致密信，赞同西藏叛国独立，信被截获，但贡汤仓不听教育，不思悔改，1957年窜到查理寺筹备资金十余万元准备大规模叛乱使用。1958年5月，贡汤仓组织集中于麦洼和若尔盖的叛乱分子号称万余人。6

月，阿坝州驻军出动围剿。7月1日首歼活动于若尔盖境内之匪。10月初，贡汤仓的管家兼带兵官次知姆亲带贡汤部落四十余人和流散匪徒二十余人在红原奶粉厂叛乱，回贡汤补充物资后，准备到黄河边与青海股匪会合，被迫歼中不敢窜入麦洼。次知姆单独逃亡下落不明。战斗中副指导员曹艾青及通讯员牺牲。

7月，贡汤仓逃至成都，被公安机关侦知，又逃向峨眉山，用金钱收买和尚未能得逞，又跑回成都。鉴于贡汤仓处处进行特务活动，四川省报经中央批准，将贡和马姓特务一同逮捕。搜查贡汤仓在阿坝的住所，搜出卡宾枪七十支，弹药一部分，反动密信多件。后判其徒刑八年。

2. 麦洼平叛

1957年被贡汤仓欺骗的群众，在1958年我军围剿中大部土崩瓦解，但仍有两千余人集聚于麦洼，由麦洼大带兵官统领指挥，围攻区公所，杀害我外出人员，抢劫麦洼贸易公司，烧毁公司库房。特别是西藏武装叛乱后，麦洼之匪更是有恃无恐。

1959年4月20日，阿坝（原茂县）军分区组织围歼，军分区司令员刘绍堂指挥，参战部队有骑二团、十四团（藏民团）、八团一部。指挥部到麦洼后，由八团部队警卫，严密控制测亮华德，断绝他与大带兵官的联系和向色既坝叛匪提供粮弹及情报。4月30日~5月3日，我部队向匪发起围歼攻击。该股匪多年参加部落之间械斗，是偷牛盗马、杀人越货的老惯匪，心狠手辣，残暴成性。战前侦察时，骑一连两个排在山沟中与匪遭遇，在战斗中一排副排长魏成富及十五名战士牺牲，八位战士负伤。匪因地形熟悉，多次与我军正面战斗，经过几次大的激战，匪遭到惨重伤亡，大部向我投降，大带兵官带少数人漏逃。骑二团王起团长奉命率部追击，从更西隆洼、独龙堂、江羊日出贡巴搜索前进。第二天二连在赫尔隆格山森林发现有马匹，团部命令主力在林外堵歼，二连进林搜索。林密藤阻，十分难找。林中暗处突响枪声，战士卧倒喊话，无人走出，继又响枪，战士将十枚手榴弹投向响枪处，炸后再无动静。战士们发现一具尸体，拖出林外让俘匪辨认，确认是麦洼大带兵官、匪总指挥。贡汤仓策划的麦洼叛乱，经过一年多的征剿被平息。共歼匪两千余人，缴枪一千余

支。参加麦洼叛乱的中琅口土官石旦梅漏逃，带六名匪徒隐匿游逃一年多。为追捕石旦梅，龙日坝区民兵连长华罗率六个民兵跟踪追寻。1960年12月下旬，细心的华罗等在放牧的牛群中发现了石旦梅的马蹄印，顺印追寻三天三夜，27日在羊拱山将石旦梅七人击毙。之后，中央军委奖励华罗半自动步枪一支，子弹一百发。

四、平息壤塘叛乱

1958年11月，号称万人实则两千余人的壤塘叛乱集团，武装进攻十团一营营区，实行封锁包围。因我部队集中，火力强大，只有个别伤亡。但各区政府人员分散，武装不强，多次受匪强攻，特别是上寨区政府未能撤回县府驻地，损失很大。1958年11月~1959年4月的五个月中，壤塘县被叛匪惨杀的干部达三十九人之多。

壤塘叛首张行，原系国民党二十四军团长，一贯为非作歹，经常杀害藏、汉群众，是个不折不扣的兵匪混合体。二十四军起义时，张率数十名兵痞流氓窜于川康交界处，在甘孜州清肃惯匪时逃往壤塘。1953年解放军进军时，张匪煽动土官、头人抗拒，1956年与反动分子再次预谋叛乱，1957年与红原、若尔盖诸匪勾结互援共叛。

1959年4月，阿坝军分区组成壤塘剿匪指挥部，分兵三路进军，骑一团由甘孜出发，经色达草原北行向杜柯前进。4月15日，十团二营四个连，首先将绰斯甲与壤塘分割，然后派五连急驰杜柯与骑一团会合，骑兵快速合围，步兵猛烈攻击，将杜柯之匪全歼。同日出阿坝西南行的十团主力与马尔康西北行的八团主力于壤塘会合，分别负责歼灭上寨中寨之匪。十团连续行军五昼夜，途中打破叛匪三次阻击，行程四百余里，20日抵达上寨，将叛匪包围，向匪喊话劝其放下武器投降。上寨是壤塘地区叛匪指挥中心，多是顽固分子，他们狂饮血酒，盟誓不降。我十团展开攻坚战，与匪争夺阵地，连续战斗十六个小时，全歼上寨之匪三百九十六人，其中击毙三百五十六人。壤塘平叛，战斗月余，歼灭有组织的武装叛匪两千余人，击毙匪首张行，缴获各种枪支两

康
定
会

千余支。

至此，阿坝州 1956 年 4 月 ~ 1959 年 5 月历时三年多的反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被彻底平息。阿坝州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真正进入制度改革、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阿坝州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为阿坝州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阿坝州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真正进入了制度改革、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第二 部分

四川民族宗教工作二三事

我所知道的四川调粮

关于四川调粮的回顾与反思

四川「大办钢铁」始末

「大办钢铁」运动的回忆

「大跃进」中在梁平

从建设「西钢」到建设「攀钢」

攀枝花钢铁基地上马前后

20世纪80年代四川工业经济调整中的五本「折子戏」



|| 四川大批粮食运抵江苏镇江。



|| 「大办钢铁」时的竹制「土高炉」。

四川民族宗教工作二三事

杨岭多吉^① 口述

邹一清 录音整理

作为一名工作了五十多年的民族领导干部，杨岭多吉从保护德格印经院、对“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质疑、对“新叛”平反、正确分析藏区形势、协调民族和宗教方面的纠纷等事件中，深深体会到，党中央和省委极其重视民族宗教工作，民族领导干部能够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保护德格印经院

“文化大革命”前，我作为共青团四川省委副书记兼中共德格县委第一书记，在德格县工作。“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受到了冲击，被当作“走资派”批斗，关进了“牛棚”。1967年我通过消息得知，德格土司的官邸已经被破坏，而德格县最重要的一处文物——德格印经院正在遭到破坏。我非常着急，因为我知道，德格印经院不仅是藏文化的宝库（被誉为“雪山下的宝库”），而且也是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瑰宝。许多藏族文化资料在德格印经院翻印，才得以广泛传播。对这样重要的地方必须加以保护。但这时，印经院的经版、经书、资料已开始散失，被说成是“四旧”，有的人还将装书用的夹板钉成了凳子等物。印经院危在旦夕。

原来的德格土司降央伯姆，是一位女士司，她是五十三代土司的传人。建国后，降央伯姆从一个女士司变成为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她在德格的土司官邸，有较高的藏族建筑文化价值，本应保护起来，但在“文化大革命”早期，被造反派作为“四旧”，用

^①杨岭多吉，1931年生，藏族。原西藏自治区政协主席。

炸药炸毁了。

面对一个个藏族文物遭到毁坏，我虽然被关进了“牛棚”，失去了自由，但我认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民族干部，对之不能不管。我想，照现在的形势，除了向中央反映情况，请中央直接下命令以外，任何人都无法阻止造反派破坏德格印经院。我立即悄悄写了一份材料，一方面反映了自己的遭遇，另一方面反映了德格印经院正在被破坏的情况，请求中央出面对其加以保护。我把写好了的材料小心地藏在一双军用毛皮鞋的鞋垫下面，当我的爱人阿英来给我送饭时，我就当着看守将这只皮鞋递给她，向她使眼色，并说：“这只皮鞋坏了，需要补一下，你把它拿回去补。”她心领神会，把鞋子拿回去就找到了我写的材料。她将材料立即寄到了在天津大学工作的她妹妹那里。她的妹妹叫曲木阿呷，通过曲木阿呷的关系，将材料转给了周恩来总理。曲木阿呷随即就给我们写了一封回信，说她已经将材料准确地交到了周总理手里。过了不久，也就是在两个月以内，就有了反应。这个反应首先是德格县武装部派了一名助理员来到我住的“牛棚”，要放我出来，再三动员我到康定去学习。我一再说明，要给我的问题作出结论，要说清楚我才出去，否则，我就不出去，我现在不急着想出去。接着，一名叫王德全的武装部部长向我透露：上面已经发话了，让你出来，这是上面的意思，所以你还是应该先出来再说。同时，我也听说德格印经院也被指示要加以保护，不能破坏。这样，我就明白了，是中央作出了安排。

德格印经院在中央、特别是周总理的亲自关怀、干预下，得到了保护。后来，还成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对民族工作指导思想的思考和建议

那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不久的事。各级党委都在传达、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当时，我是阿坝州委第一书记、州革委会主任兼阿坝军分区的第一政委，我认为，三中全会精神，为“文化大革命”以后民族地区的工作开辟了一个新天地。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我认为从1958年以来就提的“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理论是错误的。这个提法曾长期存在，自民主改革结束之后（藏区的民主改革最迟是在1959年结束的）一

直存在。民主改革的结束就标志着民族地区的封建阶级、封建制度被彻底摧毁，用群众性的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推翻和消灭了封建制度和剥削阶级。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理论被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民族地区工作，将这个观点作为总的指导思想、基本观点甚至基本纲领看待，很多问题都变成了阶级问题，被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看待、对待和处理。于是，民族地区就采取了一系列的错误做法，打击和伤害了一部分同志和朋友。

1979年10月，参加了中共四川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地点就在当时的总府街礼堂（现为假日饭店）。在会上，我发了言并提交了一篇发言稿，共八页，对“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提法提出了质疑。当时，大会简报一般只有四页，但我的发言稿有八页，大会简报还是全文刊登印发了，这是大会秘书处同志审查并经省委领导批准后决定的。大会代表，尤其是三州民族地区的同志看了简报后，反响很大。第二天，我们阿坝州小组又以小组的名义，出了一期简报，支持我的观点。这样，大会共出了两期简报，认定我对这个问题的质疑。会末，省委主要领导在作总结的时候，专门有一段文字肯定了这个问题，还部分引用了我的发言内容。于是，对这个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问题、理论问题的探讨得到了省委的肯定，我感到很高兴。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

后来，中共中央在1980年8月批转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通知》上，再次否定了“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提法，而且正面作出为什么不能再这样提的论述。

1980年7月15日，党中央安排以《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批驳“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文章，长篇论述和批判了它的错误之处，并指出，不能再用这个错误的理论观点。这就成了全国性的否定、批驳“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民族领导干部应该做的事。

三、“新叛”平反

“新叛”是相对于藏区1956~1959年发生的那次叛乱之后的

一次叛乱，时间是1968年。

所谓“新叛”，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武斗，当时确实出现了武装冲突，有破坏行为，如炸桥梁、毁电线等，军队和武斗人员中都有伤亡，后来将这个武斗冲突定性为叛乱，即“新叛”。

“新叛”的涉及面很广，涉及阿坝州牧区的四个县及一个区，以及甘孜州的部分地区，阿坝州有若尔盖县、阿坝县、红原县、壤塘县、松潘县的毛尔盖区，涉及人口达十多万。“文化大革命”后期，曾对“新叛”的问题作过一次解决，认为打击面太大了，划定的叛乱分子太多了，有“扩大化”问题，进行了一些改正，但并没有触及为叛乱重新定性的问题。

我于1976年1月初到阿坝州工作，担任阿坝州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上任后，我就到各县去了解情况。当我到达牧区各县时，我所了解的人，都与叛乱有关，很多人说“我的舅舅是叛乱分子”、“我的父亲是叛乱分子”、“我的哥哥是叛乱分子”……遍地都是叛乱分子。我感到很奇怪，心想：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叛乱分子？有人告诉了我1968年发生的那件事。我认为：定这么多的叛乱分子，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将由谁来搞？我们到哪里去找更多的依靠对象和团结对象？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开始思考：到底这个“新叛”是怎么一回事？涉及面为什么会这么广泛？我心里这样想，但不敢说出来。因为，我刚到阿坝州工作，而“新叛”问题的涉及面太宽。我只能思考和多方了解这个问题。

到了1978年，我曾经在马尔康向部队上参加平叛的领导人，如武装部郝部长和一位当事人马排长等人问及“新叛”问题，他们当时也认为定为“叛乱”是有问题。我就请州委成立工作组，我担任组长，省民委也由一位副主任带了人参加，到阿坝县去调查。经过省、州、县共同调查，大家一致认为，定性为“叛乱”是错误的。我们在1979年提出要对“新叛”平反。

但是，当时阿坝州的一些领导干部对给“新叛”平反有想法，有些人有顾虑，他们认为只能说“新叛”是扩大化了，不能说不是叛乱，不敢否定上面作出的定性决定。因为，定性为叛乱，是

由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和国务院三家批的。算是“通天”了，谁敢提出质疑？然而，我通过调查研究，更加明确，“新叛”问题是一个错案，必须平反。我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内地的武斗算作“造反行为”，而民族地区的武斗为什么就要算成叛乱呢？这同样是属于“造反的行为”，将其定为叛乱是错误的，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因此，“新叛”应该予以平反。

1979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金牛坝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当时我提出的给“新叛”平反提议还未取得阿坝州委的赞同，在我要作大会发言的前一天晚上，我还就此事向州委来的同志征求意见，但仍难取得共识。因此，第二天，我作大会发言时，说明“新叛”应平反的意见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就在我作个人发言的同时，我的意见就得到了省委的支持。省委领导多次插话，肯定了“新叛”的定性有问题，应该重新认定。我在发言中提出，请省委专门派出调查组，重新调查“新叛”案件。后来，省委派出了调查组，我也作为州委调查组的组长，组织、参加了调查工作。此后，阿坝州委的同志就都认定“新叛”是一个错案，只需要执行纠错了。

给“新叛”平反是一件大事，因为这个错案涉及面宽，牵涉人多，影响很大。当时参加平叛的有部队、干部、群众，有人当了模范，成了先进，甚至成了烈士、英雄，还有人被提拔了，如何对待这些人，给他们适当的评价，是一个既具体而又复杂的工作。最后都作了合适的安排。

四、落实宗教、民族政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是党和政府工作中的大事之一。这是全国各地都有的共同性。但在不同的地方，具体情况有所不同。

阿坝州在落实政策工作开始之初，一些干部、群众还想不通，思想比较混乱。“文化大革命”中对许多干部的处理有错，需要纠正、平反昭雪、落实政策，并且要缩小当时正在搞的“揭、批、查”的打击范围。“揭、批、查”是指揭露、批判及从组织上清查帮派组织的活动，要缩小打击面。对这些问题，有一些同志，包括有的领导干部也想不通。另外，还要落实统战政策。那时候阿坝州

政协的委员、常委、副主席等人，基本上没有人敢去接触他们，与他们交谈。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政协就像是一座麻风病院一样，根本没有人敢进去。我认为，这是一个统战工作，应该很好地贯彻统战政策。于是，我就带头与他们接触，在我有空的时候（一般是晚上），去看望政协的委员和领导。政协的委员们很感动，他们说：我们这个地方有很长时间没有人敢来了，你却经常来，让我们大受感动。我是想体现政策，经常去给他们做工作。在这个事上，统战人士是非常满意的。

落实宗教政策在阿坝州也是一件大事。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正确的宗教政策被彻底摧毁、破坏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活动开始恢复，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也开始恢复执行。这时，就有干部出来指责：这是宗教狂热行为。可见，宗教政策也需要认真贯彻落实。

1978年4月开始进行“右派”摘帽工作，对国民党起义人员落实政策，给地主、富农“摘帽”，释放原来在民主改革中参与叛乱的一些叛乱分子……这些工作在开始时，不仅干部，就连许多人民群众都认为现在搞右了。再加上我提出的给“新叛”平反，更引起部分干部群众的思想混乱。释放民主改革时的叛乱分子的工作要求得很急，上面要求在两三天内就要释放出来，因为要配合西藏的工作，涉及对外宣传问题。

以上成堆的问题都要放在一起解决，引起了干部、群众的思想混乱。大家都在等省委有何指示。但我认为不能再等待了，等待中会出现更多的混乱和问题，我们不应该等待，而是应该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主动解决。这样，阿坝州在上级指示还未下来之前，就主动召开了全州的落实政策会议。会议在若尔盖召开了几天，公社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这么一来，集中解决了干部的思想问题，干部的思想通了，所有的政策都可以落实了。州委报告了省委后，得到了省委的肯定。

解决“壤塘问题”，也是落实政策的一个实例。阿坝州壤塘县，是一个被定为“新叛”的县之一。我在壤塘调查时，感到那里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民族关系非常紧张。我回到州委，向州委的同志讲述壤塘县的情况，我说：在中国大陆，恐怕找不到

一个地方的干群、党群关系有如此之差。州委有的同志不相信，阿坝有一位州委副书记木瓦三舛是马尔康人，他要去壤塘，去前他说：“我也不相信会有情况这样严重的地方。”我建议：派一个工作团，到壤塘去解决问题。这个解决问题主要是落实政策，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搞好干群、党和民族关系，主要是要去做好事。于是，由一位州委副书记带队，在壤塘整整搞了半年的基本路线教育，落实各项政策，做好事，组织安排好生产、生活，关心群众。半年后，基本扭转了壤塘的党群、干群关系。那位担任工作团团长的州委副书记木瓦三舛回到州里后，对我说：“当时，你说壤塘县的情况时，我还不相信会有这样严重的地方。我去后才明白，实情比你说的更严重，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认真地及时解决，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991年夏，我参与协调了色达县珠日神山修路的纠纷。色达堪布尼麦彭措（县政协副主席）从宗教的角度考虑要在珠日神山上修一条路上山，另一些民族宗教爱国人士如泽主衮等则坚决反对修路，双方形成了尖锐的对立。群众中也分成两派。争论一直发展到县里，涉及县上有关部门，县委书记说，这事闹得很大，解决不下来，弄得我焦头烂额，什么事都搞不成了，成天扯这个皮。这事还影响到县外地区的安定。冲突越来越激烈，报到了州里、省上。省、州都发了话，州内出了文件，将其定性为政治斗争。甘孜州州委发了一个文件，指出在色达珠日神山为念经而修路是封建势力的再现，宗教势力的插手。这就是说将其定性为复辟问题了。

当时，双方的对立到了这种程度：首先是色达堪布活佛与反对修路的主要人物间的对立，其次是他们各自的跟随者之间的对立。听说反对修路这方有六百人的马队，而色达堪布一方至少有三千个弟子，分布在全国的藏区，支持者众多。在行动上，甘孜州已经有四个县去声援了，它们是甘孜县、新龙县、炉霍县和道孚县，四个县分别出动了一车的人。这一行动惊动了省、州，省、州委打招呼，并指示要劝说他们回去，不准去色达。经过层层劝阻，基本上劝阻了，没有去色达声援，但事情远没有平息。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有更多的人去色达声援，当然，更

多的人是去声援色达堪布的。这件事处理得不好，康区非乱不可，康区一乱，整个藏区都不得安宁。

我同省政协的两三个同志在参加德格印经院落成典礼后主动去了色达县，当天下午就有对立的双方找我们个别谈话，反对修路的一方派来了四个人，有爱国人士、活佛，都是县人大、政协的领导成员；赞成修路一方的是寺五明佛学院的权威色达堪布尼麦彭措。通过谈话，我对这件事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我认为：完全可以用反复协商的方法解决问题。只要让修路的人不再坚持修路，放弃修路，那么，反对派自然就偃旗息鼓了。一方不修路了，另一方还有什么可反对的呢？

我又和色达堪布协商，我说：“你坚持要在神山上修公路，而他们反对你修路，闹得沸沸扬扬，影响团结。如果你从维护团结出发，顾全大局，放弃修路，他们还反对你什么呢？因此，我劝你不要坚持修路了。但这样做又让你被动了，他们会说：‘我们反对你修路，你就不敢修了，我们赢了，胜利了！’我主张解决纠纷，最好‘双赢’，不争胜败为好。我是不会让你被动的，你也要主动。怎么办呢？我在会上讲的时候，就说你修路原本是得到县政府同意的，这是事实。我表态说：路是可以修的，我肯定你。这样，你修路得到肯定了。但是，我的这句话是不用执行的。我讲完以后，希望你表态说：‘杨岭多吉说路是可以修的，过去政府也说过可以修。但是，由于大家意见不一致，影响团结，我就打算放弃修路，不修了。’这不修路的话要由你亲自说，这是要认真执行的，这样你就主动了。就这样定了，明天开会，我说可以修，你说不修了。我说上句，你说下句。”就这样商定了。

第二天，我们同县上“四大班子”的领导去色达堪布处协商（开座谈会），果然像我们头天商定的那样，色达堪布在阐述了一番修路的好处以后，表态放弃修路。

既然色达堪布说不修路了，反对者也没有意见了。县上参加协调的“四大班子”的领导人和我们都表了态，向堪布献了哈达表示感谢。这场大纠纷就此完全化解了。

上午开了会以后，我们就走了。中午到了炉霍县。炉霍的一位县政协主席见了我说：“听说你们把色达修路的问题解决了。

前天才去，今天就解决了？我们已经接到了州上的通知，说纠纷局势严重。”我说：“是彻底解决了。”他连称“了不得”。

从这件事我体会到两点：一是碰见矛盾纠纷不能任意上纲上线，定性要准确，实事求是；二要坚持协商，反复耐心地真诚地协商，才能奏效。我对这件事的处理，最后得到了省委的肯定。

（注：此段文字为作者回忆录的一部分，详细描述了当时处理纠纷的过程和背景。文中提到“州上的通知”、“省委的肯定”等关键信息，反映了当时处理此类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注：此段文字为作者回忆录的另一部分，继续描述了处理纠纷的后续工作和反思。文中提到“省委的肯定”、“州上的通知”等关键信息，反映了当时处理此类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我所知道的四川调粮

何郝炬 口述

黄友良 录音整理

1950年，四川省第一次向外省大规模调粮。四川再次大量外调粮食是1959年、1960年及1961年。这三年恰恰又是四川因“大跃进”而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年，尤其是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所以调粮问题成为四川人民议论的焦点之一。四川的调粮是“大跃进”全局性错误中的一个局部性错误，不能离开全局来单独强调这个局部。

1950年是四川解放后第一次向外省调粮。四川解放后，为了解决西南地区的城市人口供粮及起义部队、南下部队、进藏部队的军粮供应，大力抓紧征粮，所以手里有点粮食。首次调粮出川是调往上海及华东地区，粮食全部装船运出，大部分是民生公司船队承运，估计不到三亿斤。四川土改后，粮食连年增产，1949年年产量约二百九十九亿斤，1956年年产量为四百三十余亿斤，粮食显得富余一些，所以中央认为四川是可以向外调粮的省区之一，此后开始每年向外调粮。

四川大量外调粮食是1959、1960、1961年三年。这三年恰恰又是四川因“大跃进”而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年，尤其是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所以调粮问题成为四川人民议论的焦点之一。我当时在建委工作，不负责粮食工作。但我可以参加省委很多工作会议，有关情况还是知道一些。

四川粮食出问题是从小1958年开始的，但当时并未引起四川领导们的重视。大约是1958年11月、12月，我出席省委工作会议，会上李井泉突然说，湖北咋搞的？把我们的粮食截了，他们不是亩产几万斤吗？原来四川调往上海的粮食在武汉被湖北强行扣

留，吃掉了。湖北截别人的粮吃，说明他们的粮食出了严重问题，因为湖北是鱼米之乡啊，这应该是个警钟。当年底统计粮食产量时，四川已经发现粮食出了问题，拿到手的粮食没有统计报表上那么多。当时还认为是大量劳动力上山炼钢，虽粮食丰产，却没能全部收回来的原因。但实际情况是粮食产量数字虚高，实际产粮并没有那么多，那一年的粮食数字是按“大跃进”精神指令性下达的。湖北当年吃了亏，截了粮，年底就开始调减指标，第二年的计划指标全面下调，就是因为1958年吃了亏，吸取了教训。四川还觉得1958年是丰产，只是没有收回来。征购粮食是按虚高指标征购的，所以是高征购，把农民手里的粮都拿走了。后来人口减少是高征购和办公食堂两个因素造成的，1958年调粮时还看不出来。

到了1959~1960年时，四川的粮食储备已经很紧张了，但中央由于不了解四川的情况，仍在向四川要粮。开始是在大城市及交通沿线调运，存粮已逐渐调光。1959年8月，省委决定降低党政机关干部口粮定量标准，省级机关每人每月二十一斤，县级机关十九斤。大约是1960年初，省委开会说到粮食供应问题，李井泉叫副省长张韶方去调查城镇人口每月到底需多少粮食才够吃。张韶方回来后说十七斤够了，主要根据是售粮多少，人口多少，平均算出来的，还加了两条因素：一是外出坐火车、汽车吃饭不需要粮票；二是城市人口还有副食品搭配，所以大人小孩拉平，人均十七斤差不多。因为当时库存粮食已经不多了，达不到配给要求，中央又要求调粮，所以几头都紧张起来了。1960年9月搞十七斤定量标准是自己已经觉得粮食紧张时采取的第一个错误办法。另一个错误办法就是宣布四川省地方粮票作废^①。当时算账，市场上流通了几千万公斤粮票未回收，都要买粮，就成了问题。这两件事做得太糟，失信于民，群众反应强烈，怨声载道。当时的四川主要领导为维护“大跃进”的进度和指标，不从实际出发，不实事求是地按实际情况决策，不顾群众生活。尽管精神是

^①1960年9月，经四川省委批准，四川省粮食厅公告发行新版地方粮票，旧票一律作废（共四千八百万公斤粮票）。

从上边来的，但是有一个执行不执行、如何执行问题，这应该是当代四川历史上的一大教训。

1961年中央继续要求四川调粮，年初下的指标后来好像又加了一点，所以1961年调粮是很多的。这时四川已经很困难了，加上调粮，更是雪上加霜。大约是1961年初我到金牛坝参加省委工作会，就是说中央调粮的事。会开到一半，北京来电话要粮，李井泉叫张韶方去接电话，说是你去说明一下，我们现在确实有困难了。张韶方去说四川已经调不出粮食了。先念说不行，要直接找井泉同志，要李井泉去接电话。李井泉只有离开会场去接电话。回来后我发现李井泉脸色很难看，表情十分痛苦，说是先念说，四川要服从大局，一定要调粮，怎么办？由于种种原因，中央并不知道四川缺粮的实际情况，而当时四川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最后决定还是调，只有调“死角粮”，从通南巴地区往外调。为此，北京专门派粮食部副部长曾传禄坐镇广元，调了几百辆车，因为那里交通不便，转运困难，而其他地方能调出的库存已全部调光了。中央调粮是根据四川的报表要求的。我当时在计委，统计年报都是从计委报上去的，那几年粮食产量都是省里定的，1958年定的比1957年翻了一番，大约是八百多亿斤，1959年九百二十亿斤，后来说是高了，调来调去，调到六七百亿斤，仍然是虚报。1962年核实，1958年实际产量与1957年相当，大约是四百二十亿斤。上边对四川的底细也不清楚，因为只从报表上看，四川的粮还很多。四川死人多的因素还有一个，就是农村办公共食堂，既掩盖了高征购的致命影响，又真正把群众生活逼到了绝路上去了。粮食本来就不够，全部集中到食堂，自己不能做饭，锅碗瓢盆都收走了，吃大锅饭，有人多吃，有人少吃。如果粮食自己掌握，还可以弄点瓜菜调剂，后果不至于那么严重。

四川粮食出问题，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生产出了问题。“大跃进”开始后农业生产每况愈下，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把农民手里的粮食拿空了。调粮造成了被动，首先是生产上出了问题，粮食产量是假数字，中央调粮，是因为你自己说有粮嘛。那时大家明明知道粮食生产出了问题，都不敢说，说了就是右倾。1958年四川实际粮食产量大幅度下滑，1961年只有二

百六十亿斤，比1949年还少三十亿斤。缺粮问题首先是高指标、高征购带来的严重后果。第二个原因是国家调粮。1959年以后连续调，一年几十亿斤，就显出问题来了。客观上讲，调粮加重了四川的困难。四川民间传说李井泉是为了当政治局委员，不顾四川人民死活，实际上不是这样。李井泉在1958年已经是政治局委员了，所以调粮与他的政治局委员无直接关系。

四川在“大跃进”中损失严重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及时改正盲目冒进的错误。湖北、云南则与四川不同。湖北第一年（1958年）吃了亏，马上调指标，第二年的钢产量指标也下来了。云南1959年“小高炉”也不干了，四川则闷着头干，执迷不悟，更加剧了困难，损失太大。从人口数量上可以说明错误的严重性，但光从调粮的数量上看，不是人口减少的直接原因。1958~1961年中可能共调走了百把亿斤粮，四川一年产几百亿斤粮，调走的基本是储粮。这件事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当时主管粮食工作的人有李井泉、李大章、张韶方等人，账也不能只算在李井泉头上。当时四川农村出了问题，饿死人了，四川的领导没有从工作失误去认识，把揭发出来死人严重的地区统统认为是当地干部出了问题，处理了芦山、丰都、眉山等好几个地方干部。丰都处理最重，县委书记开除党籍、法办，宣布为“坏分子”。1960年省委提出“政权还在不在我们手里”的问题，派了一些干部到基层任职，去的都是所谓“有问题”的地方，如省委组织部部长安法孝到江北县当书记，省委农工部副部长杨万选去铜梁（或合川）当书记，宣传部部长明朗也下去了，建设厅副厅长王森到荣县当副书记，书记是省委党校的魏文引，去的地方都是死人多的。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死人的严重性被掩盖了，因为很多地方不敢讲实话，后来才发现严重，特别是雅安、涪陵地区，两个地区的地委书记后来都被撤职了。涪陵还搞了个“反瞒产”斗争。因为1959年按高指标，粮食收不上来，地委认为是“坏人瞒产私分”，本来就死人，一斗就更整死人，涪陵为此还在省委会上介绍“经验”，省委还转发各地。这两个地方都是先撤“有问题”的县委书记，后来问题暴露，又撤地委书记。

1960年底中央提出“八字方针”，开始调整。有的省在此以

前已经开始调整了，四川的决心下得比较晚，步伐也不够快，尤其是在公共食堂问题上。1960年，李井泉在《上游》杂志发表《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的署名文章，所以四川的公共食堂又拖了近一年才散伙。关于农村工作退不退的问题，省委一直争论，当时的说法是“退到腿上还是脚上”，主要是人民公社核算单位到哪一级。关于食堂散不散的问题，省委讨论了很久，经过两三次反复，最后李井泉决定办得好的可以坚持，办得不好的可以解散。其实哪里有办得好的？省委文件一下去，一夜之间就全散了。这反映出当时四川缺乏民主作风，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人很少。这也与庐山会议以后四川反右倾搞得很厉害有关。后来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四川很多县委书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认为省委搞“一言堂”。所以毛主席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千一稀，大家满意”。还对李井泉、曾希圣几个人说，你们出去走一走，你们原来搞“一言堂”，现在大家反对，你们就不敢出门了？七千人大会回来后，省委组织传达，李井泉作了检讨，让大家讲话，彻底解决了原来的认识分歧。省委提出工业彻底退够，农业彻底退赔，把原来该放不放、该改不改的问题都解决了，四川的经济最终走上了恢复的道路。

1961年调粮后，中央了解到四川的实情，很快决定进口粮食，1962年还调了一些粮食给四川。四川的调粮问题是“大跃进”全局性错误中的一个局部性错误，不能离开全局来单独强调这个局部。中央在七千人大会上对调粮问题也有说法，周总理还就此为李井泉承担了责任。

关于四川调粮的回顾反思

廖志高^① 口述

曾庆祥 整理

廖志高同志对困难时期四川人口非正常死亡率高的问题曾长期进行研究和反思，他认为：在四川已严重缺粮、肿病开始流行和出现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时候，特别是1960年底，为了顾全全国大局，四川省委领导仍不得不服从国务院命令，过头调粮出川，这是造成上述状况的主要原因。而四川特有的或者比其他省区更严重的工作失误，即：农村公共食堂解散晚、社员自留地恢复迟、搞反瞒产私分，则极大地影响了群众抵御饥荒的自救能力，加剧了四川群众生活困难和非正常人口死亡。

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国务院为了缓解当时一些省、市特别是京、津、沪几个大城市粮食供应面临脱销的严重局面，多次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四川等省粮食外调，必须服从并限期完成中央下达的调粮任务。四川省委、省政府在本省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得不压低农村返销和城市供应，挤出粮食完成外调任务。由于口粮严重不足，四川城乡的浮肿病人和非正常死亡人数急剧增加，情况比较突出。1962年初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四川到会的有些同志，对死人多、问题反应强烈，对过头调粮也有埋怨情绪。四川省委进行过初步检讨，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四川过头调粮的问题作了必要的说明，但仍有部分同志有意见。“文化大革命”中，这个问题成为“李廖死党”特别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同志的重大“罪行”，有的人认为是“只管讨好上级，不

^①廖志高，1926年生。原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顾群众死活”，是“保官位”，甚至说“李井泉的政治局委员是靠外调粮食和牺牲群众生命买来的”……众说纷纭。总之，一句话：当时外调粮食过头有罪。

廖志高同志“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任四川省委书记，分管农村工作；1965年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复出后，1974年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1982年患脑血栓调回中央，后任中顾委委员。尽管他后来已经不在四川工作，但他始终带着四川这个问题，调查了解福建和其他一些省、市在“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况、问题和有关政策，进行比较研究和反思。1982年他患病以后，又多次赶来川治病、休养之机，广泛查阅、搜集有关资料，找一些老同志座谈、回忆，进一步了解和认真探讨四川当时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和经验教训。20世纪90年代初，他在成都邀请原四川省委几位老书记座谈时，曾坦诚地表明：困难时期四川过头调粮和死人多，如果要讲责任，除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负有责任外，我当时是省委领导班子成员，同时又分管农村工作，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已经退下来的领导干部，我有生之年的一大愿望，就是如何联系四川当时的实际，对这个问题实事求是地、正确地总结我们应当记取的经验教训。廖志高通过广泛了解，从汇集到的有关情况和资料中，经长期反思，对当时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过程和应当记取的教训，逐步形成了比较系统和明确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外调粮食过头确是四川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

四川历来就是外调粮食多的省份，“一五”期间共调出粮食一百六十二亿七千二百万斤，平均每年三十二亿五千四百万斤，尽管数字不小，但每年外调加上内销后尚有结余，从当时四川粮食生产较好的情况看，还是可以承受的。在1958年“大跃进”的“左”倾错误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下，四川从1959年开始，连续三年粮食大减产，但粮食外调任务却连年递增。1959年外调四十九亿斤，比1958年的三十九亿六千万斤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三；1960年外调六十八亿四千万斤，比1959年又增长百分之二十八

点三，比“一五”期间平均每年外调三十二亿五千四百万斤增长一倍还多。

由于外调任务过重，原有粮食库存被挖空，省内农村粮食返销严重不足，以致农民实际留粮水平锐减。1959年四川农民人均留粮（包括种子、饲料和口粮）从1958年的五百一十二斤猛降为二百七十八斤，1960年又继续下降到二百六十斤，两年都低于全国农村人均三百七十八斤的留粮水平。城镇居民粮食供应也压低到每月二十一斤，大大低于全国城镇平均二十七斤的水平，后来还要求机关厂矿职工每月节约两斤，只有十九斤。外调粮食过多，城乡人民口粮严重不足，导致营养严重缺乏，是四川浮肿病流行、人口非正常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

二、四川为什么要调过头粮？

廖志高同志回忆说：1959年完成中央外调粮食任务后，四川农村由于缺粮面大，开始出现浮肿病和死人的情况，1960年矛盾更加突出。四川省粮食厅于1960年2月向中央粮食部的《外调粮食情况汇报》反映：中央安排四川1960年上半年外调粮二十八亿斤的任务过重，库存粮源已经无法调动，外调只能是小春入库的新粮，要求部里按当年小春征购二十亿斤的计划相应地核减外调任务。省委分管财贸工作的阎红彦同志在出席全国财贸、粮食会议期间，也曾多次向中央分管的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反映四川缺粮的情况，要求减少外调任务，并且按照省委的意见表明：四川的浮肿病和死人情况日益严重，多调出一亿斤粮食，就会增加几十万人的缺粮面，必将导致肿病、死人大大增加的严重后果。

当时，全国粮食紧张形势也越来越严重，许多粮食调入省纷纷要求增加调入，调出省又一再要求减少外调，中央的粮食调拨计划难以落实。为此，中央曾多次发出紧急指示或召开电话会，要求各省市务必完成粮食调拨任务。廖志高同志回忆说：有一次，中央召集各省市在京开会的财贸和农业书记讨论粮食问题，主持会议的李先念同志在说明中央处境困难的情况后，提出了一个经修改后的调拨计划，要求大家顾全大局，承担任务，但会上一直无人表态。先念同志一再说服，几乎到了“乞求”的地步，最后不得不请周总理出面做工作。总理说，现在中央掌握的

机动粮已基本告罄，先念同志焦头烂额，我这个总理日子也很难过。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灾情发展下去，城镇粮食供应不上，出了问题后果难以设想，国际国内的影响不好，苏修也会看我们的笑话。如果大家今天不把任务背回去，那就只好不散会，都坐在这里“熬鹰”（指驯鹰时不让老鹰睡觉）好了。这次会议对我的印象极其深刻，中央已经到了那样困难的地步，确令人心里难过。

到1960年底，全国形势更加严峻，许多城市、厂矿和灾区不断向中央告急，要求增加调入，特别是京、津、沪几个大城市的存粮只能供应几天，已面临脱销的危险局面。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下达了四川等粮食调出省必须按期按量完成并突击运粮的死命令。省委当时收到的电话通知，主要内容是强调这是国务院的命令，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还讲到京、津、沪当时的紧急情况，并且说，中央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后来被传为“宁肯四川死人也不能让京、津、沪死人”）。当时省委正在开会，李井泉曾激动地说：你那里是国务院，我这里也是个小国务院嘛（“文化大革命”中就把这句话当作李井泉搞“独立王国”，想当“土皇帝”的“罪证”）！实际上他是对过头调粮有意见。后来，经省委反复研究讨论，最后一致认为：尽管四川有不少困难，但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考虑，从中央和全国的大局出发，我们只能坚决服从中央、国务院的决定，挤出粮食，继续外调。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省委不想走、不愿意走但又不得不走的一条路。

三、省委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和工作上的几点失误

廖志高同志说：当时四川因过头调粮已经出现缺粮和非正常死人的情况，省委在制定、执行有关政策和工作上还有哪些失误，加剧了群众困难和非正常死亡的严重程度？这是我离开四川工作特别是退下来后一直考虑的问题。他还形象地说，我考虑应当结合四川当时的实际来唱“川戏”。经过长期回忆、反思和掌握的资料，并同其他一些省、市、区困难时期的情况比较，他认为主要有三条是四川特有的或比其他一些省市更严重的失误。

1. 公共食堂散晚了

农村公共食堂^①是“大跃进”中搞“三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和“吃饭不要钱”的产物，从一开始就暴露出许多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如规定社员必须集中在食堂吃饭，并且把个人应分的粮食统一由食堂掌握，完全剥夺了社员在吃饭问题上的自主权。1959年，全国粮食普遍减产，农村公共食堂的困难和问题越来越多，群众意见也越来越大。

这段时间，四川针对食堂存在的问题，采取过一些变通措施，如当年7月，省委批转南充地委《关于改进伙食供给制和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批语中提出：“在积极办好的前提下，实行自愿原则”、“在积极改进食堂，加强政治工作以后，对于那些仍然坚持要退出食堂的人，应当允许他们退出”、“食堂吃粮实行‘以人定量、分配到户、食堂吃饭、节约自得’”，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群众生活的困难。

问题是这些变通措施刚下达不久，8月底省委在传达贯彻中央庐山会议精神，开展反右倾斗争的会议上，错误地把泸州地委解散公共食堂等做法作为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判，后来又采取组织措施撤销了泸州地委几位书记的职务。紧接着，省委发出了一系列关于恢复、巩固公共食堂的指示。9月初，省委在《关于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增产节约粮食，胜利渡过灾荒的指示》中，强调“公共食堂不仅是适合生产‘大跃进’为群众所赞成的组织形式，而且是战胜贫困、战胜灾荒的生活堡垒”，要求“通过大辩论，使不巩固的公共食堂继续巩固起来，被右倾分子所解散或拖垮的食堂要迅速恢复起来”。10月底，省委又发出《关于恢复公共食堂的指示》，提出“应切实把公共食堂恢复巩固起来，把多划给私人的自留地、饲料地、蔬菜地，连同这些土地的作物一并收回来”，同时还指出，“可以肯定在县、区、公社各级领导干部中都会有一些具有资产阶级立场、代表富裕农民的要求，热心搞资本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了保卫党的总路线，应该坚

^①1958年10月《四川日报》报道，至年底，全省农村已建立公共食堂六十一万多个，实现了“公共食堂化”。

决把他们揭发出来，进行批判，进一步纯洁党的各级领导核心，以便在干部中彻底纠正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一系列指示发出后，不仅使四川8月以前在食堂问题上缓解群众困难的一些变通措施难以继续贯彻落实，相反，在“保卫党的总路线”、全面开展反右倾斗争的压力下，言路堵塞，真情难于上达，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长期得不到解决。

到1960年，全国许多省区由于灾情重、粮食紧张，公共食堂大都难以维持，不少地方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但是四川仍然千方百计保住公共食堂，并在8月底的省委工作会议上，针对有些地方自行解散食堂的情况，提出要“反对右倾畏难情绪”，并且明确指出：“公共食堂不能散伙。”

1961年初，全国由于开展反右倾斗争，导致“左”的错误重新泛滥。针对当时农村中暴露的严重问题，毛主席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中央各部和各省市区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到基层进行调研活动，写出报告送中央。当时，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多数省市区负责同志的报告中，均反映了社员不赞成办食堂的意见。四川李井泉同志也于5月初亲自到内江市交通公社临江大队的十六个公共食堂专门作了调查，调查结果是社员赞成继续办的十二个，占百分之七十五；不赞成办的四个，占百分之二十五。社员不赞成办的原因，当时归结为干部作风不民主、食堂规模过大、财务账目不清和柴火困难等几个问题，并且认为经过工作采取补救措施后，问题可以解决。李井泉同志在给毛主席的报告中主张“对于没有条件办或办得不好群众要求散伙的，应该帮助他们散好；对办得好，群众真正坚持继续要办的，应该帮助他们办好。”

廖志高同志回忆说，当时我也参加了这次调查，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省委一系列坚持办食堂的指示和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等舆论导向的影响下，许多社员并没有讲真话，也不敢讲真话。紧接着，中央通知我到北京参加《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的修改工作，刚到北京我去见了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谈到公共食堂问题时他说：看来，食堂是保不住了，你们不要再拖泥带水，干脆“吹”了算

了!当然,你参加修改《六十条》时,修正草案中不一定那样写,但是全国大势所趋,公共食堂是保不住的。后来,5月21日~6月12日在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的《六十条》中,对食堂问题作了修改,删去了原来草案中“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提法,改为“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对不参加食堂的社员“不能有任何歧视”。四川在传达贯彻《六十条》后,全省公共食堂才相继解散,省委也于7月21日正式发出指示,决定“取消人民公社分配中的供给制,不办公共食堂”。这同全国多数省市比较起来,四川晚了大约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食堂解散的时间越晚,群众遭受的困难和损失越大,肿病和非正常死人的情况也越严重,这是当时四川工作中的一个重大失误。

2. 社员自留地恢复迟了

自留地是合作化时期土地入社后留给社员的“小自由”,自留地上种什么作物,是自用或出售,均由社员自己决定。人民公社化后,在“一大二公”的指导思想下,共产风、平调风等“左”倾错误遍及全国,都把社员的自留地、私有牲畜、屋基等统统收归公社所有;举办公共食堂后,这部分自留地又交由食堂统一种植蔬菜和饲料,社员没有一点小自由。当时,毛主席视察河南、安徽、河北等地的消息报道,代表党中央声音的《红旗》杂志公开刊登《河南嵯峨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对这方面的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但是,有的地方仍然采取了一些变通办法,据廖志高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的调查了解,在自留地收归集体的情况下该省确定当年秋收以后,冬闲时期允许社员在原有自留地上种植一季作物,归个人所有,群众称之为“自由一季”。后来福建和全国多数省份一样,随着公共食堂的解散,自留地又全部或大部划归社员个人。这在当时口粮紧缺的情况下,对缓解群众生活困难、顺利渡过灾荒,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而四川由于保公共食堂,自留地问题的解决也比其他省市晚了一大截。早在1959年5月,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简称《指示》)中就提出允许社员私人养猪,可以给社员恢复一部分自留地。而四川在转发这个《指示》时却指出:“四川各地已规定结合公共食堂和专业

养猪基地留了一定数量的菜地和饲养基地，这样就可以达到多养猪的目的，一般即可不必再恢复自留地了。如果恢复自留地，就会影响公共食堂的巩固。”同年6月，省委根据中央关于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精神，发出了把几项权力下放给生产队的规定，对社员的“小自由”开了一点口子：“允许社员在屋旁、村旁、水旁、路旁种庄稼，产品可自行支配”，但仍明确规定“一般不给社员划自留地”。这种不给社员恢复自留地的状况，在四川维持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直到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下达数月后，到1961年2月，省委才在全省开展整风整社运动的指示中规定“给社员划自留地”，但由于当时公共食堂尚未解散，又正值整风整社，实际上很多地方并未贯彻落实。一直到1961年7月，省委正式发出“不办公共食堂”的指示后，才于当年8月批转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社员自留地划拨情况的检查报告》，要求各地对自留地落实情况进行一次普遍检查，“没有划够的应立即按规定补足”，才算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困难时期群众把自留地称为“救命地”，四川在恢复自留地问题上拖的时间太长，解决得很晚，没能及时起到它的“救命”作用，导致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

3. 反瞒产私分搞错了

1960年冬，正当粮食紧张、矛盾重重时，苍溪县在全县范围开展“查粮食、反瞒产”的工作，共查出隐瞒的粮食五百二十八万斤，占大春已收粮食的百分之三。省委于10月下旬批转这个报告的批语中，要求“其他地区应仿照苍溪县委的做法，把‘四粮’（征购、口粮、种子、饲料）落实”。报告下发后，各地普遍进行了反瞒产。为了追查“隐瞒”的这部分粮食的去向，有的地方就给一些基层干部甚至部分社员加上“私分”的罪名，到他们家里进行搜查，打破坛坛罐罐，把社员长期节约下来的一点存粮统统拿走；有的地方甚至因此逼死人命。廖志高同志回忆说：后来我到涪陵地区发现了这一情况后，迅即向省委反映，并以紧急电话通知各地立即停止反瞒产的做法，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尽管这种搞法的时间不长，但影响极坏，给基层干部和群众造成的困

难和损失也是难以估量的。

廖志高同志认为，困难时期，社员必须在公共食堂吃饭，吃好吃坏、吃多吃少甚至给吃不给吃，命运完全由食堂掌握；能起一点“救命”作用的自留地又被收尽，长期不给恢复；即使有一点点自己可以掌握支配的粮食，也被反瞒产私分强行搜走。在当时因过头调粮已经出现缺粮和饿死人的情况下，这三条失误实际上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从而加剧了四川群众生活困难和非正常死亡人数多的严重局面。除了这三条，可能还有其他失误，但主要是这三条，是四川特有的或者比其他省市更严重的失误，也是我们在过头调粮、非正常死亡严重这个问题上应当记取的沉痛教训。

四川“大办钢铁”始末

何郝炬^① 口述

黄友良 录音整理

四川“大办钢铁”自1958年9月后形成高潮，1959年对钢铁高指标曾一度有所调整，但反右倾使调整的努力受挫。1960年在全国各省的“大办钢铁”开始收缩时，四川又继续“大办”了一段时间，至中央工作会（七千人大会）会后四川“大办钢铁”才基本结束。四川“大办钢铁”造成的损失和后果非常严重，教训深刻。

“大办钢铁”实际上就是“大跃进”时期的工业建设。四川“大办钢铁”造成的损失和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教训是深刻的。

四川旧有的工业基础很差，国民党留下来比较像样的就只有重庆的几个兵工厂。“一五”期间国家在西南基本没有投放什么项目，四川只有六项，其中两项为电厂、四项为电子工业。“一五”期间四川地方工业建设主要抓了几个糖厂，在私营企业改造中合并了一些手工业作坊，搞了一些小厂。“大跃进”前四川的钢铁工业有重钢、二钢，重钢“一五”期间年产钢约二三十万吨，二钢十来万吨。产铁基本是重钢。另外四川有几个小铁厂，出名的有三家：威远、万福、华强。总的来说，钢铁工业基础不强。

“大办钢铁”是1958年“成都会议”以后提出的。1958年3月“成都会议”结束以后，冶金部召开务虚会，冶金部部长王鹤寿提出钢铁工业要在几年内把钢产量大大提高（当时我国年产钢五百多万吨），此举得到毛主席的肯定。此时毛主席指出工业发

^①何郝炬，1922年生。时任四川省基本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

展水平衡量标准是钢产量，要“以钢为纲”，以后又有了“三帅两先行”口号。“三帅”是钢铁、农业和机械，“两先行”是煤电和交通先行。因此，要求各地都要抓钢。

我到省里来了以后参加的第一次会议是省委于1958年5月在重庆召开的全省地方工业会议。会议提出大大提高本年度钢产量，扩大基建规模，在“二五”期间上几个钢厂（江油、达县、乐山），扩大钢厂，要求各地有条件的都要办铁厂。我在会后不久就出国访问，后面的事很多我都不知道^①，但真正出问题是在1958年8月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以后。我回国后正好赶上传达北戴河会议精神，匆忙到建委上班^②。1957年全国产钢五百三十五万吨，冶金部务虚会后提出1958年要超过一千万吨，但到了七八月份，全国仅完成三五百万吨。北戴河会议本来是订“二五”计划，因钢产量上不去，在会上提出“全党动员，大办钢铁”，目的是为了保证实现指标，办法是全民动手，搞群众运动。全国各省都从9月份开始“大办钢铁”，大上劳动力，“大办钢铁”的口号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我回国后听说四川一下子上了八九十万人，这时的情况有两个特点：一是在要求上加了码。如江油钢厂当年上马，要求当年出铁出钢，一个工地就上了十来万人。我一回来，建委就马上要求下去检查进度。我带了两个人，找了一辆吉普车就到绵阳地区去了。也不知工地指挥部在哪里，一路上走的全是民工，一个挨一个，望不到头尾。后来找到一个寺庙，已成了某县的指挥部，

^①7月7日，四川省重工厅在威远钢铁厂召开全省炼钢现场会，确定三十二个单位上马建设炼钢车间。8月，《四川日报》发表《以钢为纲》社论，认为四川具有高速发展钢铁工业的物质条件。本月，省委召开市、地、州委书记会议，讨论“二五”时期及1959年经济计划，安排追加1958年基本建设投资，并决定以发展钢铁为中心，建立重庆、成都、西昌等协作区。8月5日，省委成立钢铁办公室，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兼主任，省委书记陈刚、省委工业部副部长刘洪阳兼任副主任。各市、地、州委也成立了相应机构。8月22日，省委召开市、地委第一书记电话会议，动员全党、全民为钢而战，要求市、地委第一书记挂帅，力争9月初，最迟9月底，全省万座高炉全部投产。会后，各市、地、州随即开紧急会议，布置大办钢铁。

^②9月7~11日，中共四川省委一届八次（扩大）会议在重庆举行，传达贯彻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精神。会议决定10月1日全省统一实现人民公社化，还决定年产钢八十六万吨、铁一百二十万吨，争取完成一百四十万吨。会后，全省掀起全民大办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住的全是人。

另一个特点就是建小炉子。因为光上人不行啊，又没有设备，就建小炉子。绵阳地区每个县都给了任务，有的地方没矿，就到有矿的地方去搞，于是上广元、旺苍，一下子都上去了。工地上什么都没有，住的是草棚子；露天糊个小炉子就开干。所以当时说家里只剩黄忠（老人）和穆桂英（女人），就是这样来的。城市也建小炉子。建设厅勘察科研所就在成都锣锅巷，在院里糊个土炉子，我也去上过炉，连李井泉都在重庆上了炉子。这种搞法完全是没有基本常识，炼出来的多半不是铁。城乡沾铁的东西全都砸了再去炼铁，实际上全是浪费。所谓“大办”，最集中的就是这三个月（10~12月）。最后全国统计竟完成了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宣布“大跃进”实现了，钢产量“翻番”。这年，四川宣布钢产量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全年产钢七十万二千九百吨，产铁八十三万八千八百吨。1962年核产，实际产钢四十七万吨，生铁五十六万吨。

1958年底的指标数是上去了，第二年的指标就下不来了。在讨论第二年的指标时，大家也明白上不去，但钢铁“上了马”又不能下，只能在上年报的指标基础上搞。按“大跃进”的定义，是每年都要翻番的。但1959年再翻番是肯定不行了。中央这时提出了“大中小跃进”的说法，即增长百分之三十是“大跃进”，百分之二十是“中跃进”，百分之十是“小跃进”，起码也要加百分之十。1959年初，我参加在重庆召开的云贵川三省协作区会议，讨论当年的钢产量指标，再由全国计划会议定板。云南省在那次会上就说有困难，再加就支持不住了，提出准备抓好现在有基础、比较正规的几个点，搞几个铁厂，不上新项目了。四川、贵州还是按冶金部的要求，钢铁指标增加了百分之二十。1959年时四川也不准备像1958年那样干了，年初讨论计划，准备要作一些调整，实际上就是要作一些平衡，不能再“一马当先”，但冶金部不同意，仍然要求继续上。冶金厅副厅长李文达就在会上强调说，如果按冶金部的要求，四川1959年的产量是上不去的，意思是四川还上得不够。李大章当时对李文达随口说了“元帅下马，精神不死”的话。年初民工也减少了一些，但仍决定要留一

批小炉子，所以冶金行业还是留了不少人。当时上一个三立方米的小炉子就需要几千人。一个三立方米的炉子搞好了，一天最多出五吨铁，一年千把吨的规模，几千人围着转，那时完全没有成本概念。

1959年初经调整后的指标仍然很高，所以各行各业都增加了劳动力，每个县都要求办工业，搞机械厂，设备没多少，人却上得不少。除冶金外，电力行业的项目也上得多，1959年同时开工的大电厂（几万千瓦）项目就有一二十个。这年我第二次下去看工地，这次去了乐山、宜宾、自贡，在宜宾就同时有两个项目开工，一个南广河，一个苏滩，一个工地几千人。当地电站建设项目不像钢铁指标卡得那么死，要求也不是太急，我就向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建议，就目前状况，上一个就行了，同时上两个，恐怕各方面条件都不行，回来后我又向电力部门讲了，后来宜宾确实减了一个。但从全省来讲，仍然是上得太多。

应该说1959年上半年钢铁指标未降，但干法和干的程度比1958年好一些，没有那么狂热。这时省里管工业经济的是阎红彦^①，他分管计委、建委、财办。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敢说话的领导。他曾经去看了郫县红光公社的“卫星田”，就说这是个假的么。只有他敢说，别人都不敢说。到了6月，计委要准备省人大二届二次会议的年度计划报告，整个工业计划是阎红彦、李斌^②负责，阎红彦在成都找人开会，李斌、我和张戟^③都参加了。冶金厅的人没参加，都在重庆钢办抓生产（因为他们没有参加调整会议，所以后来对计委意见很大，大批右倾）。阎红彦把李斌、张戟和我找去说：“我看你们说话都不行，看来工业指标上不去，不行，还要调。”他知道我们的想法，也知道我们没法说，他直接给我们捅出来了。他又说：“李政委（井泉）^④思想不通。不行，我们去找李政委。”下午二三点钟，就把我们几人带到金牛坝，李井泉还在午睡，阎红彦进去把他拖起来，说：“我看这个计划

①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副省长。

②时任四川省副省长。

③时任四川省计委副主任。

④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指标还是不行，还要动。”我们都没说话。李井泉说：“那好嘛，调吧。”调的结果是劳动力减了一些，指标没有下调多少。调整劳动力，冶金行业当然首当其冲。接着张戟到国家计委开会，会上提出按农轻重次序安排经济，强调综合平衡。话是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贾拓夫讲的，实际是中央的意图。张戟回来后，我们就在省上的调整会上强调这个精神。因为要综合平衡，钢铁就不能太突出。钢办和冶金厅的人很不满意，张戟就引述了大章讲过的“元帅下马，精神不死”那句话，结果惹下大祸。

只过了不到一个月，庐山会议结束了，形势陡转，全国反右倾，国家计委的贾拓夫也成了右倾分子，挨大批，好像后来自杀了。四川到处搜集右倾材料，省计委主张“综合平衡”，成为右倾的中心，这中间省委钢办的人可能起了很大作用。就在这个月，阎红彦调走了，反右倾的人只字不提阎红彦主持的那个会，只说什么人说了什么话，所以，张戟上了批判大会，挨大批。

这中间四川还搞了一次“反右倾测验”，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事。庐山会议结束后，8月30日，突然通知省里处级以上干部开会，去了以后发文件，就是《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简称《意见书》），宣布上午看，下午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后没有附任何东西。下午表态，有人不知就里，觉得彭老总身居高位，说得又有理，表态同意，岂知黄雀在后，就上了“名单”。我当时一看，觉得与报上的调子不太对口，加上彭老总说了许多农业上的事，我也不太清楚，就没明确表态，结果是侥幸过关。第二天宣布中央对彭德怀的结论，一看糟了，但谁也没想到会那样整。9月13日移到重庆继续开会，分大、中、小会批。大会一开会就点了几个人上台，有张戟、邓自力^①、夏戎^②、成都军区一个师政委、重钢经理等，下面一千多人，每排放一个大喇叭，声势逼人。这些上台的人事先谁也不知道要挨批，所以会场上气氛很紧张。中会是以省级机关工业口范围组织的，李文达^③一开会就指名点姓地批李斌和几个计委中层干部，李斌根本没有准备，被搞得一头汗水。然后又开小

①时任中共泸州地委第一副书记。

②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③时任四川省工业厅副厅长。

组会，连我、安康元（计委副主任）一起批了。这次反右倾使四川调整的努力又一次受挫，对“大办钢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四川又重新制定了钢铁指标，接着干，从此不能说调整。当时有一些别的事也跟着挨批。金堂县有个成钢，是地方项目，一个川化是国家项目，川化的条件要好得多，成钢当时上不去了。钢办刘洪阳^①宣布，钢铁行业的材料、资金不够，就抽调其他行业的。北京化工部的人说了一句“到底是姓钢还是姓化？不能拿钢铁压化肥”。结果被汇报上去，这个人回北京也挨了大批。当时轻工、纺织行业有点钱和物资，开个会就拿走了。后来有几个厅长挨批就是因为对此不满。轻工厅长刘瞻就仅说了一句“我轻工被打入冷宫”，结果也被大批一顿。

1960年全国各省的“大办钢铁”都开始收缩，但四川不仅没有退，又补了一家伙，所以1960年四川的问题多一些，也和全国各省不大一样。定1960年的指标时，冶金厅起的作用大一些。因为当时四川的钢铁指标完成得较好，冶金部在全国各省都在退的形势下，希望四川能够坚持。当时全国钢产量第一是辽宁，第二是上海，第三原来是河北，但河北1960年劲头不足，冶金部希望四川能站到全国第三的位子上去。所以四川在1960年又一次提出要上小高炉，又上了一批劳动力。与1958年不同，这次是正儿八经地建炉子了，又上了一批高炉。这时四川农业已经普遍出现问题，有的地区人口非正常死亡严重。但反右倾以后，谁都不敢说话了，说了也没用^②。我挨了“小批”以后，接着让我去北京要投资。回来后又让我去负责设备生产，组织一个“五小设备办”（小高炉、小炼钢、小轧钢、小电站、小煤矿），驻重庆，搞了整整一年，由兵工厂负责生产，专门为“大办钢铁”提供设备。这些厂虽然搞了

^①时任四川省计委、经委副主任，省委钢铁办主任。

^②4月14~16日，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召开工交和基本建设六级干部大会，陈刚代表省委作报告，要求全省工交战线“紧急准备，再一次开展全民大办钢铁运动”。规定当年必须保证产钢一百五十万吨，争取一百六十万吨；产铁三百万吨，争取三百三十万吨。力争做到全省一百多个有铁、煤资源的县都建立起不同规模的小洋（土）群，其余采取“飞地”办法，建铁、煤小洋（土）群。要求三年内，全省所有专区、州和大部分重点产铁县，都要分批建小型钢铁联合企业。大会还批了一批生产上不去的右倾企业领导干部。当年钢铁产量，1962年复核为钢六十八万吨，铁一百二十五万吨。

不少设备，但质量很差，不实用。如小火电设备是重庆497厂（望江机器厂）造的，生产的一千五百千瓦的小电厂设备，电是能发，但一开炉子，烟雾腾腾，又是“煤老虎”，煤耗比其他同类设备高出一两倍。1960年春，省委又布置“火线整风”、“整顿落后”，提出哪里生产上不去，就在哪里反右倾。冶金行业是在乐山大渡河钢厂开的现场会，批了二重的景晓村、重钢的王廉等一批人。大家后来都虚报数字，完不成也说完成，反正也没人去查，就这样又搞了一年。

1960年底，我参加了两个全国性会议。一个是国家建委召开的全国大区的基建计划会，程子华^①主持，要求大家检查“三高五风”，这是中央精神，但各省都不知道，谁也不敢讲话，说了不是又成右倾？程子华把我狠批一顿，说“你为什么不说话？”云南省去的是个副书记周仕平，干脆溜了，不打照面。贵州去的是个副省长，我职务最低，建委主任。西南三个省编一个小组，讨论谁当组长，我说云南当吧。周仕平说不行，你四川是大省，你当。贵州省不说话，扯半天无结果。结果周仕平不来开会，留一个计委副主任在那里支应着。程子华说你们根本没有解决问题。

过了两天，阎秀峰和我去参加北戴河的全国计划会议。开会头一天，李富春讲话，讲的就是著名的“八字方针”，把中央的精神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大家听了很震动。会后阎秀峰对我说：“马上打电话给省委，这事关系重大！”我打电话，李斌接电话，我刚一开头，李斌一听，马上说：“别慌！等我拿笔记录。”我讲一句，他记一句，听不清的地方还要复述一遍，结果这个电话打了七个多小时，从下午3点一直打到晚上10点，我连晚饭都没吃成，打了一个一生中空前长的电话。实际上，李井泉事前已知道中央精神，只是没那么具体。不久，调整指标拿出来了，1961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安排七十亿，分给四川不过两亿，铺这么大的摊子，这点钱揩屁股都不够。这说明形势的严峻。钢铁指标也往下调了，真正开始转变。

四川的调整过程比较复杂一些，中央方针拿回来以后，省委一开始没表态，搞钢铁的人不同意。上半年省里只是叫下一批劳

^①时任国家建委副主任。

动力，但调整还没有到位。当中有个二次庐山会议（10月），中央提出要退够。但四川仍然没有大动，农村劳动力还有几十万人在城里，基本建设投资没有了，只是在吃老本，省委当时对工业的底摸得不够，所以调整步伐不大。庐山会议后，省委意见明确一些了，要求加强调整，冶金部门还在坚持，最后李井泉下决心了，明确坚决下。因为第一农村没有劳动力，第二城里没粮食吃。省委要求退到1957年底的水平，李井泉主张还要压，结果1957年上的劳动力也下了一部分。

这时，中央发现了“大跃进”运动中的一些问题伤害了一大批干部，所以决定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七千人大会）解决这些矛盾。四川去了二三百人，主要是地县干部。七千人大会以后开始总结经验教训，“大办钢铁”到此差不多结束了，最后是下放劳动力。具体执行是杨超，大约是七千人大会以后一两个月，计委召集会议，由李满盈主持会议。会上温江官韞书认为有些调过头了，杨超刚讲了几句，刘洪阳就站起来对杨超发脾气，拍桌子，拂袖而去。杨超也气走了。这会收不了场，李满盈去找了许梦侠，许梦侠叫暂时休会。最后省委批评了刘洪阳，李井泉说还没退够，再退一些。第二年反映退多了。因为退了一部分1957年参加工作的人，这些人多数在城里安了家，这一退，农村也回不去了，生活发生了困难。所以后来有人提出退过了头。

四川“大办钢铁”，用于基本建设约十二亿元，生产上亏损十几个亿，比机械行业多。各县建的小炉子都是自己拿钱，未计算在内。省上投入及亏损两项相加，花了二十多个亿，这是很大一个数字，当时四川省财政一年收入就是十来个亿。后来还要退赔平调的劳力、物资，数量很大，各地纷纷叫苦，说是退不起。李井泉说不行，砸锅卖铁也得退。李井泉在处理“退够”问题上比较坚决。

调整的结果，重钢、二钢保留，规模缩小，铁厂裁掉了华强厂，只保留了威远、万福两个厂，成钢改产。调整后四川的钢铁生产规模比“大办钢铁”前还小一些^①。

^①1962年全省产钢三十一万三千吨，比1957年下降十一万六千吨；铁二十万六千吨，比1957年下降百分之二十七点五。

“大办钢铁”运动的回忆

张如兰^① 口述

邹一清 录音整理

高指标、强力指挥、政治介入、大撤退，是“大办钢铁”运动的一些显著特征，“后院炼铁”、“土钢炉”、“土铁炉”、“熔铁炉”、“放卫星”……是“大办钢铁”运动的“特产”。“大办钢铁”运动是四川乃至全国经济建设中的一次很大的挫折，正像彭德怀同志在《意见书》中讲的：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确实是得不偿失。

1958~1960年四川省“大办钢铁”那段历史距今已过去了四十多年，但对我们经历了那段历史的人来讲却很难忘记。“大办钢铁”运动今天看起来，实际上是在“左”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从中央发动起来的、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群众运动。搞“高指标”长达二三年之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特别是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直到1961年、1962年被迫进行调整。这次运动确实是四川省乃至我们国家在经济建设当中一次很大的挫折，正像彭德怀同志在《意见书》中讲的：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确实是得不偿失。

一、高指标

“大办钢铁”是自上而下发起的。当时毛主席有许多指示。在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毛主席他老人家对中国怎么搞工业化，怎么搞社会主义，甚至于怎么搞共产主义都在进行探索。另外当时国际形势也很紧张，美帝国主义封锁、包围还在继续，中苏关系在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急剧恶化。所

^①张如兰，1931年生。原中共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

以当时帝、修、反对我国实行了包围。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引起举国上下很大的愤慨，激发起全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爱国热情。毛主席在这个时候提出了：钢铁、粮食最重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中国对于搞工业、搞经济建设确实缺少经验，1957年12月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个口号，要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上超英赶美，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提出来，钢铁的产量七年超英、十五年赶美。1957年全国的钢铁产量是五百三十五万吨，“北戴河会议”上确定1958年钢铁产量要翻一番，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这是很高的一个指标，那时动不动就讲翻番。这个指标从上面压下来，四川也就要求钢铁产量翻番。1957年四川的钢铁产量只有三十五万四千吨，主要是重钢生产的。1958年提出搞八十五万吨，翻一番还多；1959年一百四十万吨，又将近翻一番。相应的生铁、煤炭等物资都大幅增加，当时在“大跃进”年代，说增长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根本不能提，提就是“右倾保守”。高指标压得很厉害。

1957年四川省的钢铁基础很差，主要是重钢，年生产二三十万吨。另外全省有小铁厂二十多个（十几至二三十立方米的小高炉），要想产量翻番，靠现有的设备显然是不行的，靠新建、扩建正规的钢铁厂，时间也来不及。所以高指标的结果就要靠大搞群众运动，靠人海战术，搞土炉子。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大中小并举”，实际上大的根本来不及搞。还有一个口号叫“土洋并举”，当时把有机化鼓风的小高炉、小铁厂叫“洋”的，土的即用石头或砖瓦砌一个零点几立方米的小炉子，鼓风靠人力拉风箱，煤炭供应不上就烧木材。“土洋并举”实际上是以土为主，大量用这样的土炉子，广种薄收。土炉子当时有个名称，还在正式文件中出现过，叫“小土群”（小——小炉子，土——土办法，群——大片大片的小炉子）。还有“小洋群”，所谓“小洋群”是指二三十立方米的小高炉，洋是指机械鼓风。以“小土群”、“小洋群”为主力，搞万座土高炉运动来完成钢铁产量翻番的任务。当时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很短的时间，就是在一夜之间把过去的高级社变成人民公社，然后在农村大量抽调劳动力，最多时（当时统计的数据很不精确）号称八百万人上山（砍树炼

铁)。《四川日报》有一次报道：一千万钢铁大军战斗在大巴山、华蓥山、峨眉山、邛崃山等崇山峻岭当中。这号称的一千万人中，除了农民是主力军以外，后来因为钢铁产量上不去，压力大了以后，把机关、学校、非钢行业工厂的人员也投入进去，所以叫全民“大办钢铁”。在机关、学校到处修这种小土炉子，外国通讯社叫我们“后院炼铁”。

当时上山的农民要自带口粮，米都是自己背上山去，而且不发工资，就是干了以后记个工分，回公社去参加分配，这实际上是对农村人民公社一次大的“平调”，是刮“共产风”的问题。四川的森林在1958年“大办钢铁”运动中几乎给砍光了，多少年以后才慢慢恢复过来。1958年秋收时，由于公社的人都上山砍树去了，粮食烂在地里无人收割。那时李井泉说：社员在发牢骚，说“人民公社”变成“人民母社”了。当时就是靠这样的人海战术，靠一些极为低劣的装备生产钢铁。

当时不仅是炼铁，炼钢也搞土炉子，叫“土钢炉”。“土铁炉”也好，“土钢炉”也好，从科学的观点来说基本上都行不通。我去看过炼铁，把矿石倒在炉子里面，加上什么东西，拉起风箱就烧。甚至后来“小土炉”都搞不过来了，就搞“大窑铁”，这个“大窑铁”就更原始了，炉子都不要，就是挖一个大坑，把煤炭、矿石堆在里面烧。温度根本就不够，炼出来的东西根本不是铁，当时我们心里在想，但不敢说，实际上是把好好的东西（木材、煤炭、矿石）烧成不能用的烂渣子了。正规的炼铁，铁渣与清清亮亮的铁水是分开的；而这样烧出来的东西就像稀泥巴一坨。当时有一个比较含蓄的说法，叫“渣铁不分”，实际上是把好东西烧烂了。有一个插曲有点意思，当时产量天天报，一天一个县生产几百吨上千吨“铁”，但是烧出来的东西不能用，怎么办呢？我那时在省钢铁办公室，知道这情况。一天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同志打了电话来，他报告李政委（李井泉），说现在渣铁不分的问题解决了。他们试验搞了一个“焠铁炉”，就是再搞一个小炉子，把渣铁不分的东西，像四川炒“回锅肉”一样，再回一下炉就行了，就出铁了。李井泉听到这个情况非常高兴，马上就开电话会，布置大家再搞许多“焠铁炉”，组织队伍到泸州去

取经。那时省钢铁办公室在重庆，我们这些秘书和工作人员就在重庆市委后院里搞了一个“熔铁炉”，炉子很小，弄了一个木头风箱，我们换着拉。我记得李井泉也带头来拉风箱。我们自己在“种试验田”，大家轮换着搞了半天，还是不行，还是渣铁不分。当时省委工业部有一个处长也住在那个院子里，我记得他当时披了一件军大衣跑来看：“这是什么东西？这怎么能出铁？”结果被李井泉听到，把他臭骂了一顿，叫来一辆吉普车，让他连夜赶到南充去，在那里搞五百个或是一千个这样的炉子，搞不成、出不来铁就不准回来。后果如何我就不清楚了，肯定是不成功的。

当时就是在这种炼出来的东西不能用的情况下，受浮夸风的影响，迫于压力，还是天天报几百吨、几千吨的产量，还要放高产“卫星”。我记得比较突出的一次是1958年国庆节前夕，全国部署在9月29日放高产“卫星”，我们四川也在那天放高产“卫星”，报上都登载了，全省日产生铁一万零二百吨、钢五千五百吨。日产一万多吨铁，那么一年就是三百多万吨，这怎么可能呢？当时报产量，哪有精确的统计呢？就是估量。根据修了多少土炉子，估一个平均的单炉产量，算出来；或者按投入了多少矿石、木材、煤炭折算出来，都是神仙数字。质量根本没有检验。而且那天的一万零二百吨还是凑出来的，让大家报，报了不行还要再报，要报够。还“预借”，29日的产量不够就把30日的“预借”一些来，这样使全省达到日产生铁万吨。这个日产万吨铁，当时觉得已经是不得了了，但是比起其他省份就不行了，当时全国都在狂热地浮夸。我记得比较清楚，广西放的“卫星”就更厉害，这是上了《人民日报》、新华社也发了消息的，广西鹿寨县日产生铁二十万吨。他们就是搞“大窑铁”，根本不搞炉子，就是挖坑坑。后来的记录还有比这更高的。这消息在报上登了以后，李井泉同志就马上派冶金厅厅长孟东波带一帮人坐飞机到广西，连夜赶到鹿寨县参观取经。回来时，我记得李井泉亲自到重庆白市驿机场候机室里等孟东波带的工作组回来。一下飞机，李第一句话就问：“那是不是铁哟？”当时人很多，孟东波不大好说，还是点了一下头说：“还是有铁。”烧了那么多东西，一天产二十万吨，仅仅“还是有铁”。后来证明那完全是弄虚作假搞的。当时

还有一个所谓的“大跃进”理论，叫“数质并举”，而且数量在前，质量在后。我们搞工业一般都说没有质量就没有数量，质量是基础。当时一种“理论”就讲，没有数量就没质量，说质量是一定的数量体现出来的，数量都没有还谈什么质量呢？所以实际上是只强调数量，不要质量。

二、强力指挥

虽然这个运动脱离实际，但当时抓这项工作的人们，确实都有一股强烈的责任感和忘我的热情。领导们把战争年代打仗的办法运用到搞工业生产上，实行强有力的指挥，在“大办钢铁”运动中确实达到了一个顶点。

四川从省委开始到各地市委书记的工作重心，本来是在农业方面，但是到了“大办钢铁”年代，就成了全党办工业，全党抓钢铁。李井泉同志亲自指挥，并坐镇重庆，实际上把省委工作的重心，移到了重庆。他带了一个大班子，省委的工业部部长、交通部部长、冶金厅厅长、煤炭厅厅长、交通厅厅长、物资厅厅长等主要的工业系统一把手都在重庆长住，我当时跟着工业部的领导同志在那里住了两三年。在重庆成立了一个钢铁办公室，它是由各部门抽调来的干部组成的，不是指挥机构，基本上是一个调度机构。天天通过长途电话和各地市委书记、主管工业的一把手、大厂的厂长联系，了解情况，然后整理好向李井泉同志汇报。好的就表扬，好经验就推广，产量没搞上去的就批评，有时在电话上把一些地委书记批得很厉害。开电话会，当时中央召开电话会，由中央书记处彭真、薄一波等同志主持，中央开了省委就接着在重庆开，省委电话会议结束后，各地、市委马上就通知各县召开电话会，一层一层开。中央开得少一点，省委的电话会几乎每周都有一两次。那时一般人打长途电话，根本打不通，都得给“大办钢铁”让路。电话会从晚上七八点钟，一直要开到天亮。层层往下开，就是讲形势、压任务。当时新闻界的报社、广播电台都派了主要的记者，报道电话会议，会议结束都在夜里12点过后，记者根据李井泉的讲话马上就写稿子，再用电话往报社、广播电台传稿子，当时还没有传真机，我记得我还去传过两回。那时总编或值班的编辑就守在电话旁，我们把稿子传过去，

传到深夜两三点，第二天早晨就要见报。当时重庆与成都有飞机航班，李井泉早晨就站在他住的招待所门口，等着看报。大概七八点钟报来了，登在头版头条。这在通讯不发达的情况下，确实是抓得紧。还有就是“调度”，钢铁办公室打电话进行调度。天天打电话，报日产量，除了报数字以外还要找那些书记了解情况，产量搞上去了有什么经验？没有搞上去是什么原因？像重钢这样的大钢厂，到最紧张的时候，每个班都要直接向省委报产量，大平炉生产多少，小平炉生产多少。钢铁产量、煤炭产量是多少，交通运输、铁路车皮发运多少，这些都要天天调度。当时除了钢铁产量外，还要调度物资数量，大量“小高炉”修起来以后，煤炭、矿石供应不上成了问题。大量树木砍了、烧了，做风箱的木材紧张了，风箱中的活塞是用鸡毛做的，有一段时间鸡毛也不够了，李井泉工作抓得很细，他说现在的关键是风箱问题，风箱问题就是鸡毛问题。让我们天天打电话问鸡毛的情况，报上去他要。过后大家开玩笑，说我们真正是在搞“鸡毛蒜皮”的事。

三、政治介入

钢铁产量上不去，达不到指标的要求，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领导们很着急。当时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叫“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鼓足干劲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反对“右倾保守”。钢铁产量上不去，反右倾就介入到这里面来了。当时分析，为什么钢铁产量上不去？主要是因为领导干部“右倾保守”。后来反右倾，在乐山钢铁厂和重庆鱼田堡煤矿等单位进一步发展为“火线反右倾”。哪里产量上不去，就在哪里反右倾，在火线上就批判，就撤干部。就像我们现在踢足球一样，输了球就换主教练。干部的压力当然就很大了。不仅是基层干部，大厂领导、地市委书记的压力都很大。我记得1960年，在重庆开一次上万人的大会，叫“六级干部会”，六级干部指省、地市、县、厂、车间和大厂的部分班组干部。在这次万人大会上，除了作报告以外，李井泉还讲了话，非常严厉，指名道姓地批评产量上不去的单位的领导。我记得当时一个是批评重钢，说重钢右倾保守，指名道姓地批重钢党委书记安以文。后来安以文被撤职了。另一个印象深刻的是批

永荣矿务局，指责党委书记杜介厘：你这么大一个矿，煤炭产量为什么上不去？而且这次你的干部来开会，还上街去耍，还不着急……实际上是在休息时间，他们矿有两个车间书记上街去修手表，不知道被我们秘书班子里的哪一个看到了，告诉了李井泉。李井泉大发脾气，喊杜介厘站起来！杜介厘是矿务局的总头头，他一站起来，下面的矿井、生产队的几级干部都跟着站起来，一排排的在台上站着。那个时期强迫命令很厉害，政治压力很大，大家都陷入了一种很盲目的状态。用类似于军事指挥的方式强迫命令，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生产，而不是按照经济规律搞生产，有一些过激的做法，就像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四、大撤退

四川的“大办钢铁”运动渐渐地坚持不下去了。农村由于大批劳动力上山砍树炼铁，田间因缺乏劳动力而减产，搞公共食堂，搞浮夸风加上自然灾害，使得情况越来越糟。工业方面比例严重失调。本来想要钢铁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结果是钢铁元帅升帐了，万马齐喑了。轻工业等其他工业被挤占得很厉害，搞不下去了。1959年搞的高指标确实完不成了，被迫进行调整。四川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也是更不好的地方，我们还在坚持不退，我们的调整收缩比全国各省都慢。四川搞高指标很凶，持续的时间又很长，在调整的时候，步伐很慢，边战边退，甚至顶住不退。1959年上半年，党中央已经出现一些调整迹象，讲人民生活，讲国计民生，钢铁指标也作了一些调整。但是到了1959年下半年，因批彭德怀右倾，使纠“左”步伐中断了。批彭德怀传达到下面以后，又继续反右，包括“大办钢铁”运动一直还在坚持。1960年全国“大办钢铁”就在退了，劳动力在撤退，指标在压缩，原来搞得很凶的广西、河南也在撤退，但李井泉不想退。有一件事我印象比较深，1960年4~5月，当时国际形势很紧张，中国共产党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遭到苏共及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围攻。在那次会议上，只有阿尔巴尼亚支持我们。在传达这件事的会上，李井泉很生气，对我党受到围攻非常气愤，他马上提出搞一个“钢铁高产周”。他的意思是要奋发图强，把钢铁生产搞上去，回击修正主义。当时我也感到，

我们搞钢铁生产确实是一个政治任务，不光是几吨钢的问题。1960年，在全国都开始调整的情况下，四川省委又正式作了决定，再来一次“大办钢铁”运动，再上三十万人，提出1960年钢铁产量一百五十万吨。但是后来还是搞不下去了，山上的人也稳不住了，“小土炉”也不行了，叫做“强弩之末”了吧。最终，1960年的钢铁产量，经过核实只有六十八万吨。就是说比1957年的三十五万吨将近翻了一番吧。但是至今我还是怀疑那个所谓核实的六十八万吨，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有符合质量标准的扎扎实实的产量。因为当时政治压力很大，浮夸风盛行，大量弄虚作假。那时弄虚作假，有的是有意识的，有的是迫于压力，有的是不了解情况、官僚主义。所以“大跃进”那几年的数字很难说。我们四川的调整、收缩比全国其他省晚了至少一年。调整慢了，加重了人民生活困难。

四川从1961年被迫开始调整。工业上主要是压缩钢铁战线，压缩劳动力，其他还包括：纠正“共产风”，解散公共食堂，调整核算单位，压缩城市人口。城镇人口原则上并且也只能控制在1957年的数量上，多出来的都要回农村去，因为没有饭吃了，养活不了。钢铁行业是一次大撤退，“大跃进”中修起来的“小土炉”早就拆掉了；同时期建起来的几百座小铁厂，在1961年、1962年调整时也基本上全部砍完；而且1958年“大办钢铁”以前的二十多个小铁厂也基本上砍掉了。全省到了调整以后，就只剩下两个半铁厂了，一个是达县的万福铁厂，另一个是叙永的后山铁厂。为啥还有半个呢？威远钢铁厂有两座小高炉，砍掉一座，叫做停一开一，就算半个厂。所以全省钢铁行业不仅仅退到1957年，实际上退到1957年以前了。威远钢铁厂保留下一半的经历是这样的：威远钢铁厂是一个老厂，建国前就有了。调整时决定要撤掉，这个消息传到厂里后，全厂上下干部职工声泪俱下。厂党委书记刘和地听到厂要撤掉的消息，就连夜从威远赶到成都，我看到他在金牛坝找省委反映，代表全厂几千名职工要求把这个厂保住。他找到当时主管工业的老书记陈刚同志，讲了很多理由，他们决心要自立更生，不要国家出什么钱。谈的时候我不在场，据说谈得很激动，刘书记也哭了，最后这个厂保住了，留了一座

小高炉。后来威远钢铁厂搞得很不错，他们生产一些小五金、小钢材，那时正是困难时期，正需要这些东西。直到现在威远钢铁厂都算是一个搞得比较好的地方铁厂。以后大家看到刘和地，还和他开玩笑，说这个厂是他像刘备哭江山一样哭出来的。实际上当时还是很沉重的事情。压缩以后，剩下两个半铁厂，1962年全省的生铁产量只有两万多吨。这里没算重钢的产量，算的是我们地方的小铁厂。两万多吨铁是什么水平呢？是1951年的水平，返回到了建国初期的水平。钢铁厂被迫压缩以后，造成市场上钢铁制品奇缺，机器就更别提了，据说在北京连妇女用的头发夹子都买不到。1962年困难时期，更严重的是老百姓没有铁锅了，市场上也买不到。要买一口铁锅得写报告获得专门批准，才能得到一张锅票，买一口铁锅。因为大部分铁厂关闭了，生产不出来。老百姓（特别是农村中的老百姓）的铁锅许多是大办公食堂时，有些干部为了追求将公共食堂办得好，强行把村民的锅给砸了，让他们只有到公共食堂去吃饭。那几年我到农村去，看到有些农民用打破得只剩一瓣的锅片做饭。另外，老百姓把家里好好的铁壶、铜壶等金属东西交给国家，拉到钢铁厂炼钢，所以不少铁锅也献出去炼钢了。那时候机关、学校的铁门也都拆下来交出去炼钢了。我还经历了一件我认为是最没有道理的事，我们住在重庆市委院里，重庆市委开电话会议的那幢楼里有一台空调，是国民党时期遗留下来的，和现在的像一个箱子一样的空调大不一样，地下铺了一层密密麻麻的铁管子。重庆的高温三四十度，热得人难受，我们进到开电话会的会议室里确实感到很舒服。突然有一天空调没有了，空调被拆了，把好好的空调拆了去炼钢了。当时大家都觉得可惜，但又没人敢说。

“大跃进”中在梁平^①

明朝^② 陈杰^③ 李克乾^④ 口述
王林 录音整理

1961年，明朝、陈杰、李克乾等同志由中共四川省委指派到重灾区之一的梁平县担任各级领导职务。他们在农村基层亲眼目睹了瞎指挥、高指标、高征购、浮夸风等造成的巨大灾难。明朝等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请上级调粮救急，恢复冬水田，放宽政策，划田边地坎归农民自种自收，默许包产到户，使当地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农民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

明朝 省委叫我们去梁平是担任实职，改造落后。我兼县委书记。

李克乾 明朝同志兼的是正职，我们兼的都是副职。陈杰兼县委副书记，张重光兼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还有两位女同志钟光珍、朴玉洁兼县委的副部长。我是直接下到公社，兼公社副书记。加上唐小丁、王朝清、李正模都在公社挂职，一共九个人，全是宣传系统的。

明朝 那次除我们到梁平，安法孝还去了江北县，杨万选去了合川县。

我们是1961年9月去，1962年夏天回来的。省委叫我们去改造落后县，那时所说的落后县，一是指天灾，另外一个说法是下边的干部犯了“死官僚主义”错误，所以造成落后状况。在上面

^①1961年2月1~10日，四川省召开地委书记会，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决定在农村开展整风整社工作，重点整顿“三类社”。2月13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在全省开展整风整社运动指示，并派出大批干部下基层“改造落后县、社”。

^②明朝，1918年生。原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

^③陈杰，原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

^④李克乾，原四川省精神文明办公室主任。

谁也不说底下没有粮食。省委召集地委书记们开会，我都参加了，地委书记们没一个人敢反映缺粮饿死人的情况，只说有肿病。省委书记们经常下乡，也没有人提饿死人的事，却叫卫生厅下去了解究竟是什么病。卫生厅长潘阳泰向省委汇报，不敢涉及病因，只讲症状，说不是传染病，当然提不出有效的治疗方法。

陈杰 那时说用蒸笼蒸可以治好。

明朗 对了对了，你还记得，叫“蒸汽疗法”。省委也搞了一个，杜心源叫我也去疗一疗，我去试了一下。

李克乾 我们都去疗过。

明朗 把衣裳脱了，进去，满屋子蒸汽。蒸完了出来给你一碗红糖姜汤，喝了挺舒服的。领导同志知不知道下面饿死人？我看好多人心里都明白，但谁都不肯说。派我们去梁平的时候，李亚群同志就告诉我，啥子肿病哦！就是没饭吃，万万蒸不得，一蒸就死。你们下去给老百姓弄点粮食就行了。李亚群为什么能给我说这个话呢？因为他是井研人，他对家乡的情况很清楚，而且知道我不会告发他。

我们下去时到处看，找农民谈，情况一目了然，就是没饭吃，饿死人。

陈杰 有的一家几口，老人夫人都饿死了，就是为了保娃娃。

李克乾 1960年底，杜心源同志带我们跑川东几个县区，走在一条路上被拦住，有人倒在路上，爬不起来了。他们说，你们来查，你们来看，村里的人死了一半。特别是男的死得多，都要成寡妇村了。但是在会议上书记们都说自然灾害如何如何严重，不谈饿死人。

明朗 当时就是笼而统之地说自然灾害。

陈杰 李大章说的是天灾加人祸。那时候分不清哪些是正常死亡，因为大家都挨饿，即使有点病，或老了，加上饥饿，就会死得更快。

明朗 这种情况就像一层窗户纸，谁也不去捅破。李亚群就说，忧国忧民不敢忧啊！

梁平死了多少人，我有数字。我专门问过梁平公安局的人，

叫他老老实实给我说，这三年究竟死了多少人。他说是八万。那时梁平的人口是五十万左右，这个数字我是一直记住的。我只记得整数，记不得零头了，他说的数字有零头。八万和五十万之比是六分之一，当然这里头也有正常死亡，这是公安部门统计的。我那时是县委的一把手，这个数字应该还是比较确实的。但梁平不是最严重的，因为我到附近的县看过，万县、开县、渠县，也很严重。我经过涪陵，涪陵的情况比梁平严重。那时候涪陵的城乡简直不成样子了。梁平在四川大概是中等的。我到德阳也兼过县委书记，回省后到德阳去看过，情况比梁平好些。

李克乾 只有下去在路上碰见的农民敢说，他们说，你们只要给点粮食就行了。我当时都落泪了，但又不敢当着哭。

陈杰 人走不动了，饿死在路边，也没有哪个敢动公家的粮食。那时候老百姓真好。

李克乾 在那种情况下，老百姓都没有骂共产党。

陈杰 廖志高同志当时也到梁平去过。明朗同志向他如实反映了情况，说能不能给下面拨一点粮食，他还真拨了点粮食下来。

明朗 我们下去的时候看到到处都是浮肿病人。下边的干部并不像上边的领导同志那样，忌讳说没有粮食，饿死人，是给我们说实话的，包括县委书记徐海清，并没有向我隐瞒实际情况。他领着我去看了一个最严重的村子。我去看了以后，很难过，跟刚打完淮海战役，双堆集附近那些村庄的情况相仿。门窗都没有了，家具也没有了，屋子一个个是敞开的，屋里都是杂草和灰尘，后边的山坡上是一堆堆的坟，村里村外看不见一个活人。他还领我们去看了肿病医院，干瘦的多，肿了以后就干瘦。吃的是营养丸，营养丸是糠和黄豆粉做的。

李克乾 一般的人还吃不到，肿得很厉害的人才能吃一点。

陈杰 明朗同志有时候也带上我看几个地方，商量怎么办。我就说，救命第一，首先救人命。

李克乾 我们下去以后做了几件事情。有件事情是：上边规定把冬水田的水抽干了种麦子，结果大减产，农民反应很强烈。我们经过调查，就决定恢复冬水田，这在当时还是比较大胆的。

陈杰 那个时候没有自留地，就把田边地坎分给农民。再就是实行“先交后留”，农民收下粮食以后该上交多少粮食，定下来，剩下的就分给农民自己，这个政策也很好。还有就是划一部分水田栽芋子。

李克乾 把田坎划给农民不是梁平最先搞的，是其他县先搞的。梁平最突出的是向上反映了实际情况，第二就是恢复冬水田。当时我在公社，乡村干部们说，你们真胆大哩！

李明朗 冬水田是在没有水利保证的情况下，群众多年行之有效的一种耕作制度，上边硬性规定消灭冬水田，一季变两季，同当地的生态是相违背的，实际上起到破坏生产力的作用。

李明朗 这就叫“瞎指挥”。

李克乾 这同把树砍了种粮食是一样的，好心办坏事。现在搞退耕还林，看起来耕作的面积少了，但恢复了生态，对种粮食是有利的。

李明朗 冬水田实际上是一种旱涝保收的水利措施，每年把稻子收了以后，田里就蓄上水，把草和垃圾堆在田里作肥料，既有了肥料又有了水，第二年栽秧时就不愁了。把冬水田放干以后种麦子，由于地是湿的，水一下子干不了，种麦子宜干，不宜湿，种下去就收不到多少，一亩只收几十斤麦子。到了第二季种水稻的时候，没有水，只好等天下雨，等到有了水，季节已经过去了。稻子勉强种下去，也减产了。所以说“两季不如一季”，这是老百姓的话。梁平的冬水田多，单这一项瞎指挥，就减产很多。

李克乾 冬水田是湿地，类似于低洼地，是放不干的。梁平和川西平坝不同，川西的土壤是干的，又有都江堰水系的保证。

李明朗 当时的瞎指挥、高指标、高征购、共产风、大炼钢铁等是全国性的。四川还有一些特殊性，当中央要纠“左”的时候，四川顶住不执行，最典型的例子是对待主席的党内通讯。那时我在德阳，党内通讯一传达，底下都说好。省委却很快通知收回去，说是要从积极方面理解，实际是不叫执行。

陈杰 那个时候，李井泉在重庆，我去参加过李井泉通令收回的那个会议。通知地委书记们一律把文件收回。

明 朗 四川第二件很突出的事情是公共食堂。“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这话是李井泉的发明创造。全国其他地方已经在收缩了，四川就是坚持着，坚持的时间最长。我们到梁平，公共食堂早就名存实亡了，上边还在说办得好的，要坚决办好。

陈 杰 我给报社写了一篇文章叫《公共食堂万岁》，李井泉看了很满意。那时云南已经撤销了公共食堂，四川还在坚持。

明 朗 四川第三个特点是对农业上的瞎指挥特别多，既具体又烦琐。硬性规定每年放干冬水田的任务，就是一例，所以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更严重。

李克乾 四川的粮食产量最多，结果吃粮标准最低。一方面向上报的产量很高，另一方面把四川的吃粮标准压得很低，工资标准也最低。李井泉当时的确“左”得很，加重了四川人民的苦难。

陈 杰 当时我们还推行了一个政策，搞“先缴后留”，就是先定上缴任务，秋收收下来以后，除了上缴的粮食，剩下的都分给社员。干部群众高兴得很，说这个政策太好了，规定缴多少，剩下的我们自己吃。原来的办法是留的口粮全归集体掌握。

明 朗 关键是农民的口粮要留够，征购数是硬的，征购多了，你说留口粮多少，留种子多少都是空的。1958年是大丰收，当时大炼钢铁，粮食在地里好多没有收回去。再来一个高征购，征购完，粮食就所剩无几了。又来一个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几天就吃光了。1958年的冬天和1959年春天，死的人并不多，因为老百姓家里多少还有些存粮，可以将就将就。1959年开始减产，照样高征购。又来了个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下面没粮食，眼看着浮肿流行，大量饿死人，谁也不敢反映。1960年、1961年继续搞浮夸风、瞎指挥，浮肿、死人，越来越严重。反右以后党外无声；反右倾以后，党内无声，谁都怕当小彭德怀，是最沉痛的教训。

李克乾 还有一个原因是集体种地，农民没有积极性。

明 朗 怎么会有积极性呢？种了地还是要饿肚子，饿得他们做不动活了。

李克乾 那时候都是生产队长去喊，快出来哦，快出来哦，

不出来干活要扣口粮。农民们才拿着锄头去磨。

明 朗 我到梁平气象站去问过，那几年的雨量基本上是正常的，和平常年差不多。所以梁平不能说是天灾，完全是“人祸”。

总的来说，我们下去以后采取了几个措施，第一个是要粮，按照人口发给口粮。

陈 杰 大概一人一天五两。

明 朗 情况比较好的社队少一点。

第二个措施是恢复冬水田。

第三个措施是放宽政策。情况大致是：主张田边地坎归私人，谁种谁收；提出划芋头田，类似恢复自留地。由于省里派人下来改变落后，地委就派副专员刘子敬来协助。他是农民出身，很熟悉农业，对生产上那些瞎指挥非常反感。他说：“弄得农民都不会种地了。”那时上边对这方面控制得不那么紧了，我就说，老刘，你懂得生产，你负责去整吧！搞了粮食分到户以后，他又提出要搞包产到户，我没敢表态。到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上面对政策更放宽了些。他可能给下边作了暗示。正是要插秧子的时候，我回成都开会，开了一礼拜的会，回去的时候，全县的秧子都栽上了。刘子敬悄悄对我说，“都自发了（指包产到户了）。要是按老办法，一个月也栽不完。”把我吓了一跳，更不好表态。那时，像这样的事，只要我们不明确表示反对，基层干部瞒上不瞒下，悄悄地就干了。到1962年生产已逐渐恢复，肿病死人也明显减少，最困难的时期可以说已经过去。

陈 杰 我们离开梁平前，到老百姓家里，已经有人留我们吃饭了。有人甚至说：“你们救了生产队的命。”

从建设“西钢”到建设“攀钢”

杨超^① 口述

杜维宣、黄友良 整理

在“攀钢”建设之前，曾有一个西钢建设的探索过程。20世纪50年代末，西昌周围地区被探明有四大矿区：太和、白马、攀枝花、红格。1958年四川省决定建立西昌钢铁公司（简称“西钢”），搞钢铁和有色金属开发，并成立了西昌建设委员会。但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全国都头脑发热，拼命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四川同时搞了六条铁路，“西钢”的建设也受到影响，其机构于1962年撤销。1964年，攀枝花钢铁开发作为“三线”建设的重要项目开始上马，先搞铁，后搞钒钛磁铁矿的综合利用，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朱老总同我们谈过一次金子和外汇的问题，说如果我们能找到金子，对国家贡献就大了。1957年夏天，我去了甘孜、西昌，曾到了康定的二道沟、三道沟，产金子的地方。在雅安参加了一个地质工作会议，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地质。他们说你还是到一下西昌地区。以后到西昌，看了一下“901”，就是会理镍矿，听取地质队汇报，谈到那里钒钛磁铁矿资源很丰富，于是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在西昌搞钢铁。

因为我去过西昌，1958年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向省委、李井泉同志反映，自告奋勇去西昌搞钢铁。

1958年5月，我和高扬文、李井泉、廖志高四人去西昌，了解地质资源的情况，那时有四大矿区，太和、白马、攀枝花、红格，记得当时探明的储量最多三十多亿吨，太和大概七亿，白马

^①杨超，1911年生。时任中共西昌工业区委书记。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当时设第一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

七亿多，攀枝花最多不过十亿，共生矿金属元素最多的是红格。

我们四人在西昌就基本上定下来要搞西昌钢铁公司。听取了西昌所有地质队关于西昌地质的汇报，也谈到其他有色金属、稀有金属，主要还是搞钢铁。

我是1958年8月17日去西昌的，调了一大批干部，有冶金部派的，有重钢的。一进西昌，成立了西昌建设委员会，是一个领导机构，也是一个省里的代表机构。两个部、一个办公室，基建部侯德才负责，生产部高丰负责。基建部主要搞“西钢”，生产部主要搞铜，搞有色金属，还有其他的，如搞一些小型的砖瓦厂、木材厂。现在保存下来的唯一工业种子就是410厂，二十八立方米高炉。那个高炉是1959年建起的，是冶金部专家冶都培协助建设的，他是我国冶金系统有名的专家。我在西昌的时间大约三年，1961年11月，省委把我调回来，“西钢”的机构是1962年夏天撤销的。

1959年夏天，贺龙去住了一个星期，在元帅中他对四川很熟，很关心钢铁，也关心我们抓农业，还特别提到建昌马（西昌地方马品种，善走山路）。这年夏天，国家建委宋平他们有一个大的工作组，搞了一个多月调查研究和规划。那时国家确实想把“西钢”作为一个重点，但是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西昌上不可能。全国“大跃进”，头脑发热，我们也干了些蠢事，搞了一些钢铁，品质很低。

（中国）北面抓钢铁，南面抓有色，当时国家计委的规划不可能实现。在四川也不能集中力量，为什么呢？四川同时搞了六条铁路，大家都想上，大家都拼命扩大基本建设，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搞不出名堂，这是很重要的历史教训。

对我自己来说，西昌建设虚晃一枪，退下阵来^①。当然我们对西昌地区的工作，确实也有促进，劳改系统搞铅、锌，我们对西昌劳改系统支持比较大。另外真正促上去的是镍矿，地质储量一万多吨，以后在生产中又发现一个富矿，大概有两万多吨。

1964年程子华带工作组作了调查，从乐山、宜宾一直到渡口

^①1962年2月撤销西昌工业区委，工程停建。

(今攀枝花市)。我有个毛病，爱争论，程子华同志对我不高兴。

1964年，毛主席说了几句话，“骑毛驴下西昌”，“建不好攀枝花睡不着觉”，“不仅是钢铁厂问题，是战略问题”。他们（中央）说攀枝花，我们说西昌，攀枝花矿种很多，给他们印象很深。选厂址是宜宾、西昌、渡口等几个。现在看来，厂址选在渡口选得好，渡口的资源是很丰富的，铁、煤、石灰石、白云石、木材、水，各种资源都比较齐，很理想，而且在地质上相比之下是安全岛（即不在地质断裂带上）。

毛主席那些话，不仅使我们看到了他的决心，而且看到他的战略眼光。当时确实有战争的危险性，苏联的经验教训，它一千八百万吨钢，有九百万吨保存下来，乌拉尔恢复很快，搞坦克，所以很快战胜了法西斯。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要建立战略基地。

渡口的建设速度很快。渡口建设是在没有通铁路的情况下建起来的，是靠汽车运输，这也说明了我们的民族、我们党这样大的气魄。

1964年渡口上马后，我在省里当工业书记。那时，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搞粮食，负责后勤供应。1964年不只是搞渡口建设，还搞“三线”其他建设，迁厂就有九十个，从东北、北京、上海、洛阳往四川迁。

渡口先搞铁，后搞钒钛利用，搞钒也经过一个发展过程，先是雾化提钒，后来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搞了一些设备。以后又搞钛，那是方毅同志去了以后，搞了一个选钛厂。其他的东 西，铬、稀有元素都没有提取。实际上我们是先吃豆腐渣，后取有用的元素，所以污染很厉害，上海、崇明岛都有反映了，污染影响到整个长江，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围矿坝、过江管道，但还有问题。

方毅同志抓了七八年的钒钛磁铁矿的综合利用，老流程的改进和完善，新流程逐步在实践中，取得了很显著的成绩。所谓新流程，简单一个概念，我的看法叫冶金工业革命。新流程这条路现在小试验走通了，在搞中试，就是走410厂的道路，否定了高炉、转炉，通过海绵铁直接冶炼。我们在1958年研究过，西昌走电冶炼的道路，没有经过实践证实。

在二滩修水电站，方毅同志 1980 年以前好像就看过汇报，小平同志点了头，中央也批过，说要上。小平同志正式批时还有一句话，叫“力避拖延”。这里有四川内部的矛盾。我们分管工业的同志（我那时分管计划），认为四川缺电在东部，不是渡口，没有远见。这一反映上去，国家计委就抓住了，你们自己认识都不一致，就把二滩压下来了。方毅同志很生气，要我回来正式向省委反映，我在省委公开讲：方毅同志很生气。后来我也承认，这是失误的地方。二滩没上去，一拖就拖到现在^①。1984 年我向耀邦同志汇报，他说二滩要上，三峡要上，黄河上游（小浪底）也要上，而且说我们水电上晚了。二滩上去，钒钛磁铁矿综合利用要大大加快，有廉价的电力来源，我觉得在攀西地区首先要布置耗电工业。

我兼渡口市委第一书记时，是李超具体管，白良玉也在，我们配合得比较好，那一段工作比较顺利。据以后反映，是搞得比较活跃的。文艺我们过问了，城里面的建设我们过问了。现在渡口存在的问题是，企业富，市政穷，条条块块的问题老是解决不了。市里面没有什么工业基础，是个“和尚庙”。粉碎“四人帮”以后，发展速度就更快了，渡口上去了，现在叫作“三个二”：“二滩”、“二期工程”、“二基地”。今后渡口集中与分散相结合，攀西地区可以搞到五六百万吨钢。昆明水钢可以翻一番或一番多，达到二三百万吨。另外内地在乐山或宜宾，将来可以搞几百万吨，这是总方案。总规模我看可以搞到一千几百万吨，没有多大问题。

^①二滩电站于 1991 年上马，1999 年建成，安装有六台五十五万千瓦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三百三十万千瓦。

攀枝花钢铁基地上马前后

程子华^① 口述

李思校、黄友良 整理

攀枝花钢铁厂厂址最初定在西昌。1964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对攀枝花的开发作过许多指示，会后中央、国家计委等有关部门就开始了厂址的考察论证工作。意见比较集中的有三个地方：弄弄坪、西昌和乐山。西昌由于水、煤、运输处在地震带上等因素被排除了。选弄弄坪还是乐山，意见有分歧。中央派李富春、薄一波到攀枝花作调查。经过两次调查，由于弄弄坪北面有金沙江的水，南面有六盘水的煤，并可利用成昆铁路为运输线，中央最后确定厂址定在弄弄坪。攀枝花建设上马不久就遇到“文化大革命”，但由于是“三线”建设项目受到的干扰较少，进展比较顺利。

1958年3月，党中央在成都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一个文件上作了批示，肯定了开发攀枝花资源的意见，这次会议我没有参加。当时说的攀枝花钢铁厂在西昌，叫“西钢”，是杨超在搞。那时，冶金部、国家经委、计委都是把攀枝花钢铁厂址确定在西昌。

在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对建设攀枝花有过不少指示。这个会我参加了，毛主席一方面对以前建设攀枝花的工作提出批评；一方面指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在发生战争以前没有很好建立后方战略基地，提出建设攀枝花是建立战略后方的总的原则。他说：“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略‘屁股’和后方了。”这是批评以前建设“三线”的工作不力。他说：建设攀枝

^①程子华，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原“三线”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花就是建设“三线”，建设攀枝花是建设“三线”的一个重点。他对战争形势是提出准备早打、快打、大打。打起仗来，没有后方，沿海一带都占了，什么都完了。那个时候，提出战争不可避免，是中央的提法。当时即是在这种形势下决定建设攀枝花的。毛主席说：“攀枝花不搞起来我就睡不着觉。”我当时在国家计委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他这样一讲，我就着急了。赶快准备材料，了解情况。会一完，就到“三线”去作调查研究。这次会议上，不光是中央领导同志，各省、市，中央各部门，大家在这个时候思想一下都统一起来了，都一起下决心建设“三线”，建设攀枝花。会后，中央、国家计委等有关部门，就一块儿到四川来了。四川的杨超、四川经委、计委和我们一块儿进行调查。调查厂址究竟放在什么地方。杨超他们准备了十几个备选厂址，我们就一个一个都去看。看究竟放在什么地方合适。后来集中在三个地方：一个是弄弄坪；一个是西昌，因为西昌原来是作为“攀钢”建设的；一个是乐山。李井泉主张在乐山，其他都不行。西昌在研究中发现一个地震问题。原来在介绍西昌时没有讲到地震问题。我们打电话到北京找科学院，请管地震的同志来人给我们讲历史上西昌的地震问题。来的人讲，西昌过去发生过十级地震。另外，在西昌建立钢铁厂，水也不行。安宁河一到冬季就没有什么水了，非修水库不行。水库计划修在西昌北面，过了喜德，具体在什么地方记不清了。说修水库把安宁河水存起来。因当地地质条件不行，漏水。又想在西昌偏南（或偏北）修，也没定下来。因为不能用安宁河水，只有引邛海的水，但又会发生与农业争水的矛盾。因此，水解决不了。再一个，西昌没有煤，还是要用贵州六盘水的煤，要把那里的煤运到西昌，就要修铁路，从贵州水城到云南巧家，过金沙江，沿着黑水河修到西昌，这也未确定。本来毛主席早就决定要修成昆铁路的了。从六盘水修铁路运煤至西昌，又恰在地震带上，这样，就把西昌否定了。否定西昌可不容易呀，因原来厂址定在西昌，杨超在那里搞了好几年。冶金部、国家计委都定在这里。那时，我还没到国家计委，所以，原来一些决定我不知道。最后，只剩弄弄坪和乐山了。李井泉主张在乐山，我主张在弄弄坪。有人讲，弄弄坪只

有那么一点点，又是在山上，乐山在平地上，离省会成都很近。弄弄坪荒无人烟，没有什么工业基础可以利用。我为什么主张在弄弄坪呢？一个是铁矿石就在金沙江北面，南面有煤，可以炼焦。但煤不够，主要还是依靠六盘水的煤。铁路可以利用成昆线，从三堆子接轨到攀枝花（弄弄坪）。水可以用金沙江的水。矿石、煤、水都行。又有人说是山地，重庆不是个山城吗？重庆不是有个重钢、二钢吗？两种意见不能一致，最后反映到中央，中央决定派李富春、薄一波来调查。李、薄从北京坐飞机到昆明，叫我和阎秀峰也坐飞机到昆明，再一块儿去攀枝花。他们把攀枝花都看了。

我们这是第一次调查，是从西昌—会理—拉鲊—鱼鲊，过金沙江。过了金沙江又上大山，上大山后，转到云南的仁和，从仁和到渡口去坐船，坐船下去到攀枝花河边的一个叫马坎的地方上岸到攀枝花。那里有个攀枝花村，村里有棵攀枝花（木棉）树，地名就是这样来的。然后沿着山一直到了弄弄坪。地方上的同志给我们准备了毛驴和马，李、薄副总理骑马，我是骑的毛驴，其他同志就走着到弄弄坪。把弄弄坪一带考察了。在研究中，是定弄弄坪，还是乐山，冶金部的人不表态。最后，坚持定弄弄坪的就是我一个人了。争论以后，到了北京，李富春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会，李井泉参加了，我也参加了，中央的一些部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把“三线”建设的组织形式、组织机构定下来了。一个是“三线”建设委员会，一个是铁路总指挥部。铁路总指挥部总指挥是李井泉任主任，“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是李井泉兼。“三线”建设委员会北京去一个人，西南局去一个人。富春说：“好，北京程子华去。”李井泉说：“西南局阎秀峰去。”决定了我是“三线”建委的常务副主任，阎秀峰是第二副主任。铁路总指挥部也是北京去一个，西南局去一个。北京去谁呢？富春讲：吕正操。李井泉讲：西南局熊宇忠去。这样，“三线”建设就有两个机构了。“三线”建委决定从渡口修一条铁路支线，为贵州磷肥厂修一条支线。我们和铁道部研究，一定要修这两条支线。不然，六盘水的煤怎么运进去？将来钢铁又从哪儿运出来？贵州的磷肥厂大，不修支线也不行。铁路建设由铁道部副部长刘建

章、铁道兵副司令郭维成负责。

1964年10月8日，我们第二次又到攀枝花，看了三天。中央来了十三个部委，是在成都组织的。中央主要的部，每个都来一个副部长，计委计划局长、基本建设局长都来了。四川阎秀峰、熊宇忠，还有原来搞冶金的都来了。徐驰那个时候是中央部门的，是冶金部副部长。这次本来要从仁和到渡口坐船下来。中央一些同志反对我们坐船，特别是地质部的一个副部长坚决反对。他们地质部曾经坐过船，几乎出了危险。这样，只好步行从渡口到炳草岗。到了炳草岗，有条小路下去，有个小渡口。我们便从那儿坐船过江，对岸就是攀枝花。从攀枝花到弄弄坪，水泥厂厂址、电站、洗煤厂、宝鼎煤矿、小宝鼎（1958年上马）都看了。以后就搞“攀钢”建设的规划。1964年10月搞的规划。在这次搞规划会议上，阎秀峰反对，说不能搞。徐驰说：“咱们这么多人看了三天，不搞规划一点结果也没有，跑这三天干什么呢？咱们还是搞个规划吧。是否在这儿建厂，以后再定嘛。总之大家跑了三天嘛，搞个规划出来。”阎才同意搞。搞规划怎么搞法？首先解决钢铁厂一年炼多少钢，把这个先定下来。冶金部内部搞综合平衡，一百五十万吨钢，需要多少铁？攀枝花矿石含铁百分之三十，那时，三吨矿石炼一吨铁。一百五十万吨钢需要多少铁？这部分铁需要多少矿石？这就是矿石的建设规模要多大？这么多矿石要选矿，选出矿后要筛选，筛选后要烧结，烧结就要有烧结厂，烧结后要炼铁，炼铁就要有炼铁高炉。这样，烧结、炼铁高炉、炼钢、轧钢、初轧等的规模，也要考虑。冶金部搞了这个综合平衡，然后搞外部平衡。需要水的问题，给水利部提；机械问题，给机械部提出来，铁路支线问题，找铁道部等。这次会议，各部把初步设计搞出来了。弄弄坪钢铁厂总的规模设计是重庆钢铁设计院负责搞的。另外，还有个城市规划，国家建委搞整个地区规划。规划搞出来后，对攀枝花钢铁厂建设，不是有两种意见吗？就座谈，座谈完了重新调查，又看了乐山等，最后定在弄弄坪。在弄弄坪就得先解决交通的问题。要修路、修桥，必须解决水泥供应问题。运水泥，从昆明运到攀枝花，靠汽车每吨要三十多元。从成都运每吨要四十几块钱。所以决定先建个十五万吨的

水泥厂。原来的路、桥梁只能通过十吨。建发电厂，机组拆散后大件是五十吨。靠公路运输，桥梁通不过。公路弯弯曲曲，汽车拐弯也不行。因此决定要改建公路。1965年2月，我到北京向富春汇报，我说：靠铁路建设太晚了，只有靠公路。必须改建两条公路，不改建不行。这样，富春就批了二千五百万元分给云南、四川改建公路。桥梁可以通过六十吨，山上弯弯曲曲公路改直。这样，二万五千吨的机组大小零部件都可以运进去了。冶金厂高炉等其他设备零部件全部拆散运进去，在弄弄坪进行焊接。计划决定1970年出铁，1971年出钢，1972年出钢材，这是原来的计划。所有部门都要按照这个计划，电、水、煤要供应得上。铁路支线要修通，冶金部内部和其他各部门内外部综合平衡，通通都按这个计划进度来搞规划。

攀枝花建设规划有三句话：第一句话，叫统一计划。第二句话呢，叫分工负责，属于冶金方面由冶金部门负责，煤由煤炭部负责，电由电力部负责。第三句话叫统一步骤。光有十年规划、长期计划不行，必须分步走。要有一年一年的计划。1965年作准备，各部门把准备工作做好，1966年就开始动工了。1965年各部门要把这么多准备工作做好，也不是容易的。但各部门的副部长、局长都在现场，有很大好处。因此，1965年、1966年、1967年、1968年、1969年、1970年，每年计划统一步骤。没有统一步骤，各部门你今年的投资多，我今年的投资少，结果就不齐了。材料、木材、钢材、水泥、国家的材料，不按这样估计不行。地方上砖、瓦、灰、沙、石，地方负责，也要按这样来。吃饭、穿衣问题，国务院“五办”组织了两个财贸小组，包括商业部、粮食部、供销社、财政、银行。一个负责供应铁路建设吃、穿问题，一个负责供给三线。中国有句老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邮电部也把机构设起来了，战士、工人要给家里写信，要看报呀。机械问题就复杂了。第二年2月，我同徐驰回到北京，徐驰同沈鸿（一机部副部长）一块儿商量，把冶金、一机部两家设计人员集中在一起，研究攀枝花需要的机械设备，要用最先进的设备，商量定下来了。一机部分到哪个工厂，什么时候弄弄坪哪个厂土建完成，需要什么机械，要什么时候运来，也都按照1970

年出铁、1971年出钢、1972年出钢材这个统一步骤，一年一年的把任务分给各个机械工厂生产。攀枝花需要的矿山设备，都是沈阳几个机械厂生产的。攀枝花设备完全是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安装，完全是自己的。那时速度是快的。计划以后延长了。为什么延长呢？把建设的主要力量抽去武汉搞一米七的轧板厂去了，致使攀枝花建成时间拖长了。我是1965年下半年来调查、搞规划的。1967年上半年，我一边被批斗，一边搞工作。红卫兵在这方面还是知道，程子华是毛主席派来搞三线建设的，不能影响他。一方面开斗争会斗争我，审查我，审查完了，说，你回去搞你的工作去。1967年上半年，我就是这个处境。红卫兵到处抄家，就不来抄“三线”建委，知道那里是毛主席关心的地方。红卫兵一来，我和钱敏，我们俩直接接见红卫兵，由他们提问题，我们答复。只要你来，我们就接见，不推。直到1967年5月，总理把我要到北京去了。要到北京，李井泉、廖志高、杨超、我、鲁大东^①和其他二十几个人都住在招待所。1967年6月，四川红卫兵到招待所把李井泉、杨超、廖志高等三个人揪跑了。总理打电话要。过了没几天，航空学院韩爱晶又带着人来揪人了。红卫兵问我叫什么，我说我叫程子华。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总理叫我来汇报“三线”建设，才没揪我了。后来，总理说地方招待所不安全，叫我们换了个地方，送到一个飞机场团部。直到9月，四川军队的红卫兵到北京把我们四人（李井泉、杨超、廖志高、我）揪回了四川。我们坐飞机到成都，坐敞篷汽车到西南局的一个院里，由军队保护起来了。我们是由总理保护下来的人。

“文化大革命”中，我从北京回来就关在成都昭觉寺。上午学习，下午写总结，用了两三年时间，写了一个草稿，总结攀枝花建设。1965年，首先是搞典型试验，然后搞四十八个歼灭战项目。1966年搞了一百零二个歼灭战项目。搞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因此，才搞了歼灭战项目。这些都是关键、重要的项目。同时，各部不管明年国家计委安排什么项目，不管规模大小，一定要国

^①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

家计委列上项目的，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有了初步设计，才能定歼灭战项目。那时，“三线”建委一年只开两次大会，8月以前或8月开一次，定下一年项目。然后送到计委，计委审查后列到下一年项目。第二年2月开一次会，看哪些项目定了计划，增加了些什么项目等，就开综合会议，地方上参加。厂址定后不好的要搬家等，都是地方负责。我原从财贸战线来，没经验，也没搞过计划。我总看到怎么这个项目、这个车间，去年的计划是当年建成投入生产，结果今年计划还是列的建成投入生产，明年计划呢？还是建成投入生产。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不懂。再一个是简易投产，投产时，缺这个，少那个，建设过程又拉得很长。设备、材料缺一样就不行，就得停止建设，时间要拉长。在未搞“三线”建设时，我到包钢去看过，发现那里开始计划一百万吨，厂里公路等各种配套设施按一百万吨建设；过几天，调整到一百五十万吨，原来的建设又不行了，又按一百五十万吨建设；再过几天，调整到两百万吨，又要按两百万吨来建设。没规划，建成以后得不断扩建。有了这个经验，到了攀枝花我才有了前面讲的那个先叫冶金部搞综合平衡，然后再搞外部综合平衡，统一计划、分工负责、统一步骤、互助合作的思路。前几年，全国建设中没有不缺这少那的，而攀枝花建设时就少有这样的问題。这样搞起来后，渡口成立市，徐驰做市委书记，他就来统一各方面了。徐驰要搞“攀钢”，要搞综合平衡，怎样才能实现？1965年四十八个项目当年完成四十三左右，1966年一百零二个项目完成了九十七八个。就用这个来搞综合平衡，攀枝花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讲，打仗，不光是什么原子弹，最后决战还是常规武器。我们到四川，首先是搞常规武器。原计划三年建成，后来用了两年，1964年、1965年就建成了。五机部又在四川摆了一百个高射炮基地，需四机部配套。四机部准备三年建成，我打电话找王震，商量两年建成，王老同意，安排设备、材料，我组织施工力量，两年建成。这是在四川广元西边的一个县，是按照攀枝花这个经验来搞的。六盘水的煤矿，也是按这个方法搞的。以后“三线”建设其他项目都是照这样来搞综合

平衡的。这么多年来，没有说这个少了，那个缺了，相互间没有矛盾。

关于炼铁出钛问题，冶金部首先在承德钢铁厂搞模拟试验。承德钢铁厂用的矿石是承德北面大庙那个地方的矿石。那个矿石也是含钒钛铁矿，含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攀枝花含的是百分之十一至百分之十二。为了搞试验，把那个地方的矿石配成含百分之十一至百分之十二进行炼铁。炼铁中把钛脱出来。那时是1965年2月。我到北京，富春带着我们一起去承德看模拟试验，模拟试验成功了。那时，全世界脱钛的问题还没解决，因此，毛主席有那句话：将来钛脱不出来，炼不出铁，后不后悔？不后悔！这是毛主席的决心。试验成功后，到西昌正式用攀枝花矿石炼铁。钛脱出来了，炼铁成功了。冶金部给毛主席写了个专题报告。脱钛成功了，然后炼钢，脱钒那就容易了。炼铁提钛，炼钢提钒嘛。

20世纪60年代四川工业经济调整中的五本“折子戏”

张如兰 口述
邹一清 整理

20世纪60年代初期，四川省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根据四川省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四川工交战线在这一时期采取的五个方面的措施，习惯上被称为五本“折子戏”：一、对职工实行“定、包、奖”的工资奖励制度；二、干部参加劳动的“三定一顶”制度；三、加强企业政治、技术两方面基本功的“两基”工作；四、企业中试行“亦工亦农”的轮换工制度；五、工农业互相支援的“厂社结合”制度。

四川工业战线的五本“折子戏”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事。所谓“折子戏”是指川戏中的精彩片段。从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共四川省委在领导经济工作当中，有一个说法，叫做“唱川戏”。“唱川戏”最早是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同志提出来，是和“唱京戏”相对而言的。它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四川在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时候，不能照搬照抄，要结合四川的实际情况，要有四川的特色，要有“川味”。这主要是在领导思想、领导作风、领导方法上提出了这么一个概念。现在看起来“唱川戏”的提法，还是比较好的，也很形象化。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经济工作中，凡是结合四川的实际情况，从四川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调查研究，深入实际安排的工作，一般说来都是比较成功的，在实践当中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但是脱离了四川的实际，形式上看起来和中央保持一致，实际上在工作中往往会出现一些错误、偏差，教训还是不少的。

川戏有“大戏”与“折子戏”之分，“折子戏”就是在“唱

川戏”总的思想指导下，把四川的企业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而且起了很好作用的典型经验总结出来，然后在面上推广。“大戏”是省委来唱，工业战线就唱些“折子戏”。这个话是当时分管工业的书记杨超同志首先提出来的。他在一次工业工作会议上说：唱川戏，我们就来唱点“折子戏”吧！他把当时工交战线比较典型的五项措施归纳出来，这就是五本“折子戏”的由来。

五本“折子戏”开始总结和提出来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也就是1961年、1962年的时候。这是党在领导国民经济中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全党上下正在总结经验，纠正以“大办钢铁”为标志的三年“大跃进”这一“左”的错误。“大跃进”、“大办钢铁”、高指标、瞎指挥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加上自然灾害，使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全国经历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60年代初全国开始着力纠正过去几年中一些“左”的错误，在经济上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整顿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安排好人民生活。当时，调动群众积极性的问题，干部作风问题，还有整顿加强基层工作等，都提上了党的重要的议事日程。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经济工作搞调整，在领导作风上，就是要纠正过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毛主席在1961年初提出：全党上下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带头作调查研究，深入实际。当时省委、市委的一把手，都亲自抓调查研究，抓干部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转变作风的问题。当时我在工交部跟着领导同志，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到基层蹲点，深入矿山、钢铁企业抓调查研究，抓总结经验。五本“折子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第一本“折子戏”是关于对职工实行奖励，恢复奖金制度，推广“定、包、奖”。以前我们长期实行没有奖金的做法，在“大跃进”以后搞了一点计时工资。计件工资，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已取消。后来搞了一点奖励，奖励也是一次性的，叫什么“综合奖”，一次性发给三至五元钱。“综合奖”也不讲什么条件，差不多人人有份，所以有人叫它“松活奖”。“综合奖”变成了“松活奖”，不分等级，都是那么三至五元钱，黄鳝泥鳅一样长，基本上是搞平均主义。1961年起，四川工交战

线第一本“折子戏”是搞计时工资加奖励，然后和包产相结合，简称“定、包、奖”。“定”就是定工作条件、生产条件。基层班组、工人向企业包产，待完成包产后给予奖励。这在当时，从全国来说也好，从四川来说也好，都是首创的东西。第二本“折子戏”叫做干部参加劳动的“三定一顶制”。所谓“三定”，就是定时间、定岗位、定职责，“顶”就是在学会了技术、能够独立操作的时候，顶一个生产岗位。第三本“折子戏”就是抓企业的“两基”工作。一方面是加强企业的基础工作，包括原始记录、定额等管理的规章制度，为企业打好基础；另一方面就是企业职工，大练技术基本功，后来又提出大练政治基本功。所谓技术基本功，就是操作上的功夫；政治基本功就是讲思想、讲道德、遵纪守法等。第四本“折子戏”是根据当时刘少奇同志提出的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思想，在工业企业中搞轮换工制度，当时叫做“亦工亦农”。招收农民进工厂，订合同，搞几年，学会了技术，挣点钱，然后回去。再在那个生产队另外招工来。第五本“折子戏”，就是工农业相互支援。一个大的工厂就带一个大的人民公社，当时大的公社相当于现在的几个乡。中厂带中社，小厂带小社，组织起来，实行厂社结合。下面，我分别叙述一下，它们是怎样产生的，后来又怎样夭折了，只留下一些经验教训，供我们今天参考。

第一本“折子戏”是关于工资奖励制度。开始时，工资奖励制度是在一部分煤矿和铁矿中实行。它的全称叫“计时工资加奖励和包产相结合”。这是李井泉同志确定的，我亲自听他讲的。当时有的同志反映这个名字太长了，不好记。李井泉同志仍坚持，他说计时工资加奖励这是通行的，没什么特殊的，包产也非坚持不可，去掉了包产，精华或中心就没有了。实际上我们当时体会李井泉在工业上坚持搞“定、包、奖”，他是从农业上得到的启发，农村当时就在搞承包。李井泉对工业和农业都抓得很紧、很深入，所以他就把农业上的承包移植到工业上来。这里有一个插曲，当时李井泉搞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有些重大的东西，他直接向毛主席写报告。我当时参与了写“计时工资加奖励和包产相结合”的报告，一起参与的还有成都市委管工业的书记

冯焕武同志。李井泉把我们两个找去，住在内江谢家坝招待所，后来又把我们带回成都，他就讲他的思想，讲计时工资加奖励。我记得给毛主席的报告写完后，他还请我们吃饭，很简单的四菜一汤，他说今天办了个大事情，很高兴。

“定、包、奖”按照最早省委批的文件，试点单位有重庆鱼田堡煤矿、永川煤矿、荣县臭水河煤矿。这些单位的经验都通过省委的正式文件发到全省，并且上报中央。这几个煤矿的做法，“定”就是自上而下对生产队（当时煤矿的矿井就叫生产队）或班组实行四定：定劳动力、定工具材料供应、定工作地点（就是工作面的确定）、定协作条件（即有关方面给予的协助）。“包”，就是生产队或班组向厂矿实行三包：包生产任务，包安全，包成本。后来还加上包质量，煤矿也有质量问题，但问题不像其他轻工业、机械工业质量问题那么突出。“奖”，是对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实现了三包任务的集体或个人，按月评奖，多超多奖，在计时工资（计时工资是固定的）基础上给予奖励。奖金的比例由原来占工资总额的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八，提高到百分之十五左右。原来的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八就是三至五元钱，现在提高到百分之十五，在当时已经不得了了。当时发个十来元钱是很大一件事情，那时工人的工资才多少钱？一级工二十九元五，二级工三十三元，而且要好多年才升到二级工，所以发一二十元钱奖金是很不简单了。奖励面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这有点照顾面的性质，不是少数几个人。还提出分配标准，集体奖高于个人奖；井下工人高于地面工人；技术复杂、劳动强度大的工种高于一般工种。这些做法对当时工资、奖励制度上的平均主义做了些改进。60年代初期这样搞需要有很大的魄力，因为此前批修正主义，批奖金挂帅，已批了很多年。

我们四川工交企业职工的工资，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低二平”的缺陷。当然这个“一低二平”有很多种说法，说什么本来全国都是低工资，李井泉又压低了四川干部职工的工资，到现在还有些人埋怨。特别是1958年以来从农村抽调到煤炭、钢铁这些行业的有一百六十多万新工人，“大跃进”时号称八百万人上山。那时人民公社把男的都调到山上砍树去了，社员们发牢骚，说“人

民公社”成了“人民公社”了，没有男人了。“大办钢铁”失败后，大多数农民也就回去了，后来精简到一百六十多万人，这一百六十多万农村来的新工人长期实行低工资制。四川有个提法，叫做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三个人的事情五个人做。这个叫做“低工资多就业”。这一百六十多万工人低工资低到什么程度呢？前面提到的一、二级工资还是指正式工人工资，有文件可查：十四至二十元。而且工资的等级很少，只有三至五个等级（正式工人是八个等级），级差也很小，大概就是一至二元、二至三元。1958年以后四川绝大多数厂矿将过去实行的计件工资制改为计时工资制。以前搞计件工资，老工人，还有技术水平较高的工人，收入还比较多一些，但1958年以后把计件工资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来批判了，改为计时工资制，老工人的收入一般降低百分之十左右。虽然也有按季或按月的综合奖、年终奖，但奖金额一般只占工资总额的百分之几，非常少，而且完不成国家计划同样得奖，起不到调动工人积极性的作用。所以实行“定、包、奖”后，奖金幅度提高了，面也扩大了，最低额也增加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们工资制度上“一低三平”的缺陷，体现了精神鼓励与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原则。试点单位重庆鱼田堡煤矿实行这个办法三个多月，工人的实际工资平均增加了百分之十五点五。每个月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人增加收入，工人生产热情普遍提高。生产工效显著提高，国家计划月月超额完成，原煤成本也比试行这个办法前降低了百分之五点八。

由于“定、包、奖”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所以省委决定，从1961年下半年起，首先在采煤、采矿、冶炼、运输等行业普遍推广，以后工业交通其他行业也根据自己的特点，逐步实行了不同形式的计时工资加奖励的制度。整个工业、交通行业都搞了，可以说比较普遍。特别是在三年调整期间，实行“定、包、奖”制度，对于缓解职工的生活困难，调动职工积极性，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它实行时间不长，改革深度和广度都有限。试行没多久，随着抓阶级斗争大气候的变化，使刚刚起步的奖励制度试验也受到了冲击。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基本路

线，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八届十中全会后按中央部署，开始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城市里面就搞“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还提出个口号，叫作“工业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即巩固全民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与动摇全民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社教”运动中，“定、包、奖”被作为“搞物质刺激”、动摇全民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资本主义倾向”受到指责和批判。

这个问题以前我始终没想通，我亲身经历了“定、包、奖”奖励制度建立的全过程，李井泉同志还有其他领导同志都加以肯定，没有哪一个人当时说不对，李井泉给毛主席写那个信，我还参与了，他原则提得很高，说是要克服四川工资长期“一低二平”的缺陷。但是到了1962年以后，搞“社教”，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又是李井泉出来批判这个事情。我对李井泉同志一直很尊敬，但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他就有点出尔反尔。我记得很清楚，他有一次在会上讲：“毛主席说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怎么贯彻呢？怎么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呢？不能光在报纸上天天说吧？必须要在实际当中。”他说：“我通过调查发现两个问题，农村天天讲阶级斗争，讲什么？怎么讲？就是通过评工分来讲，批判以工分为中心；工厂里面就要批判抓利润、奖金和工时。”他当场还点了两个企业的党委书记的名。这个事情整个就翻过来了。1964年底省委领导人在一次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工交企业中，奖励问题集中反映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片面强调物质刺激，拿钱买干劲，致使一些职工在生产上追求产量，不顾质量，挑肥拣瘦，弄虚作假，腐蚀了职工思想，影响了职工团结。这说明在奖金工作中反映出来的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十分尖锐的。在奖励制度上的修正主义和修正主义影响及资本主义倾向也是比较严重的。（实际上这些话是李井泉讲的）你看，把奖金制度批判得简直是不得了，不过就是搞了那么几块钱的奖金，而且还是他提倡的。

后来小平同志主张恢复奖金制度，那是大得人心的。我认识

一些老同志，当时在省委、在企业里当领导或是在秘书班子里工作，就是为了推行奖金的事，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被批得很厉害，什么搞刘少奇的“小包工”了，被划成“黑五类”，受迫害相当严重。1964年12月省委就批转省总工会党组、省劳动局党组的一个报告，叫做改进奖励制度，确定奖励范围不得扩大，没有实行工资奖励制度的一律不再实行，已经实行了的就把多种奖金统一为“五好竞赛奖”。一个季度发一次，奖励面压缩到百分之三十左右，得奖者每季度每人平均十元左右。三个月得十元钱，奖什么？年终就发一次年终奖。还确定所有企业单位的脱产、半脱产的中层以上干部一律不再发奖金。到此，“定、包、奖”完全取消了，企业的工资奖励制度基本上名存实亡。这就是奖励制度从兴起到后来全部取消的过程。这就是第一本“折子戏”吧。

第二本“折子戏”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实行“三定一顶”制度。这是工业战线上抓得最紧、坚持的时间最长、收效最为显著的一本“折子戏”。在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60年代初期，中共四川省委十分重视抓干部的领导作风问题。那一段时间当中，蹲点、调查、研究，机关干部种试验田，企业干部参加劳动蔚然成风，并且逐步形成制度。那时候光到下面转一圈、跑一下不算数，非得实实在在下去参加劳动，搞调查研究。机关干部一个星期至少下去一天。我们那时骑上自行车，跑到金牛坝去种棉花，李井泉也亲自下田。机关干部种试验田，不光是劳动，还要总结经验。当时全省普遍推行眉山县委机关的“二五制”工作方法，即一周内两天在机关处理日常工作和学习，五天在基层调查研究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没有假日。工业企业干部参加劳动是由来已久了，从“大跃进”以前就开始参加劳动，但当初参加劳动没有经常化、制度化。“三定一顶”的制度最早是重庆水轮机厂率先创造的，后来在全省铺开。它的精神就是要使干部参加劳动制度化，不能说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为什么叫“三定”呢？干部参加劳动要固定时间，定星期几去，把队排好，厂一级的至少一周去一天，中层干部特别是车间干部要两天，半脱产干部要三天；还要定岗位，在什么地方劳动，是干车工还是电工等等；另外就

是固定职责，这个职责就是要顶班劳动。当然还没强调非要和工人一样完成生产定额，但至少要学会一门技术。这叫“三定”。后来又有个一“顶”，顶什么呢？就是在技术水平提高，能够独立操作以后，顶替班组定员。这个就水不得^①了，不然生产就脱节了。这在当时是搞得比较扎实的。大型企业的厂级领导干部、科室干部一周在一个岗位上工作一天，叫“六顶一”；车间干部一周两天叫“三顶一”。小型企业继续实行干部不脱产、半脱产。这个制度很严厉。由于上下认识一致，决心很大，办法具体，“三定一顶”迅速在面上推开，成为当时广大企业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一个主要形式。

有个数字统计，1965年一季度一次调查分析，在四川专、市属以上的工交企业中，“三定一顶”劳动制度的推广面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在已经推行中，参加“三定一顶”劳动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推行得较好的企业，工人出身的干部大多数回到生产岗位参加劳动，顶替了班组定员，原来不会技术操作的干部，不同程度地学到了一些基本的操作知识，其中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人已经初步学会了一门技术，开始顶替班组定员。

推行“三定一顶”劳动制度的收效，从当时来看是很的。干部在生产中与工人并肩劳动，不仅直接为国家创造了物质财富，而且通过劳动实践，改进了领导作风，密切了干群关系，同时干部通过参加生产劳动，领导生产，还发现和解决了一批生产和管理上的关键问题。这里有个统计数字，重庆钢铁公司，一千五百多名干部在七百五十五个生产班组中参加劳动，其中有一百九十六个班组在思想教育、比学赶帮和班组管理工作等方面进步比较突出；四百零七个班组进步较快，其他一百五十二个班组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干部参加劳动起到了“既是劳动组、又是工作组”的作用。从1964年初开始形成到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断，前后延续了近三年的时间。这项工作当时除了李井泉同志抓以外，杨超同志也抓这件事情，他深入实际，从

^①水：四川方言，形容办事敷衍。

理论的高度总结了很多经验。他还在当时的《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讲干部劳动的“三定一顶”制度。就是在1965年发表京戏《红灯记》那一期上登载的。杂志社给了杨超同志稿费八十八元，他还送给我们几个秘书班子的人每人一本《毛泽东选集》。

第三本“折子戏”是讲“两基”工作，就是加强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和职工大练基本功。这是根据四川一些企业从1963~1965年开展的“比学赶帮”增产节约运动中一些好的做法，加以总结提炼后在面上推广的。“两基”工作最初叫“三基”，即领导抓基层，企业抓基础工作，干部职工大练基本功。省委、市委领导抓基层，后来因为在企业推广，就没有讲领导抓基层了，所以就变成“两基”工作了。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主要是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包括班组工作，基层党、团、工会工作，定额工作。基本功分为三大基本功：政治、技术、管理。政治工作的基本功，就是干部蹲点调查研究，参加生产劳动，坚持学习等；技术工作的基本功就是工人提高技术水平，学习操作规程，熟悉设备性能，弄清产品的技术标准、工艺过程，掌握基本的操作技术和设备维修技术；管理工作的基本功主要是科室职能部门在材料管理、原始记录、技术标准、质量检验等方面练好硬功夫。在不同的企业、不同的行业中推广加强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和工人练基本功，后来发展到学大庆、学铁路。什么仓库的管理员把眼睛蒙着，你要什么给你拿什么。“两基”工作是经常性的工作，不像干部参加劳动、奖励制度在一定时期内推广，这是长期扎扎实实的工作，要持之以恒，不能采取搞运动的办法。这样抓了效果就比较显著。

我举两个例子，成都针织三厂开展了树立全厂先进标兵的活动，把各车间、各工序创造出来的“三最”即最新纪录，最高水平，最大效果搜集起来，形成一个全厂之最。比如说，接纱头全厂之最在哪个班组，由谁创造的等等，就像我们开运动会的各项纪录一样。然后就组织职工群众大练基本功，去打破这个纪录，创造新的纪录。把比学赶帮的群众运动落到实处。自贡炭黑厂认真总结职工技术操作的各项主要经验，制定了简明扼要、工人能

懂易记的岗位操作法，作为指导操作的主要依据，并相应健全了交接班、设备维护保养等岗位责任制度，从而建立起正常的生产秩序，促进了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

第四本“折子戏”是试行以轮换工为主的“亦工亦农”劳动制度。根据刘少奇同志关于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指固定工和合同工，全日制学校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的指示精神，1964年上半年四川开展“亦工亦农”劳动制度的试点。试点单位七十来个，带头的是永川花果山煤矿、威远钢铁厂、303伐木场等。当年共向农村招收“亦工亦农”工人三万多人。试点方式是，分期分批从农村招收一部分青年农民，同企业签订合同，安排在各个生产岗位上，同原有的固定工一样承担生产任务，干两至三年。有条件的企业还结合生产使他们学会一些农村实用的技术，如电工、设备维修等。他们的工资待遇比一般的工人要高一些，而且不实行学工制度，一去就是二级工，当时月工资33元钱；他们还要给农村交点公积金。不带家属，在工厂住集体宿舍。

我们搞“亦工亦农”轮换工制的初衷，是统筹安排城乡劳动力，不能说农民就一辈子当农民，城市里的人一辈子当工人。要统筹安排，缓解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困难，又解决工人的接替问题，同时向农村不断输送具有工人阶级思想和一定文化技术水平的工人，并可为提供劳动力的公社、生产队增加一些收入。轮换制工人不带家属，可以大大减轻企业在福利设施、服务事业等方面的负担。在矿山和有害健康的工种实行轮换制，可以从劳动制度上减少以至避免职业病的发生，有效地保护劳动力。“亦工亦农”轮换制开展初期还比较顺利，但第一批“亦工亦农”工人的轮换期还没有到（最早一批是1965年进厂，1967年才到期），“文化大革命”就来了，冲击很大。

“亦工亦农”为什么失败？就是由于“固定工”、“铁饭碗”的思想根深蒂固，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另外，说句老实话，当时城乡之间生产、生活条件差别很大，轮换制的工人一般不愿再回到农村。他们纷纷起来“造反”，认为实行工人轮换制、合同制是对他们的“迫害”，要求废除这一制度。我是有亲身体会的，

我在的工厂搞轮换工有两百多人，当时我分管劳动、工资，起来“造反”的轮换制工人一天到晚找我、质问我。因为这个事情根子是从刘少奇那里来的，那时刘少奇不行了，这事就成了刘少奇、李井泉推广的“黑”制度，你跟他们讲也讲不清。他们把我挟持着从内江徒步往成都走，要到省委请愿，要求废除轮换工制，走到半道让人劝回去了。当时我们也没办法，后来慢慢也“靠边”了。到“文化大革命”后期，迫于压力，轮换制工人都“转正”成了固定工。所以这个制度也就失败了。

第五本“折子戏”是李井泉同志最早倡导的“厂社结合”。“厂社结合”的本意是工业支援农业，探索怎样把工业企业和人民公社通过一个制度结合起来。工业支援农业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经济战线上长期的一个重大任务，也是个指导方针。工业支援农业做了不少的事情，比如说建了很多农业生产资料的厂，化肥厂、农机厂等，还有抽水、灌溉等等。但是作为工业企业，它和人民公社具体的结合并没有解决。后来李井泉同志提出这么一个办法，叫“厂社结合”。最早搞“厂社结合”是在1965年底，这个办法就是：在坚持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分别核算的前提下，工厂和农村人民公社建立固定的联系，大厂带大社，中厂带中社，小厂带小社，在生产、建设、思想、文化方面相互支援。我还是举我在四川农机厂（现在叫峨眉柴油机公司）的做法为例，这是一个中型厂，两千来人，生产小型柴油机，地处内江口木镇，与附近的口木公社建立了固定的协作关系。这不是我们选的，是上面安排的。具体形式是工厂党委参与公社党委的领导，我们厂党委书记陈华同志参加公社党委会，担当二把手。工厂里（如职代会）也邀请公社党委和贫下中农参加工厂里的重大政治活动、生产活动。工厂为公社及生产队解决照明用电，电力灌溉等问题。按规定这些是要算钱的，记了账，但最后付没付钱我不清楚。农忙时还组织工人参加抢收、抢种。工厂地处农村，厂区用围墙围住，搞“厂社结合”就把围墙拆了。公社教育农民，爱护工厂、保护工厂财产。当时农民的思想应该说还是比较好的，还给工厂解决蔬菜和副食品供应。我们厂也实行“亦工亦农”轮换制，开始我们在别的公社招收青年农民，以后就在“厂社结合”的公社

招收轮换工。工厂对公社，车间对大队，班组对生产小队都一一建立了固定联系。我们有些党员还到生产队去过组织生活，辅导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个设想是很好的。后来，1966年毛主席发表了个指示，全国都要成为一个大学校，工、农、商、学、兵“五结合”。有段时间我们工厂“工农结合办公室”变成了“五结合办公室”（即工厂、公社、商店、半工半读学校、工厂的民兵相结合）。杨超同志在一次讲话中对此提出不同看法，他说（大意），不能什么单位都变成大学校，工厂还是要搞生产，出产品。当时我觉得毛主席都讲了，他还敢提出不同看法，真够大胆了。实际上“厂社结合”没坚持多久，“五结合”也没结合起来，就都随着“文化大革命”中党组织的瘫痪而夭折。过去“厂社结合”中的经济遗留问题，农村欠工厂的钱也都不了了之。

五本“折子戏”已经过去四十年了。我觉得它在历史上还是有一定值得回顾的价值和借鉴的作用。五本“折子戏”有它的局限性，有些做法本身就不太完善，还没有经过实践的充分检验就匆匆忙忙地推广，比如说“厂社结合”、干部参加劳动等推广得比较急迫，效果不好。最大的问题是当时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的大气候下，把一些企业的生产问题、管理问题，都上纲上线，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联系起来，当成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来批判，而且牵连了一大批人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受到批判、冲击，包括李井泉本人，他虽然当时批别人，但后来还是成为他搞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罪行”。

不管怎么说，这几本“折子戏”是四川工业几十年发展当中的一段足迹，反映了四川老一代工业领导人，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为搞好企业管理、发展生产所做的大胆探索和辛勤努力。

第三部分

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
附录：从一个案例看一段痛史



1987年3月29日，杨尚昆同志与“萧李摩事件”当事人合影。图为萧泽宽、曾德林、杨尚昆、李止舟、廖伯康（从左至右）。



“大跃进”期间，四川大放水稻高产“卫星”，图为四川《农民日报》刊登的“水稻卫星上天”的宣传画。

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

——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

| 廖伯康^①

“萧李廖事件”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大跃进”和“大抓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四川发生的一起对提出不同意见并向中央如实反映四川情况的同志实施打击报复而造成严重政治恶果的事件。在本文“事件的缘起”一章中，作者回顾了“大跃进”重灾区四川的情况，分析了造成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以及向中央反映问题的经过和内容；在“冤案的铸成”一章中，回顾了八届十中全会大抓阶级斗争的背景下，省委指示重庆市委解决“萧李廖”问题，从揭发批判到分别处理的过程；在“雪上加霜”一章中记录了“文化大革命”初抛出“萧李廖”，后升级为“反党黑帮”的情况和“文化大革命”中颠沛流离的生活；在“冤案的平反”一章中记述了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境遇开始好转到拨乱反正中“平反决定”经反复修改终于形成的过程；在“温故而知新”一章中把往昔的伤痛化为理性的反思，从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凝聚人心、建立民信，继续消除“左”的思想束缚三方面总结了教训。

开篇的话

我选这个题目来写回忆，也曾颇费踌躇。但出于一种历史责任感的驱使，我还是决定把这段亲历写出来。为此需要作几点说明。

1. 我为什么要写这段往事？

“萧李廖事件”发生距今已经四十年了。流年似水，岁月悠悠，往昔的伤痛早化为理性的思考。重新揭开此处伤疤，虽然令

^①廖伯康，1924年生。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

人不快，却有一个好处——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是社会前进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这个事件涉及的远不是几个人的是非毁誉，而是党的历史上一段痛苦历程中的一个地方典型事例，是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回顾这段历史，澄清事实，分清是非，还历史以真实和公正，吸取经验教训，乃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说清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或许会有助于反思这段历史，以史为鉴。

2. 我如何认识“萧李廖事件”？

“萧李廖事件”，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因当时中共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顽固坚持“左”倾错误，压制党内民主，对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并向中央如实反映四川情况的同志实施打击报复，从而造成的一桩带来严重恶果的政治事件。这个事件的几个有关成员，开始被定为右倾“反党活动”，“文化大革命”之初在省、市党报上公开批判时又升级为“萧李廖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

“萧李廖”是三个人名的简称。其中的“萧”，是萧泽宽，重庆解放前川东地下党最后一任特委书记，挨整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是李止舟，抗战时期在南方局直接领导下和在新四军工作过的老同志，建国初曾任青年团重庆市工委书记，挨整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廖”，是廖伯康，即是在下，抗战时期在中央大学读书时参加革命，抗战胜利后随学校复员到南京，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1948年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后，奉命和一部分同志返渝，主要从事学生运动，迎接解放，也算是川东地下党的一员小卒。建国后长期做青年工作，挨整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

我们几个都是四川人。李止舟和我先后在团市委和市委办公厅同事，是老上下级关系，萧泽宽此时作为市委常委分管团的工作。所以我们工作上接触多一点，对当时时局的看法也比较接近，仅此而已。其所以被定为“进行反党活动”、“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是那个时期畸形历史的产物，实际上是“大跃进”

以来党内两种不同意见交织碰撞的继续和发展中的一个典型。说是四川特产，是因为四川在贯彻执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中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而当时省委那位主要负责人的领导思想特别“左”，领导作风尤其霸道，对中央有关纠“左”的一些措施与群众的呼声置若罔闻，顺昌逆亡，一意孤行，遂使人民群众的灾难和我们的厄运不可避免。

因此，这个事件有着直接的全国背景，也有当时浓厚的四川特色。对于全国这一段历史背景，在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作出明确结论，有关著作也多有论述，而对四川当年的情况至今却很少涉及，尚未揭开庐山真面目。

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后，党内多了一些民主气氛，我们一些人鉴于“大跃进”以来已经产生的严重后果，不满意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一意孤行的农村政策，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反映真实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不料却应了韩愈的一联诗句：“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由此招来无妄之灾，蒙垢沉沦二十年。尽管我们一直不服，但是我当时的认识水平，还远未达到“文化大革命”之后经过全党总结经验、拨乱反正所达到的高度。所以在以下的叙述中，我将本着现在的认识程度反映当时的认识过程。

3. 我打算怎样写这篇回忆文章？

根本的原则当然只能是实事求是，实话实说。但要真正说清问题也非易事。因为我们作为被动的一方，对于当时领导的认定和决策经过无法详细了解。即便是我们几个“同案人”之间，平反以后在各自岗位上忙于工作也没有仔细凑过情况，我的了解不一定全面准确。因此，我的叙述主要偏重于我个人的亲历，旁及一些所见所闻，同时参照了一点历史资料。我以为，其间的主要经过和关键环节大体可以说得清楚。

对待历史不必苛求个人责任，也不应计较个人恩怨。但这不等于可以淡化是非，抹杀教训。为了要说清情况，我的叙述便不能不牵涉一些具体的人和事，完全避开是不可能的，但我绝无意指责某些同志和领导。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人们必然站在“革命路线”和“党的领导”一边揭发批判我们，与我们划清界限，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对一些老领导始终尊重和谅解，平反以后我和许多同志的合作共事也比较好。至于个别同志直到最后仍然固执地认为自己一贯正确，整人有理，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一、事件的缘起——全国背景，四川特色

事件的缘起是从议论当时四川存在的严重现实问题开始，经过几件相互关联的事情逐步积累和发展起来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由于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后，我们向中央反映了四川的真实情况。

1. 面对严重困难，干部忧心忡忡，议论纷纷

1958年5月，党中央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当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后，更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推向高潮。我和许多同志一样，满怀豪情积极投入运动，满以为我们正在加速向共产主义进军，但问题也随即出现。以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大跃进”成了大倒退。当年秋冬之间，党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问题。11月，党中央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着手纠正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一些错误。毛主席在会上多次讲话，要求纠正他已经觉察到的某些“左”的错误。可是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却又把党内要求进一步纠“左”、要求从指导思想上清理“左”的错误根源的正确意见，视为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将敢于实事求是向党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使本来自反右派运动以后已经很沉闷的党内空气，由此愈加窒息。许多人不敢说真话，明哲保身，但求避祸。

大规模严厉的反右倾斗争，打断了经济上纠“左”的进程，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已被觉察、有待纠正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再加上部分地区一定程度的自然灾害，结果从1959到1961年造成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异常严重局面。

尤其是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农林牧副渔业产品全面大幅度减产，出现了全国性粮食、副食品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和供应危机，许多地方的人因营养不足而普遍生浮肿病，农村大量死人，城市普遍饿饭。面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中出现的严重困难，1961年1月，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主席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要纠正“五风”（即高指标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共产风）。五六月间，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刘少奇同志在会上对1958年以来发生问题的原因，引用湖南农民的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少奇同志沉重地说：“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我看在座的同志应该是有经验了吧！饿了两年饭还没有经验？……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这样搞下去了。”

在中央采取了一些纠“左”措施的情况下，从1961年后全国形势开始好转，而四川却继续实行“左”的政策，困难还在不断发展，属政治经济双重重灾区，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浮肿病人多，饿死人多，牲畜死亡多。广大干部对此忧心如焚，惶惶不安，担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切盼党中央和毛主席能了解下情，进一步采取措施，克服困难。

随着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不少同志进一步思考“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重庆，团市委的干部年轻人多，思想活跃，顾虑较少，又经常下基层，了解较多实际情况和群众思想，对面临的困难和工作中的问题议论纷纷。有的同志说，高指标、浮夸风完全是上面压出来的，是图虚名而招实祸，严重破坏了生产力。还有的同志认为，要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农业生产，应该实行包产到户。不少同志对1958年以来的错误性质也产生了疑问。他们提出：为什么这几年工作中造成的问题危害范围那么广，损失那么大，还有一套硬性组织措施，是不是路线性错误？对当时四川省委没有认真执行中央已调整了的一些方针政策，也提了很多意见。我将当时许多干部的心情概括了三句话，叫做“矛盾重重，忧心忡忡，议论纷纷”。

我自己和许多同志对“大跃进”的后果和对四川农村问题严重程度的了解认识也有一个过程。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要求全国所有社队以贯彻执行《十二条》为纲，进行整风整社，纠正“五风”。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市委抽调一批机关干部，组成农村整风整社工作团，分别到当时重庆所属的巴县、綦江、长寿三个县进行整风整社。萧泽宽是巴县工作团团长，李止舟是长寿工作团团长，我是农村整风整社办公室主任，联系三个工作团。正是这一年，我们才真正了解到四川继续实行“左”的政策给农村造成的灾难。

1960年底工作团下去时，农村已被折腾得差不多了，大办钢铁、大修水利、大办食堂造成的破坏历历在目。树砍光了，有的房子也烧了，公社化把社员的很多东西都归公了，为办食堂甚至连社员的锅灶也搬走了，家里不准煮饭冒烟。长寿是当时重庆三个县中的重灾区，1960年饿死人数以万计，虽比附近的涪陵地区少，但情况也很严重了。李止舟在长寿工作团的一份简报中写道：有些生产队是到处家徒四壁，犹如猪圈，强壮劳力丧失，剩下孤儿寡母，令人惨不忍睹！市委书记鲁大东看了这份简报后还赞扬说写得不错。当时整风整社，是带着抓阶级斗争的框框，重点整落后队。所谓落后，主要是由于贯彻执行“左”的政策扼杀了社员积极性，造成生产落后，生活困难，饿死了人，浮肿病人多。基层干部为了被迫完成上级任务往往违法乱纪。如由于普遍饿饭，社员出工不出力，有的小拿小摸，干部便对社员实行搜查抄家，乃至捆绑吊打，有的致伤致残。不少干部也有一些多吃多占，组织瞒产私分行为。当时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所谓“凡有三类苗，三类队，必然有三类人”。于是在社队干部中大搞批斗、撤职、抄家、抓人，搞得杀气腾腾。后来随着调查了解的深入，李止舟他们发现不能怪这些社队干部，主要问题不在他们，而是强制执行上级的“左”倾政策造成的，认为必须改变整社队干部的做法，上级也感到是个问题，所以把被抓的一些人都放了，对被整的干部也进行了甄别。

那时巴县的情况稍好一点。说来也极具讽刺意味，其所以稍

好一点，主要原因是巴县对上级的瞎指挥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来对抗。例如省里违反自然规律和群众习惯，硬性规定各地大放冬水田，抢种一季小麦。明明不对，却硬定指标往下压。巴县委书记周平深知民间疾苦，也懂得政治风险，既不敢硬顶，也不愿照办，便采取多报（数字）少放（冬水田）的办法，结果减少了损失。为了对付高征购，上交的是早、晚稻，多留点“饱水谷子”的中稻，让社员尽可能多吃一点粮食。因此巴县饿死人不多，但患浮肿病的也不少，这点小举措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当时干部、群众普遍呼吁搞包工分成。群众要求不高，只请求在田坎背壁空地上让社员夏天种点豆子、高粱，冬天种点胡豆、豌豆，收获后社员可以分点成。就这样县委领导还有顾虑，怕犯包产到户的错误。萧泽宽说，群众现在没有吃的，搞点包工分成是救命的紧急措施，如果出了事由工作团负责。这种包工分成的办法对救急渡荒也起了一点作用。以后批判萧泽宽的“罪状”之一，就是说他搞“三自一包”。

1961年，萧泽宽和李止舟还先后分别到重庆邻近的涪陵专区作过考察，那里的情况比重庆地区更严重得多。我也到长寿渡舟公社作过调查了解。有的生产队已是遍地荒凉，满目疮痍，大好河山，勤劳人民，解放已经十多年，竟然连年饥荒，难觅一碗饱饭。“左”倾政策造成的灾难，实在令人震惊，发人深省。严酷的现实教育了我们，使我们逐渐有所清醒。

2. 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发扬民主，总结经验教训

三年“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虽然经过1961年调整方针的贯彻执行，形势开始有了转变，但问题仍然很大。然而在党内干部中，对当时形势的估计以及应采取的方针政策，在认识上并不一致。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增强团结，动员全党更坚决地执行调整方针，战胜困难，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1961年11月16日，在中央发出的《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中指出：1958年以来，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

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约七千余人，通常称为中央七千人大会。这是党的历史上由中央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干部大会。

七千人大会的前一阶段，是讨论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1月27日，刘少奇同志针对党内思想疑虑最大的几个问题在大会上对书面报告作了说明，讲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看法。如：对于“三面红旗”，他说：“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关于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他再次提出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观点。少奇同志的讲话，受到大家热烈欢迎。由于与会者还有许多话希望在中央会议上讲，毛主席建议延长会期，让大家在北京过春节，“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这个“出气”，就是让大家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1月30日，毛主席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毛主席在会上还作了自我批评，并且说，同志们回去后，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要发扬民主，争取主动，作自我批评。

为了能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带回各地，中央要求每个县、每个地区、每个部门都去两个人。中央认为去一个人可能有片面性，两个人就会全面些；一个人去可能卡住回来不传达，两个人就会好一些。为了发扬民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中央七千人大会还采取了一个措施，就是各小组简报不只发本小组，其他小组也分发传看。当然也不是完全都发，有些简报还是只发大区。重庆参加这次会议的共有四十九人，市委负责人去的有第一书记、市长任白戈，书记鲁大东，常委、组织部长萧泽宽。当时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张黎群参加了这次会议，负责西南地区简报。所以会上各个小组的简报，包括上送的、下发的，他那里都

有，对全国各地情况比较了解。萧泽宽与张黎群很熟悉，中学时代他俩在成都同过学，后一道到上海读书，参加革命。1936年12月，经全国学联负责人段君毅介绍，他们又同赴陕北，后来又派回四川做地下工作。由于两人私交甚笃，萧泽宽经常到张黎群那里去看各地的简报，包括不下发的简报，了解很多情况。鲁大东和萧泽宽同住一个寝室，他很注意会议的动向，经常找萧泽宽通过张黎群打听有什么新的消息和各地动态。我们听说在七千人大会上，四川参加会议的同志，以及中央机关的同志，对四川省委的工作和执行中央政策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批评，小平同志还到四川小组听意见。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那位主要领导人在小组会上作自我批评时还掉了泪。还听说周总理讲到这位领导同志时说，他是老毛病，我们都清楚，要给他担担子。

中央七千人大会所强调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犹如一股温暖的春风，对当时正处于困难时期的全党是个巨大鼓舞。

3. 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的市委第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

1962年2月底，重庆召开了有各区县、各部门以及大型厂矿、大专院校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市委第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这次全委会是在省委召开传达会议之前先开，这是有点违反常例的。实际上是省委主要领导人想通过重庆先开会了解干部情绪，投石问路，摸摸情况。他认为重庆的干部对省委的意见多，有气先在重庆出了，不然到省里开会时对省委压力大。所以尚在北京时，他就向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交代，重庆要先开会传达，然后省委再开会传达。

就如何传达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市委常委会进行了研究。七千人大会为了发扬民主，强调要实行“三不”，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而且还提出发言（材料）“不装袋子”（不进入个人档案）。常委会在研究如何贯彻这个精神时提出，为了解除大家发言的顾虑，规定小组记录只记事，不记发言人姓名，小组讨论中提倡只谈事不要涉及人，避免追究个人责任。当然，在一个小组内大家都知道是谁发的言。同时，事与人也很难分得开，谈到具体事情很自然会涉及人，但都尽量避免。由于小组记录都只记事不记发言人姓名，所以后来在市委二

十次全委扩大会议批判我们时，就把小组发言记录拿出来，追问哪个话是哪个人讲的，结果人人有份，凡是发了言的，都得作检讨。另外，市委常委会还研究了小组简报如何分发的的问题。过去市委开会办公厅都设有简报组，小组简报送来审查修改后再发下去，这也是开大型会议时的惯例。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时，为了充分发扬民主，使大家畅所欲言，规定各小组简报不送审查，由小组自行审查，只要简报内容符合会上发言的实际，组长签字就行了。各小组的简报要不要下发的问题，常委会上产生了不同意见，有的主张按照中央的办法所有简报都发到小组，有的则不同意。最后任白戈作结论说，还是按照七千人大会的办法，对于各小组的简报都下发交流。为了将七千人大会精神全面带回各个单位，常委会决定仍是学习中央的办法，每个单位也来两个人，以免回去传达走样。同时，还决定对1958年以来市委所发的有关政策规定、指示和重要会议记录等，普遍进行一次检查和清理，以便更全面地总结经验教训。我是办公厅副主任，这项工作由我负责，后来批判我时这也成了一条罪状。

由于中央七千人大会正视现实，发扬了民主，比较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虽然会议没有为彭德怀等同志平反，没能彻底从指导思想清理“大跃进”、反右倾的“左”倾错误，但参加市委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的同志听了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的传达后，仍然感到心里亮堂，心情舒畅，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希望。在这种气氛影响下，再加上市委对会议所采取的上述一系列发扬民主的措施，因此这次会议一开始就比较活跃，发言踊跃。大家认为几年来工作中的成绩很大，同时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对于如此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必须认真地总结，并切实贯彻到今后的实际工作中去。在小组讨论中大都联系重庆和四川的实际情况，对省、市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尤其是对省委特别是对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意见比较集中，有些话也讲得很坦诚尖锐，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的意见，是对当时全省形势如何估计的问题，这是会议初期各个小组普遍提出的一个问题。很多同志问，全省一百

七十多个县，就有五十多个“落后县”，省委对此如何估计？近几年四川农村生产力究竟破坏到什么程度？农林牧副渔业究竟下降到什么程度？特别是全省这几年非正常死亡究竟有多少人？群众生活困难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这些情况省委是否如实向中央作了反映？有的同志指出，省委提出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大量调出粮食支援全国，但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和群众观点应该是一致的，从六亿人民出发和对四川七千万人民负责也应该是一致的，而省委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有片面性，突出反映在粮食问题上。四川口粮标准在全国最低，浮肿病人多，死人严重，与省委提出要发扬这种“共产主义风格”有直接关系。大家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认为省委没有如实向中央反映四川粮食严重减产的情况，怕暴露自己工作中的问题。不少同志还问道，目前全省形势究竟如何，最困难的时期究竟过去了没有？并说，过去几年由于对困难估计不足吃了大亏，现在再也不能轻描淡写，粉饰太平了。有的同志提出，1961年后全国形势已开始好转，非正常死亡已基本停止，而四川的困难却仍在继续发展，浮肿病人越来越多，人畜还在大量死亡。希望省委猛醒，揭开真相，迅速采取措施，真正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扭转困难局面。

有的同志在发言中尖锐指出，当前最大的危险是省委对大批死人现象遮遮掩掩，措施无力，这着实令人吃惊，不知还有没有群众观点？有的举例说，建国初期广西一个专区因粮食调运不及时，饿死了一些人，事后中央作了严肃处理；去年（指1961年）河南信阳、甘肃天水的死人问题，中央也进行了处理。四川死这么多人却不敢正视现实，共产党员对人民生命冷漠到如此程度实在令人痛心。

第二方面的意见，是认为省委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今天对当时所提这一方面的意见应该作一点分析。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根本问题出在中央，“三面红旗”本身就是“左”的产物，各地贯彻执行起来无不产生严重后果。但当时在我们这些人中，在参加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的同志中，谁也不曾也不敢直接怀疑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有问题。另一方面，当时四川确实是推行“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支柱，并且在“左”的方面大有创造发挥。同时，在中央对某些政策作了有限度的但也是重要的调整以后，四川却对调整的一些政策措施或执行不力，或顶住不办。大家的意见主要是针对这一情况而言的。

不少同志在会上提出，四川向称天府之国，物产丰富，而现在的困难却比全国其他许多省都严重。究其原因，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人祸是主要的，省委应作出结论。四川工作中的成绩与缺点错误究竟是多少开，省委应该有个交代。这些意见，不同意省委一再强调成绩与缺点错误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认为四川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能框得住的，造成四川严重困难的原因不能只说天灾，而主要是人祸，应该着重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四川几年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少同志讲，这些年省委主要领导人很少原原本本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凡是合自己口味的就积极传达贯彻，不合口味的就强调四川情况特殊，强调要结合本省实际。有时甚至根本不传达，不让下级知道。贯彻执行中央指示要结合本地实际当然是对的，但当时四川的所谓“结合”就是向“左”靠，越“结合”越“左”，越脱离实际。基层干部反映，每逢听到中央的指示后都精神振奋，听到说四川情况特殊后就冷了半截。有的群众说，四川出了“贪污分子”，把中央的方针政策“贪污”了。中央的方针政策是一斗，到省委只有八升，有的地方层层克扣，越往下剩得越少。同时也批评市委在接受省委制定的政策任务时，不认真进行调查研究，不敢如实反映情况。

对于省委工作中为什么会存在这些问题，有些同志直言不讳地说，四川的问题是“左”，以“左”比右好的指导思想对待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宣传文教小组的同志说，几年来四川的问题是死抱“左”的东西不丢，以为“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这种思想在四川影响很深，在干部思想上扎了根，大家都怕右不怕“左”。有的同志批评说，我们常说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但从党的历史上看，右固然不

好，“左”也未必好。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使大革命遭到失败，可是王明的“左”倾错误却使革命几乎倾家荡产。邓子恢的所谓右倾使农业合作化发展推迟，但没有减产，日子还好过，而“左”的结果，则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天府之国也搞得民穷财尽。当时讲这些话的同志是颇有点胆识的。

第三方面的意见，是认为省委脱离实际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对干部实行过火斗争，搞得干部人人自危，不敢讲真话。当时大家认为，省委抓阶级斗争还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强调过分。表现在轻易把一些问题提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原则上去解决，运动不断。如1959~1960年，在工农群众中大张旗鼓地开展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效果不好。1960年冬开始的农村整风整社，把主要锋芒引向阶级斗争，大搞揭盖子、夺取政权，实际影响了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改造落后队工作中，省委认为百分之七十是阶级问题，对基层干部搞“五撤三、三撤二”。1961年在全省又搞了两次大逮捕、三次运动，搞得人人紧张。省委提出“贯彻执行总路线要以反右倾斗争为纲”，搞“火线反右倾”、“火线整风”，“哪里生产上不去，就在哪里反右倾”。结果弄虚作假的干部受表扬，讲真话办实事的人受处分。而且要斗哪个干部，就要斗臭、斗透、斗垮，还要查成分、查历史、查社会关系，翻老账，株连家属。在农村中，对大队、生产队不脱产的群众干部大搞抄家、赔退、抓人。群众说“当干部的没有好下场，鼓掌上台，捆绑下台”，搞得不仅农村社员视当干部为畏途，连家属也不让亲人当干部，怕犯错误牵连全家。党内过火的斗争，伤了一些人的感情，破坏了民主原则，窒息了党内民主空气，滋长了命令主义，造成干群关系、党群关系、上下级关系紧张。在党内有些人靠整人吃饭，靠整人起家。

对于造成党内过火斗争的原因，有的同志分析说，一是几年来工作任务要求过高、过急，根本谈不上发扬民主，实事求是；二是有的领导人自以为是，强迫命令，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领导干部要有自我批评精神，要征求意见，敢于承认错误。如果对下级提的意见记上一笔，关键时刻说上两句，暗箭一支，下面就受不了。毛主席提倡干部应有“五不怕”

的精神固然很好，但实际上大家都怕，越提倡不怕越怕，怕引蛇出洞。对于当时为了纠正反右倾斗争扩大化而正在进行的甄别工作，不少同志提出邓自力和安以文的问题。邓自力、安以文是全省反右倾斗争的重点，完全搞错了。可是对他们的甄别却很不彻底，留了很大的尾巴。邓自力是前泸州地委第一书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后，面对农村严重饥荒，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敢于从实际出发，在全省率先解散公共食堂，给社员划自留地，规定自留地要恢复到高级社时期的数量，同时在一些生产队搞包工包产试点。这些措施调动了社员积极性，对促进生产解决农民生活困难发挥了很大作用，当地农村社员称他为“邓青天”。可是在反右倾斗争中，泸州地区却被省委定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邓自力被定为四川“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地委书记职务，下放农村劳动。1961年中央制定了农村工作《六十条》，按照《六十条》的规定，批判邓自力的几个问题全错了。可是省委仍以他有包产到户的错误的理由，在甄别时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改为“犯了右倾错误”，由地委书记降为地委副书记，同时下放长宁县任县委副书记。安以文是重庆最大企业重庆钢铁厂党委书记，是中央管理的干部，在反右倾斗争中被定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撤销党委书记职务，放到下属的103厂任厂长。他的所谓错误是：（一）1956年公开赞成反冒进；（二）在讨论制定1958年“大跃进”计划中，连续十一次修改降低指标；（三）认为1958年四季度太紧张，主张1959年一季度要进行休整。安以文的上述观点和做法符合当时实际，是完全正确的。但在1961年甄别时，仍说他“犯有政治上右倾动摇和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错误”，“动摇了军心，瓦解了士气”，不再适宜担任党委书记工作，改任地委副书记。两个人都留了不该留的大尾巴。参加十八次全委扩大会的许多同志认为，省委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和纠正错误的勇气。如果对错误处理的干部甄别不彻底，就不能解除干部的思想顾虑，不能真正做到畅所欲言。要求省委通过甄别工作，从政策上体现说老实话的人不吃亏，让干部敢说老实话。实际上，市委领导对甄别工作不彻底也是有看法的。在北京参加七千人大会期间，鲁大东就对萧泽

宽说重庆把干部整得厉害，伤了元气，要他回重庆后抓紧进行甄别工作。市委十八次全委扩大会后，任白戈也同意给安以文彻底平反，不留尾巴。可是省委主要负责人却派大员到重庆坐镇，坚决给安以文的甄别留尾巴，任白戈也不好表态了。

宣传文教小组在讨论中还提出，省委有的负责同志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也有片面性，说知识是从实践斗争中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未参加革命，也未参加实践，有什么知识？知识分子翘尾巴，就要把他们搞臭，要挖祖坟，要拔白旗、插红旗。希望省委改正这种错误观点，正确对待知识分子。

第四方面的意见，是认为省委领导缺乏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风。不少同志针对当时党内生活中存在的不正常现象提意见说，1957年以前大家还敢讲话，党内上下级意见不一致时，可以争得面红耳赤而毫不介意。但1957年以后就一天天不同了，经过各种政治运动整了許多人，大家有了“经验”，变得有的驯服，有的油滑，有的沉默。不少人总是揣摩领导的心理和需要来表态行事，党内党外都是如此。即使在党委会上讨论工作也要看一把手脸色行事，不能说不同的意见，不能商量问题，一把手说了算。如此上行下效，在“一言堂”的情况下，谁提了不同意见，搞不好就被扣上“党内反对派”、“反党分子”的帽子。“报喜得喜，报忧得忧”，结果造成党内不敢说真话，只能说成绩，不能说缺点，只能说好的，不能说坏的，使得领导很难了解基层实际情况和群众真实心态。

有的同志提出，省委从未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党内作过自我批评。省委对中央要求民主，强调因地制宜；对下面则要求集中，强调服从照办，有时到了违背常识、不近情理的地步。在“大跃进”中，省委提出全省要“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连插秧也要拉起绳子比照插，做到“三、六条栽”、“四、七条栽”“一个样”，致使水稻大量减产。下面稍有不同意见，动辄扣帽子：“是否和省委一条心？”使干部提心吊胆，战战兢兢。

十八次全委扩大会对省委领导的意见提得多提得尖锐，二十次全委扩大会议时便说我们在会议内外刮起了一股反对党的歪风。

其实，萧泽宽、李止舟和我都分在党群小组，我们几个在小组会上发言并不多，原因是我们知道内情较多，有意让大家多谈。我们即使发言也没有长篇大论，比较简短，有时是对其他同志的发言作点插话补充，属于三言两语。但意见倾向明确，毫不含糊。有一次任白戈到党群小组听意见，高兰戈发言时李止舟很气愤站起来插话说：“我也想通了，有些人就是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我们这些人算个卵，你说他听不听？”李止舟这个话明显是针对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故意说给任白戈听的，话不长，却语惊四座，任白戈当时也没有表态。因此，后来批判我们时就说，你们是专门画龙点睛。

我在这次会上的几次发言中，先后主要谈了五条意见。

第一条是水利方针问题。中央确定的水利方针是小型为主、社办为主、以蓄为主，而省里却要搞大而洋，搞机械提灌，这在四川遭到普遍反对。因为如果水都没有从哪里提灌？而且提灌要动力，四川丘陵山区面积大，扬程高了上不去，需要多级提灌，那个时候的经济力量和生产水平实际很难普遍做到。所以我认为，四川把中央提出的小型为主、社办为主、以蓄为主改为机械提灌为主，结果把原有的小型水塘、堤坝、沟渠等水利设施弃而不用，造成了很大损失，这是瞎指挥。

第二条意见是说，现在对高估产高指标大家都有共识了，但引起高估产高指标的思想方法却没有得到解决。我说，过去几年用很多特殊条件创造了一些“典型”，然后根据这些“典型”进行推算，并把推算出来的指标拿到群众大会上去打擂比武，结果越轰越高，这就是高估产的思想方法。

第三条意见是说，1961年底省委在成都召开了一个会，布置在群众中搞“新三反”（反分散主义、反投机倒把、反贪污盗窃）运动，实际是搞反瞒产私分，想通过“新三反”搞出几亿斤粮和几亿元钱来解决当时生活和财政上的困难。省里这个布置，贯彻到各区县、公社，要把粮食和钱搞出来。层层搞的结果，造成了许多违法乱纪现象。当时中央不准搞反瞒产私分，并专门召开了几次会议批评搞反瞒产私分。1960年8月又发文件，明确指出今后不再在群众中搞反瞒产运动，可谓三令五申。而四川却反

其道而行之。这个情况不只我一个人谈，我的主要问题是最后说了一句“真是祸国殃民”。市委二十次全委扩大会议时查记录查出了这句话，因为会议记录不记发言人姓名，于是就追问“祸国殃民”这个话是哪个说的。我说是我说的。使用这样尖锐的语言当然更是大逆不道了。

第四条意见是说，1960年全国其他地方都没有再搞什么全民运动了，四川比人家慢半拍，还在大搞“全民运动”。仅1960年一年，重庆就搞了三十三个中心运动或全民运动，像种南瓜与泡咸菜这些群众的家务事都搞全民运动。我之所以说全市搞了三十三“全民运动”，是因为七千人大会有一条规定，要各地把1958年以来的文件清理一下，凡与七千人大会精神不符的，各地自己就把它取消。根据市委常委会的决定，我清理出了三十三个布置搞“全民运动”的文件，比较典型的就像种南瓜和泡咸菜都搞群众运动。这在当时是为了准备渡荒，当然不是坏事，但大搞群众运动却是不适当的。本来规定这些不符合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文件要同干部见面，市委有的领导同志不赞成把这些文件公开出来，我便在会上提了这个问题。

第五条是说，我们在上面搞高、大、散、乱，即高指标、大办、分散主义、乱指挥，当然会遇到干部和群众的反对与抵制，而领导上往往又把群众中的这些不同意见动辄提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一提到路线斗争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提到阶级斗争就要抓阶级敌人，所以干部群众都怕。四川为什么回头慢？问题为什么揭露不充分？四川的问题究竟是“左”还是右，或者是时“左”时右？我说，总结经验主要是从政治上总结，从几年来的实际情况看，是谈右色变，谈“左”泰然。全市干部也是对反右十分敏感，对纠“左”十分迟钝。中央精神主要是纠“左”防右，可实际上大家是怕右不怕“左”。

在市委十八次全委扩大会上，市委委员、副市长邓垦的发言更尖锐，更直截了当。他说，对四川农业形势应作正确估计，不能硬套三七开。“大跃进”这些年造成了严重后果，饿死了那么多人，把老百姓害苦了。现在把困难归结为是天灾造成的不科学，应该是在天灾基础上加了人祸。其实就是没有天灾，刮这样

的共产风，也非困难不可。对干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他批评说，这些年许多说真话的人挨整，搞得许多人不敢讲真话。四川犯了几年“左”，反了几年右，越反越“左”，把反右倾斗争当成了推动工作的方法。他在一次常委会上还说，省委是犯了“左”倾路线错误，省委主要领导人的职务是用四川的粮食换来的（当然这是气头上的话）。在十八次全委扩大会上公开提出省委犯了“左”倾路线错误的是邓垦，其他同志大多只是说省委有“左”的错误。所以，邓垦在市委二十次全委扩大会上也就成了被批判的重点。邓垦说有“路线错误”，就抓他这句话，并找我查证，我说我没有听到他说过。因为那次常委会也没有文字记录，查无实据，这个问题也没有追出结果。邓垦对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的“左”倾意见很大，也不隐讳。在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期间的一次全委会上他还念了首打油诗：“年已五十满，活得不耐烦，闲来无事干，打打太极拳。”这是故意讽刺挖苦的。他说了就说了，谁也拿他没办法。市委书记孙先余在一次常委会上也说过：四川的“左”与晋绥的“左”是同一格调，省委那位主要领导人一贯的“左”，他还没有接受过去的教训，至今劣根未除。他的阶级分析是主观臆断，不切实际。孙先余是晋绥来的老同志，这个话说得很有分量。但他这些话是在常委会上讲的，听到的人很少，后来又没有人揭发，也就没有被追究。

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结束时，任白戈作总结，对会议作了高度评价。他说，会议开得很好，到会同志思想敞开了，发言热烈，冲破了许多框框和束缚，开始做到知无不言，民主空气活跃，大家心情舒畅。这次会议可以说是来了一个翻箱倒柜，对过去工作中的矛盾作了比较充分的揭露，有助于总结经验教训。矛盾揭露以后大家在许多问题上的认识逐步趋向一致，问题见面了，共同语言更多了，今后的工作应该做得更好。最后他还作了两条保证：第一，我以党性担保，把大家所反映的情况如实向中央反映；第二，我以党性担保决不打击报复。其实这也是中央的精神，中央七千人大会上就提出了新的三大纪律，其中一条就是要如实反映情况。以后发生的事情说明任白戈同志这两条保证都没能兑现。当然，这也不能怪任白戈，处在省委主要负责人的直

接领导下，他也无能为力。

4. 参加扩大的省委工作会议和我编写的一期综合简报

市委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后，紧接着省委在成都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传达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重庆去的有任白戈、市委书记辛易之、市委工业部长马力和各区县及有关部门的代表共八十八人。省委书记廖志高在会上代表省委作了《健全党的生活，加强党的团结》的报告。重庆去的代表在小组讨论中，把市委十八次全委扩大会上提到的有些问题也反映出来了。对于廖志高同志在报告中说四川是“严肃认真地贯彻了总路线以及中央的方针政策”的评价，大家认为估计得太高了，实际上省委贯彻总路线一直强调“多快”，忽略“好省”，对中央的方针政策也不能说都是严肃认真贯彻的，如对毛主席的一些指示省委就没有原原本本传达。关于反右倾斗争扩大化的问题，认为省委在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主要是“左”，但一直开展的却是反右斗争，廖志高同志的报告没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而且还强调反右倾斗争的成绩是主要的。因此，有的同志在发言中说，这个报告缺乏说服力，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及其危害讲得轻描淡写。大家希望省委应把什么是反党、什么不是反党的界限讲清楚。在小组讨论中，有的同志还提出，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思想在下面普遍存在，省里是否存在？省委如果存在这种思想，四川就很难做到实事求是。有的同志说，廖志高同志的报告自我批评精神差，有些问题没有为下面承担责任，实际上下面很多错误做法大多是从省委那里来的。总的看来，重庆参加省委工作会议的同志在会上还是认真、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这次到省里开会，工作人员只有我和市委办公厅秘书处陶维全两个人。在成都，我向陶维全讲，白戈同志在市委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总结时讲要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这个事怎么办？市委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期间各小组的简报我都带到成都了，东西一大堆。我说现在没有其他人，只有我们两个来整理了。陶维全问怎么整理法，我说为了快些、简便些，由我说你记。那时我还年轻，记忆力较好。我便将十八次全委扩大会上反映的意见综合为七个方面，每个方面又分若干小问题，都是根据小组发言归纳

的，基本用发言者的原话，包括邓垦说省委犯了“左”倾错误（当时没加“路线”二字。如果那时写了是路线错误，后来邓垦更脱不了手）等都如实反映。这个材料整理出来后送给辛易之审阅，他那时是市委书记兼市委秘书长。辛易之拿去后对我们写的七个方面问题一个也没有改动，但把所有尖锐词句都删了，用语缓和一点。可见当时市委领导对十八次全委扩大会的估价是比较一致的。辛易之删改之后送给任白戈，我以为他看了要返还我们然后报送中央。那一次到成都开会任白戈的秘书陈虹跟去的，我每天都到陈虹那里，要她把送给任白戈的卷宗拿给我，看对材料有什么批示，以及有什么要交办的事情。一次我和陈虹一道清理文件，发现会议的其他简报用的都是上报中央的红色刊头，而我们整理的这份反映市委十八次全委扩大会上所提意见的综合简报是用只限发省委常委（不上报下发）的绿色刊头印发，便知道重庆这份简报并未上报到中央。因为七千人大会有条规定，要求各地将贯彻七千人大会情况的简报直接送中央，简报刊头通通是红色。而我们整理的这份综合简报，任白戈直接送给了省委主要领导人，他看后批的是“此件只发常委”，变成绿色刊头了。我一看，心想糟了，重庆的综合简报被省里捂住了没能上报到中央，省内也只有几个常委知道，任白戈的保证落了空。

省委主要领导人看了我们整理的这份简报，加上重庆小组在省委工作会议上发言的简报，震动很大。他说重庆意见如此之大，就是省里各个厅、局跟重庆把关系搞坏了。于是省委分管工业的书记陈刚带领所有工业厅、局长到重庆小组一一作检查。陈刚也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同志。那时省委工业部长是刘洪阳，马力是市委工业部长。刘洪阳便找到马力说，不知怎么搞的，省委主要领导人脾气大得很啊！说省里各厅局把重庆得罪了，让我们所有厅局长都到重庆来作检查，究竟是为啥事？马力说他也不知道，廖伯康一定知道。刘洪阳便来问我，我说，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为什么发脾气我也不知道。实际上我明白一定是看了第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上反映的意见后才发的脾气。刘洪阳说，省里管工业的厅局有二十几个，每个厅局都到重庆小组作检查，会议结束了也检查不完。他说能不能由他出面，上代表陈刚下代表各个厅

局，到重庆小组作个检查。我说这个事你找我不行啊，你还是找辛易之。他找到辛易之，辛易之说刘洪阳说的有道理，就让他上代表陈刚，下代表各厅局来重庆小组作个检讨。后来刘洪阳专门到重庆小组作了次检讨。那时省委主要领导人发脾气，只说各个厅局把重庆得罪了，从来没有说自己的工作有问题，路线有问题，作风有问题。

会议结束时，省委主要负责人作总结，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仍然轻描淡写，护痛怕痒，一带而过，基本上没有什么认真的自我批评。他解释说，对于几年来工作的估计，要用发展的、联系的观点从本质上看问题，不能静止地、孤立地从表面现象上看问题。这话从哲学概念上讲是不错的，问题在于他在总结中仍不肯面对现实，承认四川问题的严重程度，仍然强调反右倾斗争的必要性。同时再次提出过去几年“我们是团结起来犯错误”。“团结起来犯错误”这个话他讲过多次，当时四川的干部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我理解这话的意思是即使省委错了也必须跟着省委走，不能违抗，不能“破坏团结”。换句话说，就是错误人人有份，我们都在一条船上，你们提意见等于给你们自己提意见。这些就是省委主要负责人总结发言的基调。重庆参加省委工作会议的许多代表明显感到省委这次会议没有重庆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的效果好。但在当时总的形势下，客观地说，这次会议对于纠正“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还是起了一定作用，但又留下了以后进一步向“左”发展的伏笔。

由于中央一系列政策措施和七千人大会精神的贯彻执行，全国的形势逐步好转，四川的困难也得到缓解，生产有了较快的恢复性增长。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十分善良，比较容易满足。只要政策宽松一点，给予自由空间多一点，群众的积极性便会调动起来，促进生产较快发展。可惜这个良好的发展趋势，很快便被新一轮“左”倾冲击波打断。

5. 被批传为几个“半勇敢分子”给毛主席写信反映四川问题

大约在市委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后不久，发生的另一件与“萧李廖事件”直接有关的事情，就是团市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于克书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了四川的问题。这封信后

来被讹传为是几个“半勇敢分子”写的。因为当时毛主席提倡“五不怕”，要敢于反映真实情况。还说，即使不做勇敢分子，不敢落真名真姓，做个半勇敢分子，写个匿名信也好。实际上于克书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写的。后来抓“萧李廖”就是从追查这封信开始的。这便涉及我与团市委的关系了。

我是1960年由团市委调到市委办公厅任副主任的，但仍兼团市委书记。调我到市委办公厅工作有个前因。1960年团中央通过中央组织部要调我到团中央工作，当时市委不放人。那个时候中央组织部的权威很大，调谁都要服从，不去不行。任白戈当时提出能不能给团中央说一下，不调行不行。此时市监委书记廖苏华恰好要到北京去开会，任白戈知道她与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很熟悉，1938年在延安时同在中央军委工作，胡耀邦是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唐彬（此时任重庆市委书记）、廖苏华夫妇都在军委机要处工作。所以任白戈便要廖苏华在开会时找胡耀邦反映一下能否不调我到团中央工作。廖苏华到北京后，有一次开大会时胡耀邦坐在台上，大会结束她便走上台去找到胡耀邦。胡耀邦已猜到是有关我工作调动的问题，还没等廖苏华开口就说：“苏华！我知道你们重庆很困难，我今天炖个鸡给你吃。”那是困难时期，炖个鸡很不简单，在北京也算难得的事。结果我的工作调动问题廖苏华根本没有谈成。

团中央知道市委不同意调我到北京，于是就派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梁步庭到重庆做工作，一方面是希望市委放人，一方面希望我采取积极态度。梁步庭到重庆后，既找了任白戈和分管组织工作的李唐彬，又找我谈话，动员我去北京。那时我认为青年团是搞群众工作的，到上面工作有点“虚”，真正实在的是在市这个层次，直接面向群众，所以我也不想到北京去。梁步庭找我谈时，我说团中央人才济济，调我去干什么？他说因为团中央联络部部长吴学谦调到党中央联络部去了，让我到团中央任常委、联络部部长。我说这个工作我不行，我的外语不行。梁步庭说，团中央也考虑过让我到设在开罗的世界民主青联书记处任中国书记，按规定可以带个翻译去。我说，我带个翻译工作上还可以，生活就不方便了。他又说也可以到《中国青年》杂志当总编辑，

我说文字也不是我所长。梁步庭最后说，你推来推去，外语不行，文字也不是你所长，你大概是不想去啊！我也对他直说，青年团工作最实际、实在的还是在市这个层次。

梁步庭走后，李止舟提出与其团中央调不如我们调，市委几位书记都同意。这样，1960年调我到市委办公厅任副主任仍兼团市委书记。当时市委办事机构很特别，辛易之是书记兼秘书长，李止舟是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我是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市委在找我谈调动工作问题时，我提出办公厅与青年团是两个性质和要求完全不同的部门，办公厅要求守家，青年团要搞活动，要面向基层到群众中去，一个是为市委书记处为常委会服务，一个是要在群众中开展活动，两个工作性质结合不起来，我怎么个兼法？辛易之说，你重点放在办公厅，团市委那边你一个礼拜回去半天。因为当时市委各部门的主要干部大都参加农村整风整社工作团去了，萧泽宽是巴县工作团团团长，李止舟是长寿工作团团团长，农工部长郝振乙是綦江工作团团团长，主持宣传部全面工作的副部长王若是綦江工作团副团长（这时重庆只管巴县、长寿、綦江三个县），办公厅就只有我这个副主任管日常工作，所以一个星期只能回团市委半天。

一周回团市委半天做什么？在同于克书、王竹、刘文权、赵济几位副书记商量时，我提出团市委常委会我不参加，你们开书记办公会若有无法解决或难以解决的问题我可以回来一道研究。于克书、王竹、刘文权、赵济都不赞成，他们说我们这里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我说那我回来干什么？他们说要我回去参加他们中心组的学习。他们几个人的想法是，我在市委可以了解中央有什么精神，市委有什么打算，通过中心组学习让我给他们露点消息。他们说，他们只要求在大政方针方面给他们露点消息，就能更好地保证党的领导，发挥助手作用，具体问题不需要我与他们一道解决。于是我便每个礼拜回团市委参加半天中心学习小组学习。以后的“祸事”也是由此引发的。

市委虽然把我调到办公厅了，可是团中央调我到北京工作这个事还没有了结，中央组织部说他们发了调令从来没有收回过，团中央也不松口。最后达成一个协议，由重庆另派一位同志替换

我到团中央工作，遂决定调团市委副书记向洛新到团中央《中国青年报》担任群运部部长，后任团中央学校工作部副部长。一个人一生的际遇有很多偶然性，如果那个时候我调到北京去了，“萧李廖”这个事件也就没有了。再有，如果不是向洛新调到北京也不一定出来个“萧李廖事件”。这是后话。

团市委的干部一向有着胡耀邦同志倡导的“议大事，管本行”的传统。1961年初，耀邦同志曾给有关的十八个省、市团委书记写过一封信，强调要进行调查研究，如实反映情况，总结经验教训。并提出青年团要做党的助手就应做党的耳目，要说实话，做政治上、政策上的助手。因此，当年五六月间，在团市委机关中层以上干部的学习会上，大家对面临的形势、存在的矛盾和省、市委工作中的问题多次坦荡陈言。萧泽宽和李止舟有时也到团市委来同几位书记一起议论。

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我同团市委几位副书记座谈会议精神时，他们提问：四川问题如此严重，死那么多人，中央知道不知道？我说，根据我的判断中央不完全清楚。于克书提出是否可以给中央写封信反映一下情况。我说，安徽问题也很严重，安徽问题也是揭不开，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批示派人去一查就把盖子揭开了。王竹、刘文权和赵济都积极赞成给中央写信。由谁写这封信呢？大家都推于克书，因为他任过巴县整风整社工作团副团长，比较了解农村情况。这封信写不写？于克书开始也有所犹豫，怕万一把信转下来要受到打击报复，而王竹和刘文权一再催促他，还特别用毛主席提出的要有“五不怕”精神鼓励他写。王竹说，给中央写信是向党反映情况，还怕杀头吗？于克书最后下决心给毛主席写信是在省委工作会议之后。因为我把省里的情况带回来了，我说省里这次开会，市委十八次全委扩大会上所提的意见没能反映到中央。

于克书写出信后让团市委的干部朱芬芳（也曾参加巴县整风整社工作）作了文字整理，然后打印寄出去了。在一次市委开常委会时，李止舟和我按例列席。会前，于克书走来悄悄对我说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并把打印稿给了我。我看完后便顺手给李止舟看了。我问李止舟这封信写得怎样，他说没用，毛主席收不到。

常委会开完后，于克书找到我，问他给我的东西看了没有。我说看了，并问他送出去了没有。他说已寄了。他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寄了就算了。他问寄了就算了是什么意思，我说如果没寄还可以修改。他问修改什么，我说从政策上提出问题还不够。那时还不敢公开说存在路线问题，只好说是政策上的问题多。

我们都担心有人会拆看信件追查笔迹，甚至监听电话。我曾亲历过一件事，对此有所了解。1959年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他打电话有人监听，写的信也被人拆看。邓自力写给他堂兄邓垦的信，邓垦给邓自力的回信就都被拆看过。省委办公厅有次给我打电话让我找邓垦谈话，我问找邓垦谈什么？那边说邓垦给邓自力写了封信，问问他写的是什么内容。我向辛易之汇报，他一听，那边是省委主要领导人追问，这边是邓垦，邓垦发起脾气来谁都不认，两边都惹不起，就叫我去处理。我便给邓垦打电话，邓垦听了大发脾气说，我给堂弟写信为什么还要我交代？这是我私人的信，我受宪法保护。他的脾气发完了。我说，邓垦！我不是省委主要领导人，你发脾气只能给他发，不能给我发。他说你是传达省委主要领导人的话，我给你发脾气就等于给他发脾气。我说，这个可以！那我怎么给省里回话？是不是就说我已同邓垦谈了，他说记不起了。邓垦说，可以！可以！后来我给省委办公厅回电话，那边说写的什么记不起了，这封信我们都拿到了，实际上是要邓垦交代一下，他回忆得起回忆不起都是一回事。所以邓垦写给邓自力的信肯定被检查了。

为防止查对笔迹，于克书写给毛主席的信是用打字机打的，恰好团市委打字员李国权是个哑巴，绝不可能说出去。为了防止被查出信是从哪里寄的，当时正有人坐船经武汉去北京开会，便托他们带到武汉交邮局寄出。于克书那封信的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没署真名，确实也只能算作“半勇敢分子”。尽管于克书想了那么多办法，但后来还是被那位省委主要领导人查了个水落石出。

6. 冒风险向胡耀邦、杨尚昆汇报四川死人问题严重

直接向胡耀邦和杨尚昆汇报四川的真实情况，也是由很多偶然因素促成的。我在1957年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

团中央委员。1962年6月团中央召开三届七中全会，这时各地已有不少三届团中央委员调离了团的系统。如果已调出团组织系统的委员不去开会，人数超不过半数。团中央将这一情况向中央书记处分管青年团工作的杨尚昆反映后，中央办公厅为此发了通知，要求三届团中央委员都要出席这次全会。我将中央的通知报告辛易之，辛易之说虽然工作很忙，但还得去啊！这样我同于克书（团中央候补委员）一道赴京参加这次团中央全会。到团中央开会，我想肯定要见到胡耀邦。考虑到四川情况如此严重，要不要向耀邦反映？如何反映？临行之前的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思想非常矛盾。因为省委主要领导人打击报复是著名的，他主持四川工作先后重点整的人都是在重庆开会批判的，杀鸡给猴看。他有一块心病，总是怀疑重庆有人反对他。我妻子罗楨很单纯，她天真地说，向中央反映情况还睡不着觉，未免顾虑太多！她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件关系身家安危非同小可的事！我想起市财政局原副局长戎占芳的遭遇。戎占芳是山西“牺盟会”的老战士，满怀正气，富有经验。1956年在一次会议中，我与他同住一个寝室，有一夜他翻来覆去不能入睡。我问他什么事情，他说他有些情况要反映，有些意见想提，但顾虑很大，思想斗争激烈，因而睡不着觉。我那时三十多岁，血气方刚，不知厉害，劝他说，在党的会议上向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提批评意见是共产党员最起码的权利，有什么值得顾虑的？果然他听了我的劝，在会议上坦率提出意见，结果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为这事，我对戎占芳同志一直深感歉疚。想不到几年之后在同一种心情下，夜不能寐的却轮到了我。我不禁为之苦涩暗叹。冥想中，又一组画面萦绕心头，挥之不去：1961年我到长寿县渡舟公社亲眼目睹的那一幅幅景象。成村成乡的人群因饥饿而周身浮肿，气息奄奄。什么叫“家徒四壁”，什么叫“野有饿殍”，什么叫“易子而食”！我这才真正是眼见为实。人民群众生活如此之惨，四川死人如此之多，我岂能知情不报？这一夜冥思苦想的结果，促成我那次北京之行的所作所为。尽管为此遭受了近二十年的劫难，但我终身无怨无悔。

我去北京时，作了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准备。在北京，老战友

的小聚成了导火线。我一到北京，向洛新、陈家俊夫妇便请我吃饭，陪客是曾德林、罗玉清夫妇，都是原来团市委的老同事、老朋友，餐饮颇丰。当时北京粮食定量是三十斤，重庆干部定量是二十一斤，还要“节约”二斤只有十九斤。所以吃饭时我说，在重庆要想吃到这些东西很困难。曾德林说，你们四川怎么搞的，不断有人写信说吃不饱，肿病多，要求我们寄粮票回去。我说，实际情况比你们知道的要严重得多，你们所说的困难都是城市的困难，都是干部家庭里面的困难，真正困难的地方，饿死人的情况你们根本不知道。他们问究竟死了多少人？我说死了一千万以上啊！并对中央封锁，下情难于上达，许多情况不为中央所全知。这次小聚中的谈话，引起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兼办公厅主任曾德林的高度重视和深深忧虑，随即向胡耀邦作了反映。此后，中央为了了解四川实情，煞费苦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也是从这次小聚的谈话中引发出来的。所以80年代我对曾德林和向洛新开玩笑说，“萧李廖”一案的始作俑者是你们两个人，第一是你向洛新如不请吃饭就没有以后的事，第二是你曾德林若不向胡耀邦反映也就没有后来的文章。

团中央这次全会开的时间很长，从6月19日开始到7月9日结束。为什么开这么长时间？因为七千人大会后各地传达贯彻情况尚未充分反映到党中央。党中央建议此次团中央全会在讨论原定议题之前，先用三天时间让大家充分反映各地传达贯彻七千人大会的情况，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干部的情绪。团中央三届七中全会一开始便宣布：青年团作为党的助手，应反映党的方针政策在各地贯彻执行的情况。西南地区云、贵、川、藏四省区是一个小组，组长是四川团省委书记李培根。在三天的小组会上，我基本没有发言。我认为在人多嘴杂的小组会上谈如此重大的问题不合适，搞不好传了回去，也许我人还未到家，整人的大棒便高举以待了。

过去到团中央开会我比较爱发言，也敢讲真话，这次三天的小组会我基本未发言，引起了胡耀邦的注意。他问廖伯康为什么不讲话啊？一定是有难言之处。胡耀邦说，目前全国最困难的地区有安徽、甘肃、河南，还有四川，有关地区的团干部我都单独

谈过，我再单独找廖伯康谈谈四川的情况。

胡耀邦一贯重视调查研究，过去找我了解情况时一般都带有秘书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速记员等。而这次他却是只身来到我们住的前门饭店，手里拿着厚厚一叠稿纸和几支削好的铅笔。在前门饭店偌大一个会议室里，就只有我们俩对谈。我一向对耀邦非常敬重，不是因为他的职务，而是因为他的才识，他的作风，他的人品，他那一颗真正为人民为革命的赤子之心。我对他十分信任，愿意向他倾吐积郁在胸的一切。

向耀邦同志汇报四川的问题，是我来北京的一大愿望。当时，我心情有点激动，但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平静地说，他平静地听，不断地记，有时还插一两句话，说这个问题安徽有，那个问题甘肃也发生过，另一个问题河南也有。我觉得耀邦同志好像在作解释，而对四川如此严重的问题既未直接发表看法，又未提出解决的意见，这和耀邦同志平素的作风大不一样，我感到纳闷，谈到后来我的情绪愈来愈低。大概耀邦也察觉到我情绪的变化未能畅所欲言。就这样结束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汇报。但随后却出现了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情。汇报完后，耀邦即将我向他汇报的笔记交给了团中央另一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专门组织整理了一份简报，直接报送党中央书记处。与此同时，耀邦又亲自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口头汇报，并建议尚昆同志直接找我谈话。耀邦同志说，廖伯康谈了许多四川的严重情况，但似乎言犹未尽。尚昆同志问，如果中央书记处找他谈话，他会不会谈？耀邦说他肯定会全盘托出的。就这样给我开辟了一条直接向党中央书记处汇报四川问题的途径。这时，我才领悟到耀邦和我谈话时为什么采取那样的态度。因为我汇报的不是一般的问题，是在一个中国最大的省区，死人达千万之多如此严重突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左”的指导思想所致。作为团中央的书记，对一个来自当地的中层干部，他能够对这些问题公开说什么，提出什么解决办法或处理意见呢？耀邦的冷静正说明他在党内久经磨炼，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也说明他早已成竹在胸，另有安排。像四川这样严重突出的问题，只能向党中央书记处直接汇报才是最正式的

反映渠道，才是真正能起作用、解决问题的办法。正是由于耀邦的精心安排，才有以后党中央的相应措施，也才使四川的一团迷雾得以真相大白。

要我到中央办公厅向杨尚昆同志汇报，是两个人分头通知我的，一个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伟，另一个是曾德林。看来，向团中央书记处汇报之事，团中央书记处是正式研究过的。我提出于克书参加过农村整风整社，对农村情况了解更深入、更具体，是不是一道去？他们说可以。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对我们这次汇报采取了一些保密措施，以调我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也请了假。去之前我同于克书商量，全面情况由我汇报，涉及农村某些具体情况由于克书补充。在当时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还要如此遮遮掩掩，形同地下状态，这说明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到了何种程度！当然我们也理解，这是团中央对我们的保护措施。

1962年6月28日下午，由曾德林带领，我们乘专车直接到了中南海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一间小会议室。杨尚昆同志，以及中央办公厅的群工组组长，还有两位书记处工作人员（三个人作记录），加上我们去的三个人共七人在场。入座后，尚昆同志一开始就先端正我的态度说：听说你反映情况有顾虑，有什么顾虑啊？你们省里李大章、廖志高我都同他们谈过。重庆的廖苏华我也找她谈过，不过她不了解情况，谈不出什么来。我也找任白戈谈过，他有顾虑不敢讲真情。唉！不怕官，只怕管嘛！我处在他那个位子我也怕。最近我还找了一位你们四川来京开会的省委部长谈，他王顾左右而言他，同我打太极拳，也不得要领。你今天不是来跟我打太极拳的吧？我当即表态说，我长期在城市工作，对全局情况尤其是对农村情况不完全了解，怕反映得不够全面。但我一定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如实向中央汇报。杨尚昆说，又不是要你们来决定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接着杨尚昆开门见山地说，我们知道四川情况很严重，死人很多，中央早有察觉。国务院办公厅曾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凤州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

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杨尚昆说他们看了也很震惊，并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同时他也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听到这里我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四百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死了八百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尚昆同志问我，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这时我伸出一个指头说，四川的问题是这个问题。杨尚昆说是什么问题？我说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杨尚昆说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啥子问题？我说死了一千万人。他问我，你这个一千万是怎么来的？我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他说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我说我看文件和你看文件不一样，你看文件是备查性质，我看文件要贯彻执行，为了贯彻执行我就要研究文件。1962年5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身很简单，但后面附有一个各个地区的人口数字及各地干部定编数。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六千二百三十六万，而另一个材料《户籍年报》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七千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我又说，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不止这个数字。杨尚昆问为什么？我说从1957到1960年有个自然增长数；同时，1961~1962年上半年，全国都好转了，但四川却还在死人。我举了几个典型例子：

一是1961年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安法孝带领整风整社工作团到江北县，副团长是团省委副书记王毓培，他住在县上都饿得受不了，每个礼拜天到团市委来打牙祭（团市委食堂自己喂猪，伙食办得好，颇有名气）。他说江北县饿死不少的人。第二个例子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区组织工作座谈会后到重庆，萧泽宽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兰戈请他吃饭。吃饭时问他涪陵死人情况怎么样？他说他们问了一下，全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二百多万^①。第三个例子就是省委工作会议期间雅安地区的荣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还描绘说有的一个村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外一个村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这些埋人的人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再从其他的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反映荣经县情况的这份简报按规定要发到各组，还应上报中央，但我刚看到就通知要收回去（据后来了解，到职不过半年左右的前荣经县委书记姚青1960年被捕判刑当了替罪羊。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因到荣经调查死人情况写成报告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可见当时下面各级干部都了解四川死人严重的情况，但就是反映不上去，谁敢反映谁挨整）。我说，四川死人最严重的地方，一个是雅安地区的荣经县，一个是涪陵地区的丰都县。讲了这几个典型后我对尚昆同志说，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死的人还应加上二百五十万，有文件可查的是一千万，再加二百五十万。我说，我认为这个数字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一千万。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并立即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一折打开看了后说：“就是你这个数字！”

接着，杨尚昆问：“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问题？”这时，我不能不把我所知道的省委主要领导人在四川的所作所为都谈出来。大体谈了以下

^①据《四川省志·地理志·人口编》的记载：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涪陵专区的人口总数是四百七十七万多人，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专区人口是三百七十二万多人。1964年比1953年的人口还净减少一百零五万。

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说省委主要领导人总强调四川情况特殊，中央的许多方针政策在四川都没得到贯彻执行。例如，1959年4月毛主席有个《党内通信》六条指示，四川没有贯彻执行，后来四川发生的许多问题都与没有执行《党内通信》六条有关。省委主要领导人说这个《党内通信》发下去会起副作用，便在文件上批了句“要从积极方面理解”，不要再往下发。重庆因李止舟感到这个文件特别重要，接到文件就立即转发下去了，下面都传达了这个文件，不久省里又要求收回。四川其他不少地方农村干部甚至不知有这个文件。杨尚昆插话说他也听到过这方面的反映，说四川没有把《党内通信》下发，他也曾问过，说文件发下去后很快被省委收回。关于贯彻执行中央方针政策方面的问题，我还谈了一个养猪政策问题，一个人民公社分配究竟是实行“大包干”还是实行“三包一奖”的问题。毛主席提出的养猪方针是公养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而省委主要领导人却改为以公养为主，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造成生猪生产第一大省的产量锐减。再有就是1959年毛主席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把办好人民公社的原则总结为十四句话，其中两句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当时确定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管理区或生产大队。1961年9月，毛主席明确指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并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了六年糊涂日子（从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而省委主要领导人则一直坚持说“队”在四川就是大队，把小队改为大队，到1962年也还解决得不彻底。我问尚昆：1961年四川还搞了“新三反”（实际重点是反瞒产私分），不知道是中央布置的还是四川自己搞的？杨尚昆说中央根本没有布置搞什么“新三反”。

第二，是反映省委主要领导人主观臆断，独断专行，搞瞎指挥。举的例子就是破坏了几千年来行之有效的冬水田制度。他不管水利条件如何，硬性规定必须放多少冬水田种小麦。结果水放不干，造成小麦播种时积水歉收。第二年小麦收后马上要栽秧，天不下雨，田中无水秧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减产，两头失着。为了表面好看，他还在铁路、公路、交通沿线搞“高产路”，

把远离公路地方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集中在“高产路”沿线，只图表面好看，造成新的“一平二调”。同时还大搞“一个样”，规定拉绳插秧搞密植，无论山上山下、平坝丘陵，都要同时栽种收割。杨尚昆问，是不是因为他是北方人，不懂南方耕作制度？于克书说他是南方人啊。我说主要问题不是哪里人的问题，主要是走不走群众路线，有没有群众观点，听不听群众呼声的问题。

第三，是反映省委主要领导人上骗中央讲假话，下压群众隐瞒真相。我说如像粮食问题，他就到处说四川在全国交粮最多，对全国贡献最大，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中央财办下发的一个文件中，将全国各省上调粮食的数量列出，当时上调数量最多的是黑龙江、吉林，江西也多。四川是大省，当然上调也是多的。但如按照人口数平均上调粮食的数量而言，四川只略相当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且上调的这些粮食还包括对城乡口粮定量标准压得特别低这样的因素，城市居民是二十一斤，干部只有十九斤，农村社员一般是十六两老秤的四至五两原粮。就是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不落实，只有空指标没有粮食。此外上调的粮食里面还有一部分是宝成铁路修成前边远地区运不出去的死角粮。这位领导还在干部群众中散布，四川困难是由于中央把四川粮食调多了引起的。特别是周总理知道四川很困难后，提出来要调几亿斤粮食给四川解决困难，他却一口咬定说四川没问题。我说这位领导人一方面对中央封锁，另一方面压制下面不准谈死人情况，一谈死人情况他就说这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杨尚昆听后说，你们今天所谈的情况有些中央不知道，过去只知道四川上调的粮食多，今天你们谈了之后我才知道，四川上调的粮食中包括老西南局时期的死角粮，还有许多是压低了干部和群众口粮定量才凑上的。四川口粮定量低我们知道，我有个老同学在江津白沙教书，让我给他寄点粮票去，我哪有粮票，只好给他寄了一百元去。杨尚昆还说，七千人大会上总理说中央把四川粮食调多了一点，是中央帮省委主要领导人承担责任，他把这个话拿到下面去散布就不好了。尚昆同志又说，四川省民政厅报的死人数字是四百万，公安部查的是八百万，我这里还有个数字大约是一

千多万，不知四川搞的什么鬼！

第四，是反映省委主要领导人专横跋扈，打击干部，搞“一言堂”家长统治。他压制民主，个人说了算，不许提不同意见，一提不同意见就扣帽子，轻的是“不尊重省委”，重的是“藐视省委”，是反党。他常说：“跟着省委走，错了由省委负责，不跟着省委走，就是对了也有个组织错误。”他这句话在四川干部中影响很大，不然为什么明知是错的还要跟着走？他在全省布置搞亩产万斤的万斤亩运动，这明明是假的也不准人怀疑，哪个怀疑哪个挨整，而且蛮横地说我就不相信搞不出来，我搞不出来，我的儿子也要把它搞出来。他不仅在农村打击了一批敢讲真话的干部，还在厂矿基层大搞“擦锈”和“火线整风”。后来我查了省里的有关资料，自“大跃进”以来，被打击批判并戴了帽子而需甄别平反的干部达三十八万人之多。七千人大会后，这位领导人在省委召开的会议上，对自己究竟有什么错误不作检查，相反提出“四川是团结起来犯错误”。杨尚昆听后说，难怪中央向四川要传达贯彻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总结报告，省委办公厅总说还没有整理好。

尚昆同志最后问：“你们谈了许多情况和问题，那么，总起来看是什么问题呢？”我思索一会儿后说：“在重庆市委十八次全委扩大会上，李止舟说‘省委主要领导人是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我看是合乎实际的。”这是我们当时的真实思想和认识水平。现在看来并不准确，其实这位领导人比我们更了解中央，只不过他是揣摩一人之好恶，而又从“左”的方面加以发挥发展。“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以致在四川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尚昆同志又问：这些问题，只是你们的看法，还是其他人也有这样的看法？我说：这不仅是我们的看法，在重庆市委第十八次全委扩大会上就充分反映了广大干部的意见，只是没有点这位领导的名。

告别时，我对尚昆同志说，今天我们反映的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建议中央派人去四川进一步深入了解。我还说，我们今天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事希望保密，万一传到省里，我们便活不出来了。尚昆同志笑了笑说：“你也是办公厅主任，有人向你反映问

题，你会怎么处理？”

近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下册第一百九十页上，在1962年6月28日的工作日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下午约重庆市青年团二同志来谈话，谈农村工作问题，由三时到六时半。”指的就是他同我和于克书两人的这次谈话。

7. 中央书记处派川籍干部到四川调查了解情况

后来知道，我们向杨尚昆同志汇报后，7月2日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杨尚昆等参加。杨尚昆在会上汇报了四川的情况和问题，并反映了我们希望中央派人到四川进行深入调查的建议。小平同志说，按照他们的意见派人去。遂决定派一批司局级川籍干部以返乡探亲访友为名进行调查。派司局级干部到四川调查，也是我们当时的建议。因为部长一级的干部到四川要报告省委，司局级干部来不必上报，也不那么引人注目，可以自由找人谈话。当时杨尚昆也分管组织工作，他便要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在中央机关司局长一级的川籍干部中提个名单。安子文专门在中南海西楼召开了一些部委党组书记会议，提出了一个十六人的名单交给杨尚昆。这次西楼会议是保密的，除参加者外，其他的部党组成员都不能告诉。后来四川调查的是十七个人，多了一个唯一不是四川人的萧风。萧风原任人民日报社总编室副主任兼报社机关党委书记，当时刚调到中央办公厅任财贸组组长。他到尚昆那里汇报工作，知道要派人去四川了解情况，便也要求参加。萧风是苏州人，是比较老的同志，身体不大好。尚昆说你又不是四川人，你跑到四川能了解情况吗？萧风说，他对四川问题早有耳闻，七千人大会时他参加了安徽组的讨论感受颇深，有调查研究经验。同时说他当时的关系还在《人民日报》，可以《人民日报》记者身份找人谈话，谈话可深可浅；可以找一般干部和群众谈，也可以找比较高层的人谈，门路较广，比较方便。就这样，尚昆同意让萧风也到四川调查。行前，杨尚昆和中办副主任、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分别与他谈过话，都说，四川农村情况严重，七千人大会时没有完全把问题揭开，会后有不少干部群众来信来访反映问题，因此中央要组织一些干部到四川了解情况。萧风此行，是由中央办公厅派遣，

不属中组部调派之列。

中央派出的十七名干部各自到四川后分头进行调查。与我直接接触的有萧风、二机部原子能局副局长邓照明和二机部办公厅副主任牟爱牧。此外，我知道来川调查的还有中央调查部办公厅主任徐淡庐和天津市一位副市长。徐淡庐到重庆后没直接找我，他先找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刘连波，他们是老熟人。刘连波给我打电话说，有个老同志徐淡庐要回江北县家乡去探亲访友了解些情况，可他是地主家庭出身，认识的人相当部分是地富分子，人家可能要问他为什么接触的都是这些人？如果人家问他是从哪里来的，他是中央调查部（当时是内部机构，严格保密）的又不能对外讲。问我能不能给他写个介绍信。我在电话上与徐淡庐取得联系，对他说，你到江北县后人家若问你，你就说是中央来的，介绍信交给重庆市委办公厅廖伯康了，当地要了解你的情况，就请他们打电话直接找我，我就说你是中央介绍给市委的，介绍信留在重庆市委。天津那位副市长是丰都人，从丰都了解情况后经重庆回去。那时廖苏华是常务副市长，请他吃饭要我参加，我一听就知道是回来调查了解情况的。所以我对廖苏华说，吃饭由我安排，还是请廖大姐出面，另外请市政府找位负责人陪一下。这位同志我没接待，姓甚名谁也不知道。那时我没有给徐淡庐写介绍信和未参加接待天津那位副市长，只是为了免得多事，后来也确实少了一番交代检查。

中央书记处派来四川调查的干部很快就到了。萧风最积极，他7月底就来了，邓照明比他晚来一个月。7月28日，萧风是由新华社重庆分社社长廖永祥陪着同我见面的，廖永祥介绍他是人民日报社机关党委书记、总编室副主任。但萧风自我介绍说，他既是人民日报社工作人员，也是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这次是尚昆同志要他来的，有点一见如故的意思。我估计尚昆同志是给萧风交了底的，所以他见到我一点避讳都没有。他说，这次来对外不公开，连对任白戈也不要讲。他提了两个要求，第一是要求找几个人多了解一些四川农村情况，第二是要查阅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些文件。他还说，他是第一次到重庆，走之前，尚昆对他说到重庆可以找李止舟、廖伯康。因为我在北京向尚昆同志汇报的时

候，曾引过李止舟的话说“省委主要领导人的问题总起来看是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尚昆同志问，找李止舟谈，他谈不谈？我说你找他谈毫无问题，他会什么都谈的。李止舟是市委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过去他们在工作上就有接触。李止舟还曾对杨尚昆提过如果中央开会欢迎到重庆来开。杨尚昆对他说，你还提这个要求啊！中央到一个地方开会，那个通讯呀、安全保卫呀一系列问题弄得很紧张，人家都怕去开，你这个办公厅主任还提在你那里开呀！所以尚昆同志对李止舟印象很好，说这个人精明能干，也很有思想。

因此萧风到重庆后由廖永祥陪同先见了李止舟，说明了他来的意图是了解四川的真实情况，看看四川省委下发的文件。并且说，这件事不能对任何人讲，包括对你们的第一书记也不能讲，这是中央的机密，如果出了什么事情由中办对你们负责。所以第一个告诉我萧风来到重庆的是李止舟，而且他分析可能是我们向杨尚昆反映情况后中央采取措施派人来调查了。

萧风来重庆后要开座谈会找哪些人？市委十八次全委扩大会上党群小组里最敢提意见的一些人廖永祥也知道，一个是于克书，一个是高兰戈，还有王炎等都比较敢说话，廖永祥提出是不是把他们都找来谈一谈。后来觉得高兰戈、王炎分管的工作不一样，高兰戈是组织部副部长，王炎是市政府办公厅主任，在上面的时间多，虽敢提意见但具体情况可能说不出多少来；于克书虽然了解情况，但他心直口快，口风不严，包不住话，怕不保密。所以最后这几个人都没有找。萧风又提出听说原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接连给中央写了几封信，控告省委主要领导人不执行中央政策，并对他进行打击迫害。萧风说他这次先到成都就是为了找邓自力，结果邓自力到泸州去了，他又赶到泸州，邓自力却又回成都了，因此一直没能找到邓自力。萧风说，听说邓自力有个堂兄在重庆工作，他了解邓自力的情况。我说是啊，这个人就是邓垦，他确实知道邓自力的情况。由此便决定由廖永祥陪同萧风去找邓垦。事前李止舟告诉了邓垦，说明了萧风此来的情况和意图。萧风是同邓垦单独谈的。后来萧风对李止舟和我说，你们那个邓垦很有意思，他说省委主要领导人管的事太多，建议最好调

胡耀邦来四川任省委第一书记。萧风除与邓垦单独谈过外，李止舟还向他提供了一个情况说，1962年中央农业部有一位臧局长在涪陵蹲点，蹲了很长时间，最近才到重庆，曾同辛易之谈了很多涪陵的情况。这个人当时还在重庆，廖永祥陪萧风也找过这位臧局长。

萧风到重庆除单独找过邓垦和臧局长外，主要是找我和李止舟谈，没有找过萧泽宽；萧泽宽也不了解萧风重庆之行。在我与萧风的接触中，我知道他了解很多情况，来川前作了充分准备，从他谈话口气看，《一字一泪诉川情》那封信他都可能看过。另外，我和李止舟还陪萧风到过小泉。当时张黎群跟随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于江震住在小泉宾馆。萧风找张黎群单独谈过，具体内容我们不了解。吃饭时于江震在场，萧风顺便问了几句，没有展开交谈。萧风只是说，他在泸州时发现邓自力允许农民上交生猪后可以把返还肉拿到市场去卖，既增加了城镇肉食供应，又增加了农民收入。他说这是个好办法。那时于江震有病，常住重庆。他对西南局和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政策和作风也有意见，要求离开西南。一次中组部副部长陈野苹给李止舟写了封信，李止舟打开一看，是要他转交于江震的。内容是说，于江震要求调离西南可以，等他养好了病再说。中组部副部长给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写信都要避开那位西南局和省委主要领导人而由李止舟转，可见这位领导人当时之厉害。

萧风来重庆的事，根据他的要求，没有报告任白戈，也没有向辛易之汇报，但辛易之晓得萧风来过重庆。因为有一天我们请萧风在市委小食堂吃饭，辛易之见到也参加了，李止舟只介绍了萧风的身份，辛易之也没有具体过问萧风来干什么。萧风要看省委的文件，李止舟便将市委办公厅档案科长辛玉介绍给萧风和同他一道来的罗贞治，请他具体协助办理。萧风那时什么文件都想看，1959~1962年的文件共借了三百多份，白天找我们谈，晚上就看文件，临走时还没看完，要求带回北京去看。带回北京的文件以后都通过内部机要交通归还了。萧风来查那么多文件，我想是我们向尚昆同志汇报省委主要领导人不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后，他派萧风来弄个究竟。尤其是我说四川死了多少人有文件可

查，尚昆同志说为啥子他不知道这个文件，可能是萧风要将这些文件带回去给尚昆同志看，看了就一目了然了。

萧风8月5日离开重庆，邓照明与牟爱牧（抗战时期曾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过，修建办事处的办公楼就是他办的，是有名的“牟副官”）两人于8月底到重庆。邓照明是宜宾人，牟爱牧是巴县长生乡人，他们先各自回乡作了调查，然后到重庆。萧泽宽和邓照明是1948年底成立的中共（地下）川东特委的正副书记，两人历经风险，患难与共，当然非常熟悉。因此邓照明先找萧泽宽提出要了解农村情况。萧泽宽说他只了解巴县情况，李止舟是长寿工作团团长，廖伯康是市委整风整社办公室主任，他们了解很多情况，是不是找来一起谈。邓照明说可以。所以若问萧、李、廖是哪个“组织”起来的？那就是邓照明。以前萧、李、廖并没有联在一起，1962年8月底邓照明来后萧、李、廖才“串”在了一起。

邓照明是抗战前四川大学物理系学生，川大地下党总支书记，被选为七大代表赴延安，曾在晋绥作过县委书记、县大队政委，1946年1月调回川东作地下工作。建国初是重庆市总工会组织部长、工业局长，后调长寿狮子滩搞水电站建设，并从那里调到北京。以后中央决心搞原子弹，因他是学物理的，便调他到二机部原子能局任副局长。我们同邓照明见面后，李止舟问他，你是搞原子弹的，怎么突然对农村感兴趣了，要座谈农村情况？邓照明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真人面前不烧假香，我这次到四川，不是凭个人兴趣来的，这个问题你们不必问，我也不能讲，我这次回来是以探亲访友的名义来的。”他让我们大胆谈，由他向中央负责。他还说了一句：“我们这么熟的人，我不会害你们。”“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碰到邓照明时开玩笑说，老邓，你说过的话不作数啊！你说不会害我们，结果被害惨了！为这个事我们都遭^①了。

萧风在重庆没有熟人，所以除李止舟、邓垦和我知道外，其他人都不晓得。邓照明在重庆熟人多，他以回乡探亲打掩护先去

^①遭：四川方言，遭受，多指遇到不幸的事。

看了些熟人。有的人很敏感，市委工业部长马力就问过邓照明，你回来干什么？邓回答说，回来看看，没再说下文。当时大家心照不宣，都希望中央能解决四川的问题。

萧风和邓照明先后到重庆调查了解情况，接触的人不完全一样。同萧风谈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在市委一号楼，参加者有萧风、廖永祥、李止舟和我共四个人，谈了三个多小时。同邓照明谈是9月上旬在萧泽宽家里，参加的就是萧、李、廖加邓照明，也谈了三个多小时。两次谈的问题基本相同，因此放在一起说。有些内容与我在北京向尚昆同志的汇报也大体相同，但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当时我们讲的一个主要问题，还是说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四川没得到贯彻执行。那时候，大家印象最深、意见最大、议论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说省委主要领导人传达毛主席和中央指示时从来不原原本本传达，往往夹杂他个人的东西，结果弄不清楚哪些是中央的，哪些是他个人的。不仅我们弄不清楚，任白戈也弄不清楚。所以在市委十八次全委扩大会上，有的同志说我们这里听不到毛主席的声音，听到的都是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如何说。一些同志提出，有的人天天说拥护毛主席，而实际却在天天反对毛主席，就是针对这个情况讲的。我们具体举了一些他没有贯彻执行中央方针政策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他在转发毛主席《党内通信》六条指示时，加了一句“要从积极方面去理解”。以后又通知把《党内通信》收回去，说怕起副作用。为了“要从积极方面理解”毛主席的指示，还在成都开了个座谈会，形成了一个座谈纪要，有些政策内容同毛主席的指示相违背。这个文件萧风带回了北京，邓照明只是作了记录没带文件走。

第二个例子，是毛主席在1959年提出了“公养私养并举，两条腿走路”的养猪方针。后来毛主席又进一步补充要公养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而他则强调公养为主，说生猪算生产资料只能公养。我在向尚昆同志汇报时就说过，四川出的问题是一字之差。如：生猪是公养为主还是私养为主，生产队规模是大一点还是小一点，自留地是划多一点还是划少一点等等，都只是一字之

差。但这一字之差却是南辕北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像养猪问题就牵涉肥料、肉食供应等一系列问题。允许农民私养，老弱劳力打点猪草就把猪养肥了，杀过年猪有钱有肉，也增加了市场供应，公私两利，但就是不准社员私养。划自留地问题也是如此，凡是划够了自留地的地方，肿病死人的问题就好解决一些。1959年6月中央下发了一个《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许这种小私有，实际上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而省委主要领导人却把这个指示扣下来了，不准下发。一直到1962年萧风来查文件时，中央这个指示原件都没找到，只找出了个省里要各地扣发中央文件的通知。这是造成四川死人多的原因之一。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反瞒产私分。自1959年起毛主席多次提出不得在群众中搞反瞒产私分，1960年中央又发文指示各地不得在农民中搞反瞒产私分，可谓三令五申。但一直到1961年上半年，四川还在各地大搞反瞒产私分，抄家捕人，造成严重违法乱纪。1961年下半年，毛主席指出，公社分配要以“大包干”为好，不要搞“三包一奖”，并批评“三包一奖”是烦琐哲学。可是省委主要领导人却说，我这个“三包一奖”是在南充火花公社总结经验总结出来的，只能搞“三包一奖”，不能搞“大包干”。而且说不按省委这个办法办就是蔑视省委。

第四个例子，是说1961年、1962年，省委主要领导人看到群众生活困难了，就下令每个县只准留一所中学，其他县中、农中一律砍掉。他说，农民读不读书不要紧，只要会种庄稼就行了，读书是城里人的事情。当时我们说这是在文教战线上大搞右倾倒退。现在看，砍学校不是右，而是“左”，是同一个根源。

我们谈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省委主要领导人上骗中央下压群众，我行我素，一再撞墙，仍不倒拐^①。这类问题不反映在正式文件上，而是表现在平时的讲话中。他到处吹嘘四川最为坚

^①倒拐：四川方言，比喻思想等转变方向。

定，贡献最大。1958年1月，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工作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再次严厉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周总理被迫检讨。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参加了南宁会议，会后直飞重庆，李止舟去接他。在进城路上，他颇为得意地对李止舟说：全国其他许多地方都不行了，现在只有四川顶得起。他是有所指的，意思是全国到处右倾倒退，四川硬着头皮顶住。这也就成了他在随后开展的“大跃进”运动中的指导思想，是“大跃进”在四川造成极为严重后果和以后各种问题的起因。据我后来看到一份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经过核实，1957年四川的粮食产量为四百二十六亿一千万斤，1958年为四百四十九亿一千万斤，被吹得天花乱坠的“大跃进”增产不过百分之五多一点，按当时城乡人口计算人均占有粮食六百三十多斤（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在内），虽然小有增产但由于“敞开肚皮吃饭”等原因开支大增，实际上这年的粮食已经收不抵支，人口出现负增长；1959年猛减至三百一十六亿四千万斤；1960年再降至二百六十七亿九千万斤；1961年更降到二百三十一亿斤，全川城乡人口平均每人只有粮食三百七十三斤（仍然包括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三年间粮食产量下降了近一半。这样的大减产，还要瞒上欺下，硬绷面子，便狠心克扣群众的口粮。这个问题同萧风谈了后，萧风把有关文件带回去了。

此外，我们还谈了省委主要领导人在四川独断专行，实行政长统治的作风问题。他在上面搞专制主义，下面就搞奴隶主义。所以群众和干部不敢反映真实情况。1960年是四川最困难的时候，他对农村一些落后地区，不分析落后原因，对农村干部一律三撤二，五撤三。他在南充蹲点，培养“典型”。为了交流推广南充的做法，用南充经验改造其他地方，便把南充的干部派到雅安去。这些干部人生地不熟，不但没能解决落后地区的问题，反而增加了新的矛盾。像这样随心所欲、我行我素的做法，就他来说不只一两桩，而且还有很多发明创造。如1959年庐山会议后回四川传达时，便别出心裁，设下口袋阵让你去钻。他不打招呼，不讲会议情况，而将彭德怀的《意见书》直接印发给重庆市属一百二十六个单位五百二十三名党员负责干部，要人人看后表态，

赞成和基本赞成达五十八人。结果凡同意彭德怀同志意见者便定为“严重右倾”，甚至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重庆市民政局局长、老红军、原冀鲁豫军区组织部副部长王云程，因工作忙，连《意见书》都没看过，上面急着问他的态度，他告诉秘书说，既然是彭老总的意见，就告诉他们说我同意。就这样便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化大革命”后开大会为他平反，他在狂喜中突发脑溢血而死于平反大会上）。

因为萧风是中央派来的，并说来四川调查是机密，如果出了什么问题由中央对你们负责。所以我们就敞开来谈。当时集中谈的是四川死人问题。李止舟说，我们打倒蒋介石歼灭国民党军队八百万，但真正在战场上打死的不过一二百万，六百万以上是起义、投降、俘虏的。而在和平建设时期饿死上千万人，把“天府之国变成了地狱之乡”，真是“天下所稀闻，古今所未有也”。萧风听了我们反映的情况后，对四川问题概括了五个字：高、急、反、斗、死，即高指标、急要求、反右倾、斗干部、死官僚主义死不回头。萧风在重庆时曾给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写过一封信要我寄，我说交机要，他说不要交机要，交平信最保险。这封信写得很简单，李止舟和我都看过。信上说此间情况严重，比之安徽有过之而无不及，此间干部希望中央早日解决四川问题。他对“高急反斗死”，的“死”字专门注了一下，是死官僚主义。因为毛主席曾批评有些干部看到群众饿死无动于衷，是死官僚主义。实际上，省委主要领导人也并非不了解四川饿死人的实情。有一次他到重庆，李止舟负责接待他。他知道李止舟是荣经人，荣经饿死人多，便对李止舟说，我把你们县委书记抓起来了。完全嫁祸于下面的干部。

在与萧风、邓照明座谈中，我们还提了几条要求和建议：一是因为省委主要领导人中央欺骗封锁，希望他们能把四川的这些问题带回北京直接向中央反映。二是希望中央派检查团到四川进行全面检查。三是希望中央能够调换这位领导人的工作，调其他人来，要想靠他自己回头是不可能的。我最后说了一句话，希望中央以四川七千万人民为重，而不以一人为重，请中央早下决心。

8. 《人民日报》记者萧风保存了一份当年参加调查四川问题的调查报告底稿

萧风来重庆之前，曾在陕西找四川流亡在那里的人员了解过情况；后又在泸州与当地报社有关同志开过座谈会，最后才到重庆。8月5日他从重庆回北京后，向田家英简单汇报了四川情况。田家英听后说，情况很严重，要好好整理。萧风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写了一份一万九千字的调查报告——《四川情况》，连同四川同志对省委的意见、1961年四川省委下发文件内容摘要、四川农村情况（包括人口死亡）等附件，一并交给中央办公厅综合组组长何均，便再也没有下文。不久，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政治风向逆转，这个报告也就胎死腹中，交不上去了。随后，萧风即离开中央办公厅回到人民日报社工作。

四十年后的2002年下半年，通过一个很偶然的机，我与九十三岁高龄的萧风同志取得了联系。未曾想到，这位老人不仅身体健康，头脑清醒，更难得的是至今他还保存着当年那份调查报告（《四川情况》）的底稿，并复印了一份给我。说来，这份历史资料得以保存下来也颇具戏剧性。由于萧风以《人民日报》记者名义到过泸州，在被邀请与《泸州日报》编委会有关人员座谈时，有人提问：现在困难时期可不可以搞包产到户？萧风根据个人的认识与理解，认为不妨试一试。这条信息便立刻从泸州汇报到了四川省委。八届十中全会后，四川有关部门向《人民日报》揭发萧风，说他在四川散布包产到户的言论。当时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承担了责任，说是他派萧风到四川的，给予保护，没有追究。但萧风已不便在中央办公厅工作，只好仍旧调回人民日报社。这是萧风四川之行的一项个人“收获”。足见四川当年对内对外控制之严密，防御之坚固，反击之迅猛，出手之辛辣。想必萧风对之有了更切身的体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以陈伯达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萧风作为“走资派”靠边站，他检查、交代了到四川调查的详细经过，同时根据他进行调查了解的情况揭发了省委主要领导人在四川的某些作为，将《四川情况》的底稿交给了工作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将个人的检查交待材料退还本人，那份《四川情况》的底稿遂又回到萧

风手中。

萧风当年的调查报告开宗明义写道，四川的主要问题有四：一、非正常死亡；二、政策；三、干部；四、领导。现将这份调查报告的一些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1958年以来的四年中，四川的人口、粮食、征购、生猪、耕牛都是大幅度下降。

人口。1957年7300万人，一说是7175万人。1960年省委组织部批转各地编制时6200万人，再加上1961年、1962年春夏荒死亡数，以及生死相抵，共约减少1200多万人，减少17%左右。

粮食。1957年465亿斤，1961年260亿斤，减少40%。

征购。1955~1957年三年平均每年96亿斤。1961年65.5亿斤，约减少1/3。

外调。1954年以来平均每年38亿斤。1961年原计划12亿斤，后改为上调4亿斤。

口粮。1959年计划每人每天1斤。1961年后，规定贸易粮6两、4两（16两秤，下同），有600万人口的特别严重地区，每天只有2~3两。

生猪。1957年2500万头，1959年底3000万头，1960年底1700多万头，1962年7月1030万头，比1957年减少40%，比1959年减少约2/3。

耕牛。1957年515.5万头，1959年556.3万头，1961年469.5万头，1962年5月底452万头，比1957年减少12.3%，比1959年减少18.8%。过去每年出生小牛40多万头，近两年平均每年少生20多万头。

以上数字，除人口减少外，都是从省委历次的讲话、指示等文件中摘出的（按：萧风当年共查阅了四川省委下发的362份文件）。

一、非正常死亡问题。四川人民的非正常死亡问题，正式见诸省委1962年1月29日关于粮食评借评销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中说：全省大约还有25个县约1000万人口的地区，问题比较严重，尤其是其中约600万人口的地区，由于灾情特别严重，缺粮面很大，相当一部分群众最低的口粮没有保证，每

天只有二三两粮，甚至发生断粮。至于非正常死亡率的数字，据说“因为保密”，“因为讲了小资产阶级害怕”，各方面都不了解。四川的同志们反映，死人多的主要原因：一是高指标，大改耕作制度，造成大减产；二是高估产，大压口粮标准；三是执行政策“左”，扣得死，转得慢。

二、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问题。四川农村工作的政策，主要是死抱“左”的东西不丢。同志们说：四川的工作，不是听中央和主席的话，不是“稳”，而是抵抗中央和主席的指示，“上马迟，赶得猛”，出了毛病转得慢，不彻底，拖长了严重局面。有的同志用两句话概括说明这种严重局面：“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一）不执行毛主席党内通信的六条指示；（二）办公社急于平调，急于过渡；（三）坚持公社组织规模要大；（四）坚持以大队为基础；（五）食堂、自留地、生猪三不放；（六）全省开展“新三反”运动。

三、干部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情绪问题。四川工作中的第三个问题，是干部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情绪问题。有的同志说，目前干部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情绪很不正常。普遍反映是：“干部气不顺，群众心不定”。西南局一位负责同志（按：萧风此指于江震）说：干部气不顺是是非不清，群众心不定是政策不稳。有的同志说，这几年来党的民主生活不正常，大家不敢讲老实话，是由于不断反右倾、瞎批判、乱斗争的结果。不少干部不敢反映真实情况，不敢提出和领导同志不同的意见，不敢分是非。四川的运动不断，运动一来大撤干部，造成“干部气不顺”，造成目前干部思想上有三怕：怕右倾、怕资本主义、怕挨整。这几年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受到严重挫伤，情绪受到很大压抑。

四、省委的领导问题。四川工作的关键问题，据不少同志反映，是省委的领导问题。这一问题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领导班子；二是指导思想；三是领导作风。

关于领导班子问题。据今年扩大的省委工作会议期间所传达的省委意见说：“省委班子是全国最强的班子，全国都找不出的。像我们这样强的班子，工作中尚有些问题，全国可想而知。”省委主要领导在省委工作会议上讲：“这几年我们是团结起来犯错误”。有的同志说，团结起来犯错误是手法高明的反

映。省委堵嘴的时候讲团结，克服困难的时候讲斗争。对省委“班长”，省委书记李大章、廖志高都有意见，不敢讲。他们都怕被认为是“地方主义”，都怕被批判想取而代之。为什么有人怕会被认为“取而代之”呢？据说，1959年这位领导同志在批判、斗争重钢党委书记时说：“我并不怀疑你（想）取而代之，不必要对你打击报复。”从此，许多负责同志都怕省委主要领导会怀疑自己取而代之而受打击报复，虽有不同意见也不敢讲了。过去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怕挨整而不敢在四川工作。

关于指导思想的问题。普遍反映，是“左”比右好，越“左”越好，因而不断反右。一些同志的意见是：“几年来四川为什么会出如此大的问题呢？是与‘左’倾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省委某些负责同志的‘左’倾思想是有历史根源的。晋西北的思想看来并未解决，风行一时的‘左’比右好的理论和做法，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天府之国’也搞得民穷财尽了。”有的同志则说：“某些负责同志在晋绥就犯过的‘左’的错误，现在又带到四川来了。这几年搞的过火斗争，实际是以前错误的重犯。不执行中央指示，把‘天府之国’搞成‘地狱之国’，死这样多人！如果四川是个独立王国，那老早就亡国了。”

关于领导作风问题。省委的领导作风，据同志们反映是：对上分散对下集中；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上欺中央，下压群众；上推中央，下推各级；顺我者昌，违我者整。有的同志反映：省委负责同志说过，中央有好多东西，并未规定各地一定要执行。所以有些指示、决定，都是“可行可不行”。如中央要纠“左”，省委却布置反右，要各级都“落实到人”。有的同志说，在四川工作的同志是不能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的。如果反映，就要被批评是“告状”，就要挨整。有的同志说：“也许是四川‘雾重’，有人一手遮天。”扩大的省委工作会议以后，不少同志议论四川的工作问题和省委的检查。他们要求省委作全面、深刻、具体的检查。有的同志说，共产党员就应该有共产党员气魄，有错误就承认，我们党的伟大也正在这里。领导人不正视错误，对人民将会带来更大的损害。有的同志说，四川的问题与省委主要领导同志骄傲自满有关。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照理说应该更了解中央意图，成为贯彻执行中央政策的

模范。但事实恰恰相反，往往强调地方特殊性，修正中央政策。这是因为当了政治局委员，腰杆更硬一些，胆子也就更大一些，因此不那么谦虚谨慎了。

以上就是四十年前萧风受中央办公厅派遣，到四川进行独立调查后写出的原始报告底稿摘要，使用的材料来源主要是当年四川省委本身的文件，最能反映原汁原味。比较起四十年后我们来搜索枯肠，搜集资料，追忆往事更能说明问题。这四十年间我们从不通音讯，未谋一面，四十年后再读萧风同志对当年四川问题的看法，竟是如此相同，绝非偶然。

除萧风向中央办公厅写了调查报告外，中央组织部派出的干部到四川调查后也都分别写了调查报告。据我知道，邓照明回北京后就写了一万二千字的调查报告交中组部。田家英对这次调查很关注，所有的材料他都看过，并打算送请少奇同志看后再转毛主席，结果八届十中全会后风向变了，最后并未送到毛主席那里。“文化大革命”中，重庆造反派两派群众组织都有搞“萧李廖”问题的“专案组”。有个“专案组”在1967年去找过胡耀邦，胡耀邦讲过一些情况。他说，1962年中央派人到四川调查，反映了对省委主要领导人的不少意见，还提了一条建议是将他调离四川，派胡耀邦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胡耀邦还讲，当时彭真说死人的事已经过去，整个情况已经好转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所以这些调查材料没有送给毛主席。建议派胡耀邦来四川工作，是邓垦第一个向萧风提出来请他向中央反映的。当时我们都赞成，说这个办法好。因为我们都认为胡耀邦最讲实事求是，他能打开四川的局面。

以上发生在市委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前后的几件事，就是后来批判“萧李廖”进行“反党活动”的起因。

二、冤案的铸成——风云突变，祸起不测

1. 所谓“几个半勇敢分子”写给毛主席的匿名信被追查

1963年初我到北京参加团中央三届八中全会时，团中央常委、宣传部长黄天祥对我说，听中组部一位同志讲，廖伯康去年来团中央开会时把四川的盖子揭开了。我想中组部的人在团中央

都这么讲，很可能已传到省里去了。那时我隐隐约约感到可能要出事，有一定思想准备，认为几年内可能不让我到北京了。所以我离开北京时对一些友好说，五年之内我不会来北京了。以后的发展说明我想得真是太简单、太天真了。

将“萧李廖”定为进行右倾“反党活动”并给予严厉处分，是从追查于克书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开始的。于克书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中央办公厅收到后，管信访的同志直接送给了杨尚昆，尚昆同志看后认为写得好，便将此信批送在京政治局委员阅。送“在京政治局委员”，实际上是让在京政治局委员了解四川情况，同时避开了“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以保护写信的同志。但这封信最后还是通过其他渠道，被省委主要领导人得到。

省委这位主要领导人看了于克书写给毛主席的信大为震惊和恼怒，认为这封信写得有水平，不会是群众写的，也不是一般干部写的，是熟悉工作懂政策而且能抓住要害的领导干部写的，便下令有关部门追查写这封信的人。开始时，他认为在省委部长这个层次的干部中大概不会有人反对他，省长、副省长也不会反对他，要在副部长、厅局长当中去查写信的人。开始时曾怀疑过某些人，经过暗地查访都被一一否定了。

对这封信追查了一段时间没有结果，省委主要领导人又要限期查出。经过反复研究信的内容，有人就提醒说，这封信的两个例子是重庆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最后整理的综合简报上写的两个例子，连语句都一样。这时这位省委主要领导人才恍然大悟，问这个简报是谁整理的，说是廖伯康。这样便追到我的头上了，匿名告状信来源就这样初露端倪。为什么于克书那封信上举的例子和语句与我整理上报的那份综合简报都一样？这是因为于克书参加了市委十八次全委扩大会，也在党群小组，他在会上发言讲的是这两个例子，他给毛主席写信时也用了这两个例子，我整理简报时又用的是于克书的原话，所以完全对得起口。但当时并不知道信是于克书写的，因为于克书那封信的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而我整理简报时只反映了十八次全委会上发言的内容，并未写明是谁的发言。省委主要领导人正是由此断定这封信肯定与我有关。

2. 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国政治气候陡起变化

省委主要领导人追查于克书那封信，最初只是在上层内部掌握分析，还没有公开追查。真正追查到我们头上，是在1963年市委召开二十次全委扩大会议之前。我估计这位领导同志开始心里也不踏实，因当时有的地方死了几百人干部就被查处，四川死了那么多人，中央对他究竟是什么态度他也要再看看。但对这件事他一直没有放松。直到八届十中全会后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他认为时机已到，对己有利，才开始动手。

从全国的形势看，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近两年的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使得党内在严重困难面前已经存在的对形势估量和工作指导方针上存在的分歧也逐渐公开和发展起来。1962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财贸等方面的工作，包括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问题。但会议一开始，毛主席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要大家讨论。这个题目随后也就成了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在北戴河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发表了多次讲话。他将当时党内外一些干部群众要求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倾斗争扩大化错误，以及提出的一些合乎实际的正确意见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他说：现在有些人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认为社会主义不行，只能单干。他批评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的要求，甚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他还说近来刮平反之风不对，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这样，省委那位主要领导人便把重庆市委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上一些同志的发言同毛主席这时要批判的倾向挂起钩来。

八届十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1963年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主席在会上总结湖南、河北等地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并决定在农村进行以“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

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四清”和“五反”在当时被视为是国内反修防修、挖修正主义根子的一个重大战略措施。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省委主要领导人抓住机会，通过市委第二十次全委扩大会公开对我们动手了。毛主席说过，有些人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摸不得偏要摸。毛主席可以这样说，也可以这样做。而位居其下者却很难以身试之，搞不好老虎会吃人的。于克书的一封匿名通天信，便成为引发“萧李廖事件”的导火线。

3.在市委二十次全委扩大会议上萧、李、廖等成为被批判的重点

市委二十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前，已有某些迹象表明要出事了。那时我们早晨在市委一号楼前学打太极拳，体委的一位老师来教，参加者有辛易之、邓垦、李止舟和我。邓垦原来就会打太极拳，而且打得很好，他也跟着老师同我们一道打。大约是1963年3月底，鲁大东、辛易之参加省委扩大会议，布置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辛易之从省里回来突然说我们不要打太极拳了，早上就不要再碰面了。李止舟有经验，他说看来省里开了什么会，可能要出什么事，并给我打招呼说，书记不找我们，我们不主动去找书记了。那时我一方面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方面又自我宽慰说：我们又没有做见不得人的事！

由于于克书信上举的两个例子是巴县的例子，所以开始时市委还没有最后断定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究竟是我写的还是萧泽宽写的。会前，辛易之找李止舟谈话说，我们重庆做了一件很对不起省委，对不起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的事情。大家对省委有点意见，有点情绪是很自然的，是否有人给中央反映了，给中央写了信啊？等等。总之是旁敲侧击点这件事。李止舟是听懂了，便说大家对省委是有意见，就是十八次全委扩大会上谈的那些，但肯定没给中央写信，而且据他所知，萧泽宽也没有写过信。辛易之找李止舟谈话后，便把李止舟和萧泽宽撇开了，断定是我廖伯康搞的。

辛易之找李止舟谈话后，并没有找我谈话查证核实问题，因为这时市委通过另外两条渠道也完全掌握了内情。一是团市委有同志揭发了我与萧泽宽、李止舟在团市委如何议论省委和省委主

要领导人的有关言论，以及于克书可能给毛主席写信的情况。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有同志起来揭发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团是党的助手，要听党的话，当然要同我们划清界限。二是通过廖永祥也了解了所有情况。廖永祥原是新华社重庆分社社长，1963年已调成都任四川分社社长。由于萧风来重庆先找廖永祥，廖永祥带萧风找李止舟和我，还找了邓垦。萧风来四川这件事被省委抓住了，廖永祥只得把整个情况如实交代。萧风来重庆又关系到我向杨尚昆汇报情况，这是“萧李廖事件”中最关键的一件事，“罪魁祸首”是我。所以后来省委主要领导人说，萧泽宽这个人老实忠厚，他是跟着李止舟跑的；李止舟是摇鹅毛扇的军师，拿主意的是他；最坏的是廖伯康，三件事（指于克书给毛主席写信，直接向杨尚昆汇报，将市委十八次全委扩大会上所提意见汇集起来写成简报力图上报中央）都牵涉他。应该说，这个分析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不仅三件事牵涉我，而且萧风和邓照明先后来重庆调查时，我也参加了全过程。

1963年4月23日~5月8日，市委召开第二十次全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公开说是传达省委工作会议精神，讨论如何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委关于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的指示，检查重庆市一年来的工作。李止舟和我是办公厅正、副主任，但有关这次会议的一切工作，市委都不再找我们参与筹备和研究了。很显然，这次全委扩大会议的真正重头戏，是根据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指示解决“萧李廖”问题。

第二十次全委扩大会议一开始，任白戈在报告中便宣布这次会议要根据省委提出的“三个原则”，即阶级原则、党的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认真清理和检查在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澄清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以来少数同志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是非，要求大家“洗澡”、“下楼”，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团结对敌。事隔不过一年零两个月，在市委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上开始出现的有点生动活泼的气象，至此已荡然无存。当时，每遇形势困难或出于某种需要，就发扬一点民主，给予一点宽松；一旦形势好转或出于另一种需要，便秋后算账，翻脸无情，动手整人。这已成了那时政治运动的一种规律。

因为规定要按照“三个原则”检查在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原来的发言多少都有点“问题”，因此几乎人人都会在会上作了检讨。绝大多数同志通过检讨都“下楼”了，萧泽宽、李止舟和我，邓垦、马力，以及市委党校党委书记、副校长余时亮等分别成为各小组被批判的重点。于克书由于到成都参加省团代表大会，没有参加会议的开始阶段，但他一回到重庆就在小组作了检讨，会议单独对他的检讨发了一期简报，只是他还没有交代给毛主席写信的事。马力的主要问题，是说他否定反右倾斗争的成绩，对省、市委领导不满，夸大工作中的困难，忽视阶级斗争。余时亮的主要问题，是说他在市委组织十七级（相当处级）以上党员干部集中到党校传达学习中央七千人大会文件时，背离市委指示，秉承萧泽宽的旨意，组织大家鸣放，散布攻击省、市委的言论。在没有辩护权利的严厉批判中，余时亮曾以自杀来抗争，获救未死。

经过对各小组重点人物的揭发批判，整个会议的重点便逐步集中到萧泽宽、邓垦、李止舟和我四个人身上。批判我们在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期间背离市委集体领导，刮起了一股攻击省委、市委领导的歪风，对省委和市委造成很大的冲击。揭发我们四个人的主要问题：一是夸大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把省委描绘成一个违反中央政策指示和严重脱离群众的省委，否定省委的正确领导；二是积极收集省委指示中一些具体规定与中央原则指示不一致的地方，作为向省委进攻的弹药；三是在全委会和小组会上，挑起四川是否有路线错误的争论，使人感到省委犯了路线性错误，诋毁省委，涣散斗志；四是扭住死人问题和反右倾斗争不放，提出这几年究竟是应纠“左”还是应反右的问题，攻击省委以反右倾为纲，把两条战线的斗争变成了一条战线。说我们为犯错误的人翻案叫屈，主张为千百个邓自力、安以文恢复名誉。还说我们把好的说成坏的，把正确的说成错误的，把省委向中央和外省上调粮食这种识大体、顾大局的崇高风格，说成是不顾群众死活打肿脸充胖子，是慷群众之慨，把自己装扮成群众利益的真正代表者。会上揭发批判邓垦在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期间的言论，说他攻击“省委犯了几年‘左’，反了几年右，制定的战略

任务和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都与往常不同，责问四川有无路线错误？四川盖子是否揭开了？要求中央派工作组检查四川工作，揭开省委的盖子”等等。还批判我们以反对盲目服从为借口，反对市委执行省委指示。

我在十八次全委扩大会党群小组的发言也从档案中摘录打印出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说“中央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提到过去存在高估产、高指标、高征购和不适当的大办等问题，自然会受到群众的抵制，而我们往往粗暴对待，动辄提到阶级、路线上来批判斗争”。

第二，我讲“过去市里什么都搞群众运动，大运动套小运动，胡子眉毛一把抓，中心不突出，形成虚假浮夸”。

第三，我提出“四川工作上的严重问题究竟是来自‘左’还是来自右？现在是谈右变色，谈‘左’泰然。本来是‘左’的问题，省市不但不纠正，反而把抱怀疑或进行抵制的人打成右倾，把事情搞颠倒了，把一些关系搞乱了，生产乱、生活乱、社会秩序乱，尤其是党内生活乱”。

这三点从字面上看，即便是在当时，分量也不是很重，而为什么最为要害的实质问题，即我们向中央反映情况的问题，在这里反而只字未提呢？因为这实在说不出口，拿不出手，究竟还是共产党嘛！总不能把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公然说成是叛逆，总不能完全不顾及自己的一点脸面。但是这丝毫不影响领导心里的底线和出手的力度。因为很久以来，一些人心里想的和口头说的、笔下写的、实际做的已经不一样了，总要找一些冠冕堂皇的道理来掩饰问题的本质。

会上，要我按以上三个方面作检查，要大家按此进行批判。在当时，从政治上讲，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理论已为全党接受。我们原来以为省委主要领导人违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中央政策造成了严重后果，所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出意见。现在则是毛主席又发了话，说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是阶级斗争的新表现。省委主要领导人把它挂在我们头上，认定我们是“三风”代表人物。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

从组织上讲，上级领导决定要批判的人几乎从来没有敢于对抗的先例。什么宪法精神，什么党章原则，什么公民、党员的基本权利，早已被抛向九霄云外去了。我只有按照领导规定的调子认错检讨，甚至连按照七千人大会要求清理过去不恰当的口号，以及在十八次全委扩大会期间将小组简报印发各小组传阅和我综合各小组对省委所提意见整理的综合简报等都作了检讨。可是多次检讨都通不过。聊以自慰的是，我的检讨可以反复多次，可以自我上纲，但我从不说假话，不攀扯别人推卸自己。后来任白戈在常委会上说：他们（萧李廖）在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搞了“逼宫”，搞了“宫廷政变”，在政治上、组织上犯了严重错误，脱离了市委的轨道，使市委的正确领导产生动摇。提到这样高度，我无论怎样检查，理所当然的是过不了关的。其实市委领导也明白，我们对市委并没有什么大的意见，只不过认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对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某些重大错误抵制不够，补救不力。其所以说我们是“逼宫”，也是为了表明市委与省委保持一致，表明市委清白。二十次全委扩大会后，任白戈曾对李止舟说：“你们做了件对不起省委主要领导人的事，给市委惹了大乱子，得罪了省委。其他什么问题都可以原谅，这件事（即向中央派来的干部反映四川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原谅。”所以市委领导一再强调我们做了“对不起省委、对不起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的事”。这也可以理解，不然市委几位领导人自己也保不住，他们应该比我们更了解这位四川主要领导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84年，时任四川省政协主席的任白戈同志，在整党对照检查时说：50年代搞“左”的一套，我是有一份责任的。重庆划了那么多右派，我感到内疚。还有个“萧李廖”，虽然没有戴帽，但是弄下去了。七千人大会后，萧、李、廖及邓垦发言激昂，说“三面红旗”都错了。有人给中央写了匿名信，反映四川的问题，结果一查，查到了廖伯康。邓垦检查了就算了，对萧、李、廖三个人省里要批判。我认为他们三人按职务应排为萧、李、廖，省委主要领导人坚持要按廖、李、萧的顺序排。后来见报时排的次序是萧、李、廖。为此，省委主要领导人狠狠发了我的脾气，说我怎么不听话？

二十年后白戈同志的这段发言，说明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据我的了解和推测，不论是省委还是市委领导层当时在某些问题上的看法也不完全统一。例如，前面讲到过的市委书记孙先余对省委主要领导人“左”的做法是不满意的。又如市委常委、监委书记廖苏华，市委常委段大明，市委委员宋学武在我们的问题上都一言未发。廖苏华在讨论我们这个案子的个别场合就说过，在党的会议上的发言，即使是错误的也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否则今后谁还敢在党的会议上讲话？再如市委书记辛易之，他是主持处理“萧李廖”案子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似乎也有某些保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1962年我到团中央开会时，直接听了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团中央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的讲话。他说：在现在困难的情况下，生产关系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就在这次讲话中，他引用刘伯承同志的话说：“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比如说，要尽量保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回到重庆后，辛易之问我北京方面有什么消息，我就把小平的这番讲话内容对他讲了。不久，就接到团中央通知，小平讲话内容绝对不准对任何人泄露。原来在小平同志这次讲话后不久，毛主席有个谈话提出，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小平的讲话显然与毛主席的谈话精神不符。小平同志便立即通知团中央收回他的讲话记录稿，并叫立即通知已听过他讲话内容的人绝对不准外漏，但这时我已告诉了辛易之。在批判我时，辛易之没有提这件事，没有追究我传播“单干言论”的问题，否则更得罪加一等。我想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保护和宽容。辛易之长时间领导农业和财贸工作，长年累月深入农业第一线，比较了解情况，懂得群众疾苦，想了一些办法来缓解当时的困难。但是他无论是在领导农村工作还是在处理

“萧李廖”问题上，却不能不执行上级指示，即使是明显错误的。这是那个时代的烙印，我们都避不开（如反右倾斗争时，我也主持过批判安以文同志的会议）。他当时为什么不追查我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但在我已是受惠不浅了。后来听说，在省委其他领导同志中，对“萧李廖”问题有的不过问，有的不表态，反正“是省委主要领导人直接抓的”，在四川谁能扭得过他呢？

市委二十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所揭露批判的各种问题，都被归结为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都同当时开展的阶级斗争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

4.对几个人的分别处理

市委二十次全委扩大会议结束时，认为马力和邓垦“基本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其实当时邓垦的态度最“顽固”，根本没作什么检讨。马力也是消极应付）。萧、李、廖三人的态度一直不老实，始终不向党交心。宣布萧泽宽、李止舟和我三人停职检查，放到所在部门继续揭发批判，并调宣传部副部长王若主持办公厅工作。我在办公厅多次检查，接受批判，后又到团市委“下楼”检查。团市委召开中层以上干部会议，同“萧李廖”划清界限，市委一位负责同志到会发动大家揭发我的问题，并说：“你们是跟着市委走，还是跟着廖伯康走？是要党的领导，还是要廖伯康的领导？”我在团市委作“下楼”检查时，仍然由于克书主持。后来，市委领导集体找他谈话点他的问题说，老子，你不要演戏了。于克书只得将他给毛主席写信的事作了交代。团市委副部长以上干部也都要“下楼”，挖地三尺，人人过关，清除“萧李廖”的影响。当时我无论怎样检查都不可能过关。给我们定的罪名是：“在1962年正当我国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国内外阶级敌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猖狂进攻的时候，萧李廖等人在市委十八次扩大会议前后，利用困难和党总结经验的机会，恶毒攻击党的领导，攻击三面红旗，攻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大刮单干风和翻案风。”这就是当时为我们几个人定的性，实际上是个反党集团的性质。落脚到我个人头上则是犯了“反对党的方针政策、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党的组织纪律”的“严重错误，给予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的处分，下放建筑工地劳动。李止舟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井口第二机制砖瓦厂做副厂长。萧泽宽和邓垦则被调离工作单位，分别派到农村整风整社工作团，名义上是副团长，实际上是带着“问题”在工作中改造，并受到监视。这个处分决定也是省委主要领导人交代的，他说廖伯康要从重处分，其次是李止舟，萧泽宽可以轻一点。接着领导下令李止舟和我的家搬出机关宿舍，迁住居民房，李止舟之妻赵济和我的妻子罗楨也受到牵连被下放到基层。赵济虽已被选为共青团“九大”代表，也不准她去出席了。随后，团市委副书记王竹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基层，工资级别由十六级降为十八级。于克书和赵济被免除团市委副书记职务降职另调工作。那时对他们虽然名义上没有定为“萧李廖”反党集团成员，但不言而喻是按反党集团成员处理的。团市委五个书记撤换了四个，实际上进行了改组。

这里我要着重介绍一下在“萧李廖事件”中受到严重处分的团市委副书记王竹。我们虽受了处分但还没有降级（本来市委决定将李止舟由十级降为十一级；我由十三级降为十五级。但上报省委一直未得到批复），而王竹却被降了两级（市委批准了就执行），降职调为市水上运输公司副经理。“文化大革命”中又将他抛出来，被造反派关水牢，灌粪便，捆绑吊打，受到更残酷迫害。这是为什么呢？当时有关部门整理了一份《关于王竹同志错误的调查报告》。下面，我摘录这份材料所记载的主要内容，即处分他的两条主要依据。

一、反对党的领导，攻击党的总路线

1961年6月，在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组织团市委副书记以上干部鸣放近几年党在工作中的问题。在鸣放中，有的否定“大跃进”的成绩，有的主张包产到户。王竹同志不仅没有引导同志们回到正确立场上来，反而不断打气。当有的同志说“大跃进”搞得太多时，他说：三年置人民死活于不顾来搞“大跃进”，这是错误的。当有同志说“五风”破坏生产力时，他插话说：走得很远，整得很惨。最后他在会上很激动地总结说：这几年粗暴地违反了客观规律，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并作

了六条结论：（一）违反了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规律。说我们党千方百计消灭个人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把生活资料所有制和生产资料所有制混同了起来。（二）违反了高速度、按比例规律。不尊重法则，靠剥夺农民来搞积累。（三）在民主与专政问题上，说党听不得反面意见。在对犯错误干部的处理上，内容和方法都有问题。不给别人说话不行，应该有广开言路的渠道。（四）在党的建设经验问题上，说党不虚心，不学别人，认为自己唯一正确。（五）在群众路线问题上，说党违背了一切通过群众的观点、关心群众的观点。（六）说我们党不尊重规律，不尊重辩证法，企图改造、创造规律，有些被胜利冲昏头脑。

1962年5月，在团市委机关的一次学习中有的同志说“总路线不像路线，像口号，人民公社是空架子”。有的同志提出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错误是不是路线错误？王竹最后归纳说：“不是路线问题，但实质是‘左’的错误。”同时，他又把这几年的错误与1931~1935年的“左”倾错误相提并论。他手中拿着《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我们1931~1935年的错误到1945年才作结论，我们这几年的错误，以后九大会作结论。”

在研究工作中，当汇报一些单位工作中的缺点时，王竹经常借机发泄自己的反党观点。如一次说：“这些人还不接受教训，搞得不好要翻船。”一次说：“解放前，我们反国民党的饥饿，现在人民生活很困难，如果不好好工作，搞得不好，别人也会反我们的饥饿。”一次说：“要注意无产阶级专政的阴暗面。”还说：“户口、票证都卡在我们手上，我们不注意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比国民党法西斯专政还要厉害。”等

二、否定和攻击省、市委领导

攻击省委：（一）1962年对团中央一位干部说：“四川死了很多人，问题很大，这个情况中央是否知道？”还说，“四川需要小平同志来坐镇，才能揭开盖子，解决问题。”（二）攻击省委犯了“左”的错误。说，四川的问题不是反右，而是纠“左”。八届十中全会后又说：“我们四川只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不行，还要贯彻中央扩大会议（按即七千人大会）精神，不然的话，又要破坏生产力。”（三）对省委负责同志进行攻

击。当他听说省委主要负责人在长寿发脾气时说：“不能用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来解决问题。”当有人议论都江堰受损失时，王竹说：“都江堰兴于李冰父子，现在省委领导把它搞坏了。”还攻击省委有的负责同志特殊化。

攻击市委：1961年，王竹到团中央开会，到处打听其他城市的蔬菜供应、生活状况、口粮标准、城市体制、商业网点、养猪等情况。他甚至在打听了全国十二个大城市生活水平后，分类排队，擅自将重庆列为第三类。说：“重庆生活最困难，蔬菜价格最高，口粮标准最低。”他还说：“有些红色官员坐在小汽车里，不了解这些疾苦。只有坐公共汽车，才能听到群众的呼声。”

以上摘录的许多观点和言论，现在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当年却是王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是他挨整的原因。其实，他讲的只不过是一点实情，是最普通、最平常的常识性道理。他凭着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不媚上不跟风不趋时，侠肝义胆，碧血丹心，直面实际，冷对权势，敢言人之不敢言，虽九死一生而不改初衷，风骨依旧。这不正是我们党一贯提倡的共产党人最可宝贵的品格吗？

市委二十次全委扩大会后，我们对强加予我们的罪名始终不服。作为共产党员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和意见，以及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批评和建议，完全是党章规定的党员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完全符合党内民主生活准则。不正是因为党的工作出了问题，发生了困难，才号召大家提意见和建议吗？怎么可以说是破坏党的组织纪律、乘机向党进攻？我们向中央派来的干部反映情况时，中央说了要保护我们，怎么连中央的话也不作数了呢？所以我曾两次给胡耀邦写信，要求调动工作，但均未见回音，后来才知道他也被反右倾，正在作检查。萧泽宽给中组部长安子文及邓照明、邓垦给杨尚昆、李止舟给中联部副部长李初梨也分别写过信，反映情况，要求调动工作。中央有关部门知道情况后采取过一些保护措施。尚昆同志和中组部长安子文同志曾分别几次向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通报了情况，打招呼说，你们不要追查了，是中央找他们反映情况的，是中央派人到四川来调查的，再

追查就追到中央头上了！但省委主要领导人对此毫不理会。后来我想，这不仅是他自恃是一方诸侯，位高权重，特别跋扈，更主要的，恐怕是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已经感觉到中央当时的主流倾向是喜“左”恶“右”。这也与他一贯的思想作风特别合拍，因而才敢于有恃无恐，放手整人。李止舟下放到第二机制砖瓦厂以后，为解决厂里试制页岩砖的设备问题出差北京，去看望老首长、农机部长陈正人。这时陈正人已经看出了苗头，他对李止舟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这件事不要急，也不要再说了。你现在要老老实实在砖瓦厂把页岩砖的生产研究好。”李初梨给李止舟回信也要他“善处难局”。

中央见省委不听招呼，便打算把我们分别调离四川。邓垦挨批判的事小平同志知道后，打电话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说，我这个老弟是个大自由主义者，经常敞开嘴巴乱说，他在重庆还会乱说，把他调走算了。因为小平同志说了话，邓垦被平调到武汉市任副市长。中央组织部将萧泽宽调中侨办任政治部副主任。李止舟也准备调离重庆。当时的中联部副部长李初梨，在东北解放初期任吉林省委秘书长，李止舟是秘书处长，是老上下级关系，互相很熟。所以中联部准备调李止舟。当时准备调我到已任高教部政治部主任的曾德林那里去。萧泽宽调北京的事拖了近两年才成行。中联部调李止舟时，省委那位主要领导人说李止舟是要准备开除党籍的人，中联部怎么还要他？结果中联部只好作罢，我的调动也就无从说起了。那时，省委这位领导人确实很厉害，他可以不听中央一再招呼，并将中央有关部门顶回去，理由就是根据毛主席这时提出的理论和路线方针，认为我们是在四川刮“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的代表，是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代表。可是事情也很奇怪，实际上把我们处分或处理了，但西南局和省委却始终不下批文，就这样把我们挂着。直到后来给我们甄别时，有的领导同志说你们的案子省委没批啊！确实也没有见到省委对我们进行处分的批文，市委是按省委主要领导人的口头指示办的，可是他就是不作正式书面批示，这确实是“领导艺术”的高明之处。因为处分决定没有批复，所以后来便说我们“无反可平”。我们说问题在于实际上执行了处分

没有？我在建筑工地劳动几年，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这算不算执行了处分？

后来知道，当年批判斗争我们时，中央给省委打招呼无效，最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野苹给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打电话。他们是老战友，陈野苹是廖志高的入党介绍人，能够互相讲真话。廖志高说，“萧李廖”问题是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直接抓的，具体情况他也不清楚。陈野苹说，这件事中央在过问，你作为省委书记不能不管。于是廖志高要重庆市监委送去处分决定。廖志高一看，我们的所谓反党活动，一是反对党的方针政策，即对省委出台的某些政策规定有意见；二是反对党的领导，实质是针对省委主要领导人的；三是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就是未通过市委、省委直接向中央反映四川的情况和问题。廖志高看后说，怎么能这样写处分决定？这样写把省委都牵进去了。于是要重庆市委重新写处分决定。重庆市监委要市委办公厅写，办公厅说原来的处分决定是你们写的，要改只能由你们来改。就这样在市监委和市委办公厅之间推来推去而被搁置下来了。

1962年我在尚昆同志那里汇报了三个多小时，却被整了二十年，这个话后来我向尚昆同志谈过。我们还谈到过一件事：“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关押在重庆干部集训队的后期，从北京来了几个人，要我交待和杨尚昆的关系。北京和重庆各有一个组同时分别审讯杨尚昆和我，并每天通过电话交换情况。当时我们谈的都是实话，没有空子可钻。我们说只有实事求是讲真话才经得起历史考验，由此尚昆同志和我取得了彼此信任而成为忘年之交。1987年尚昆同志到重庆，参加重庆“三三一”惨案暨杨闇公烈士（尚昆同志的四哥）牺牲六十周年纪念。那年他刚好八十岁，临走之前请他吃饭，饭后上了一个果盘，里面有一个用白糖塑的寿星头。寿星脑壳的额头是凸的，叫“奔头”。尚昆同志问我寿星脑壳为什么会是“奔头”？我说不知道。他让我想一想看！我说这个问题我怎么能想得出来啊！尚昆同志说，人老了摔跤摔多了就摔成“奔头”了。这时尚昆同志的儿子绍明听到后立即走到我面前，举起一杯酒对我说，廖叔叔，听说你也摔过一个跟头，我敬你一杯酒！我说，这杯酒你不能敬我，你敬你爸爸。我对尚昆

同志说：“大跃进”时期提出一天等于二十年，我比“大跃进”还要“大跃进”，我当年只向你汇报了三个多小时却挨整了二十年。尚昆同志说，好！好！好！我们三个人干了这杯酒。我与耀邦同志、尚昆同志接触，从来没有压抑感，没有职务高低的心理距离，可以敞开心扉畅所欲言，谈长谈短都行，互相信任，不说“官话”，非常随便，也很亲切。从他们身上可以深切感受到我们党内的优良传统作风。

5. 在监管中劳动改造

1963年5月，我被下放到重庆市第一建筑公司101工区劳动，住在工地的工棚里，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先从土石方工干起，开始时每天累得肩背疼痛，直不起腰。工人们都很关照我，当两人抬一筐土时，他们总会把筐绳尽量往自己那头移；我挑土时也有意给我少装。他们还一再关照说别闪了腰，造成残疾是一辈子的事。看到我汗流浹背又不断地喝水，便告诉我喝水越多流汗越多，身体就越虚，越难搞重活。教我泡一杯浓茶，口干时含一小口，多分泌些唾液，既解渴又少出汗。同工人生活在一起，从他们对我的种种关怀中，我切身体会到工人們的淳朴、善良和真诚的同情心。

建筑工地的木工、钢筋工、起重工等工种我都干过。而干的时间最长的还是混凝土工。那时的混凝土是人工搅拌，将水泥、河沙、卵石与水混合，由两个人相对而站，弯着腰用铁铲轮流一铲一铲地搅拌。这是建筑工地上仅次于抬工的最重的体力劳动。经过长时间的磨炼，我终于成为一名合格的混凝土工人。我能将五十公斤重的一袋水泥夹在腋窝下搬运。有一次我和一位工人师傅抬四袋水泥（二百公斤）横穿马路，可怎么也跨不上十六厘米高的台阶上人行道，大概我的体力最高承受极限就是抬二百公斤了。那时小组工作实行计件，由于我努力工作，劳动积极，给我所在小组增加了收入，奖金也多了，我是一文不分，颇受欢迎。每月评先进时，大家都评我为先进。我对工人同志们说，不要评了吧，评了也不作数。但小组还是月月评我为先进，当然月月上报后都不会批准。我在炎夏的烈日下干重活，皮肤晒得油黑油黑的，雨水打在身上都不沾，肌肉也锻炼得结结实实。直到现在我

已年近八十，身体还比较壮实，或许要感谢这几年的强迫劳动锻炼。

有一次我随几位工人到潘家坪招待所浇筑做葡萄架的水泥柱，碰见于江震的秘书何锦沐，知道于江震住在那里。解放初，于江震任西南局组织部副部长兼青年团西南工委书记，是老上级。我对何锦沐说，希望见见江震同志。经何锦沐通报后我去到江震同志住处。于江震同志对我说，劳动锻炼对身体有好处，现在只是看不到文件了，其实文件上的东西从报纸上基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我当时的处境下，江震同志没有回避同我见面，还给我以亲切的鼓励。这是一种雪中送炭，令我终身难忘。

1965年后，不知是什么原因又调我到工区当干部，在监督下工作。我心想这是不是与于江震同志打了招呼有关呢？不过，我这个干部也不同于其他干部，在政治待遇上还有严格区别。比如，市委书记李唐彬去世，通知工区干部都前去掉念，却不让我去。工区举办干部“四清”运动学习班，我这个“定了性”的干部也不能参加，叫我留下来抓日常工作。我说我不懂技术，要求留下一个搞技术的干部。那时，省里提出城市居民房也搞“干打垒”简易住房，重庆建委要建筑一公司101工区试点，我和一位姓李的技术员便领受具体实施修建“干打垒”住房的试点任务。当时规定“干打垒”房每平方造价不得超过三十五元，层高由一般的二米八降为二米七六，室内外都不勾缝，不粉刷。在建房过程中，我也初步学到一些建筑方面的知识。一般建房是按图施工，我则边建边将图纸与房子对照研究，从而也学会了识图。当我们建成了第一幢城市“干打垒”的“样板房”后，省委书记廖志高、西南局建委主任程子华，还有彭总（彭德怀时任西南局建委副主任）都先后来视察过。廖志高来时有人指着我对他说：“那就是萧李廖中的廖伯康。”廖志高已经走出了门又回头看了我一眼。这以后，凡有领导来参观“样板房”就再也不要我在场了。在工区当干部这段时间，我仍在工棚和工人吃住在一起，同工区的工人干部相处都很好，还能每个礼拜和家人见一次面。

周末的相聚，是我和罗楨一周的盼望。曾经历过相当长时间不明我下落而终日恐惧的罗楨，现在能定时见到我，这样的日

子，她很满足了。罗楨想，说不定我会被送去劳改，如有那一天，她将随我同去，一家人都去。不过当年如我真的被送去劳改，恐怕她的心愿也是无法实现的奢望。盼望了六天的周末相聚，在前途渺茫难测的无奈中得过且过吧，谁知哪天又会被隔离！我们都更加珍惜相聚的时光。罗楨写道：

壮志难遂志难移，离时苦久聚时稀。

今宵夜静杯中酒，国忧家愁孰与知？

这一段时间似乎过得很平静，其实这是暴风雨到来之前的平静。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风暴正在孕育之中，只是我们被隔绝在政治死角里无法感觉到。

三、雪上又加霜——“文化大革命”升级，投诉无门

1. “文化大革命”初期升级为“反党黑帮”

1966年，正当我国刚刚完成调整经济任务、克服了国民经济中的严重困难、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当年5月4~26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一、揭批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撤销了他们的职务。二、通过了由康生、陈伯达起草，经毛泽东主持几次修改（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批判和撤销了原经中央批准的关于文化革命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并成立了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和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新的“文革小组”。《五一六通知》背离马克思主义原理，严重脱离实际，颠倒是非，混淆敌我，把长期以来存在“左”倾错误推向极致。在这些系统的错误观点指导下，“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造成了十年浩劫，陷党和国家于空前的劫难。

在这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之时，西南局和省市委领导心中无数，十分被动，便按照传统方式，抛出一些领导认为有问题的人来应

对。西南局在发出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决定》中提出：“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和重庆市要在报上点名批判一二个影响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每个大学也要批判两三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随着政治温度的上升，在报上点名批判的人远不止一两个、两三个。在成都首先抛出来的是马识途（曾任地下党川康特委副书记，时任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地下党老同志，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党组书记）、沙汀（大革命时期的老同志，著名作家，时任省文联主席）和张黎群（抗战时期南方局的老同志，前中国青年报社社长、总编，时任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以及其他一些同志。前面几位都是大文人，爱写文章，发议论，因文贾祸，因言贾祸。实际上他们因为对“左”倾错误和作风不满，早就受到排斥打击，“文化大革命”初，省委主要领导人把他们抛出来也是事所必然。在重庆则是将已经被打倒的“萧李廖”抛出来再踏上一只脚，还有重庆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郑思群，以及另外一些同志。郑思群是一位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三度留学日本，抗战军兴投笔从戎。1942年在冀鲁豫军区任抗大分校、陆军中学政委时，在一次反“扫荡”中，部队被敌人包围，他亲自带领一支小分队坚守阵地，掩护大部队转移脱险。待到弹尽粮绝身边只剩几个战士时，他命令战士分别突围，自己用最后一颗子弹慨然自尽。敌人围上来后又补了三枪，但他却身中四枪未死，居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在根据地老百姓的救护下得以生还。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他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和里通“苏修”的罪名被抛出来，悲愤至极，自杀身亡。二十多年前的壮烈一幕再次展现。前一次没有死，这一次真死了。前一次面对的是敌人，这一次面对的是“左”倾错误，是专整自己人的“左”倾运动。

“萧李廖”被抛出来要稍早于郑思群。我们这次是挂在张黎群的“黑线”上硬拉上去的。其实我们与张黎群在《重庆日报》开辟《巴山漫话》专栏、发表杂文一事没有丝毫关系，而张的杂文善意、深刻，鞭辟入里，受到读者欢迎。但那个时候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呢？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们的处境更是每况愈

下。起初，运动还在党委领导下开展的时候，我们被公开抛出来升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一月夺权”后，我们又落入“新生的红色政权”之手。前前后后加给我们的罪名，戴给我们的帽子，批斗我们的手法一脉相承，如出一辙。只不过后者不再提“反对省委领导”，却又把我们同杨尚昆“黑线”挂上了钩。

《五一六通知》下达不久，为了准备把我们抛出来，我被从石坪桥101工区转移到歌乐山巴蜀中学战备校舍工地，并叫我多带钱粮和衣物。那时正是夏初，我有意试探地问：秋冬衣服带不带？回答说，能带的都带上。我一下意识到将被长时间软禁隔离了。我又问怎么去法？他们说，市委办公厅和团市委各派一人，用车子送去。我感到如此规格押送去歌乐山，前途难测。在家里和罗桢收拾衣物时我想：今后能不能再回这个家？能否再和家人见面？一切都是未知数。罗桢似乎并未觉察到这么严重，我也不便向她说，以免增加她的思想负担。此时此刻，虽在暑天，我却真有点风萧萧兮嘉陵寒的滋味。

在歌乐山工地隔离劳动中，市委办公厅和团市委的两个监管人员不断向我提问，要我表态。我心想他们是在搜集我的材料为批斗作准备，因此也十分警惕，谨言慎语。如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监管人员拿给我看后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平静地回答：“只要是牛鬼蛇神就应当扫嘛！”歌乐山工地办公室设在一座有围墙的砖木结构小院。一天下午，我偶然路过小院，听到里面监管人员正打电话向市委汇报我的情况。一墙之隔，我听得清，他们却看不到我，不知隔墙有耳！于是我每天下午准时去到那里，伫立墙外，洗耳恭听监管人员的汇报和下一步的对策。他们那里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棒，我就顺水推舟，随机应对。在那风雨如晦、乌云压顶、大祸临头之际，我突然明白恐惧来源于不明底细。当底细都明白了，就像观赏一场事先看过脚本的惊险演出，晓得将有几场几景，我这个当事者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观众”，心里踏实，也就不那么惊恐了。

1966年6月13日，《重庆日报》发表《戳穿〈巴山漫话〉的黑幕，挖掉张黎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长文，公开把我们

抛了出来。文章说：“《重庆日报》的《巴山漫话》，不是张黎群一人搞的，而是和市委前组织部长萧泽宽、前副秘书长李止舟、前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廖伯康等人共同出谋划策、合伙经营的，而廖伯康则是直接为张黎群搜集材料、转送稿件的一个大帮手。”“廖伯康等人到处煽风点火，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攻击三面红旗，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积极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煽动牛鬼蛇神向党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气焰十分嚣张。”文章号召，要“穷追猛打，深入揭发和清算这伙黑帮的反党罪恶活动，彻底挖掉张黎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为了彻底挖掉张黎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6月底，市委又分别编印了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高兰戈、余时亮、赵济、雷勃（《重庆日报》总编辑）等一批人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材料，并发到基层揭发批判，有的陆续在报上公布，电台广播。一时电闪雷鸣，刮起飓风。这完全是一出政治上的乱点鸳鸯拉郎配，纯属无中生有，指鹿为马，蓄意编造，硬凑出来的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在经历一番烦躁之后，我反而冷静下来。我的冷静倒使监管我的人紧张了。他们怕我走上绝路，反而来安慰我说，不要有其他想法，问题是会说得清楚的。我当时对自己已无所谓了，而最牵挂和担心的是罗楨和三个年幼的孩子，不知他们在这场风暴中如何承受灾难。后来知道，他们真正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难。

早在1963年我被停职批判时，便把时任市委宣传部高教处副处长的罗楨调离宣传部，下放市中学教师进修学院做教务员，并以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将其开除了党籍。6月13日《重庆日报》批判张黎群《巴山漫话》的文章发表后，她当然已意识到大祸将临。霎时间，整个山城大街小巷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高音喇叭响彻上空，像瓢泼大雨劈头盖脑向她打来。这一天，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回家的，又不知我被关押在哪里。这一天，孩子们在学校的广播声中抬不起头，平时教他们熟读“老三篇”的爸爸怎么竟是反党分子？二儿子感到无地自容，跑到厕所藏起来。他的一位好朋友张寅很同情他，跟着在厕所陪他蹲了半天。在四十二中的小女儿，老师教育她要和反动爸爸划清界限，揭发爸爸有哪些反动言行。这一天，三个孩子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和

妈妈相对无言。晚上，他们没有开灯，默默坐在黑暗中，各自不知想些什么，从何想起！孩子究竟是孩子，一躺上床便睡着了。罗楨心潮起伏，难以入眠。过去的经验使她想起：历次政治运动中搜出被批斗对象的日记、笔记、信件，都会被歪曲夸大，上纲上线，作为反党的铁证。不能留下片言只字！她把多年的日记本、信件找出来，拿到厕所一篇篇撕碎，一本本烧毁。历次政治运动批斗对象的下场历历在目，而如此来势汹汹更是前所未有的，作为家属也将在劫难逃。她感到一切都完了，坐卧不宁，恍惚中想一死了之。她随手抓到一条睡衣上的腰带试着套在脖子上。熟睡中孩子们的几声咳嗽使她警觉了：“不能死！要为孩子们活着！”为了保护孩子，她能做到的只有演一出像历次政治运动中那样的家庭悲剧：划清界限，离婚！于是这天深夜，她悄悄离开家去到进修学院，敲开黄自强院长的家门，说明了来意。黄院长说：“廖伯康的问题还在审查中嘛！你现在不要想这些，多想想有什么该揭发的问题如实向组织交待就是了。你安心回去睡觉吧！”黄院长送罗楨出门，还担心深更半夜不安全，嘱咐一位值班的老师送她回家。这位平时看上去有些粗暴的老红军的宽容态度和浓浓的人情味，使罗楨十分感动和感激，心情也平静多了。

“文化大革命”抄家，我家自是首当其冲。地段上抄了一遍，罗楨所在进修学院又来抄一遍。孩子们被打入另册，备受歧视。地段上批斗地富反坏分子，十五岁的大儿子也被拉去陪斗。我被打成“黑帮”，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全都受到株连。同时还对与我们有工作关系的七个方面的同志进行追查，即市委办公厅、组织部、团市委、市委党校、市中区委、巴县县委和地下党的同志。甚至有从未与我见过面的人也被打成“黑帮爪牙”。1967年我们流亡北京时，一位重庆江北区的青年工人来到住地要见廖伯康。他说，有一次他们工厂团委转达江北区团委传达的廖伯康的一次讲话，他听说了有一句“这个报告好”，就因为这句话，便把他揪出来打成“黑帮”爪牙。他说：“连人都不认识就当‘黑帮’爪牙，真是好冤枉啊！”听了这位工人的叙述，在场的人只有苦笑。

《四川日报》和《重庆日报》公开点了“萧李廖”的名后，在

北京的中侨委副主任方方知道了便找萧泽宽谈话说，老弟啊！要注意啊！又要整人了。不久，四川省委通知中侨委要萧泽宽回重庆接受批判。方方对萧泽宽说，你在中侨委工作表现是好的，没有问题，四川的问题了结了就回来工作。萧泽宽被从北京押回重庆放在市委组织部批斗，李止舟和我也被分别押回市委办公厅和团市委机关批斗。

团市委为批斗我作了充分准备，发动所有干部翻查自己的笔记本，组织专人查阅各种会议记录和讲话稿，回忆过去我有什么反党言论。我第一次被押进批斗会场时，满堂的横幅、标语和震耳的口号声，看不清也听不清。我不禁嘴唇微微动了一下，立刻听到有人喊：“他还在笑！”我知道自己犯了不严肃、没有做出认罪样子的错误。我立刻端正面孔，认真交代、检查问题：50年代提倡青年人穿花衣服，提倡青年人要培养自己的意志性格，提倡青年人向科学文化进军，提倡青年人要敢想敢干等五个问题（其实这些都是当时团中央提倡的）。我检查结束便坐下来准备记录大家的批判。我刚一坐下大家就高喊“站起来！”我说站起来我怎么记呢？主持会议的同志见我坐着不动，便说让他记笔记吧，我就争得了坐的权利。主持会议的说，你作为反党分子，难道只有这五个问题？要我继续检查。到下一次开会时，我将五个问题分解，一分为三变成十五个问题，心想这该够秤了吧？当然无论我怎样检查，无论给自己戴上什么帽子都是不深刻的。原来省委主要领导人指示：萧泽宽已调北京，弄回来批一下就算了；李止舟是“军师”，要狠批；重点是整廖伯康。在他的心目中我始终是最危险的分子。尤其令他怀恨的是，我们所反映的正是他极欲掩盖的四川死人问题！这些对他来说是命运攸关的，所以对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整！

关于四川死人既是当年四川的要害问题，又是我们向中央反映之后挨整的根源，也是把多项事情串联起来的中心环节。所以对这个问题还要再作一点剖析，说得更清楚一点，以澄清事实，明辨是非。

第一，1959~1961年三年中四川死人是不是十分严重？究竟死了多少？我在向杨尚昆汇报时讲的是死人一千万，根据是前面

已经说到的两个统计报表，再加上三年的自然出生率，估计总数约为一千二百五十万。虽然四川人口统计版本不一，互有出入，但大体上都是八九不离十。以近年出版的《四川省志·地理志·人口编》中统计数据，1957年全川人口是七千零八十一万，1961年为六千四百五十九万二千人，净减少六百二十二万。而同一时期出生四百二十九万四千五百人，加起来仍是减少一千零五十一万四千五百人，其中有自然死亡率。但那时的“自然死亡”无不带有因饥饿致病致死的因素。

为了增加“保险系数”，在平时的言谈中，我们大都只说四川死人八百万。所以后来抓我们问题时，都是抓的这个“八百万”。不论是八百万还是一千万，都是骇人听闻的数字，都大大超过当时以死人受查处的河南、安徽、甘肃等地，肯定稳居全国榜首。

第二，四川死人问题主要是因为粮食严重减产，而粮食减产是不是因为所谓严重天灾造成的？不是！1959~1961年三年中四川确实有灾，但远非被夸张得那么厉害。四川幅员广阔，几乎年年有灾（主要是旱灾），问题在于如何看待灾情。可以作一点比较：如1960年的灾情和1972年差不多，都是春旱、夏旱一般，伏旱严重。1960年受灾七十六个县，受灾面积二千七百万亩；1972年受灾八十五个县，受灾面积二千二百三十一万亩。但1960年粮食总产量为二百六十七亿九千万斤，而1972年为四百七十六亿六千万斤。自然条件相同，政策略加调整，产量就几乎翻了一番。再如，1961年和1978年也是灾情大体相同，都是三旱（春旱、夏旱、秋旱）连续，比较严重。1961年受灾一百一十四个县，受灾面积四千五百九十五万亩，全省粮食总产量为二百三十一亿斤；1978年（尚未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受灾一百四十个县，受灾面积五千九百六十四万亩，产量为六百三十九亿三千万斤，相当于1961年的二点七六倍。1959~1961年的三年中，1960年和1961年全省的粮食总产量和主要经济作物产量都低于1949年的水平。在最严重的1961年，全省水稻（四川的主产）产量仅为1949年的百分之六十二，而人口（在大量死亡前）却增加了一千多万。人民群众能不挨饿吗？能不死人吗？阶级原则、党的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到哪里去了呢？这一组数据再简单不过地表明

了“严重自然灾害说”在四川只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谈。

根本问题出在哪里？在于人祸，在于一系列的“左”倾政策组成的一个“左”倾“连环套”：一是严重的“五风”造成农林牧副渔各业衰退，连年减产；二是漫天胡吹乱编，一直虚报成绩，造成超高征购，不顾人民死活，竭泽而渔；三是面对极度饥荒，中央已经放宽政策，而四川死不松绑；四是对反映真实情况和群众呼声的干部党员实行打击迫害，不准提意见讲真话。这样的连环套搞得农民群众宁肯挨饿逃荒也没有生产积极性，搞得许多干部不敢从实际出发，不敢讲真话办实事。所谓“苛政猛于虎”，这就是造成大量死人的最直接的原因。回避了这一点，就离开了历史真实。

第三，四川死人是不是由于发扬了“顾大局”的风格，多调粮食支援了全国才造成的后果？这要作具体分析。四川是人口大省、产粮大省，素有余粮外调，多上调点粮食是很正常的事，也很显眼。这是四川人民作出的重大贡献与牺牲。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四川平均每年外调粮食三十二亿五千四百万斤，按农业人口计算人均均为五十五斤；1957年是外调粮食的高峰，这年调出五十八亿四千四百万斤，人均九十四斤四两。但在“大跃进”后的三年中，靠挖库存、高征购、减城镇口粮定量标准，四川三年年均上调的粮食也只略高于“一五”期间的平均水平。例如，1958年全省外调粮食三十八亿斤，比1957年少二十多亿斤；1959年最多，上调四十八亿斤，也比1957年少十亿斤；1960年上调二十八亿斤，比“一五”期间的平均水平还少了四亿五千万斤。最关键的问题还不是上调过头，而在于连年减产。1957年全省虽外调粮食五十八亿四千四百万斤，但农民人均留粮仍有四百八十斤；1960年上调粮食比1957年少了三十多亿斤只有二十八亿斤，而农民人均留粮却仅有二百六十斤。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

至于当年四川上调给国家的粮食数量和所占比例也要作实事求是的估量。根据中发〔1960〕904号文件，经中央批准的中央财办与各地商量后分配给各地1960~1961年（跨年度）上调粮食计划，除京、津、沪和西藏、新疆地区，以及辽宁、山东、河北等少数几个工业大省外，共有十九个省、区有上调任务，共上调

一百八十八亿一千四百万斤，人均贡献四十二斤三两。其中上调总量和人均贡献最多的是黑龙江省，上调三十四亿斤，人均一百八十七斤；按人平均数，第二位是吉林，人均一百一十四斤；再次是江西，人均七十四斤；第四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内蒙古，人均六十八斤；第五才是四川，人均四十三斤七两。如果说这些地区多数是地广人稀的话（江西不是，江西多数是山区，面积不大，人口不少），而人多地少的安徽省却与四川不相上下，人均达四十二斤多，浙江省也近四十斤。连偏远荒凉的宁夏，人均也上调三十斤。说什么四川贡献为全国第一，不是事实。而且其他各省虽有困难和饥荒，却没有一个地区城乡人口口粮像四川这样低，死人这样多。这种对比十分鲜明。四川上调粮总量较多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不着边际地吹大牛，虚报浮夸。1959年后全国其他大多数省都调低原来上报的产量，而四川却是“硬着头皮顶住”，打肿脸充胖子，吹嘘又是大丰收。1959年实际粮食产量为三百一十六亿四千万斤，城乡人均只有四百五十五斤（包括种子、饲料、工业用粮），在农村许多地方夏收秋收之后，除去征购和留种就已无米下锅。而当年对外公布的粮食总产为七百亿斤，城乡人均千斤以上（时过四十多年，现在也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浮报一点二倍，这不是欺上瞒下吗？这样的大丰收，多调一点粮食算什么问题呢？如果说真的是发扬了共产主义风格，那么我们向中央反映此事，岂不是更能张扬这种高尚风格吗？为什么要封锁消息打击揭露者呢？为什么周总理知道四川特别困难后要调一批粮食给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又坚决拒绝呢？这位领导人究竟是何种心理状态，不是很容易明白吗？

在四川死人问题上，我们从未松过口，因为这是事实。在机关揭批我的时候，有关现实问题无非是市委二十次全委扩大会议上已批判过的那些内容，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有一次有人追问我向中央反映过四川死人的情况。我说：“是的，我曾向中央反映过困难时期四川饿死人上千万。”有同志质问：“你是一个数过的吗？”我说：“对的，我是根据省委下发文件中的统计数字用加减法计算出来的。现在把文件拿出来我马上算给你看。”会场一阵沉默，无人再问。

死人问题搞不下去，又开始搞我的历史问题。有人提出，“经过三年调查，查明你是国民党中央军校的学员，1948年曾被派赴台湾。”我说：“1948年我在上海，以后回到重庆，一直都是搞党的地下工作，这是尽人皆知的。”后来我才弄清楚，原来有位合川人向市里探问，现在批判的廖伯康是不是他的一个原在中央军校后去了台湾且多年失去联系的哥哥。就因为我与他那个哥哥同名同姓，明知风马牛不相及，却硬要安在我的头上。以后又说我是假党员。因为1948年派我从上海回重庆时正值重庆地下党遭受大破坏之后，不便带组织关系，我的正式组织关系是1949年由随第二野战军回重庆的邓照明在武汉接受带回重庆的。据此，就说我是假党员，这不就是明显的编造陷害吗？更为荒诞的是，还说我是叛徒特务。因为1949年我在重庆搞地下工作时，一次和重庆学运小组另外两位成员余时亮、向洛新在望龙门附近一个茶馆内会面，看见过叛徒冉益智。于是便说，被叛徒特务发现而未被捕就是与叛徒特务勾结，我也就是叛徒特务。甚至还建国后人民政府判决枪毙叛徒冉益智，说成是我为了杀人灭口。这就是当年的逻辑。

我从工地虽被押回了团市委机关，但仍实行监管，不能回家，我的工资便由团市委行政科黄崇明送到我家去。没过几天，黄崇明又把钱拿来交给了我说：“他们不要！”我又不敢问明原因，心里极度忐忑不安，为什么钱又送回来了？家里情况怎样？难道发生了什么不测吗？在那个动乱年月，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我最担心罗桢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会走上自毁之路。在当时情况下，如何才能试探到家中情况呢？我向机关报告要家里给我送几本《毛泽东选集》来。《毛泽东选集》送来了，上面有罗桢的印章，看来家里还未出什么大事，我稍微放心了一点。后来我才知道孩子们在学校遭受的压力太大，一向听毛主席话的他们，也弄不清爸爸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老师教育他们要划清界限，跟着毛主席走革命的路。于是，他们对妈妈说：“我们不要他的钱！”当妈妈的不能成为阻挡孩子提高觉悟的绊脚石呀！妈妈无言以对，只好让孩子们把钱退回团市委机关了。

在机关揭发批判实在搞不出新的问题，又把我押回工区进行

揭发斗争。工区的干部和工人原本对我是不错的，但在当时的形势气氛下，尽管找不出什么可揭批的内容，还是要在“鸡蛋里挑骨头”，搜寻些问题出来上纲上线。1964年工区开展“四清”运动，工作队是石桥铺中学校长刘元锁（河北人），他对四川的“言子”——歇后语颇感兴趣，随时搜集。一次工区党员在办公室集中学习开始前，大家七嘴八舌谈开了四川的言子。总支书记郭正荣说：“半天云跑马——露马脚”，“木炭推磨子——走一方黑一方”；工区主任说：“官山坡卖布——鬼扯”；我也说了两个“言子”：“城隍娘娘害喜——怀鬼胎”，“城隍老爷嫁女——抬轿的是鬼，坐轿的也是鬼”。很明显，在这样的场合谈这些“言子”纯属谈笑闲扯，与“四清”运动毫无关联。但在揭发声讨时，说我用展“言子”来散布不满，抵制“四清”运动。又一次，工区党员去市里听报告，途经黄家垭口斜坡时，恰好有一辆自行车顺坡而下，我顺口讲了个“洋马儿下坡——不睬（睬）”，便批判我是无视市委领导抗拒改造。1965年工区学习大庆革命化经验时，每座工棚都要搭一座语录台，我看到一座正在施工的语录台搭得有些不伦不类，便说“不要搭得像土地庙啊！”这又被说成是诬蔑毛主席。甚至我在食堂打饭时将饭和菜打在一个碗里，也被说成是用这样的行动来抵制对杨献珍合二而一理论的批判。不过这都是一般群众的说法，谁也不会计较。

类似这样荒唐的思维方式，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如工区有位很老实的老工人，对毛主席非常热爱、非常虔诚，特地买了一尊毛主席的石膏像放在工棚的桌上。不久染了灰尘，他用水洗净后置于窗台上晾干，又担心搁不稳掉下来，便用一根麻绳拴牢。这一下可不得了，说他仇恨毛主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我的妹妹廖世贤是二机部韶关209铀矿勘探队的工程师，为人老实诚恳，也比较受同事们尊重。在排练跳忠字舞喊口号时，把“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喊反了，心里又急又紧张，连晚上睡觉都在警告自己不要再喊错，第二天正式上演前一直都在默默地想着不能错！哪知还是喊错了。这当然被视为不可饶恕的政治罪过，并联系到我这个被打成“黑帮”的大哥，无疑是对党、对毛主席不满，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开除了党籍。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无

辜被整的人又何止我所说的这些。

2. 红卫兵调查我们是什么样的“黑帮”

1966年九十月间，全国红卫兵开始大串联，11月达到高潮。北京来的一批红卫兵与重庆造反派结合造市委的反，其中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见到满街贴有“打倒萧李廖反党黑帮！”的标语、大字报，却又未见公开批斗，他们就到市委要求交出这几个大“黑帮”进行公开批斗，遭到拒绝。这时，市委深恐红卫兵和我们接触，便急忙将我们秘密转移到远郊红卫兵不易去串联的地方，改名换姓地隔离关押起来。萧泽宽被送到江北一所精神病医院，并嘱咐该院如有红卫兵来了，就给他打一针镇静剂，使之失去知觉不能讲话。12月初，将李止舟押送到华蓥山208地质勘察队队部，那里是“三线”建设重点之一，中央规定不准搞“文化大革命”。把李止舟改名李文华乔装为地质工程师，两个押送看管的人作为他的助手，不让与外人接触。我于11月3日被押送到綦江县南桐区和巴县交界的隆盛公社，关在一间粮食仓库里。我不同意改姓，自己改名为廖纯，我告诉他们：“我乃纯洁之纯，纯正之纯。”用此表示我的清白和抗议。到那里后，我担心家里对我下落不明着急，写了一封信经看守我的人涂改后同意发出，却不准注明寄信地址。

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要求公开批斗“萧李廖”被拒绝后，引起他们中一些人的怀疑：既然是“黑帮”，为何不让公开批斗？这时，省委那位主要领导人也被揭发批判了，说他反对毛主席。北京的红卫兵就感到奇怪，省委的这个大“黑帮”又把那批人打成了“黑帮”，于是就提出究竟谁是“黑帮”的问题。有黑吃黑，也有红吃黑或黑吃红，打的和被打的究竟谁红谁黑？他们想摸一摸这个问题，于是就想找到我们。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两个身着棉军装的年轻人闯进了我的家，把处在四面楚歌中的罗楨着实吓了一跳。来人说，他们是从北京来的。听说是从北京来的人，罗楨的心便放下了一大半。他们问：“廖伯康在哪里？”罗楨答：“很久没回家了，不知道在哪里。”又问“有信来么？”罗楨取出我的信说：“上面没有寄信的地址。”他们要去了信封，又要去了我的一张照片。他们按

照信封上的邮戳标记，乘一辆吉普车来到綦江直奔县委找县委书记张献贵要人。这时，张献贵已经靠边站，正在收发室守门，听说是找他的，谎说“书记在里边！”伸手向后一指就溜之大吉。他们没有找到书记，又拿着信封去邮局询问邮戳上支局的地址，然后到兴隆场通过区委找到关禁我的粮仓。他们先盘问看管我的两个人说：“你们看管的是不是大黑帮廖伯康？”没有回答。这个粮食仓库只在墙头上有一扇小窗子，光线微弱，彼此都看不清楚，只听他们大声问：“你是不是廖伯康？”我说：“我叫廖纯。”他们说：“你就是廖伯康！”我说：“我不认识你们！”他们说：“我们认识你。”随即亮出我的照片说：“这就是你嘛！”接着说，“立刻跟我们走，到重庆去弄清你的问题！”他们帮我卷起被盖，收拾好行李，砍来两根竹竿，让看守我的那两个人抬着行李，步行两公里多来到公路上，然后乘吉普车离开了兴隆场。此时我吉凶未卜，福祸不知，一片茫然，只有听天由命。一路上，他们问我为什么被关押？我便把向中央反映“大跃进”时期四川问题的前因后果简要叙述了一遍。车开到城里沧白纪念堂，才知道他们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造反组织的红卫兵，这里是他们在重庆的联络站。来寻找我的这几个学生叫李云生、黄景贤、任克亚。

到了沧白堂，在一间宽大的屋子里，地上是一排红卫兵的稻草铺，却把我安在屋子里唯一的一张床上。第二天早上，我到食堂买饭票时，迎面一个秃顶干瘦老头向我微笑点头，我觉得似曾相识，便也对他点头微笑。午餐时，大家围坐在一张乒乓球台上用餐。我意外地发现李止舟坐在对面，惊讶地问：“你怎么也在这里？”他笑笑说：“早上我们就打过招呼，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原来，一是我当时没有戴眼镜，视力模糊；二是关押久了关糊涂了，反应迟钝。这么熟的人竟然相见不相识！饭后李止舟告诉我，他所在的华蓥山208地质勘察队职工群众也起来造反了，头头是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的技术员。他们首先怀疑这位“地质工程师”，便将两个看守找来盘问，才知道这个神秘老头就是李止舟，便在高音喇叭上广播：“大黑帮李止舟在华蓥山落网！”同时又与在重庆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联络站联系，把他送到了这个

联络站。这里的学生也向李止舟详细询问了“萧李廖”被打成“黑帮”的经过。我们所谈的内容完全一致，他们弄清了真实情况后，认为我们不是“黑帮”，因而在各方面对我们礼遇有加。

我们虽然回到市里了，可是有家不敢归，这些红卫兵就去通知家里人给我送粮票和钱来，罗楨和孩子们也得以经常到联络站看我。联络站的人还说，我们被关押隔离久了，不了解外面的形势，可上街去看看大字报，但我们也不敢走得太远。

“萧李廖”三个“黑帮”被找出来两个，还有一个萧泽宽在哪里？他们从市委机关造反派那里得知，团市委机关大院偏僻的角落有一个叫“诚实山庄”的小院，里面关了一个人，不知是谁。山庄的大门长期紧闭不得而入，几个学生便翻墙而入，把人带回了联络站。原来此人是重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兰戈，从此他也在联络站住了下来。高兰戈也是因在重庆市委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言论而被视为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在二十次全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1964年市委二十二次全委扩大会上再次进行批判，会后即调到“四清”工作团“工作”，实际调离了市委组织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又被抛出，并挂在“萧李廖反党黑帮”的线上。在“文化大革命”中相当一段时间内，高兰戈也和我们一起相依为命。这时，市委正受到造反派的严重冲击，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在江北精神病院看管萧泽宽的两个干部与上级失去联系，感到萧泽宽这个大“黑帮”在他们手上是个包袱，便将萧送回市委机关。萧泽宽听说我和李止舟都在沧白堂北京地院红卫兵的联络站，自己也来到这里。就这样，三个“黑帮分子”加上高兰戈在联络站聚首了。

我们在红卫兵联络站住了一个多月，每天都上街看大字报。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汉民写的大字报“之一”、“之二”，因为内容比较实在，引起我们特别关注。我们正等待着看揭发材料“之三”时，突然大字报传出燕汉民自杀身亡的消息，说他在被关押的重庆长安机器厂一栋五层楼梯中缝坠下而死。接着又从大字报上传出《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原系团市委同事）跳楼自杀的消息。这两个人的自杀我们都觉得蹊跷，一个人要自杀，怎么会从狭窄的楼梯中缝坠下呢？对罗广斌我们更非常了解，他性

格乐观开朗，在国民党监狱中备受折磨而表现得非常坚强。“文化大革命”之火烧到他头上，他响应号召起来造反，后来两派分裂，他陷于一派，被另一派抓了起来，但又何至于轻生呢？当时我们认为燕汉民和罗广斌两人之死背景异常，大有文章。在那样混乱局势下，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们的生命安全也难得得到保障。

3. 流亡北京申诉无着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在造反过程中重庆形成的两派对立已经相当尖锐，支持一派或一派支持的干部，另一派就要坚决打倒。还是李止舟有远见，他说，现在情况复杂，水深得很，我们只申诉自己的问题，决不能介入某一派。我们不愿意卷入任何一派，只有远离斗争的漩涡为妙。与此同时，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联络站在重庆两派的冲突中也有可能受到冲击，他们准备撤出重庆，已无力顾及我们，便对我们说：“你们各自回家去吧！”可是我们有家难归呀！我们几个人商量只有走为上策，到北京去向“中央文革”申诉我们的冤情。那时我们是相信“中央文革”的，对它存在幻想。当时到北京上访的人很多，为免引人注目，我们准备乘南去的火车出四川省境，再绕道湖南衡阳转车北上。

既要准备远行，须得回家拿点钱粮。出走之前的那天晚上，寒风习习，细雨霏霏，我头顶破草帽遮住面孔悄悄向我住家的红球坝走去。在离家不远的菜市场转了将近一个钟头，却怎么也找不到那条熟悉的通往家门的路。离开联络站时，我与李止舟他们约定两小时之内回去，两小时之后不见回去就要估计是被抓起来了。我愈急愈找不到路。我想起小时候听大人讲，有人半夜走过坟地，转了一个晚上到天亮时发现自己还在原来的地方，这叫“鬼撞墙”。我是不是也遭“鬼撞墙”了？后来终于看到了我家窗上透出的灯光，我悄悄爬上二楼，轻轻叩门。罗楨问：“哪个？”我轻声说：“我！”她听出我的声音，忙开了门。我一闪进门把她拉进厨房说：“我们要到北京去，回来拿点钱和粮票。”这时孩子们已经睡下，大孩子听到声音问：“是哪个？”罗楨说，“你们不要起来，好好睡觉！”我拿着钱粮匆匆下楼而去，出房门时还听到孩子问“是不是爸爸回来了？”

第二天，即1967年2月3日，由高兰戈的大儿子李鲁沂为我们买了去衡阳的车票，秘密离开重庆，踏上前途未卜的上京申诉之路。为防备万一被发现全部被抓，或如遇不测也好有人通风报信，萧泽宽同高兰戈，李止舟同我分别由高兰戈的儿子和我的儿子护送去火车站。我的儿子小波只有十多岁不懂事，他本应跟在我们的后面观察周围情况，可是他却径自走在前面。李止舟和我来到菜园坝火车站入口处，臂带红卫兵袖章的高兰戈的儿子正等着我们，并告诉我们萧泽宽同高兰戈已进去了。当时，中央已通知在全国大串联的学生要回原地闹革命，车站被返校学生拥挤得水泄不通，根本无法从车门进入车厢。我们就挤到一节车厢中部的窗口，抓着窗框先把头伸进去，高兰戈的儿子则掀着我们的身子将我们塞进去。上了车后，我们分头走到不同车厢，也有了几分安全感。学生见我们是持票上车的，还给我们让了座位。我们把棉大衣盖在头上埋头伏在椅背上装睡觉，耳听着广播所经过的车站，过了綦江、赶水，直到贵州桐梓离了四川省境方松了口气，才敢把头伸了出来。火车快到衡阳时，由于车上太挤，无法与萧泽宽他们联系，只好用暗语让车上广播通知相约在衡阳下了车。此时此刻，我们大大舒了口气，看到河水清清，湘江北去，感到分外地轻松和自由。跟着又搭了北上的列车。

到北京下车后，踉踉街头，不知该到哪里去，偌大一个北京却找不到一个落脚之所，只好先进一间小店一人喝了一杯很久没有尝到过的牛奶。我们四个人商量了很久，只有高兰戈带有工作证，其他人什么证件都没有。幸好有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联络站开的介绍信，我们只好到北京地质学院去试一试。

北京地质学院设有一个专门接待各地来京人员的接待站。1967年2月15日，我们便持联络站的介绍信到接待站登记。接待站把我们安排到北翼楼上的一间小教室，叫我们去抱了几捆稻草铺地铺。过了一会，接待站站长庄成章来问：“你们有位叫廖伯康的吗？”我说我就是。他又问我们为什么到北京，经我作了简要说明后便马上提高了对我们的待遇，要我们去抬床和领取被盖垫絮等。原来地质学院有位女教授郝怡纯也在接待站工作，1957年她曾参加赴日青年代表团，是副团长，我那次也参加了赴

日青年代表团，而且同她在一个小组。这事虽已隔多年，但她对我的印象犹存。我们在接待站登记时她在里面看见了我，便对庄站长说他们中有一位廖伯康是原重庆团市委书记，这样我们就受到了特别优待。我们在北京地院住了九个月，可是我却从未与她再见过面。萧泽宽虽回到了北京也是有家难归，不敢回去，只能同我们住在一起。

1967年3月31日，地质学院的李云生告诉我们，他参加了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个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我们的案件，总理指示把有关材料报去。4月3日，李云生把我们所写的有关四川问题及我们的申诉材料送交给了周总理的联络员。

从1967年3月到12月，我们也曾六次到中央联合接待室西南组上访，先后接待我们的有任西民、孔繁清、王政和等同志。开始让我们先送去有关材料，后来说接待室对我们的上诉是重视的，先在西南组进行了讨论，后又在联合接待室讨论，最后打印了全部材料以联合接待室名义向中央写了报告，并同意我们留在北京等候中央指示。他们认为，我们的问题最终还得在运动后期由所在地区解决。

我们一面等候中央指示，一面也要作最终回川解决问题的准备，于是将有关材料寄给四川省和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组。我们还去找了原团中央宣传部长黄天祥帮忙打印材料，那时他是中央农业口宣传部部长。他很了解我们的情况，对我们也深表同情。我们到黄天祥家里时，他立即拿出了存折说，拿去，要多少取多少！我们说钱不需要，请你帮忙打印些材料，分别寄给四川和重庆各级机关，他办到了。在最困难的时候，能得到别人真诚帮助，是永远难忘的。

住在北京地质学院期间，邓垦曾跑到我们的住处。他是“另一个最大走资派”邓小平的兄弟，地院不敢留他，到哪个家里也待不住。我们只能陪他到火车站送走了他，何时再相见谁都不敢说。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当时正在四川造反，势头颇旺，深得“中央文革”支持的“革命领导干部”刘结挺、张西挺“夫妻店”，通过北京地院的人来找我们，对我们进行拉拢，说想

同我们见面。我们婉言拒绝了。不久刘、张在四川掌权，呼风唤雨，炙手可热。我们仍不为所动，因而又受到他们的打击。但他们好景不长，很快垮台，身败名裂。如果当时我们“浮上水”^①，顺竿爬，以后就可能陷于绝境，真正万劫不复了。另一件事是重庆造反派一派的头头黄廉到地院来找我们。我们说重庆来的人不见不好，见了一次面。他问我们什么事情，我们简单应付一下，不表任何态。他们不满意，以后再也不来往了。在这之前，李止舟曾去看望老首长李初梨，李老对他说：“你们不要参加任何一派，否则将要遭受交叉的火力。”这位革命老前辈，饱经风霜，阅历丰富，真心诚意，诲人不倦。他的嘱咐对我们教育很深。

1967年九十月间，中央指示所有来京上访人员都要回到原地区解决问题，各单位设立的接待站陆续撤销，北京地质学院接待站也随之撤销。我们对四川和重庆的情况不明，且武斗还在升级，尚无回四川的条件，真是感到走投无路。后来通过一位北京钢铁学院名叫余吉冰的同学暂时住到他们实验大楼的一间实验室里。

北京地质学院同学在重庆设联络站时就成立了“萧李廖专案组”，陆续有李云生、黄敬贤、邓光中、曾昭贵等同学参加。到北京后，住在北京地质学院接待站的西南师范学院学生何亚□也和他们一道做过一些调查和整理资料工作。他们在重庆查看了一些档案材料，并在重庆、北京访问过一些知情干部，整理了一套《萧李廖调查材料汇编》，写出了《调查报告》。1967年9月下旬，为帮助我们返回四川，“专案组”派曾昭贵去成都向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汇报，并将《材料汇编》和《调查报告》送交“省革筹”主任张国华。张国华表示支持对“萧李廖”一案进行调查，并提出最好有四川造反派参加，西师的何亚□便正式参加了这个“专案组”。曾昭贵、何亚瑄二人在工作中加深了彼此了解，建立了恋情，以后结为夫妻。没想到“萧李廖”这个案子竟成了这两个年轻人的“红娘”。时隔三十年后，我再次遇见曾昭贵、何亚瑄，问他们当年为什么对我们的平反问题那样执著，那样坚

^①浮上水：四川方言，巴结讨好有权势的人。

信我们是冤枉的？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去中央档案馆查阅过萧风、邓照明从重庆回北京后向中央写的调查报告，便对这个问题有了明确看法。他们还从邓照明长达一万二千字的报告中摘录了八千字。复课闹革命后，他们将所有调查材料交给西南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了。

在北京钢铁学院住了近两月，“中央文革”联合接待室提出要我们回成都向“省革筹”作一次汇报。我们也考虑到，无论中央态度如何，作为四川的干部，最终还得回四川解决问题。北京地院“专案组”派曾昭贵护送李止舟和我于1968年2月18日离开北京回成都。我们流亡北京正好整整一年。

4. 流寓在成都的日子

1968年2月20日，我们到了成都，先暂住在省地质局招待所。随即持“中央文革”联合接待室的介绍信到“省革筹”报到，要求接待。但政工组、组织组的人都避不见面，有的说现在机关没有人，有的说你们的问题我们管不着。吃了几次闭门羹，我们也就不再去了。2月22日，曾昭贵将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致“省革筹”主任张国华的信送请“省革筹”政工组转交。2月底，“省革筹”办公室主任杨开鉴电话通知曾昭贵说，已批请“省革筹”副主任天宝同志与他接谈。3月2日，天宝同志接见了曾昭贵、何亚璋，听取了他们的汇报。3月6日一早，我们闯到“省革筹”要求见天宝，工作人员说天宝正在开会，我们等到下午一点多，天宝开会出来与我们见了一面。天宝认识李止舟，他说“省革筹”的负责人都到北京开会去了，只有他一人留在家，现在省内各地武斗严重，最近有两万多人被各地另一派打出来到成都要求省里安置，他正忙于处理这些事。关于我们的问题，他说看来只能放到运动后期解决，你们先在成都住下再说吧！我们说，我们现在无处可住，希望先给我们解决住宿。天宝说，“省革筹”哪有地方住呢！我们请求军管，以为这样比较安全。天宝说，我凭什么把你们军管呢？遂由“省革筹”给四川大学“革委会”写了张条子，我们持条由曾昭贵与川大“革委会”群工组联系在四川大学住了下来。先住在化学馆，后迁往铮园二号，继又迁到东风北楼四号，曾昭贵和何亚璋住在招待所。

我们在四川大学住下后，省里长期无人过问。重庆的情况如何呢？何亚瑄、余吉冰告诉我们，重庆市委机关造反组织“井冈山”对萧李廖问题进行过调查。余吉冰在重庆曾查看过当年市委整理的有关我们的材料，并把北京地质学院“专案组”的材料向“井冈山”一些成员宣读，过，“井冈山”表示愿与北地“专案组”交换调查材料，共同把这个案子查清。可是后来因为中央举办解决四川问题学习班时，此时已经执掌四川大权的刘结挺、张西挺传出话说，凡是给“萧李廖”翻案的人不能参加学习班。我们的申诉之路由此断绝，“井冈山”也不好再过问“萧李廖”的问题了。

1968年3月下旬，曾昭贵、何亚口再次去重庆，打算向有关方面反映我们的情况。适逢两派武斗加剧，曾、何二人也被其中一派抓去关押了几天，无法进行工作，只好返回成都。曾昭贵对我们说，他们也不能在成都久留，只能把我们的材料交给“省革筹”，由“省革筹”审查处理，他们回北京后再向“中央文革”作一次全面汇报。至此，北京地质学院负责调查我们问题的“专案组”宣告结束。尽管他们不可能真正解决我们的问题，但他们对我们很负责，有始有终。我们和这些青年学生相处一年多，在那动乱的年月，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过火越轨的行为。他们不辞艰辛，不畏风险，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做了不少调查工作，无非是为了弄清我们问题的真相，辨明是非曲直，伸张正义。他们没有个人功利目的，动机是纯正的，为人是正直的。他们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到成都后，除偶尔有几个人来看过我们外，没有同任何人交往。中央大学的老同学胡崇俊、曾瑜君夫妇来看过我们，我们也到他家去过一次。后来听说，我们走后他那读小学的女儿问：“这两个伯伯是什么人？”当告诉她我们的名字后，她非常紧张地责问爸爸妈妈：“那不就是广播中声讨的黑帮吗？怎么到我们家来？你们为什么要与这样的人交往？”从此，这位幼小的姑娘便精神失常。原来胡崇俊和曾瑜君都曾被作为“走资派”揪斗，女儿在学校被视为狗崽子抬不起头来。由于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过深的刺激使她终日惶恐心悸。而我和李止舟两个曾被高音喇叭

批判声讨过的大“黑帮”，竟然闯进了她的家门，加重了对她的刺激，变得十分狂躁，经常在家里吵闹，甚至要持刀杀妈妈，时至今日仍然时常发病。“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类似悲剧当然不仅此一家。

我们在川大开始住的一段时间里还是比较自由的，每天在校内看看大字报，有时到学校附近的街上走走。有次在九眼桥碰到高教局长康乃尔（建国初期任青年团西南工委书记兼重庆市工委书记）拉着板板车，边跑边喊：“让开，让开！”我们心照不宣地彼此看了一眼，擦肩而过。与我们同住在川大的还有成都大学校长叶兆麒，通过平时交谈彼此有所了解。他的夫人经常给他送些吃的东西来，我们都得以共享。在长期关押和漂泊生涯中，能品尝到一点家庭美味解馋，真是难得的享受。

刘、张曾想拉拢我们壮大势力，我们拒绝同他们见面，他们怀恨在心。有一天，我们从大字报上看到，刘结挺、张西挺在北京接见四川造反派时说：“走资派还在走，如李止舟、廖伯康……”我们感到情况不妙。5月21日下午，我们发现川大造反派有武装人员在我们住处周围走来走去，预感到我们可能被捕。我们也曾想及时出走。然而，考虑再三，在亲朋好友中没有人能收留我们这样的“黑帮”，我们也不愿连累别人。天地之大竟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地。果然，就在这天晚上我们被抓到川大理科大楼关押看管了起来。

在警卫森严的理科大楼，既关押有校内的“走资派”，也关有本地和外地的“走资派”，以及各类“黑帮”、“黑线”分子。这里监管严密，不准互相交往，晚上每个房间都上锁。我们隔壁关的是川大教务处长李安澜，上厕所时我们互通了姓名。原来他与李维嘉（地下党重庆市委领导人之一，“文化大革命”前任四川省农办副主任）相熟，对我们有所了解，我们也成了难友，他家送来香肠之类食物也让我们分享。有一天李止舟和我去到他的房间，突然看守来了，我急忙抱起一只理化实验用的玻璃瓶递给这位教务处长说：“谢谢，还你瓶子！”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李止舟则闪到门背后，待看守走后，才溜了出来，算是蒙混过了关，真是太冒失、太危险了。

1968年6月13日，川大“革委会”群工组的萧达昌、殷云贵找我谈了一次话，要我们写了一份简要的书面材料。9月1日下午，萧达昌通知我们说，已将我们移交给重庆的造反组织。随即由重庆“反到底”组织将李止舟和我押回重庆，隔离关押在重庆“工总司二七”总部，也没有人找我们谈话。负责看管我们的是位老工人，他对我们说：“我已快六十岁了，没有文化，没有结婚，没有子女，没有家。我闹革命完全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你们这些当干部的要想得通，不要去自杀。”“工总司二七”总部就在大田湾广场附近，离我的家只隔着文化宫，离罗楨下放的教师进修学院也仅一街之隔，而我们却是咫尺天涯，互不知情。

5. 在重庆“干部集训队”里的煎熬

1968年9月7日，我们从“工总司二七”总部被押解到“市革委”举办的“干部集训队”实行军管，地点在大坪交通学校。听说要去解放军管理的“干部集训队”，开始我们认为这下好了，食宿有了着落，安全有了保障，所以是怀着高兴的心情而去的。但我还是担心我们的申诉材料会不会被没收。9月的重庆天气还比较热，为预防搜查，我将申诉材料拴在肚脐下。到了集训队，果然所有行李被翻来覆去地检查，仔细搜身，两臂、前胸、后背、两腿内外侧都摸了一通，幸好夹带的材料未被发现，亏得未雨绸缪总算侥幸逃过了一关。那时规定我们订阅《重庆日报》，我便将材料藏在看过的报纸内。

这里名曰“干部集训队”，实则是一座严酷的监狱。一人住一间房，彼此不准交谈，走路要低头而行，不准东张西望，昼夜都不准关房门，晚上吹哨关灯睡觉，早上吹哨开灯起床。吃饭由工人提着饭菜到房门口各人拿碗出来由工人分盛。偌大一个厕所，为避免彼此接触，每次只能进去一个人。家里人送钱粮物品来都要检查，也不能见面。“集训队”的头头对看守战士说，关在这里的人不是叛徒、特务，就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都是被打倒的对象。战士们当然相信，对我们这些专政对象自然是不会客气的。我们被要求每天要背诵“老三篇”，唱语录歌。有的人年纪大了，背诵不上来或唱不上来，便会遭到一阵拳打脚踢。萧泽宽是“左嗓子”，唱歌走调，经常挨打。老红军王公杰背不出“老

三篇”，便叫他跪在地上读，读到晚上十二点还背不熟，最后以拳脚相加告终。萧泽宽在挨打时喊：“解放军打人哟！”结果是变本加厉，打得更狠。高兰戈挨打时高呼：“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这两句口号还真灵，救他少挨了一些打。有时搞外调的人来找，看守人员持枪押着出去，走慢了就会挨枪托。上厕所要报告，经允许才能去。于是有人喊：“报告小便（或大便）！”若看守听起来不顺耳，轻则臭骂，重则挨揍。总之，找各种碴儿骂人打人折磨人。

这个“集训队”究竟关有多少人，关了哪些人，我不得而知。我只从斥骂声、鞭挞声、喊叫声、呻吟声中听出一些较熟悉的声音。后来知道，关在这里的人有进有出，最多时大约有三十多人，先后有廖苏华（副市长）、华逸（任白戈夫人、市妇联主任）、裴昌会（民主人士，副市长）、王若（市委办公厅主任）、王墨林（市中区区委书记）、黄友凡（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马力（市委工业部长）、余跃泽（副市长，市委财贸政治部主任）、杨益言（小说《红岩》作者之一）、王颂咸（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等。我曾听到战士用皮鞭抽打王墨林的声音。王墨林年轻时在山东武术馆练过功，他们知道一般刑罚对他无济于事，便用重刑，给他坐过老虎凳。廖苏华、华逸、王墨林等被揪出去弄到大会去批斗时，是抓着头发拖出去又拖回来的。

在人格遭受极端凌辱的情况下，有的同志深感生不如死。住在我对面房间的王颂咸同志，是一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老党员，抗战前曾被国民党逮捕关在苏州监狱，“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进了自己的监狱——“干部集训队”。一天早上，我随哨音拉灯起床后，看到对门房间却是黑洞洞的没有灯光。一会儿便听到看守人员气势汹汹的声音：“为什么还不起床？”灯亮了，接着嘈杂声起，“集训队”的头头侯主任、医生、地方干部以及其他一些人都陆续赶到。一会儿，只见几个看守人员用被单裹着一具尸体抬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就这样被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王颂咸事件发生后，“集训队”对每个房间做了一次大清理，住房也作了大调整。为便于监视，晚上规定开着灯睡觉。每当有外调人员来找或由于其他原因离开房间回来，都会发现房间被搜

查过，萧泽宽放在枕头里的钞票也被顺手收走。这样我带进去的材料也就岌岌可危了，如果被发现，不仅会被抄没收，一顿毒打也是免不了的。如何毁掉这些材料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这里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巡逻监视，我能把它丢在哪里？我想只有上厕所时是一个人，可以把它处理在便池里。于是我喊了声“报告，大便”，进了厕所后，急忙将材料撕成碎片，丢进便池，接了一桶水冲下去。殊不知水倒急了，空气压力将纸屑冲了出来飘落满地，我只好一片片拾起来再丢进去。正当这时，廖苏华在喊“报告”。“集训队”里只有一个厕所，男女共用，廖苏华来到门口见我在里面，忙退出去又喊声报告。战士厉声说：“你才喊了，又喊！”我忙向她摆手示意不要喊！待迅速处理完纸屑，我悄悄走回房间，有惊无险地又混过了一关。

在暗无天日的“集训队”里度日如年，我想起了曾在国民党监狱呆过八年的原八路军敌工部长后任党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的李初梨同志，他曾在延安中央党校讲授如何蹲国民党的监狱。1961年李老来重庆时，我曾问他八年监狱是怎么过来的？他说，“把时间加以分解就行了，一天能过一个星期便能过，一个星期能过一个月就能过，一个月能过一年也就能过，一年能过八年又为什么不能过呢？这样分解之后，也就能以平常心态对待了。”这一席话，在此时此地对我起到了作用，使我也能以平常心态度过“集训队”八个多月的阴暗日子。

建国前做地下工作时，我也曾受过如何坐国民党监狱的教育。这时蹲在我们自己的监狱里，为了使脑子不萎缩，我强背“老三篇”和毛主席其他著作，并下决心把《毛主席语录》二百七十四条全部背完，每天读了新的又复习前面的。为了不让身体萎缩，我在斗室内做太极拳的“云手”，看守的战士说我在搞封建迷信，不准我做，结果只好每天绕着方桌转圈散步。没有想到地下工作时期受过的党的教育，在“文化大革命”中派上了用场。那时对我最大的恩赐是被叫去抬煤渣，既能活动身体又能见到难友。在与黄友凡抬煤渣时，我们还悄悄谈上两三句。同马力在一起抬时，他一声不吭。

“集训队”把党的干部当敌人对待，采取各种残酷方式折磨这

些党的干部。我们很想弄清“集训队”的主持人——营教导员侯某是何许人。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人来外调，方知此人已转业到抚顺市公安系统，当地还打算提拔他为公安局长。我们除给来外调的同志反映他主持“集训队”的情况外，曾被关在“集训队”的老同志还联名写信给抚顺市委，要求审查他的历史，查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残害老干部的罪行。后来听说，当地对他进行了专案审查，果然他是东北解放战争中被俘虏的国民党的兵，其残害老干部的劣迹确属事出有因，不说是阶级报复，至少是积习未改，旧病复发。

1969年5月，“集训队”宣布解散，我们被转到在市党校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这里虽然对我的行动继续限制，但已不是那种专政式的管理了。

6. 管制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之前，我们被转移至重庆大学新建的图书馆住了几天，男的、女的都在走廊上席地而卧。一天，我正躺在地铺上休息，忽听一声“萧李廖就在这里”。我下意识地抬头看是怎么回事，原来是负责看管我们的人陪着军代表来视察，军代表想看看大“黑帮”的样子，我也变成姓萧名李廖的那个“黑帮”人物了。接着这位看管人又介绍说“华逸也在这里”，他们便走向女同志那边参观去了。那时我们真像是关在动物园中被观赏的怪物。

在重庆大学住了几天后，我们被送到市党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这个班里的都是大大小小的“当权派”，有尚待解放的，有重点审查的，还有像我们这些已被定性打倒的，有时几种人混合在一起学习讨论。除我们几个和其他少数人外，其余的人星期六都可以回家。我们虽不能回家，生活在校内还是有了点自由，管束不严。

在一次学习讨论会上，黄启瓌、丁凤山（“文化大革命”前都是团市委的中层干部）发言说，我们一个学物理一个学外语，都是服从党的安排放弃所学专业而搞政治思想工作的，结果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落得今天的下场！黄启瓌说，假如我不搞政治思想工作而搞专业，如果学有成就，那我今天也可能成为“反

动权威”了。说来说去，终归是在劫难逃！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建国以来，在连绵不断的各种政治运动中，时而卷起袖子整别人，时而又束手待擒被人整，究竟该何去何从，谁能说清楚？当时人们思想真是一片迷茫和困惑。

有一天，突然命令我们一些被重点审查的人把皮带、刮胡刀、腰带、鞋带都拿出来上交，原来是市委办公厅主任王若自杀了。王若以死抗争的决心很大，听说他是把一截铁丝缠在手指上，末端扣在一把钥匙上，将钥匙插入电源插座触电身亡。一位十四岁投身革命，刻苦自学，颇有才华的老战士又被迫害致死了。

1969年盛夏之时，我所在的大队开大会，未通知我参加。对此我已习以为常，正好可以独自睡觉。刚睡不久，“专案组”的一个人来叫醒我去开大会，我忙起床穿衣套鞋跟随他到礼堂去。还未跨进门便听到礼堂内一阵口号高呼：“廖伯康必须老实交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进入礼堂后，让我站在人群中央，主持人发话，要我从六岁起将逐年所经历的事情老老实实、仔仔细细向群众交代。我便从进幼稚园讲起，谈得非常详细，大家听得不耐烦了，七嘴八舌地大吼：“谁让你谈这些东西！”然后，主持人便直截了当地厉声提出：“你要老实交待1948年你干了些什么？怎样回重庆的？回重庆后又干了些什么？”这下我明白了，原来他们还是把焦点放在与我同名同姓的那个国民党军校学员身上。我的历史自己最清楚，心里非常踏实，20世纪50年代出访日本、苏联，政治上都是严格审查过的。我一一谈了当年的情况，会开了一阵，大家吼了一阵，把准备好的问题提完了，我如实作答，无懈可击。因为历史就是历史。会开不下去了，只好宣布散会。对萧泽宽和李止舟，也是长时间追他们的历史，想以叛徒、特务定性，使之万劫不复。现实问题整不倒，就搞历史问题，这是那些年整干部的老章法。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于1970年春节前结束，绝大部分人都回家了，我们少数人仍留在学习班。春节后，这些人分散回原单位看管。我和廖苏华、华逸分到团市委机关被派到厨房帮厨，干完活便坐在厨房门口看报。有一天，廖苏华把一张报纸从头到尾大大小小的新闻和文章都看完了后说：“怎么昨天登了的东西今

天又登呢？”我拿过她的报纸来看，原来还是昨天的报纸。可怜这位1925年参加革命的老大姐，重庆最早一代的共产主义先驱者真是被关糊涂了。

四、冤案的平反——落实政策，一波三折

1. 林彪事件后境遇开始好转

在团市委机关帮厨了一段时间，又把我送到101工区的工地劳动。这时虽还不能回家，但日常生活还比较自由。能同工人们在一起我还是非常乐意的，在同工人的接触中，我深深感到他们正直，诚恳，实事求是，富于同情心。在“文化大革命”中，开群众大会批斗我的情况并不多，原因是我一切都如实地说，讲我们怎样向中央反映四川的问题，如何遭到打击报复。后来虽然又找我的历史和家庭问题，我说我自己也好，我的家庭也好，没有任何反动关系，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党派和任何反动会道门，我也没有被捕过，一直在党组织领导下工作。这样一讲，引起越来越多人对我的同情，包括当时已被结合的干部。这也说明中国老百姓的心中都有一杆秤，并不完全理会上面怎么说。

我再次到101工区工地劳动，分配给我的工作虽已不是过去那样的重体力劳动，但对我还是封锁一切消息，对外面的世界我一无所知。一天晚上，我躺在双层床的上铺休息，一个青年工人走进我住的集体宿舍有意大声同其他工人摆谈“九一三”林彪爆炸事件。他是采用这种方式让我知道这个消息。当时所有工人都已听了传达，只有我不能去听。

“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是件具有极大政治尖锐性的事件，它促使人们不能不严肃地思考“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现象，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九一三”事件后，我明显地感到自己的处境逐渐有所好转，虽然还是不准回家，但罗楨已从牛棚中出来，星期天可以到工地来看我了，三个孩子也早已先后下乡插队劳动。我每个星期从星期一盼到星期六，星期天工人们都回家了，我和罗楨便在清静的工地里度过美好的一天。

2. 初步落实政策——任建工局“革委会”副主任

林彪事件后，中央开始抓落实干部政策工作。1972年4月

间，根据周总理的建议，并由他亲笔修改，《人民日报》发表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批判林彪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排除干扰，抓好落实干部政策工作。1973年3月10日，党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3年12月，毛泽东又提出给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并说：“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中央所采取的这一系列行动，在党内外产生了强烈政治影响。在这种形势下，“萧李廖”这个案子也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认为是被整错的。但要真正落实政策消除影响也不是那么简单。

1972年11月，当时“市革委”的“萧李廖专案组”写了一个调查报告。这个报告避开案件产生的原委，只是说经过调查证实“萧李廖”不是“黑帮”，定他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没有根据。这样，1973年萧泽宽回到北京安排为轻工局副局长，李止舟先被安排到重庆师专做副书记、副校长。李止舟说他这个人不宜搞学校工作，重庆如果不好安排把我调到成都去好了。于是李止舟便于1972年12月调到成都任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后来四川新领导人说要把旅游作为一个产业来搞，认为李止舟有见解有眼光，点名调他任省旅游局局长。我则被就地安排到重庆市建工局任“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这在当时来说就算是给我们落实政策了。我认为能给工作做，有为党工作的用武之地了，便立即走马上任。可是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之中，机关经常受到建工系统造反派干扰，不得安宁，无法办公。造反派对所有的主任、副主任都找麻烦，唯独对我不闻不问。为什么呢？因为我列名在最后，找我也解决不了问题。同时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挨整，同谁都没有什么恩怨，在工地劳动时表现积极，与工人的关系很好。所以我这个“当权派”倒成了个逍遥派，直到“四人帮”跨台，“文化大革命”结束。

3. 调任科学院成都分院副院长过程中的波折

我们几个人的落实政策和平反过程，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粉碎“四人帮”后，不断有同志向中央反映“萧李廖”的问

题还没有解决。邓垦到北京开会时找过胡耀邦，提出要给我落实政策。耀邦说廖伯康确实是个好同志，应该解决，问题是怎么解决。耀邦曾托一位同志给当时的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钱敏捎过话：廖伯康的工作建议重庆调整一下。不久钱敏即调中央工作，没有下文。1978年中央召开科学大会，会后全国兴起了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高潮。当时主持四川工作的赵紫阳参加了科学大会，会后他找到胡耀邦（当时是中央组织部长）说，我到四川去你要支持我，调给干部。胡说你要什么干部？赵说要两类干部，一个是宣传部长，一个是搞科技的。胡耀邦对赵紫阳说，四川有的是人才，张黎群就是很好的宣传部长嘛！后来因四川省委已有宣传部长了，结果张黎群被调到浙江大学任党委书记、副校长。说到搞科学技术的人，胡耀邦也不知道我解放前具体学的是什么，便对赵紫阳说，四川干部说要给廖伯康落实政策，廖伯康搞科技就很好嘛！这样，就准备把我安排到科学院系统去。

当时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是胡克实，他要我到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做副书记、副校长，书记是杨海波。杨海波原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我同他很熟，所以我也同意去那里。我人还没有去，杨海波就打电话来催，说他要回北京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由我去担任书记。我问校长是谁？他说是严济慈。严济慈是当时健在的老一辈科学家中年纪最大的，住在北京，他不会住到合肥。我一想，我到科技大学去，那里书记一走我这个副书记就是书记了，校长不在那里，我这个副校长就是校长，党政一肩挑，而我一个熟人都没有。另外还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当时科大正在闹学潮，要求将学校迁回北京，闹得很厉害，我一去就碰到“炭圆儿”^①了。我想科技大学能不能迁回北京我决定不了，中央究竟是什么态度也不清楚。所以我说我不能去。在此之前，重庆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曾德林要调回北京任高教部副部长。他走前向市委和中央推荐我到重庆大学去，市委领导也同意，可又说廖伯康去可以，但要一碗水端平，廖伯康做副书记、副校长，还要派另一位同志去做副书记、副校长。他说，廖伯康是“反到底”派的，

^①炭圆儿：四川方言，比喻棘手、难办的事情。

另一位是“八一五”派的。听了这个话，我感到在重庆已是再也待不下去了。我直接找市委领导同志说，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我一直被关押挨整，对外面情况一无所知，从何说起我是哪一派的？我是挨整派嘛！

就这样，重庆大学我不能去，中国科技大学我不愿去。于是我找到胡克实说你把我的关系转回组织部吧。胡克实说中组部把你的材料交给我们了，我没有任何理由把你退回去。中国科学院是个很大的系统，全国到处有分院，你自己选个单位去。这时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正在向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要干部，中国科学院正在成都建立分院，由西北分院书记刘允中、西南分院书记马识途共同组建。成都分院由刘允中任书记兼院长，马识途做副院长，让我去也做副院长，由马识途和我管科研，我便同意了。省委分管科研工作的书记是杨超同志，他让省委组织部发调函调我到成都，我拿到调函就到了成都。

我到中科院成都分院做副院长，可是当时省委有的领导同志对“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危害尚缺乏深刻认识，对“萧李廖”的成见还未消除，感情上没有扭过来，仍然认为我们是犯了错误的人，不可信任。所以我到省里工作半年不发任职通知。后来赵紫阳到科分院问廖伯康工作怎么样？刘允中说他这里只说他是秘书长，秘书长也没下文发通知啊！赵紫阳一听就发火了，本来定的是副院长怎么是秘书长？定了半年为什么通知都不发？所以后来补发了一个我任副院长的通知。其实我并不懂自然科学，胡耀邦和赵紫阳可能有误解，以为我是学自然科学的，其实我是学经济的。我在成都科分院工作了五年，学到不少东西。

4. 《平反决定》的形成

自1973年我们被分别安排工作后，一些领导就认为已经为我们落实政策了。至于对这个事件彻底平反和消除影响的问题则根本不提，当然更谈不上如何分清是非、吸取教训。李止舟1972年底调成都工作时曾找市委书记鲁大东同志问，搞了我们这么多年，我究竟是啥子问题？大东同志说：“你没有事了，你们的案子省委没有正式批啊！”1973年萧泽宽回北京工作时，问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丁长河同志：“审查了我这么多年，总要给我作个结

论吧！”丁长河说：“你历史上没有问题，工作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为当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自然谈不上彻底分清是非，落实政策！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最具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纷纷提出当时党内外普遍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主张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且为一些历史上的冤案平反。这就是著名的“拨乱反正”。

根据中央关于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的指示，在中央领导同志一再督促下，1978年12月31日重庆市委发出了一个《关于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三同志的平反决定》（简称《平反决定》）。对这个《平反决定》，萧泽宽、李止舟和我于1981年6月写了一个正式书面意见，认为它回避了案件实质，掩盖了事情真相。我们说，“萧李廖”的案子说来很简单，核心问题就是七千人大会后我们在党的会议上给省委提了意见，以及向中央派来四川了解情况的干部如实反映了情况。这本来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却被认为是“反党”，于是被罗织了许多罪名，受到批判，遭到打击。但在《平反决定》中，仅就被罗织的莫须有罪名加以否定，却只字不谈这个问题的实质。如：只说我们在市委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自己的意见是“正常现象”，避而不谈意见本身是否正确；只说我们与张黎群为《巴山漫话》写的杂文毫无关系，避而不谈市委本来就知道没有关系，却偏要编造事实，大做文章，组织批判声讨；只说向中央来人提供情况是“上下级之间的工作关系”，避而不谈既然知道是中央派人了解情况，为什么还要那样对我们长期进行无情打击。况且就在对我们批判的过程中，杨尚昆还曾两次给市委主要领导人打过电话，中组部长安子文同志也分别找省委主要负责人谈过话，把有关情况和问题都是说清楚了，为什么还要那样对我们长期进行打击呢？为什么造成致死人者无罪，报告死人者反而成了罪人？说穿了就是因为我们的如实向中央反映了当时四川的真实情况和问题，触犯了省委主要领导人。为此，我们要求组织上认真审查这个案子，给我们一个实事求是的结论，并采取适当措施在一定范围内消除影

响。

由于我们提出了实质性不同意见，此后对《平反决定》便不断修改。1982年11月5日，我们就最后一次修改意见稿又向重庆市委并省委组织部提了四条书面意见。

(一) 萧李廖一案，从形式上看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黑帮”的，实际上这一案件是在1963年市委二十次全委扩大会上就定下的，只是当时没有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罢了。因此，平反的问题应首先从1963年说起，然后才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定为“黑帮”的问题。

(二) “萧李廖”一案，主要是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杨尚昆同志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派人来四川了解情况，我们如实作了反映，触犯了省委主要领导人，才被罗织许多罪名，遭受严重打击的。因此，从1963年开始直至“文化大革命”所遭受的一切打击，都不是由于我们有什么说不清楚的问题，或者组织上有什么误解造成的，而是由于我们遵照中央的指示反映了当时四川存在的问题而引起的。

(三) 1982年的修改意见稿连同1978年12月市委的《平反决定》，都只就“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报上对我们所罗织的几个罪名进行平反，其实那几个罪名都是当时为了要整我们而歪曲和捏造出来的本来就不是问题的问题。我们认为这种平反不符合“萧李廖”一案的实际，不是唯物主义者的态度，亦不符合中央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此，我们仍然希望把为什么对我们进行打击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写清楚。

(四) 把对我们平反的问题从实质上写清楚，不单纯是我们几个人的问题，也不只是受“萧李廖”一案牵连的一批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党内民主、是非观念、党的纪律的问题。我们请求组织上认真复查这个案子，还历史以本来面貌，作出正确的结论，并采取适当方式，澄清是非，消除影响，以利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最后我们写道：“萧李廖”这个案件已经过去近二十年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二大以后，我们深感党中央的英明伟大，党的事业更加兴旺发达，我们相信组织上对我们会

有一个正确的结论，我们亦不打算再提什么意见来给组织增加麻烦了。

在这之后不久，1982年12月23日，重庆市委重新下发了《关于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三同志的平反决定》，同时撤销了1978年市委下发的《平反决定》。这次的《平反决定》写道：

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三同志在重庆市委工作期间，工作是好的。1962年2月，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同志，在传达贯彻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市委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各自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批评了省、市委的一些工作；同年7月，中央机关干部萧风（以记者名义）、邓照明同志来川了解情况，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同志向他们提供了四川省的情况和资料，反映了当时存在的问题。1963年4月在市委二十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把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三同志作为思想右倾和“反党活动”进行批判，给予李止舟、廖伯康同志撤销一切职务，留党察看的处分（已执行，省委未批），下放工厂工作和劳动，将萧泽宽同志调农村“四清”工作团工作（实际是调离市委组织部）。他们的一些亲属和有关干部受到株连。“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又把这些问题翻了出来，在全川点名批判，同时把1962年《重庆日报》副刊《巴山漫话》发表张黎群同志写的杂文说成是“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与张黎群合伙经营进行反党阴谋活动”在《重庆日报》上点名批判，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反党阴谋活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许多批判文章《四川日报》同时转载。市委在此前后分别成立了专案组，对他们隔离审查；他们的亲属和有关干部又再次受到株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市委根据省委的意见对此进行了复查，复查结果如下：

一、1962年传达贯彻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市委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期间，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三同志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对省、市委的某些工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是符合党的民主原则的，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是从贯彻农业《六十条》出发的，而且他们所提供的情况是事实，所提意见是正确的。所谓“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反党阴谋活动”

的结论是错误的，应予否定。

二、萧风、邓照明二同志来川了解四川情况，是当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派遣的。事后，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组织部的领导同志曾向省委和市委讲明了这一情况，告知不要追查和批评此事。根据这一事实，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三同志给杨尚昆同志派来四川了解情况的人员提供情况和资料，本是上下级之间的工作关系，把这说成是“进行反党阴谋活动”当然是错误的，应予否定。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对此又进行批判，则更是错误的。

三、《重庆日报》开辟《巴山漫话》专栏，发表张黎群同志写的杂文（省委对此已作没有问题的结论），是报社的正常业务，而且与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三同志毫无联系，根本不存在什么“合伙经营《巴山漫话》，进行反党阴谋活动”的问题。

综上所述，1963年市委二十次全委扩大会议，把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三同志在市委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作为“反党”进行批判，把他们向中央反映情况说成是反党阴谋，作了处理，对李止舟、廖伯康同志给予严重处分，对萧泽宽同志虽未处分，但实际上调离了市委组织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又进一步说成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反党阴谋活动”，点名批判，隔离审查，在省、市党报上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所有这些都是极为错误的，违反了党内民主的原则，给他们在政治上、精神上造成了很大压力和很坏的影响。因此，市委决定对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三同志予以彻底平反，强加给他们的一切不实之词一律推倒，撤销对他们的处分，恢复名誉，并销毁“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所有材料。凡因这个问题受到株连的家属、子女和其他有关同志，也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为我们平反的决定大约先后修改了六次，但我们始终都没有签字。不签字的原因只有一个，《平反决定》没有指明问题的实质是打击报复。可是客观地说，1982年市委的平反决定是实事求是的，只是没有明确点明我们是受某领导人的打击报复。现在看来，作为一级组织的正式决定，也只能写到那个程度。实际上当

时的当事人、知情人和明眼人都心中有数。

从1982到1983年，市委在给我们三人平反的同时，又先后下发了《关于对邓垦同志的平反决定》《关于对于克书同志平反的决定》，还有为高兰戈、王竹、赵济等同志的平反决定。并把给我们的《平反决定》分别寄给受“萧李廖”一案直接牵连的共七十多位同志的所在单位，以消除影响。应该承认，最后的平反决定是诚恳的、认真的、彻底的。至此，从1962年的市委第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开始，到1982年市委为我们平反，历时二十年，“萧李廖”事件才算画上了句号。

5. 走上新征程

1982年底市委为我们平反后，1983年我也离开了科学院成都分院。最初准备调我到成都任市委书记，省委已经找我谈了话。我要求给我两个礼拜的时间，让我了解一下干部情况。可是过了两个礼拜又变了，改调重庆市委任常务副书记，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调我到成都工作我就没有思想准备，既然要我去，我当然要去；现在调我到重庆工作我更没有思想准备。我对省委书记杨汝岱说，在“萧李廖事件”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回重庆工作有难度，我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杨汝岱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我说中央决定了我当然去，但话我得先说，今后如果对我有什么意见，反映我有什么问题，希望你直接告诉我，通个气。他说对啊！干部间当然要通气。就这样我便回到了重庆，开始了新的工作。其他几位“同案犯”和众多受株连的同志也都分别走上了新的岗位，开始新的征程。“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我们不敢稍有懈怠，努力争取把丧失的大好时光夺回来。

我个人，从1978年由重庆调成都科分院工作，1983年又由科分院调回重庆市委工作；1988年再由重庆市委调成都到四川省政协工作，十年间来回转了两个圆圈。这两个圆圈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走过来的，对我来说，又被带进一个新的境界。这个时期只觉得时间不够用，知识不够用，经验不够用，有时精力也不够用。旧的压力解脱了，新的压力又来了。这是两种不同的压力，前者令人沮丧，后者令人振奋。看来我们这一代人

一生注定要在重压中度过。

五、温故而知新——抚今追昔，以史鉴今

从中央七千人大会后因积极提意见和建议而把我们实际上打成“反党集团”，到1982年彻底平反，经历了二十年的磨炼。这是在书本上学不到，工作中感受不到，地下斗争中也体验不到的人生一课。

从平反到现在又过去了二十年，这是翻天覆地的二十年。其发展之快，变化之大，出乎人们的想象，我们真正走上了富民强国之路，进入了伟业中兴的历史新时期。另一方面也面临许许多多新问题，人们的思想认识也随之发展变化。人们在想问题的时候，往往以历史为思考原料，以现实为思考对象，以未来为思考目标。温故知新，举一反三。向后看历史，是为了向前想未来。

1993年我从工作岗位上完全退下来。四十年来，乃至近六十年来往的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像我们这样的人，在中国共产党这个伟大群体里，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我们这一辈子都是在各种各样的风口浪尖上度过的，认真回顾和思考一下自己走过的历程，作一点反思，让自己活得更明白一点，或许也能帮助后来者悟出一点什么道理。

今天回过头来看，“萧李廖事件”的产生固然与个别领导人的思想观念、领导作风、政治道德有关，但更带根本性的原因则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中存在的某些严重弊端造成的。发生这个事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不论是在全国或在四川，此类事件绝非仅此一家，“萧李廖事件”只不过是其中一例不大不小的典型而已。问题的深沉性正在这里。经过二十年的折腾，“萧李廖事件”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但产生这类事件的土壤和条件并未完全根绝，在新的气候和转换的形式下，未必一定能够杜绝同类事件的再现。联系目前实际，回顾历史教训，着眼未来，在许多人的思考中，比较集中于一点：当前，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如何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如何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是一个老话题。对此，中央已经作出了一些重要论断，采取了一些步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与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比较起来，还相对滞后。在前面叙述中，已经

谈到一些看法，这里根据我的认识和体会，把历史反思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再集中作几点探讨。

1. 切实加强党的民主和社会民主建设，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历史上，我们党在长期艰苦复杂的斗争中，形成了许多优良的传统，但却缺乏一贯稳固的民主传统。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有长期残酷武装斗争环境的因素，也有共产国际传统影响的因素，更有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存在深刻影响等因素。这在建国前长期武装斗争和地下斗争环境下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建国以后，在党长期执政并要继续执政领导建设的情况下，如不切实加强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建设，就可能走不出历史“周期率”的怪圈，必然带来严重后果。建国以后的几度严重失误，大失民心，大伤元气，几乎陷党和国家于绝境，其根本的原因，就是缺乏民主，缺乏对权力的制约机制，造成个人专断，一意孤行，并可能形成新专制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经济建设事业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为了挽救濒于崩溃的经济，改革从经济领域着手是十分必要的，完全正确的。现在要巩固这一成果并继续推进这一事业，就需要相应地加强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核心问题是加强党的民主建设，进而带动国家和社会的民主建设。只有加强政治民主，才能适应新的经济基础，推进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持续高速发展；才能长期保持决策的科学性，避免可能出现大的风波和折腾；才能正确选拔和监督各级领导干部，促进德才兼备、开拓进取的人才成长，从根本上防止腐败，防止权力变资本，公仆变老爷；才能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凝聚人心，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具有主人翁感，振兴民族精神，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消除各种明忧隐患，抵御任何风险，全面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摆脱“周期率”的怪圈，实现长治久安。

对于加强党的民主和社会民主建设，历来有种种不同看法和多重疑虑，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把发扬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与加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

原则对立起来，把加强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主张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把领导人所不满意、不爱听的意见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自反右派运动以来，民主自由被搞得很臭，成了一个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坏字眼，往往把讲民主自由与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击我们不民主不人道的言论等量齐观，混为一谈。这种看法和做法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有害的，实际上是一种掩饰自身错误的遁词。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建国后的历史上看，无论是“反右派”或是“反右倾”等搞得很厉害的几次政治运动，人们都是根据党的要求、响应党的号召提意见和建议，绝大多数人意见和建议都是善意的、正确的，是为了改进和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它同敌对势力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截然相反的两码事。而实施打击的领导者恰恰违反了党的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表面搞得轰轰烈烈，气势宏大，令人畏服，自鸣得意，其结果是自毁长城，自我孤立，严重削弱了党的领导，损害了党的形象。我们党正是为了争取民族和人民解放，为了实现人民当家做主，高举反帝反封建和民主富强的旗帜，才吸引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向反动派作斗争并取得最终胜利的。恩格斯说：“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共产党怎么能压制民主，将民主自由当作资产阶级的专利品，设置禁区呢？退一步说，即使有的意见不一定正确（正确与否要经过实践检验），也不能因噎废食，轻意封杀，堵塞言路。万马齐喑、鸦雀无声才是最可怕的。七千人大会后，陈云同志说：“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这几年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教训太深刻了，建党以来，莫此为甚，绝对不应该再有重复。可惜我们并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

二是担心加强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会影响经济建设的中心位置；加强民主建设会影响社会稳定。这个问题应该辩证地看。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和方针恰恰是为了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当然不应该偏离经济发展这个中心。现在的问题正

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软环境跟不上，有些上层建筑已经不适应经济基础，影响了经济的发展，阻碍了社会进步。社会稳定是必须坚持的，但稳定不等于没有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时时处处无所不在。矛盾不怕暴露，只怕积累。要有多种渠道反映群众意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免得矛盾积累多了爆发起来不可收拾。还应看到，当前存在的一些社会矛盾恰恰是由于缺乏民主造成的。因此，民主建设的加强，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进行，将会更加促进经济大发展、社会大稳定。

三是有人认为，在党的领导路线错误的时候要强调民主；领导路线正确的时候要强调集中。我认为这种理解要不得。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不是针对一时一人一事的权宜之策，而是为了保证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能代表大多数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意志，实行正确的领导，保证全党的战斗力而制定的基本的组织原则。这项基本原则“不因尧存，不以桀亡”。正确的领导也应受到党组织（委员会、代表大会）和党员，以及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制约。否则，在一定条件下正确可能转化为错误。一旦错误路线形成气候，尾大不掉，再强调什么民主就为时已晚。殷鉴不远，不可或忘。

再从更深层面进一步思考，便涉及一个核心问题：自“五四”以来，经过几十年浴血奋战，赢得民主革命胜利后又执政几十年的中国共产党，应不应该实行和能不能够承受民主政治？几千万中国共产党员和十几亿中国人民应不应该享受和能不能适应民主政治？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比理论更尖锐的实践问题。

加强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建设，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如同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必然涉及权力分配和利益调整，其复杂性可想而知。根据我们党和国家的实际情况，加强民主建设，应该积极主动地、自上而下地有序渐进，决不能清谈误国，各行其是，一盘散沙。在民主的基础上形成集中，产生强大的权威——由经过实践检验得到群众公认的真理权威、权力权威和道德权威相结合的权威，以保持党的执政地位长期巩固，保证党的事业持续顺利发展。

加强民主建设，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做表面文章，需要扎扎实

实实全方位、多层次地进行。

第一，是民主作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都必须置身于党的集体领导之下，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决不能高高在上，把自己领导的范围当作个人的领地，搞一言堂家长制，个人说了算，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用粗暴的方法、违法的方法加以压制。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没有真正的“言者无罪”，就没有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也不会有领导班子内的真正民主，这是发扬民主的起点。民主作风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政治素质，是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

第二，是民主制度。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时就提出用民主的办法来解决“周期率”的怪圈。这是一针见血的经典名策，是不变的铁律。邓小平同志也讲制度比人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在于扩大民主，约束权力，健全法制，加强监督。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否则必然导致专制和腐败。自己是难以监督自己的，自己打自己的屁股打不痛。古谚有云：“镜不能自照，尺不能自量。”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不应是同一人，正如裁判员和运动员不应是同一人一样。最有效的监督来自广大人民群众。这就需要用民主、用法制来加强监督。民主与法制密不可分。民主是法制的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保证。没有民主的“法制”实际上还是人治；没有法制的民主，民主终成空话。如果连宪法党章都可抛之九霄云外，屡遭践踏，还有什么民主法制可言？建国以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掌握极大权力，政出于党，少有约束。只有民主治党，才能民主治国。因此必须建立健全强有力的党内民主监督机制，通过加强党内民主进而推动国家和社会的民主。

第三，是民主氛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毛泽东同志也说，要在全党全社会都“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是要不断创造条件努力达到，也必须达到的境界。

改革开放以来，在以上各个层次上我们都有许多进步，但还有较大差距。我们需要有一个与经济建设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计划和安排，要有时间表，要有透明度。在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中，我以为当前的一个重点应该是开放言禁，真正实现言论出版自由，加强舆论监督。这是民主政治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也是一个切入点。这是宪法已有的规定，不是该不该的问题，而是办不办的问题。总不能以一纸内部政策，就可以违背宪法的根本精神。因此，我们要努力营造更为宽松、融洽的环境，保障言论出版自由。要改消极防范为积极鼓励，改被动限制为主动引导，改说假话空话套话为说真话实话心里话，改“出口转内销”为维护人民知情权。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也可能带来一些麻烦，但总是利多弊少。而且这是绕不开的一关，必须突破的一关。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使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在经济建设中学会经济，在民主建设中学会民主。

2. 密切联系群众，凝聚人心，建立民信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人民群众建立血肉联系、鱼水关系，得到人民群众衷心信任与支持，是我们党得以渡过各种艰难险阻，克敌制胜的根本原因，并且成为我们党的一项优良传统。但是执政以后，这个传统实际上有所退化。一是以主观意志代替客观规律和群众心愿；二是以粗暴方式处理党内和人民内部矛盾，听不进来来自下层的呼声，听不得逆耳之言。从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均造成惨痛损失，留下严重后遗症。像四川，在和平建设时期竟非正常死亡那样多人，古今未有。谁都知道世间最宝贵的是人，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如果对群众死活都不顾岂不愧对党性良知？在各种运动中，打出那么多形形色色的“分子”，包括在工农基本群众中都要打一批“反社会主义分子”，从干部到群众都担心挨批判，戴帽子，惶惶不安，缄口不言。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做到依靠群众、联系群众、鱼水深情呢？

进入新时期以后，随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法制建设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强有力的推行，从总体上讲，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或缓解了长期笼罩在人们头上的物资匮乏

乏、生活贫困、思想禁锢、情绪压抑的困扰，改善了党与群众，特别是与广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但是在新形势下又产生了新矛盾，出现了贫富分化和腐败的困扰。这成为当前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两大亟待解决和正在设法解决的问题。

这虽然是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难以完全避免的问题，但也是脱离群众的大问题。分配不公、贫富分化使一定数量的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感到不满。这个问题要靠大力发展经济、调整分配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制、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来逐步得到抑制和解决。而腐败问题则更是党内党外、上上下下无不深恶痛绝的毒瘤。它腐蚀党的肌体，败坏党的形象，危害党的生命，破坏人民群众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任和凝聚力，阻碍党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进展。近年来，经过对大多数党员干部的教育再教育，通过对极少数贪污腐化分子的打击，以及一些法律制度建设的加强，某些最显眼的贪赃枉法的势头多少有所收敛，但远未得到遏止。腐败现象也不止于贪赃枉法，它像霉菌一样已侵入多个领域，其最核心的部位是吏治腐败和由此形成的“官场风气”。权力场像个染缸，具有极大腐蚀性，有的人厕身其间，见惯不惊，习非成是，随波逐流，逐渐变色。广大人民群众对此最有切身感受。最终衡量党风状况和党群关系的基准不是自我感觉，而是人民群众心中的那杆秤。人们对当前经济建设和各项建设的满意程度和对腐败现象的厌恶程度适成鲜明的反差。

腐败的根源是权力过分集中，缺乏监督和制约。因此治本之道还是扩大民主，制约权力，健全法制，加强监督，真正地加强和完善党的自身调节机制。这又回到前面讨论的加强民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上来了。在本质上这是同一个问题在不同方面的反映。如果我们不进一步狠抓治本之道，即使在一些问题上费了很大力，往往事倍功半，有时甚至费力不讨好，把人心搞淡。

3.当前仍然是“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倾路线的危害极大，“左”的观念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

建国后的前二十年中，反右派“左”，“大跃进”“左”，反

右倾“左”，“文化大革命”更“左”。再回顾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也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排除各种思想阻力的干扰，主要是“左”的干扰。有的人一贯挥舞“左”的大棒；有的人赞成改革开放，但遇到矛盾又容易回潮。试想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不就是针对“左”倾大棒和“左”倾回潮而讲的吗？何等的分量！再次起到坚持航向的作用。否则，历史不是不可能倒退的！这难道不足以引起人们深思吗？

当前，在各种社会思潮中，确有一些右的倾向需要注意。要注意市场经济的种种负面影响；注意千万不能脱离我们党赖以生存的基本群众。但从总体上看，主要还是防“左”。据我个人的理解，小平同志的这一论断是一个战略性估价，不完全是针对某些具体问题而言。因为要继续深化各项改革，需要革除的是“左”的遗毒，主要障碍也是“左”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当然，有些工作上的问题应该改进，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不宜都以“左”右来上纲划线。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断发展的，必须与时俱进。几经曲折，我们终于认识到市场经济是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同样我们也认识到民主与法制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大力加强民主建设，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继续消除根深蒂固的“左”的思想束缚，这是我们党当前在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上更需引起注意的问题。

历史长河滚滚向前，中间免不了出现漩涡，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一个伟大人物的错误必然由另一个伟大人物来纠正，伟大的邓小平纠正了伟大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但是历史并没有到此终结。我坚信我们党终归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列，必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

附 记

在一些老同志的建议和督促下，我从2000年10月~2002年10月，用两年时间写成了这篇回忆录。随后又搁置了两年，2004年，四川省当代四川史编委会的内刊《当代史资料》分两期摘要连载了我的这篇文章。现又在《当代四川要事实录》中全文刊行，对此，我非常感谢。

撰写的过程是一个再学习、再思考、再认识的过程，我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再教育。文章在《当代史资料》摘要发表后，我听到了一些反映。对我的观点，有赞成的，也有不赞成的。无论是赞成或是不赞成的意见，都推动我进一步反思历史，认识当前，都对我有帮助。

我在这篇文稿中所说的，都是历史事实。文中所记，除了我们亲身经历之外，所引用的数字，全部来自近年的公开出版物和已经开放的档案。共产党人作为唯物主义者，应该敢于讲真话。但真话中不免有逆耳之言，未必都能得到公正的对待。“萧李廖事件”的前前后后，都与讲真话相关。现在旧话重提，无非是希望共同总结教训，别再让类似的悲剧重演。当前，党中央再次强调要讲真话，情殷意切，令人感到非常鼓舞！

成稿之后颇有如释重负之感，却又连续发生不幸的事：我的几位至友相继撒手人间。先是张黎群，于2003年3月11日逝世；之后是萧泽宽，于2003年6月17日逝世；再后是李止舟，于2004年2月9日逝世。他们三位都是抗日救亡运动中投身革命，立志救国，追求民主，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老战士。正是基于这个坚定信念，他们襟怀坦荡，关心大局，敢于直言。终其一生，出生入死，虽历经坎坷，矢志不渝。我和他们曾是“同案犯”，是道义之交，知己之交，患难之交，半师半友之交。如今他们带着欣慰，带着

忧虑，带着希望离去，“萧李廖”三个也只留下我一人了。翘首苍穹，不胜悲凉。天上人间，永不相忘。

初稿写成之后，曾分别送请他们三位审阅。他们在重病中都认真看过，表示首肯，并提出修改意见。老萧和老李还委托我把他们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补充进去。现在这篇回忆录的全文刊行，也是完成他们的嘱托。

我还要特别感谢著名学者、党史专家李锐同志，他不顾年高体弱，刚做过安装心脏起搏器手术，仔细审读了全稿，并写下一篇很具分量的精辟文章——《从一个案例看一段痛史》，真是画龙点睛之笔，点石成金之论，为拙作大添光彩。

在本文的撰写中，还得到不少部门和同志的支持帮助，尤其是党史工作者胡康民同志和赵权璧同志，他们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态度，从内容到文字，都下了很大功夫，帮助我完成此项作业。谨在此一并致谢。

事情已过去四十年了，加以当时所处环境窘迫，现在的水平有限，有些记忆和认识难免有误，我期待着读者和朋友们进一步的批评、指正。

廖伯康

2005年7月

附录

从一个案例看一段痛史^①

| 李锐^②

廖伯康同志以自己的坎坷经历，花两年时间，写出了《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顾》；通过这个地方典型案例，反映了他们所经历的这段当代痛史。

“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全国饿死了多少人？我没有看到过精确的统计数字，只看到过几个推算的数字，有说三千万的，有说四千万的（我的有关文章引用过这个数字），各有各的推算根据。如果不说全国，只说某一个地区，号称天府之国历来富裕的四川省（那时还包括重庆），却有颇为精确的数字。即1960年底比1957年全省人口减少一千万。

这个数字是伯康在回忆录中提供的。他说明了这个数字的文件根据：1957年的《户籍年报》上，四川全省人口是七千二百一十五万七千，而1962年5月省委批转的有关附件中，所列1960年底全省人口总数是六千二百三十六万，相差正好约一千万。统计数字中一条人命只不过是“一”，这是太高的抽象，回忆录中还提供了很多具体的例证。如雅安地区荣经县委书记说的：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一个村子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尸的人也没有了，只得找另一个村的人来埋，这些人挨着饿挖坑，是重劳动，也死在坑边了，只好再找其他的村来埋这些人。这是一页怎样腥风血雨令人战栗的历史啊！

问题的严重还不只是饿死了这样多的人，而在于当时四川省委的个别领导人封锁饿死人的消息，继续调运粮食“支援兄弟省

^①该文载于《炎黄春秋》（北京）2004年第一期。

^②李锐，原中组部副部长。

市”，以致到了1961年、1962年还在饿死人。“大跃进”不是四川一省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正如中共中央第二个《历史问题的决议》^①说的，是“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在这一场遍及全国的巨大灾难中，四川（还有河南等省）是全国最突出的重灾区。其所以如此，就不能不谈到当时四川省委和中央西南局的那个主要负责同志了。1958年、1959年那两年参加中央的会议，我是有亲身感受的。“抬轿子”抬得最起劲的，是上中下游三个人。尤其是上游的这位，跟得最紧，对推行极左政策措施特别起劲，特别卖力，对于农业的破坏也就特别严重，实际造成农业的减产。在农业大放“高产卫星”，虚报产量的时候，他也不怕把牛皮吹得大。1959年4月上海会议时，田家英在四川农村作了调查，就同我谈过他在乡下挨饿的情况。可是，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就批评他，不同意他的调查。后来更是硬充好汉，根据虚报的增产数调出粮食，使广大农民失去赖以维持生命的口粮。这就是当时四川饿死上千万人的直接原因。出了这样大的可怕问题之后，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的对策仍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动摇性的表现。一些人对此忧心如焚，为了使事态不再恶化，为了把众多的饥民从死亡线上救出来，他们想方设法向毛主席写信，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要知道，当年大刮浮夸风、大报粮食高产卫星等虚假现象，在庐山会议之前，中央早有察觉。因此毛泽东在1959年4月29日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其中提出了一个“讲真话问题”，说“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为了鼓励讲真话，还这样说道：“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

^①指1981年6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曾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上两个决议均简称《历史问题的决议》。

亏。”问题出在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大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终于导致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1962年初召开的中央七千人大会，正视现实，发扬了一下民主，刘少奇再次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观点，让各地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而且还强调要实行“三不”，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可是，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回到四川，仍然不肯面对现实、仍然捂盖子，对存在的严重情况仍然轻描淡写，仍然强调“反右倾”斗争的必要性。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市的三个领导干部萧泽宽（市委组织部部长）、李止舟（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廖伯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和有关同志，于1962年上半年，分别以书面和口头形式向中央反映了四川饿死人等真实情况，以及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的霸道作风。他们为使灾情不再扩大，挽回一些损失，真可说是忠心耿耿，为民为党为国而进言。可是，这就触怒了四川省那位大权在握的主要负责同志，随后借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之机，秋后算账。这次全会是毛泽东继续向“左”倾道路发展的一次重要会议（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和前期运动准备），于是他们三人就被打成“萧李廖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之初公开批判时，又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他们经受了更加残酷的迫害。这方面有些具体记述，将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资料。

作者在记述“文化大革命”时期颠沛流离的经过中，记下在北京地质学院接待站的经历，我以为是一份很有意义的记录。通常，人们一说起红卫兵、造反派、专案组时，总是很反感的。可是伯康在这里遇到的一些大学生，仍有着年轻人的热情和正义感，听了伯康的说明之后，就尽力帮助他们，想为他们讨还公道。尽管当时完全没有可能解决这样的冤案，但是这些大学生所作的努力，是令人感动的。这也使我们看到，即使在暗无天日的十年浩劫之中，仍有一些正直的人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做一些好事。伯康说：“我们和这些青年学生相处一年多，在那动乱的年月，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过火越轨的行为。他们不辞艰辛，不畏风险，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做了不少调查工作，无非是为了弄

清我们问题的真相，辨明是非曲直，伸张正义。他们没有个人功利目的，动机是纯正的，为人是正直的。他们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写出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这就可以增强对国人人性的信心，对我们民族未来的信心。

回忆录中对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着墨甚多，从中可以看到我们当时专制体制的可怕及其惯性运转的力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1959年庐山会议时，同田家英、周小舟闲谈，我们都有这种感觉，周小舟还曾当面向毛主席说过这一感觉。因此，他们三人落难，既有全国背景，更具有四川特色：好端端一个天府之国被搞成饥饿之乡。20世纪50~70年代，在长时间“左”倾高压路线下，从党内到党外，从中央到基层，从高层领导到普通平民，都有人不同程度地不断地抗争、抵制、谏议，虽然绝大多数被扼杀，遭迫害，付出了沉重代价，却为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新时期的到来打下了群众基础。

历史总是在种种光明与黑暗、正确与错误中曲折前进。对历史尤其痛史不能回避，也不应淡化。因为，只有深刻了解了过去所犯的 error，走过的误区和弯路，我们才能加深对新时期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增强自觉性；同时，对当前党内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也可以从历史镜子里见其影子，从而提高识别力，注意防范，推动改革。历史的教训被正确认识，就会成为精神财富。我们对过去的痛史，决不可掩掩盖盖，怕痛怕丑，忌讳多端；应当留给世人和后代以真实的信息，让大家都聪明一点、坚强一点。如果当代人淡忘了刚刚过去的这段痛史，后来人不知道这段痛史，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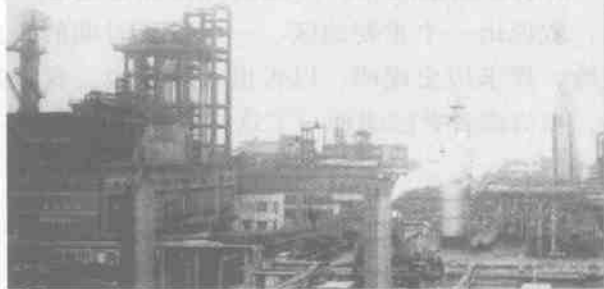
不论东方西方，近代现代，重温历史，对比今昔，成败关键之一在于是否有一个民主的制度，有一套科学决策的机制，有独立的法治体系，以保证国家、社会正常生活的运行，以保证执政党正确路线的执行、运转和发展。否则，很多事情会被扭曲。如我们经历过的人治代替法治，专制压制民主，主义信仰变成神学宗教，党的崇高威望成为个人迷信的工具，铁的纪律成为整人的手段，最杰出人物做出最荒唐事情，这难道不是令人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吗？难道还不应当彻底转变过来吗？

为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要做的事情很多，我认为，关键之一在言论自由。这本是宪法实施、政策规定中的应有之义，但又成了建国以来的老大难问题。历来有张无弛，有严无宽，乃至以言定罪。过分强调舆论一律，自然唯我独尊。一花独放，导致百花摧残，毒草肆虐。不实行遵守宪法的言论自由，不解放思想，就谈不上先进文化。言兴邦昌，言灭国亡，这是古人都知道的真理。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讲言论自由的。马克思主义也只能在实践中，在自由评价和自由研究中，得到检验，得到比较，其错误者纠正，其正确者发展。

伯康在耄耋之年，怀忧国忧民忧党之心，回首往事，着眼未来，叙说出一个重要地区、一个重要时期的真实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探求历史规律，以告世人和来者。我拉杂地写下一些读后感，相信读者会感谢他写了这样一篇回忆录的。

第四部分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赴京告状侧记
1968年的「云阳武斗」
段君毅同志在四川
我与「三化」工程
川化建设工程追忆
回忆泸州长江大桥建设
升钟水库建设



|| 「三化」工程之一的泸州天然气化工厂。



|| 北京铁道医学院「长征」串联队从成都开赴重庆。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 赴京告状侧记

曾庆祥^①

1966年11月，“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挟持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赴京告状，周恩来总理从头至尾亲自处理了这一事件。作者作为廖志高的秘书，亲历了事件的全过程，详细地回顾了这段历史。

1966年8月，北京学生陆续南下来川串联，省内的造反组织也相继出现，四川局势开始动荡。到11月，全省特别是成都市越来越混乱，一再遭冲击的西南局和省、市委几近瘫痪，领导干部被围攻批斗甚至被扣留不放。据当时省委向中央的报告：“省委机关被学生进驻，其中办公厅已被全部占用”，“11月26日，廖志高、李大章^②、廖井丹^③等省市负责人被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学生抓走，至今未放回。”当时，廖志高被北京学生控制在陕西街省高教局机关，他们同刚成立不久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以下简称“兵团”）共谋策划，决定挟持廖志高到北京告状。

一、阻拦、抢占火车的“革命行动”

11月27日凌晨，“兵团”总部的一些人挟持廖志高到了成都火车北站，随行的工作人员除我和警卫员刘寿祥外，还有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裘尧镕。当时天还没亮，一些厂矿单位和街道的队伍，打着兵团某分团的旗帜，敲着锣鼓，从城里不断赶来，车站内外人头拥挤，秩序异常混乱。一列从成都开往北京的

^①曾庆祥，长期担任廖志高同志秘书。原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主任。

^②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四川省省长。

^③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共成都市委书记。

火车被阻拦抢占，车上已经挤满了人，廖志高被带上其中一节硬卧车厢，车站站长也被抓了来。他们逼廖志高给站长下命令立即发车去京，廖志高以地方党委无权干预铁路系统的工作为由婉言拒绝，站长也表示需请示铁道部才能决定。临近中午，站上的喇叭开始反复广播：“周总理指示，有问题就地解决，不要来京，更不能阻拦和抢占火车。”此时，有的“兵团”组织偃旗息鼓准备撤离，有的则进行干预阻止，人群中出现争吵甚至相互谩骂和抓扯的混乱情况。后来在北京周总理接见的一次会上，“兵团”总部一位负责人讲到当时出现混乱的原因时说：“开始是站长办公室的人答复我们，铁道部请示了‘中央文革小组’，说只要有车票就可以去京，不久又突然反复广播周总理不让去的指示。我们当时认为这是成都铁路局和车站搞的鬼，蓄意制造矛盾和混乱，从而导致各个分团甚至‘兵团’总部领导人之间的严重分歧。有的主张先撤回再说；有的则认为‘中央文革小组’支持我们，坚决反对撤离。经过激烈争吵辩论，直到傍晚才最后决定仍然去京，不让坐火车就抓住廖志高徒步前往。当时还准备再抓上成都市委分管工业的副书记冯焕武一道前往，后来没有找到。”

就在车站广播周总理指示后不久，一伙自称是“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医支队”的人，来车厢里对廖志高围攻谩骂一阵后，说他们坚决支持“兵团”上京告状，不得已才阻拦抢占火车，这是针对省、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采取的“革命行动”，由此带来的后果应由省市负责。并且拿出他们事先拟好的《声明》，逼迫廖志高签字，否则他们将采取更大的“革命行动”，卧轨阻拦成都所有发往各地的火车。最后，廖志高被迫在《声明》上签了字。

当晚，“兵团”总部主要负责人李长友（第五冶金建筑公司驾驶员）来车厢上宣布徒步赴京告状的决定，并指派“兵团”总部成员林云钦（成都无缝钢管厂工人）带领徐尚林（成都电线厂）、侯在均（西南电力修造厂）两名青年工人，把廖志高挟持到车站附近的省手工业管理厅机关会议室暂住一宿，准备次日（28日）动身上路。此后，即由林云钦等三人监控廖志高一直到后来返回成都，在京期间，他们都参加了总理的几次接见。我们

同这三个人相处近一个月，尽管他们都是造反派，又负有监控廖志高的任务，但除了平时对我们有所戒备外，从来没有对廖志高提出过任何无理要求，他们都是工人队伍中正派、直爽和比较通情达理的好同志。

28日从手工业管理厅出发前曾出现过一个小插曲。两位机关食堂炊事员吵闹着要面见廖志高，他们是老工人，林云钦等人不便阻拦，见面后两位老炊事员对廖志高问寒问暖，态度十分亲切友好，临别时还硬将一大堆煮熟的鸡蛋硬往我和警卫员小刘的口袋里塞，边哭泣边嘱咐“一定要注意廖书记的健康和安全”，情绪非常激动，小刘要给付钱他们坚决拒收，小刘也被感动得流下了泪，在一旁看管廖志高的徐尚林等两位青年工人也不好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后，1982年廖志高来川治病休养，才得知当年这两位“炊事员”实际上是手工业管理厅的老红军干部，其中一位叫杨宗清的还到金牛宾馆来看望廖志高，他回忆说：“当时到处都乱哄哄的，很多事情我们都看不惯、想不通，那天听说要拉你上北京，我们既焦急担心，又爱莫能助，只好冒充炊事员来看看你，否则人家不会让我们进去，回想起来真是啼笑皆非。”这些都是后话，但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中这些老干部忧国忧民和关心爱护同志的精神。

二、总理和廖志高通电话

28日上午，在林云钦等人的监控下，廖志高和我们分乘“兵团”弄来的两辆小车出发，沿途看到零零落落的步行队伍中还有一些老人和个别儿童。进入新都县境，早已在公路旁等候的县委副书记罗世发（全国劳模）拦住我们说：“周总理要找廖书记通电话，请立即去县委同北京联系。”到县委后，罗世发安排林云钦等人在会议室等候，只带领廖志高和我到他的办公室，很快同总理通上了话。总理首先问廖志高：“你身体怎么样？能吃得消吗？”廖志高回答：“10月中央工作会议回来后，受到的冲击越来越大，劳累一些，但身体还可以，请总理放心。”总理又问：“他们来京到底要告什么状？”廖志高说：“我也不清楚，从这一两天的接触看，大多是涉及一些厂矿单位领导人压制群众、转移‘黑’材料和工作、生活作风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总理说：

“这些问题只有在本地本单位才能解决嘛！能不能劝阻他们就地解决，不要来京？”廖志高说：“下面劝阻已经起不了多大作用。前一两个月，我们按照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对发生的几起集体进京上访的人进行劝阻，多数人还听招呼，仍有少数不听劝阻的到了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又是接见又是慰问，有的人（实指陈伯达）还鼓动说：‘你们冲破走资派的重重障碍，来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我代表中央文革对你们的革命行动表示支持和欢迎。’载有这些消息的传单和大字报不断传回来到处张贴，使我们非常被动，而且使上访甚至抓干部上京告状之风越刮越大，连我们省委组织部长安法孝最近也被控制到北京去了。因此，目前要劝阻确实难度极大。”总理沉默了一阵又问：“你身边还带有什么人？”廖志高回答：“除秘书、警卫员外，还有办公厅一位副处长。”最后，总理嘱咐：“你要注意保重身体；目前情况复杂，还要注意安全。”我当场只记下了廖志高的谈话，通完电话后，他当即给我复述了总理的讲话内容，还十分感慨地说：“总理还是像过去（廖志高过去曾较长时期在总理领导下工作）那样，考虑问题非常细致，关心干部也十分周到。”后来我们到了北京，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对廖志高谈道：“12月28日早上7时，总理通宵办公后刚刚准备休息，就得知你被拉上路的消息，当即交代我们设法尽快找到你，他要和你通话。十点钟找到你，向他报告时他早已在办公室等候了，实际上就没有怎么休息。”

中午在新都县委吃午饭，廖志高向林云钦提出：徒步去北京，路远而且越往北天气越冷，希望“兵团”说服老弱和儿童回去。林云钦对总理和廖志高通话时县委把他撇在一边，早已十分不满，就气冲冲地说：“没法动员，全都得去！大不了死他几十百把人！你们怕出事就派车送嘛！”饭后，廖志高给我交代：“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问题，请省委考虑派几辆大客车，配上医护人员，沿途把老弱病幼尽量劝阻回去。”我把他的意见以及同总理通话的情况，电话告诉了省委办公厅值班的同志。

三、总理来电，要求选派代表去京

28日下午抵达广汉，“兵团”步行的队伍也陆续抵达。省委办公厅按总理电话要廖志高保重身体、注意安全的精神，增派了

省委门诊部医生任长方和保卫科长廖肖一赶来随同我们去京。当晚，县委收到经总理亲自审改，以国务院名义发给“兵团”的电报，主要内容是：“欢迎你们派代表（小厂一人，大厂二至三人，总数请不要超过三百人）来北京商谈。……请你们认真考虑：成千的工人同志来北京请愿，既不利于接待和会谈，也会影响你们工厂的生产……来京人数确定后望告，以便通知铁道部配车，车费由所属厂矿解决。廖志高同志也同你们的代表一道来京。”^①廖志高立即要县委连夜大量翻印，同时找来“兵团”主要负责人李长友，希望他们按电报要求尽快商派代表，待电报印好后立即组织力量散发下去做好群众工作。李长友表示同意，电报也于当晚深夜印好并散发出去了。

29日早饭后，北京工业大学来川串联的两名学生郝小林（女）、冯培新急急忙忙来县委向廖志高反映：“我们为了实现工农结合和向工人阶级学习的愿望，这次一直跟‘兵团’从成都出发，昨天深夜又自告奋勇到工人群众中去散发和宣讲总理的电报，却受到一些人的阻挠和围攻。他们说电报是西南局和省市委伪造的，是廖志高搞的鬼，并且鼓动群众继续北上。目前，‘兵团’领导人之间争吵不休，群众也出现了分裂……”，话未讲完，又有自称是某街道分团的几十个人，冲进县委气势汹汹地围攻廖志高，说电报开头对“兵团”的称呼是“成都工人造反团”，少了“兵”字特别是没有“革命”两个字，显然是别有用心和伪造的。经廖志高耐心说服解释，他们始终不相信，提出要立即同总理办公室通电话核实。当找到童小鹏同志证实确给“兵团”发过这样的电报后，又进一步要童小鹏念电报全文，经逐字核对无误后，仍然在电话上纠缠和质问童小鹏，为什么要取消“革命”二字，并在电话上破口大骂：“到北京后要找你们算账！”在场的北工大学生郝小林，出身于外交部干部家庭，对总理十分崇敬，目睹这一情况，愤慨地说：“真没想到工人阶级队伍这样复杂，竟然对总理的指示抱这种态度。”说到伤心之处，不禁失声痛哭起来。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四百五十八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当天深夜，李长友带上郝小林、冯培新急急忙忙来到县委，说现在情况越来越复杂，局面已难以控制。“兵团”决定林云钦带上廖志高尽快离开队伍，先设法乘火车去京，当面要求总理允许已经上路的工人全部去京，他们留在后面继续做工作。同时提出要郝小林和冯培新连夜赶回成都转乘飞机回京向总理详细汇报。廖志高听后表示：在目前情况下，只好这样办。并要我立即电话通知省委办公厅接待两个学生并为他们购买机票，同时对我们乘火车去京一事向总理汇报后尽快作出安排。

30日凌晨，林云钦和我们提前从广汉乘车赶到绵阳，中午接到省委办公厅电话：已安排，请于今晚12点前赶到江油车站，乘由成都开往北京的特快，到时由列车长接待。当晚，绵阳地委派车将廖志高和随行五名工作人员，加上林云钦等三人，一行共九人送到江油，12月1日凌晨1时登上火车，12月2日深夜抵京，中央办公厅安排我们九人全部住中直招待所。刚到招待所就接到通知：总理准备立即接见。

四、阻拦抢占火车是错误行动，来京只能派代表

我们稍事休息后赶到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已是12月3日凌晨。周总理因处理其他公务还没有来，趁等待的时机，我随廖志高就近去总理办公室看望童小鹏。抗战时期，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廖在地下党川东特委，都分别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了较长一段时期，见面后很自然地谈起总理的近况。童小鹏说：“‘文革’以来，总理简直忙得不可开交，国际国内、大事小事都得管，头绪多，矛盾大，经常通宵达旦工作，很难安安稳稳地睡上两三个小时。他要办公室几个秘书轮流值班休息，自己却一直顶着干，经常搞得精疲力竭，看到他这样毫不考虑自己地拼老命，大家既着急又担心，真令人心痛！28日那天早晨，他通宵办公后正准备休息，得到你被抓上路的消息，就一直坐在办公室等着同你通电话，根本没有休息。即使让他去睡他也睡不着，真拿他没办法！”廖志高听后心情十分沉痛地说：“我们工作没有做好，这次又给他添了不少麻烦，实在感到内疚！”

我们回到会议室，先期回京已向总理汇报过“兵团”情况的郝小林和冯培新也在座。大约凌晨一时，总理来了，他刚一坐下

就首先表明：“从11月27日知道你们在成都火车站的情况后，就一直关心和跟着你们，到广汉时发去的电报上称呼‘造反团’，没有‘革命’两个字，这只是个简称，没有轻视你们或其他的意思。”接着，他对在成都火车站发生的拦车、抢车行为提出批评：“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领导和发动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这同我们过去革剥削阶级的命是两回事。你们有权利批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但不能拦车、抢车，把交通运输搞断。你们的革命行动我们支持，但不是每一项具体行动，特别是错误行动也都要支持。拦车抢车、影响交通不仅不是革命行动，而且是错误行动。你们的组织名称是‘工人造反兵团’，这样乱干，还像个工人阶级的组织吗？像个‘兵团’这样的军事组织吗？造反，也要看造什么反，造谁的反嘛！”接着又批评廖志高：“听说你签字承认他们是革命行动？这不对嘛！你承认我们不能承认。”

林云钦在汇报中说，目前已经上路的人动员不回去，代表也难推选，他代表“兵团”要求总理允许他们全部来京。周总理坚持原则明确表示不能同意，同时又耐心说服：“中央的态度很坚决，就是不能同意全部都来，只能派代表，这一点我们决不松口。步行来京我们也不赞成，你们不怕苦的精神无可非议，但这会花很长时间，必然影响生产，这样的行动我们决不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不应当影响、破坏生产，还应当促进和发展生产嘛！你们是工人阶级，应该懂得这个道理！”“最近中央刚刚把红卫兵串联暂时停下来，准备加强交通运输，抓紧在冬季抢运生产上急需的原、燃材料和物资，这是当前十分急迫的大事，你们也替中央想想，能不能答应你们的要求？”周总理苦口婆心一再说服，但林云钦仍然固执坚持他的要求，而且态度急躁，语气也较生硬。这时周总理生气了，他说：“那好！林云钦同志，我们两个人换个位置，你来当总理。如果全国都像你们那样，把交通搞断，影响了生产，你怎么办！？你们一两千人的队伍都要步行来京，走三千多华里，而且越往后天气越冷，遇到这种情况，你说说该怎么办！？”一阵沉默之后，他又批评廖志高：“听说你同意派汽车运工人？”“我在这里公开宣布：这是错误的！”

这时，林云钦才没有再吭气。后来在第二次接见会上，林云钦主动向总理承认错误，诚恳地作了检讨，总理说：“有错误，认识了就好！”

回到招待所，我带着埋怨情绪给廖志高说：“下面干部的处境那样困难，签字、表态、派车都是迫不得已的事，今天还遭总理批评，特别是当着‘兵团’那些人的面来批评，我硬是想不通！”这时，廖志高给我讲述了一段他亲身经历的一段往事：“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中，一些在四川地下党工作过的同志被错误审查，为了弄清和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1943年春，中央把我从重庆调回延安。先让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接受组织对我个人的审查，由于有的同志不了解地下工作，给我提出‘重庆是国民党最高领导机关所在地，特务横行，你在那里呆了六七年之久，又是地下党的头头，为什么没有被捕过’等无法回答和解释不清的问题，而且一直纠缠不让我过关。我想不通，去总理那里倾诉自己的委屈情绪和困难处境。不久，总理来到审查小组，首先向大家介绍白区地下工作的特殊性、危险性和所处的复杂环境，然后当着大家的面批评我的委屈情绪和态度，要我正确对待组织的审查，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要采取欢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事实的可以申辩，但不能同大家顶撞争吵；当然也不能什么都包揽下来，更不能投人所好，随便乱说，这不仅给自己同时也会给组织上带来更多的麻烦。总理对我的批评，实际上也是讲给大家听的，这以后就再没有人纠缠，我也很快顺利地过了关。”他接着又说：“总理今天对我的批评本来就是正确的，我丝毫没有感到委屈，特别是当着大家的面来批评，实际上也是讲给大家听的，是对我今后工作的支持，是对我们的困境解围。”事实证明，以后“兵团”的人来逼廖志高签字表态的情况，确实大为减少。现在回想起来，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关心爱护老干部，千方百计为他们解脱困境，确是竭尽全力和费尽心机的。

12月4日凌晨1时，总理第二次接见我们和刚抵京的成都磷肥厂和人造纤维厂的五位代表。会议一开始，总理就拿出一份材料念给大家听：截至当晚止，已经到了绵阳、梓潼、剑阁和广元各有多少人，抢登火车的多少人，说服回去了多少人，哪些厂已

经选出了代表，以及遇到些什么问题，都讲得非常详细具体。可以看出，总理对“兵团”步行北上队伍沿途和抵京的情况了如指掌。他念到磷肥和人造纤维两个厂已分四批共计一百一十四人抵京时，他对这两个厂在座的五位代表严厉地说：“光你们两个厂就来了一百多人，有的还是拿着学生串连免费票，冒充学生抢上火车来的。你们都是工人阶级，我倒要请教请教，如果全国都这样搞，行不行？这种搞法我不能同意，不是代表的人到了北京我也不接见。你们五位代表要给其余一百零九人讲清楚，不能再乱来！”接着又对廖志高说：“听说学生免费票是你们的省长同意给的，省长不执行国务院的指示，慷国家之慨，这哪能行呢？”

五、问题只有回本地本单位才能解决

12月4日以后，又有几批工人陆续抵京，总理于6日凌晨1时，又一次接见我们和新到的工人代表。总理首先用重庆“二七”造反团等其他工人造反组织来京后闹事的事例告诫他们：“工人阶级组织中也有不受纪律约束的，可能还有个别搞破坏的人，对这样的人不能放纵，一放纵就会乱来。你们要各自管好自己的队伍，特别是来京以后，要加强管理教育和纪律约束。如果有闹事的，是哪个厂的就由哪个厂的代表负责。”接着，总理要他们谈谈这次来京要求解决什么问题。归纳起来，大都是反映本厂本单位领导压制群众，以党团籍威胁造反派，隐藏、转移整群众的“黑”材料，以及要求罢某些领导人的官等具体问题。总理一直耐心听完汇报后说：“要解决你们提出的问题并不难嘛，但只有回去在本地本单位才能解决。”“不准以党团籍威胁群众，不准压制和打击报复，我们发的电报中已明确讲了嘛！”“隐藏、转移整群众的材料，如果知道具体地点就派人同主管领导去查；如果没有就给他们讲清楚，今后一旦查出要加倍处罚。”“这些都是容易解决但又必须回本单位才能解决的问题，罢某些领导的官就不是那样简单，首先要调查清楚问题并且研究如何处理，还有个组织审批程序，总要有一个过程。这个问题也必须回本地本单位才能解决，哪能今天只听了你们汇报就解决了呢？”最后他对廖志高说：“趁‘兵团’的人还没到齐之前，你抽些时间先找来了的工厂谈谈，同他们认真接触，搞搞工人运动嘛！”“谈的

时候，大家摆事实、讲道理，究竟还有些什么问题，回去后如何解决，可以先交换交换意见。”这次会后，廖志高先后找了“兵团”联合指挥部、“兵团青白区支队”所属几个工厂的人座谈，按照总理关于回本地本单位解决的指示精神做了一些工作，再没有发生围攻和强迫廖志高签字的情况。

这次会上，总理还给廖志高交办了两件事：一是汇报中一位代表反映，来京途中接到成都的电话，西南局、省、市委有人谋杀了一位解放军干部，是用绳子勒死的，要求总理严惩凶手。总理当场交代廖志高尽快查明情况向他汇报。回到招待所，我立即电话告省委办公厅值班同志尽快办理，接电话的同志当即回答：“此事已完全弄清，死者是成都军区所属崇庆步校的一位领导干部，该校学生起来造反，揭露了他工作、生活作风方面的一些问题，他由于受到批判和冲击想不通自缢而死。外界有的造反组织闻讯后去殡仪馆抢走尸体，硬说颈上的自缢痕迹是被人谋害勒死的证据，曾来省委哄闹过，后来又在市体育场开了追悼大会，控诉西南局、省、市委迫害谋杀军队干部的‘滔天罪行’，完全是无中生有和夸大渲染的事。”第二天，我向总理的秘书周家鼎电话报告，请他转报总理，他说：“我也通过军队系统查了，确系自杀身亡，已经报告了总理，请转告志高同志，此事就此了结，不用再管了。”二是另一位代表反映：最近发现“产业军”总部（设在红照壁省政协大礼堂院内）挖有一条大地道，里面存有大量枪支弹药和棉被等物资，还有一些尸体，说明“产业军”开始对革命派动手了，要求总理过问此事。总理听后说“如果真有武器当然不好，但你们要冷静，不要轻信谣言”，同时交代廖志高回去后同“兵团”、“产业军”双方代表共同到现场查清此事后向他汇报。12月18日我们回到成都后，李长友等人仍把廖志高控制在“兵团”总部（设在成都无缝钢管厂），不让出去。后经我多方联系，直到12月20日，才由当时尚未被造反派抓走的省委副书记杨万选到场主持，“兵团”、“产业军”各派三名代表，同时找来提供这一消息来源的420厂工人赵勤纲，一起到红照壁大院认真查看，除了一个旧防空洞（长十米、宽二米）内堆有一些杂物外，根本没有什么地道，更谈不上枪支弹药和尸体了。当

场由我草拟了调查报告，结论是“未发现地道和任何武器，也未发现有地道痕迹及其他可疑之处”，经共同确认并签名后，由杨万选带回省委向总理作了报告，实际上又是一件无中生有、耸人听闻的事。对这两件具体事的处理，都体现了总理关于有问题必须由本地本单位解决的精神。

六、“解放大西南”的口号是错误的，对西南局和省、市委要一分为二，不要说“产业军”是保皇派

“兵团”沿途不听劝阻的工人和他们选出的代表已大部到京，都集中住在由全国总工会负责的白石桥接待站。总理又于12月11日凌晨接见我们和后来的代表，他耐心听取他们的汇报，并在讲话和插话中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教育。

总理一开始就说：“从你们要求来京的第一天起，就给你们和各级有关部门打过六次电话，发过四次电报，说明中央处理这件事的原则和态度是明确的，同时也是做给志高同志看的。”

在听取汇报过程中，总理针对有些人的偏激言论，在插话中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的观点。他说：“你们提出要‘解放大西南’，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大西南是中国共产党1949年早就解放了的嘛！现在还提这样的口号，针对谁呢？”“对西南局和省、市委，要一分为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要靠各级地方党委来贯彻，都整垮了，谁来贯彻？”“罢西南局、省、市委的官，要报经中央批准；中央还要调查和讨论。如果罢你们组织成员的官，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至少也要民主讨论讨论吧？哪能那么简单呢！”“不把李井泉拉下马死不瞑目，这样的话太绝对，最好不要讲。”“对干部要分析，不是人人都犯了错误；就是犯了错误也有轻有重，是犯什么性质的错误，不能一概不信任，都要打倒。”“对犯错误的干部，要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干部犯错误不要紧，只要检讨了就好。”“你们把省委书记带到北京来就不妥当，全省其他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就听不到他的检查了嘛！”

汇报中有人反映：现在成都有另一个工人组织“产业军”，是西南局和省、市委搞起来的，有几十万人，专同“兵团”作对，

是典型的保皇派。总理说：“不要说他们是保皇派，可能思想保守一些，要团结争取他们。不管他二十万、三十万，你们团结争取不过来，说明你们还不算真正的革命派。大方向对了，少数可以变成多数，否则多数也会成为少数。”

有人谈到“兵团”领导人之一的“杨大胡子”（杨中书），拉帮结派，处处同主要领导人李长友对立，致使“兵团”内部不团结，濒于分裂。总理说：“工人阶级要讲团结嘛！他到了以后，如有可能我可以找他谈一次，李长友也来，要他们搞好团结。但这是‘兵团’内部的事，靠你们自己去解决，我的意见也不强加于你们。”

“兵团”陆续到京的工人全部到齐后，总理于12月13日上午来到白石桥接待站“兵团”工人驻地，他始终坚持只接见国务院电报要求选出的全体代表。这是正式接见，也是最后一次接见，他的讲话内容与前几次大体相同，最后他强调：工人阶级要顾全大局，应当尽快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有问题回本地本单位解决。

七、总理单独约见廖志高

在京期间，总理还找廖志高单独谈了一次话。12月9日晚，中央办公厅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李伟信同志来中直招待所，当着“兵团”林云钦等人的面说：“中央领导同志找廖志高现在去开会”，从而摆脱了他们的监控，把廖志高以及我和警卫员小刘送到北京饭店安排住下后才说：“总理要我们找个好点的地方让志高同志好好休息一下，我们考虑这里既安静又安全，生活也可以改善。”我们在这里休息了两天，11日才回到中直招待所。

就在到北京饭店的第二天（12月10日）下午，李伟信来通知廖志高立刻去总理那里。廖志高回来后给我讲了总理找去谈话的内容：除了询问廖志高近来工作和身体状况外，还谈到“文化大革命”发展成现在的情况，他也没有想到，但是现在不能停下来，就像火车行进当中急刹车就会出轨，只能慢慢地收，估计明年内可以告一段落（前不久的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我也曾听说过毛主席打算运动再搞半年或稍长一些），要廖志高面对现实，正确对待，坚持下去。总理还要廖志高转告当时已向中央请假外

出治病的李井泉抓紧写出检查，否则越拖越被动；如果有病就“以口代笔”，自己口述由秘书整理。我当即电话告省委办公厅值班同志，要他们设法尽快找到李井泉后转告。以后，我听李井泉秘书黎本初讲，他们当时正在云南昆明，总理秘书周家鼎已将上述内容直接告诉了他们，不久到上海，又得到省委办公厅请华东局办公厅转告的这一内容，李井泉抓紧搞好检查后，即由黎本初专程回川交西南局转报了中央。从总理这次对廖志高的安排和谈话以及给李井泉的口信，可以看出，无论从生活上和政治上，他对干部的关怀、爱护，都是无微不至的。

近四十年过去了，回顾这段历史，“兵团”赴京告状，只不过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发生在四川的一件具体历史事件，但它并不是孤立的。从横的方面看，它折射出当时全国普遍出现的混乱情况；从纵的方面看，十年浩劫给党和国家带来的严重灾难已经初见端倪。把它整理出来，希望能对进一步了解研究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有所裨益。

1968年的“云阳武斗”^①

| 文荣启

1968年，万县地区发生了一场九县一市（忠县、梁平、万县、开县、云阳、巫山、巫溪、城口、奉节、万县市）造反派组织武装攻打云阳县城的大规模武斗。这场武斗，从6月2日开始，8月11日结束，历时两个月零九天。参加武斗人员达数千人（另一说约一万人）。这场武斗，造成了巨大损失。据云阳学习班揭发材料（1970年地革委组织武斗双方主要人员在云阳办学习班），共耗费粮食一千多万斤，物资折款一千多万元，死伤一千多人，其中死亡八百五十人。

九县一市攻打云阳的这场武斗，是经过充分准备的。1968年的3~5月，熊道生（当时是万县地革委副主任，后被逮捕判刑）先后在开县、忠县和万县市召开了六次九县一市联防会议，为武装攻打云阳县作准备。

3月8日，熊道生到开县招待所主持召开九县一市联防会议，参加的有各县市的主要帮派头头，还有刘结挺、张西挺^②派来的代表蒲某，一共三十多人。开了两天会后，又由熊带领，乘大型客车前往忠县县委院内，继续由熊道生主持，又开了两天会。熊在会上说：“当前，四川原始老保从组织上是垮了，但造反派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公开和激烈了。这主要是对刘、张的态度问题

^①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下达《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受到江青等人支持的刘结挺、张西挺进入四川省领导核心。刘、张为了抢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前掌握全川，不惜挑动两派群众武斗。1967年7月~1968年8月，是四川武斗最严重的时期。武斗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破坏程度之严重，全国罕见。

^②刘结挺时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张西挺任小组成员。

产生了分歧，分成了两大派……云阳是我们万县地区的反挺基地，是栽在我们地区的一颗钉子，一定要尽快拔除，不然以后就会后患无穷……”会上，还对各县武装实力，作了摸底统计。会议结束时，刘张派的代表蒲某说：“上面希望你们注意策略，特别是在舆论上要注意。”“你们最好不要公开提武装解放云阳这类口号。”

经过几次会议商讨之后，成立了武装攻打云阳“11·27”（战团名称）总指挥部。总指挥部负责人为熊道生、钟嘉玉（地革委副主任，已逮捕判刑）、牟维才、谭德六、谭明富、罗少龙、丁佳才、牟一富、刘树华、平运信、杨必春共十一人。为便于联系，还确定了各县及主要头头的代号。万县市叫“军旗”、开县叫“中心”、梁平叫“高山”、云阳叫“丘陵”等等。熊道生编号叫“一战道”，意思是一号，牟维才叫“二战道”等等，都有一个“战”字，表示总指挥部的意思。总指挥部下设四个部，即政治部、政宣部、后勤部、作战部。作战部下设四个指挥所，即：双江指挥所，共辖七个连，其中万县市五个连，万县一个连，云阳一个连（云阳与“11·27”对立的一派组成）；龙角龙岗指挥所，辖四个连，其中奉节两个连，巫山一个连，巫溪一个连；江口指挥所，辖六个连，其中城口两个连，开县两个连、巫溪一个连、云阳一个连；凤桥指挥所，辖十一个连，其中忠县两个连、万县市两个连、利川两个连、云阳三个连。一共二十七个连。

1968年5月，从万县军分区后勤部弄来“七九”步枪子弹六百多箱，三十多万发；苏式子弹两百多箱、二十多万发，美式子弹二十多箱，一万八千发；迫击炮弹五十多发；“三七”炮弹（降雨弹）一百多发；迫击炮十多门；无后坐力炮一门；“四〇”火箭筒一支；轻重机枪一百多挺；还有各种枪支三百支左右；雷管一箱、炸药三箱。同时，还从涪陵弄来“三七”炮一门，从达县弄来两百多箱半自动步枪子弹，十多万发；迫击炮弹三十一发，手枪子弹两箱。为了有足够的武器弹药，熊道生还以地革委的名义签发了《万县民兵师发展军工生产的报告》，文件中指出由万县通用机械厂生产“六五”冲锋枪，建华机械厂造子弹，忠县、奉节、万县制造手榴弹。并从自贡拿来了造枪的图纸，从重

庆请来了造枪的技师。

为了保障运输枪支弹药、生活物资、医药用品，还专门抽调了建西、先锋一号、先锋五号、向阳一号、向阳二号、万冷“201”、“822”、万龙等机动船组成水上运输队。同时，还从汽车四十九队调来了几十辆汽车，组成陆上运输队。为了保障各县的通讯联络，万县地区邮电局还专门组织了一个通讯排，架设了专线，固定了专门总机、分机，沟通了全区性的武斗电话网，专门为武斗服务。

指挥部制定了武斗的战略方针。总的要求是动作要快，打得要狠要猛。具体方针是：迂回包围、五路进军、四面合击、南北夹攻，以求全歼“11·27”。

五路进军为：

第一路，由万县和忠县担任。由万县向家至云阳龙角、朝阳、水磨到凤凰山。这一路从朝阳再分出一股，由凤桥，经马岭，过对河至复兴场，直插黄关槽，从侧面牵制磨盘寨。

第二路，由万县直属营、万县工业分部连、交通分部连担任。从长江乘船，顺江而下直去双江，包围磨盘寨。

第三路，由开县“七五”部队、城口“七一”部队、万县“七三”部队、巫山“七八”部队担任。沿开（县）云（阳）公路，夺取牛屎包，占领江口，包围祖寺观。

第四路，由奉节“七六”部队担任。兵分两路，一路从奉节至涪陵，到双坝；另一路，从奉节至红狮，到南溪，攻打花果寺。

第五路，由红云战线 6769 司令部所属部队担任。由巫溪出发，攻打云阳沙沱区。

整个武斗战场分三个战区，设三个指挥部，即南岸指挥部、双江指挥部、江口指挥部。在这三个指挥部中，以江口指挥部为前线总指挥部。

武装攻打云阳的武斗，在经过精心准备之后，于 1968 年的 6 月 2 日正式开始。先派出一个侦察连到万县南岸的柏相，配合红云（云阳“11·27”的对立派别）两个连，做开路先锋，打响了第一枪。

1968年的6月4日，开始全面进攻。万县工业分部连、忠县官坝连、煤矿连、财兴分部排，配合红云6769司令部的两个支队，强占了云阳水磨公社、黄岭树湾，并积极准备攻打凤凰山。红云的“七一”、“七三”、“七五”、“七八”部队，沿开（县）云（阳）公路，直插江口。在打下牛屎包后，强占了江口，并构筑工事，与祖寺观对峙。

7月6日，经过激烈的战斗，打下云阳凤凰山。一夜之间，凤凰山上，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7月25日，打下云阳祖寺观。这是武装攻打云阳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武斗。祖寺观地处长江北岸，在云阳盐渠公社云盘和吉安大队之间的一个山包上，海拔九百米，有一个用石条修筑的坚固寨子。整个寨长二百多米，宽二十多米，分一寨、二寨和三寨。寨与寨之间，有坚固的寨门。寨子三面临岩，地势非常险要。7月17日，熊道生亲临江口，要求三天攻下祖寺观，七天解放云阳县。经过策划，在熊道生、牟维才、及明业（城口武装队负责人）的指挥下，于7月22日晚强占了狮子包，扫清了祖寺观的外围，把住在狮子包的另一派人员，全部赶进了祖寺观，进行了四面包围。这时，熊道生、牟维才、及明业再次经过讨论，制定了作战方案；巫山、城口各打一面，前后两寨同时爆破，同时打响，前后夹攻，合击中间，全部歼灭，不准跑掉一个。并提出“谁是英雄狗熊，在祖寺观上比比看”的鼓动性口号。7月24日晚，以城口、巫溪为主体的近千名武斗人员将祖寺观团团包围，熊道生返回江口坐镇指挥。7月25日凌晨3时，在牟维才的指挥下，巫山武斗队爆破了一寨寨门，共死亡五十一人，其余退入二寨。这时，牟命令石德虎、何发堂调炮到一寨，准备炮击二寨。城口武斗队攻三寨未成，开县增援武斗队爆破了三寨寨门。三寨寨门爆破后，石德虎、何发堂向二寨炮击十一发，二寨寨门被爆破，住在一寨的武斗队，蜂拥而进，打死对方六人。防守二寨的人，被迫退到三寨。遭前后夹击，寨内的人，完全丧失了自卫能力，不少人跳岩逃跑。跳岩的人刚跑下岩就遭到追歼，打死二十九人。这时，巫山、城口武斗队同时冲进三寨，向寨内进行疯狂扫射，数分钟内，就有三十七人惨死在寨内地堡里，躲在地堡外

的人员也被打死了九人。这次战场上共死亡一百二十八人，活捉四十人中，在中途又打死二十八人，一共死亡一百五十六人。这次武斗，是武装攻打云阳四大血案（祖寺观血案，凤凰山血案，城口苦黄垭血案，巫溪朝阳、红池坝血案）之最。

8月1日打下花果寺，8月5日占领云阳的云安镇，8月7日打进了云阳城，8月9日解决了磨盘寨。这时，云阳有三千多人向外逃跑，有两千多人向巫溪逃跑，被尾追至巫溪朝阳、红池坝遭截击，共死亡六十七人。有一千三百多人准备逃往陕西，8月11日逃至城口苦黄垭，又遭到截击，死亡三十七人，二百零七人被活捉，关进了集中营，受尽折磨。

段君毅同志在四川

集体座谈^①

章玉钧^②执笔

段君毅同志 1970 年奉中央之命下派到四川，先后担任四川省革委副主任及省革委生产建设办公室副主任、省委常委等职。在四川的六年多时间里，他以“大智若愚”的睿智顶住“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压力，同极“左”势力的干扰作坚决的巧妙的斗争；他亲自到企业蹲点，抓“五小”工业，为稳定局势，减少动乱带来的损失，保障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他妥善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各种复杂的关系，促进地方、军队、群众的团结，维护领导班子的协调一致；他生活简朴、公正廉明、两袖清风，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和浩然正气。

段君毅同志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就走上革命道路，是一位久经考验、德高望重的领导干部。解放大西南时，他是二野大军的后勤司令兼政委；建国初期，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副主任兼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20 世纪 50 年代初四川工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工商业的调整，成渝铁路的修建和迅速通车，都凝聚着他的心血和汗水。

在调到中央工作十八年之后，1970 年 8 月，君毅同志奉命下派到四川，任四川省革委副主任及省革委生产建设办公室副主任，负责计划、工业生产、“三线”建设方面的工作；1971 年 8

^①2003 年 3 月段君毅同志逝世后，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邀请许梦侠、王黎之、明朗、辛文、章玉钧、林凌、张叔和、唐克碧等同志座谈，回忆 20 世纪 70 年代段君毅同志在川工作情况，本文即在此座谈基础上写成。

^②章玉钧，1936 年生。当时在中共四川省委政工组、办事组工作。原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月，在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及其后的省委二届一次全委会上被选入新恢复的中共四川省委领导机构，担任省委常务书记直至1976年12月离开四川。

—

段君毅同志在四川六年多，那正是国家危难之际，“文化大革命”大乱之时。在这种非正常的历史条件下，他怀着对国家、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维护和促进领导班子的团结和统一，运用丰富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经验，顶住“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压力，同极“左”势力的干扰作坚决而巧妙的斗争，为推进四川的工业生产和“三线”建设，稳定四川的局势，尽量减少动乱带来的损失，保障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中央在《段君毅同志生平》中所作的评价：“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他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主动和中央保持一致……”

当时在省委工作的同志，都还记得君毅同志离开四川前，1976年12月在四川省暨成都市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大会上，义愤填膺、有理有据地揭批江青一伙及其在四川的骨干分子上压下攻，里应外合，妄图篡党夺权，搞垮省委，搞瘫各级党组织的罪行。由于这伙人要阴谋，搞破坏，造成了国无宁日、蜀无宁日的局面。尤其是1975年12月开展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四人帮”一伙更是肆无忌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为此，他们采取了一“压”、二“挂”、三“煽”、四“揪”的卑劣手法。在1976年2月的“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等人气势汹汹地压省委主要领导赵紫阳、段君毅等“揭发”邓小平，“揭发”“批派性”的“内幕”，压他们发展重庆市造反派头头黄廉等人“入党”，以“纳新、提干、跟造反派转”作为干部“转弯子”的标准。省委领导没有屈服于他们的压力，江青、张春桥就宣称要把四川的问题“挂起来”，并通过他们的亲信和骨干到下面散布“四川省委问题多”、“四川省委不可信任”等舆论，从而在全川掀起了层层揪“走资派”、“还乡团”，揪“邓小平的代理人”的恶浪。

1976年3月，成都街头贴出了一张质疑“反击右倾翻案风”，并指名批驳张春桥谬论的大字报，得到许多围观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帮派分子以此为口实，纠集一百多人先后冲击中共成都市委和中共四川省委，呼喊“打倒二赵”（指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和主管政法工作的省委书记赵苍璧）的口号，并“进驻”省委机关抓“二赵”。当省委紧急商议对策时，赵紫阳提出：干脆我出去，把你们解脱出来抓工作。段君毅立即阻止，说：你不能出去，否则省委工作没有人主持，层层抓一把手，工作就瘫痪了，全川就乱了。我对情况熟悉，还是我出去应付他们。于是，君毅同志不顾个人荣辱安危，挺身而出。帮派分子把段君毅和许梦侠（省委书记兼成都市委书记）围斗了两天两夜，不让他们睡觉，还押着他俩到处找“二赵”，不见“二赵”的踪影。帮派分子便挟持段、许书记上北京逼中央表态，还硬把他俩分别封为“四川省赴京告状总团团团长”和“成都市赴京告状团团团长”。几经周折，这伙人架着两位老书记到广元上了开往首都的列车。3月的北京，天气寒冷，年已六十六岁的段书记病倒了。许梦侠见状劝段去治病，说这里的事让他们找我，我顶着。段君毅不肯走，许梦侠义正词严地对帮派分子说，万一段书记出了事，你们可就闯大祸了。那伙人最后只好让段君毅住院治病。在此期间，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同志把这伙人找去，批评他们，叫他们放人。这帮人仍然胡搅蛮缠，一面逼许梦侠“揭发”邓小平，一面找门子、通关系，想在“四人帮”直接支持下，达到“改组”省市市委、要官要权的目的。但这时，北京发生了广大党员、群众冲破“四人帮”的禁令，自发地或有组织地追悼、怀念周总理的天安门事件。在这种万众抗议、声讨“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潮流面前，四川这伙帮派骨干黔驴技穷，江青等人也无暇顾及他们，“赴京告状事件”也就无果而终。

在君毅同志担任四川省常务书记期间，形势曾几次反复。从林彪事件后周总理提出批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到“四人帮”告“御状”，转而批极右、批林批孔“批大儒”；从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时抓全面整顿、批派性，到风云突变，转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从共和国主要缔造者周恩来、朱德、毛

泽东相继辞世，江青猖狂至极，到“四人帮”被粉碎。在这样悲喜交替的大风大浪中，君毅同志处变不惊，始终有自己的主心骨，从不迷失方向。对周总理和小平同志的正确主张，他衷心拥护，积极跟上。如1973年秋冬，在京召开四川十二个重点企业汇报会，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消除派性，搞好团结，把生产搞上去。其后，君毅同志同省委其他领导一起，推广这一经验，分片召开重点企业汇报会，解决“老大难”问题，使工业生产有所恢复和发展。又如1975年10月，赵紫阳奉调来四川前，小平同志在京对他讲：四川反派性没有抓紧时机。批派性，各地都要过这关，四川也不能例外。当时，段君毅几乎每天晚上都同他通电话，介绍四川派性矛盾等详细情况。为了制定妥善的方案，他请示小平，通知君毅同志进京参加会议。赵紫阳到成都后，第二天一早就去君毅同志的办公室，与他商议工作。当时他们根据小平同志“要突出敢字当头，批派性”的要求，确定了“批派性”的具体部署，组织起草了“批派性”的讲话。但刚启动不久，就因“批邓”出笼而夭折。在咄咄逼人的帮派骨干面前，君毅同志显得“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说话慢条斯理，甚至有点磕磕巴巴，边说边想，考虑问题很全面，不是只顾眼前“说得脱走得脱”，而是顾及长远的后果。不管那些人怎么来势汹汹，他都沉得住气，尽量不激化矛盾，不授人以柄，又从不乱许愿，说丧失原则的话。一些官迷心窍的“造反派”头子向他要“党票”、要“官帽”，君毅同志却给他们讲标准，讲程序，磨来磨去，总不松口。那些人“捞不到稻草”，气急败坏地骂“段老头是个老滑头”。

二

君毅同志刚到四川时，震惊全国的大规模武斗硝烟尚未散净，企图乱中夺权的野心家刘结挺、张西挺刚被“挂起来、靠边站”，许多“三线”建设项目陷于停顿，工厂停止了生产。面对这种情景，他心里很着急，一面组织调研、主持起草并反复修改省的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一面力主把原来靠边站、熟悉业务、有干劲的领导干部解放出来，放到适当的岗位上抓工作。同时，他经常深入工厂、企业，同干部、工人座谈，苦口婆心地劝勉大家：四

川是祖国的战略后方，是“三线”建设的重点，我们只有把生产搞上去，才能为祖国争光，让毛主席放心。当时有一大批中央企业下放给省里管，也有的企业如第二重型机器厂是双重领导、以省为主。君毅同志长期当一机部部长，对许多企业的情况都相当熟悉。他讲：我国的三大动力（指三个重型机器厂）中，德阳二重这一套是最先进的。他常常去二重指导帮助工作。在省委和他的关心、支持下，二重在1971年12月实现了全面投产。当时这些大型企业的“婆婆”很多，为了理顺体制，君毅同志提出了一些改进的意见，防止出现那种“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毛病。大足重型汽车制造厂生产的是国家急需的载重大卡车，他有一次到厂里蹲点近十天，帮助企业整顿生产秩序，恢复正常生产。

君毅同志是搞大工业出身的，经常讲：工业生产要讲究规模效益，尤其是机械装备生产必须有一定规模，遍地搞小加工厂是没有前途的。但鉴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下，“五小”工业关系着人民的日常生活，关系着地、县的财力，有助于改变四川地、县工业十分薄弱的状况。因此，君毅同志在发展地方“五小”工业上也下了很大功夫，动了不少脑筋。那时候，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连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都奇缺。随君毅同志上北京开会的干部，返回四川时每每受人之托，大包小包地带回胶底布鞋、白糖、肥皂、洗衣粉。段“老头”笑指他们说：四川轻工业上不去就是你们造成的。他时刻把老百姓的冷暖饥饱放在心上，一件一件地安排组织日用品的生产，以满足人民吃、穿、用的需要。有段时间，四川要求北京调铁锅，先念同志批示要四川自己解决好人民需要的饭锅问题，君毅同志曾为此跑到乐山五通桥抓铁锅的生产。还有一次，成都市民连蜂窝煤都买不到了，急得段书记和其他几位省领导赶快到大邑邛江煤矿去调煤。

三

君毅同志在川工作的几年，善于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各种复杂的关系，十分注意促进地方、军队、群众的团结，维护领导班子的步调一致。他虽然一直不是四川的一把手，但在协调各种关系上却起到了别人不能代替的作用。当时的革命委员会是军、

干、群“三结合”的班子，正职大都由部队领导干部担任。君毅同志在军队、地方都有很深的资历、很高的威望。时任成都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国华同志对他就很尊重。君毅同志也自觉地摆正位置，当好“班长”的助手^①。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那天，君毅同志正在重庆开会，当晚张国华同志就打电话请他立即回蓉，共商稳定局面的大事。同年12月，君毅同志带队参加全国计划会议，这是联系经济工作实际，揭发批判林彪一伙对经济工作干扰破坏的重要会议。周总理在会上提出了整顿企业，抓规章制度、抓产品质量等一系列要求，会议一直开到1972年2月初。君毅同志赶回成都后，大年初三就去军区五号楼向张国华同志汇报，取得主要领导的支持来贯彻会议的精神。不久，国华同志病逝，继任的军、地主要领导人之间有些不谐和，这使处在常务书记位置的君毅同志相当为难。他深知，班子如果步调不一，局势就会稳不住，因此总是以大局为重，恪守组织纪律，善于沟通、协调，力求取得共识。遇到一些棘手的重大问题时，他往往建议召开省委常委和军区党委常委的“两委联席会议”，向大家通报情况，充分讨论，统一思想。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非常时期，事实证明，这样做确有必要。对于从劳动模范中选拔进“三结合”领导班子的年轻干部，君毅同志是关爱和体谅的。对于他们因缺乏政治经验而有时说话不慎、处理问题欠妥，总是事后跟他们个别摆谈，教育和开导他们，同时又在适当的场合帮他们说公道话，支持他们大胆工作。这几位同志至今从内心敬重和感激他，把他视为自己的政治启蒙老师。

四

君毅同志光明磊落，公正廉明，爱护干部，工作深入，品德作风不愧为党员干部的楷模。一些曾在他手下工作的同志讲，段书记块头大，资格老，看上去很威严，接触多了，才知道他非常随和，心地坦荡，平等待人。下属在工作上有不同意见，可以跟他争论，

^①据段君毅同志夫人陈亚琦同志说，中央派段君毅同志到四川，是由张国华同志提出，主动要他去的。

吵完就完，他从不记恨整人。调查了解情况，他一次没有弄清楚，会两次、三次找你谈，“打破砂锅纹（问）到底”。到企业视察，对生产流程和经营管理的事问得很仔细，很在行。他这样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只身来到四川，开始住在永兴巷机关院子内，后来住到省委七号楼一个大房间里。生活非常简朴，每天由公务员从食堂打饭菜送到家里吃，早上一碟菜、两个馒头、一碗稀饭，中晚餐常常是一汤一菜一饭，生活上从不提什么要求，甚至连吃水果的要求都没有。他一心扑在工作上，有时夫人陈亚琦同志从北京来看望他，他也很少陪同；到北京开会，他总是住在会上，很少回家同妻室儿女团聚。君毅同志的身体并不好，美尼尔氏综合征不止一次地发作，休息几天后仍旧带病坚持工作，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感于他这样清苦至极的生活，背后形容他像一位“清修的佛门老人”。

君毅同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在川从未安排任何人到机关谋职谋利，从未接受任何人的礼品。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经常告诫说：不能打我的牌子在外边乱为自己或乱替别人办事。他调回中央前，省上一位领导同志想安排段的一位秘书到某军工部门负责，君毅同志对这位秘书说：“劝你别去，去了你也不好开展工作，因为你不熟悉军工，人家会认为你是利用段君毅的权力来当官的，会瞧不起你。我走后组织安排你做啥就做啥，量才使用嘛。”他对自己、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非常严格，而对广大干部和老百姓却十分厚道和宽容。有次出差路上，因雨天路滑，汽车把一位挑担的人撞倒了，君毅同志很不安，叮嘱马上送医院，又留下秘书处理此事，要他拿些钱去医院看望，把该承担的责任承担下来。有次在彭水县听完县领导汇报后，六十六岁的段君毅坚持要上山看一看农民。当他在县上干部陪同下，随意进入一户农家，看到家徒四壁，一个火炉子，上头吊着一口锅儿，煮了些红苕、包谷，床上是一条烂棉絮。他抿住双唇，眼眶里泪水直打转儿。还有一次他到重庆开会，秘书了解到当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鲁大东家里生活惨淡，连多的板凳都没有一条，同另一家人合住在造反派给安排的三间房子里，早晨上厕所都要排队。君毅同志听了很感慨，在他的关心下，鲁大东家的住房和生活境况得到了改善。还有一件事，凝聚着他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深

厚感情，那就是1974年11月彭德怀同志在北京含冤去世后，他的骨灰盒由两位军人送来四川，经君毅同志和另一位省委书记杜心源精心组织安排，把这个化名“王川”的骨灰盒安全转移到成都东郊火葬场妥善保存，并一直严守秘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送回北京，在中央隆重召开彭德怀同志追悼大会后，安葬在八宝山公墓。

段君毅同志回到北京后，仍然关心着四川经济社会的发展，好几次叮咛四川去看望他的同志：一定要把四川搞好，四川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有相当好的经济基础，人口那么多，人才济济，如果搞不好，没法给国家交代啊！

我与“三化”工程

何郝炬 口述

黄友良 录音整理

“三化”工程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决定从国外引进并摆在四川的三套化肥、化纤设备。“三化”工程从项目定点到工程建设经历过一番曲折，其中川化、泸天化工程因为是依托老厂，基建投资省了一半，建设周期短，投产后对财政、农业贡献大。川维由于是白手起家，投资大、浪费多，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也大，开始几年效益很差，1984年以后才有所好转。

一、“三化”工程的由来

四川的“三化”工程建设是中央决定搞的，行业涉及化肥、化纤，是指四川的三套进口化工设备。后来有人把“三化”和“三线”混在一起，实际不是一回事。

1. 化肥设备工程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后，中央于1972年开始抓整顿，恢复经济。工业上抓化肥生产是一个重大决定。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拟进口十三套化肥生产设备。“四人帮”一开始反对进口，十三套设备中原准备放在上海的那一套他们不要，提出自己搞国产设备，还提出与进口设备比，要“多快好省”（后来硬上了一套国产设备，还是“仿”进口设备，效果并不好，这是后话）。进口设备经毛主席批准，由余秋里负责，具体办事的是国家计委副主任周泰和。决定十三套生产装置中的六套以四川天然气作原料。1973年，我在省革委生产组，到北京参加计划会议，国家计委提了方案：六套装置中的两套安排给四川，要求安排在有设备、生产能力的厂。省里后来决定在四川化工厂（成都市青白江区）、泸州天然气化工厂（泸州市纳溪县），各安装一套

年产三十万吨合成氨、四十八万吨尿素的设备。另外四套，国家计委安排给云、贵、鄂、湘各一套，原来打算均不放在当地，全部放在四川，定点在靠近原料产地的地方使用四川的天然气，产品调各省安排。最后，贵州、云南反对，湖南、湖北也不赞成，此事就吹了。国家计委给云、贵出点子，说是你们可以靠着四川边界设厂。结果贵州的厂设在赤水，与四川古蔺接境，连接天然气的管道距离短，所以贵州特别积极。云南的厂子是国家计委出面向四川打招呼，要求四川划地支援云南建厂。这样办是因为有例可循。四川在建设攀枝花时，划了云南一块地，现在攀枝花市金沙江以南那一块就是原云南永仁县的地盘。四川后来同意在宜宾县划出两个乡，设为云南省的水富特区，搞了个云天化（云南天然气化工厂）。从宜宾安边坐船过去约二三十分钟路程。这个地方的公路不通云南，云南建这个厂，全是从成昆铁路把物资运到成都，从成都转运到安边卸下，再用船运过金沙江安装。这个厂当时是云南工业的重要企业，建在水富，完全是为了利用四川的天然气，云、贵厂子的班子和技术骨干，全是四川支援的。川化到的贵州，泸天化到的云南。湖南、湖北的设备后来没有用天然气，改为用石油。这是因为燃化部规划的川汉输气工程下马，原定的输气方案不能实现。

这中间还有一段插曲，是川天化（四川天然气化工厂）上马的事。川天化定点在合江，1960年开工建设，准备搞盐化工，生产烧碱。“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停了，主要是因为原料供应问题（合江仅有一个长河盐场，产量很小）。国家决定进十几套设备时，烧天然气的几套中，燃化部拟在合江摆一套，这事合江方面是知道的。后来燃化部了解，四川的天然气产量不够，如果四个厂一下子全摆四川，一年需十几亿方气，当时四川全年仅产气七八十亿方。如果六套化肥设备一起上，光化肥生产就要用去四川四分之一以上的天然气产量，明显支持不了。1974年我去北京开计划会，回来刚到计委上班，就被合江川天化来的七八十个人围住了。用“造反派”的方式质问我为什么不同意把设备放在他们厂。我看见厂党委书记也在人群中，就问你为什么也来了？他笑而不答。后来他对我说，一半是他也希望厂子能被定点恢复建

设，一半是被工人们架着来的。一直围到下午4点，午饭也没吃，我怎么解释都没用。后来我就在办公室当着他们的面往北京燃化部打电话，我说这是你们部里定的事，摆不摆都是你们定的，怎么现在成了我的问题？燃化部答复说，这个厂这次定不了，一定设法装一套别的设备，总是要解决他们问题的。这下子他们说对不起了。我说你们想复工生产的愿望我理解，但方式我不能接受。结果我请他们吃了一顿饭，才散去了。后来一直到1980年，化工部仍未给这个厂定项目。当时因为进口的化肥设备运转良好，农业增产效果很好，国家决定在四川再摆两套。我对化工部说，这次机会无论如何都应该给川天化。化工部长还不太愿意，说是摆在合江经济效益不好。这时，省内达县、重庆也提出要摆，二机部有个军工厂在涪陵，提出改造一套。鲁大东当时管军工，他支持摆涪陵，争论不下。当时，这几个地方就有人公开说我支持川天化，不支持他们，有意见。最后没办法，我到北京找到国家建委王德瑛，他跟我很熟，原是参加搞川气出川计划的。我说你来帮我处理一下吧。结果他提出招标，由他主持。他来四川一趟，把几个厂子都看了，作了分析，最后决定定点涪陵、合江，这次才把川天化搞上去了。

2. 化纤设备工程

就在国家决定搞十三套化肥设备的同时，国家计委向周总理报告，建议进口几套化纤设备，生产纺织原料。后来决定上四套化纤设备：上海石化、辽阳化纤、四川川维、天津石化，其中，川维是纺织部的项目。1972年轻工部想搞一套国产维尼纶设备，摆在重庆。尚未定点，次年就下马了。这次定的项目是搞维尼纶，也是因为四川有天然气。在定点时，要求靠近城市、河道，燃化部主张摆合江，纺织部不赞成。因为这个项目归纺织部安排，最后按纺织部的意见，决定放在重庆附近的长寿县。

二、“三化”工程的建设

“三化”工程建设中，川化、泸天化比较顺利。这中间虽然有“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泸州还有“武装支泸”的武斗，但终究有个厂的底子，上边有人（行业部门）管，所以比较顺。川维一开始就不顺，项目定点时重庆很勉强，定点后很长一段时间无人

过问。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征地，长寿县不同意，不给划地。1973年6月批准立项，到1974年春天施工单位还进不了场。北京与外方签订的合同是四年完工，这时已将近一年，还开不了工，北京很有意见。中央当时是谷牧、余秋里管生产，谷牧就给徐驰打电话，指责四川动作迟缓，提议专定两人管这个事，就是要四川立军令状了。谷牧直接点到我和省建委副主任杨乐斋。后来省里决定成立“三化”建设领导小组^①，组长由徐驰兼，我来主持抓工作，我的计委主任未免，但不管计委的事了。后因为搞天然气出川，又改为“三化”输气小组。1974年初，省里决定：凡“三化”工程有关事项均由领导小组定夺，需要哪家出力、出人，直接通知，给了很大的权力^②。我组织了一个有七八人的办公室，最初每月跑一次工地，泸天化、川化很快开工建设了。进口化肥设备的运输当时遇到困难，火车运不了，后来由长江运进来，在乐山卸下，专门修了一条专用公路，组织了一个大件运输车队，用四百吨平板车运到夹江上火车，到新津卸下，再从陆路运到工地。领导小组把设备安全责任交给省公安厅，省公安厅是按国家元首标准沿途警戒。安装时，施工单位没有大型吊装设备，因为没有外汇进口。施工单位想了很多办法，结果设计出一套用简单设备吊装的土办法。日本专家十分怀疑，认为不可行，还专门到现场观看，结果看到用几台卷扬机就吊装成功，十分惊讶，说你们真有办法！还拍了许多照片，连说“了不起”。泸天化、川化的建设一开始就比较顺利，后来基本是按期建成^③。

川维的前期工作我没有参加。我刚一接手“三化”工程，长寿工地施工单位的领导来找我，说土地未征，施工队伍进不去，怎么办？我给重庆打了多次电话，解决不了。后来我对他说，你干脆把队伍先开进定点地区，没有工地就先在露天扎营。这些施工队伍都

^①1973年7月3日，中共四川省委决定成立川化、泸天化、川维三套大型进口装置建设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建设工程。8月2日正式印发文件通知有关部门、地区执行。

^②1974年2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关于加强三套进口装置建设工作的领导的通知》。通知对领导小组的工作，有关地、市党委加强对建设的领导，省革委有关部、委、局加强协同配合等作了原则规定。

^③泸天化1974年4月动工，1977年7月建成投产；川化1974年5月7日开工，1977年1月建成投产。

是从军队转业下来的，真的就这样开进去了，就在公路两边住下等着。我又给重庆打电话，说队伍已经来了，你们怎么处理？鲁大东派专人驻长寿，督促他们在几天之内就解决了征地问题。化纤项目一直拖到1974年8月底才正式施工，建设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因为工程所需建材均是提前一年订货，施工单位在等待征地时，有的物资已经到货，却找不到接收单位和堆放地，结果送货单位只能卸在路边，大量的钢材、水泥、砖瓦砂石堆在一起，型号、标准全乱了，用的时候只能按最低标准，估计着用，浪费了许多材料。川维厂订的是法国设备，供货方也出了问题。在北京签的合同是1976年3月投产，而法国人回国后订货是定的1976年3月交货。厂房设计要等设备到了才能做，所以法国人一错，这边全乱了套。1974年进工地，只能做点平整土地、备料的工作。1976年开始来设备，又遇上政治形势混乱，造反派闹腾“夺权”，工地上又乱了一阵。粉碎“四人帮”以后，才进入安装阶段，1979年底投料试车成功，1983年竣工验收。后来有人指责说川维建设选点不当、浪费、工期拖得长等，事实上都事出有因。

川维厂投产就发生亏损，原因是设计的时候天然气价格很低，维纶出厂价高。到1980年投产时，天然气价格上涨，维纶出厂价下调^①，当时中央、地方都有人批评川维建设决策有错误。后来拿了一半厂房搞涤纶，改产聚乙烯醇、甲醇，厂子在80年代中期扭亏为盈，一年有近亿元利润。

1977年，川化、泸天化投产后，生产红火，到处都来争化肥，川化、泸天化每年纯利润都是一亿多。两个化肥厂，一年产一百万吨化肥（其中六十万吨合成氨、九十六万吨尿素。），1977年粮食一下子增产三十多亿斤，化肥起了大作用。赵紫阳当时对我说，我们化肥这么紧张，自己都不够用，为什么还要调出去？我说这是中央当初决定的。他说，那不行！不让调。结果别人调不到化肥，告状到北京，国家计委来电话找我，问哪个人不让调？我去找赵紫阳汇报，这才让调了。赵紫阳对化肥的作用印象深

^①川维厂设计时天然气价为每千立方米五十元，维纶出厂价为每吨五千五百元。但当其1980年投产时，天然气价格上涨至每千立方米八十五元，维纶出厂价下调至每吨四千五百元。故1983年每吨维纶亏损三百七十七元五。

刻，所以“三化”工程完了以后，领导小组没撤，他到北京要了两亿专项资金，把“三化”小组改成支农办，资金由支农办掌握，继续搞化肥生产、农机生产和支农生产的事，实际上就是工业支援农业。所以周颐（省委秘书长）对我说，我理解你那个支农办实际就是省委的工业办，管的都是工业上的事。每年都要把两个化肥厂厂长找来，定增产计划，安排资金，解决困难，给予特别关照。这是两个厂的“黄金时期”，至今仍为一些老厂长追念不已。1979年我到省政府管常务，支农办工作逐渐停止，共安排了四亿资金，用于化肥、农机生产。当时赵紫阳到北京要了很多条件，包括将1977年、1978年四川财政增收部分全部留用等，所以当时还有点钱办事。当时还有一段插曲，是关于几个省委第一书记的。一次我和赵紫阳到北京开会，碰上几个熟人，说起几个省委书记的顺口溜：许家屯（江苏）会叫，陈丕显（湖北）会要，杨易辰（黑龙江）会闹。说的是江苏最早搞财政体制改革，那几年江苏日子好过；湖北会叫“穷”，要得多；黑龙江杨易辰嗓门大。说你们四川省委书记也厉害，也会要。我跟赵紫阳说起前三个人，他马上问，我的名声也不好吧？我笑答，也差不多。这几个人当时在全国算是有特点的。

“三化”工程建设，总体上没有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化肥项目进展快，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这是中央、毛主席批准的工程，要限期完成，加上领导小组协调权限大，否则压不住。当时我在计委，经常半夜接到电话，说是电厂没煤发电，马上要停机了。结果是到处找运煤的火车，哪里有煤就地截住，不管是去哪里的，用了再说，以后来了煤再还，生产秩序很乱。川维项目受“文化大革命”影响最大，工地施工单位的造反派指责我们不搞批邓，以生产压革命，还到成都省革委来“造反”。有一次我到徐驰办公室去，正碰上造反派围着他在拍桌子。当时徐驰的好处就是替我们挡着，说有什么事我去顶着，你们去干。

川化、泸天化工程，因为是依托老厂，基建投资省了一半，投产后每年纯利润有三个亿，对财政、农业贡献大，当时四川省财政收入一年也就只有二十几个亿。比较起来，川维白手起家，投资大，浪费多，开始几年效益很差，1984年以后才有所好转。

川化建设工程追忆

焦成斌^① 口述

王林 录音整理

四川化工厂三十万吨化肥装置是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从日本引进的大型先进成套设备项目之一，施工难度和质量要求都很高。由于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全省上下大力支持，施工干部、技术人员、工人排除干扰，经过艰苦努力，群策群力攻克道道难关；不断学习掌握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在日本技术人员的真诚合作下，仅用了二十二个月零八天就完成了施工安装并试车投产，在国内同批引进的项目中最早建成投产，树立了成功引进国外大型先进技术设备的样板。

川化三十万吨化肥引进装置建设工程，是我从事建设工作三十多年来直接参与、按期建成投产的重要工程之一。

川化三十万吨引进工程是20世纪70年代初周总理报经毛主席批准，从国外引进的十三套化肥装置之一。当时从国外引进的化肥装置是十三套，化纤装置是四套。川化这套装置是从日本东洋工程公司引进的，年产三十万吨合成氨，四十八万吨尿素，总投资二亿六千六百万人民币，相当于现在三十多亿人民币。这套装置工艺比较先进，系列化、自动化程度比较高，占地面积小，只占九点六公顷。川化年产九万吨（改造后年产十八万吨）。合成氨的老装置生活和生产区一共占了一百六十六公顷，其中生活区大概占三分之一，生产装置仍然占了一百多公顷。占地相差十

^①焦成斌，1930年生。时任四川省建工局副局长。原四川省国土局局长、四川省移民办公室主任。

倍，新装置的产量还高，可见其工艺是先进的。

这套装置施工难度大，质量要求高。一是超限（超高超重）设备多，有六大件，比如氨合成塔的直径二米八七，高十二米八三，重三百二十五吨；二氧化碳吸收塔直径二米三至二米八，高五十二米，重二百二十五吨。从运输、卸车到安装，过去从未有过。二是工艺管道数量大，重三千五百八十吨，长四万四千七百一十米，相当于四十多公里，材质种类多，计有二十五种，其中有碳钢、合金钢、不锈钢等，压力最高要达到每平方米二百六十公斤。管道是全厂的大动脉，不能出一点问题。所有这些管道都要由熟练掌握焊接技术的工人进行操作，而且所有的焊缝都要百分之百地作X光透视检验和磁粉检查，完工后都必须经日方检查确认。三是仪表安装要求高，各类仪表有一千一百二十四套，安装前都要组织专业人员对其进行校核，合格以后才能安装。四是传动压缩机设备对安装时的洁净度、水平度和螺栓位置偏差的要求都非常严。

中日双方于1973年4月10日签订工程合同，当年5月16日生效。1974年5月7日开工，1976年3月15日工程建成进行试车投产，总工期用了二十二个月零八天。在全国前期六套引进装置中最早建成投产，1976年的6月22日出了合成氨，7月2日出了尿素。

这中间有个插曲，出了尿素以后本来应该接着进行考核，因为唐山大地震，把日本人都吓回国了，拖延了时间，到1976年的10月，才又进行考核。11月中日双方签订合同工厂的签证书，等于双方确认合格了。11月2日国家正式验收，并评为优质工程。省里和化工部都不愿意报建成投产，因为从验收到正式投产期间生产的化肥，化工部可以处理，省里也可以处理，利润可以不上交，这是都有利的事情。尿素当时是三百五十元钱一吨，一年四十八万吨尿素是多少钱？当时的一个亿可不得了，四川省一年的财政收入才二十几亿。所以正式向中央报的是1977年7月1日建成投产。

工程完工以后实际决算，节约投资一千一百万，这是十三套引进装置中唯一没有超概算的工程。1980年底不仅全部收回了投

资，还有余。所以川化总工程师尹学进很自豪地说，川化是合同生效后三十四个月建成，建成投产后三十四个月收回投资，每年的利润是一亿一千多万元，并且创下了连续运行三百七十九天的纪录。

工程之所以能顺利建成投产，概括起来有三个主要因素：一是决策正确，当时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反映了我国发展经济的需要，特别是改变农业面貌的迫切需要，符合全国人民和广大职工的心愿。当时“文化大革命”破坏很大，大家早就想结束这种局面了。二是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全省上下大力支持。三是广大职工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奋战的结果。

一、选调精干的施工队伍

四川有“三化”：川化、泸天化和川维。“三化”经省里研究决定由省建工局承担。建工局接到这个任务，既感到任务光荣，又感到责任重大，决定选择很强的施工队伍承担这项任务。具体落实到省建第六工程公司、省建第一安装工程公司、省第一机械化吊装公司。在承担任务过程中所需要的设备、主要的技术人员在全局范围选调。任务下达以后，这三支队伍从领导班子、管理人员到主要工种都配得比较齐全。比如为了压缩机的安装，安装公司集中了一百多名优秀的钳工。这些队伍都是“一五”期间和“三线”建设期间承担过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经过锻炼的优秀队伍，所以思想素质、技术素质、管理水平都比较高，能够适应工程的要求。当时施工人数少的时候两千多人，最高三千多人。承担设计任务的是省第一化工设计院，也配备了很强力量。为了搞好工程，四川化工厂本身也组建了很强的基建班子和生产准备队伍。

二、统一部署，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任务重，工期紧，场地狭窄，怎样打好这一仗，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在“三线”建设时期，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是一项成功的经验。

1973年与日方签订合同后，在与日方进行技术谈判时，充分了解了这项工程的特点、工艺要求、各个阶段材料设备供应和施

工的主客观条件。在此基础上，组织专门的技术队伍，认真编制了施工组织总设计，确定按照先国内后国外、先厂外后厂内、先地下后地上的顺序和土建保安装、安装保试车、试车保投产的原则，实行组织阶段性“战役”，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针。在每一个战役中抓住关系全局的主要矛盾，选择主攻方向，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这些原则是日方、工厂、施工单位、设计单位一起研究确定的。

1974年“大战六十天”和“大战四季度”为“第一、第二战役”，以扫外围、攻地下、抢土建、上安装为目标，打了压缩机厂房的主体、地下循环水管道、尿素造粒塔和超限设备卸车等几个攻坚战。这一年我们提前二十天超额百分之二十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计划。完成了铆焊车间外二万九千八百平方米的工程，八十一个大型和小型设备基础，造粒塔四十米以下基础和压缩机厂房的结构吊装。铺设地下水管道三千五百五十二米，占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三；还完成了主管廊一百二十吨钢结构的制作；完成了一段转化炉308钢结构的调装；完成了二氧化碳吸收塔、高低温转化炉的运输、现场卸车和安装就位，为1975年的安装大战创造了条件，赢得了时间。

1975年第一季度为“第三战役”。以推进安装全面展开为目标。土建工程大打了主控制室、压缩机厂房、离心机房、造粒塔、净水池等六个项目的会战。会战的结果是六个项目都分期分批进入安装。安装工程大打了吊大件、安管廊、战炉区、突击一二段转化炉、加氢塔、脱硫槽安装的会战，充分发挥了塔桅起重机的作用，把到场的设备全部吊装就位。同时狠抓技术练兵，重点突破了氨球焊接、转化炉合金钢管的焊接、离心机安装三大技术关，为氨球组装和辐射段管组的吊装、焊接作了充分的准备。

1975年第二季度为“第四战役”。以保安装获全胜为目标，土建工程大打了仓库、栈桥、水源地工程和界外的扫尾工程的歼灭战，保证了安装的需要。安装工程进行了大小设备一起上、非标准设备基本完、工艺管线和电器仪表向前赶的会战，除造粒塔、尿素仓库的设备和合成氨塔以外，所有的设备都安装就位。

1975年第三季度为“第五战役”。以安装、保试车调试为目

标，大打了公用工程歼灭战，使水处理、软化水和循环冷却水于9月下旬都达到了试车调试的条件。8月下旬又围绕空气压缩机的开车和一段转化炉点火组织了工艺管线安装和炉区工程的歼灭战，使管道工程连续两个月突破万米大关，为试车调试创造了条件。

1975年的第四季度到1976年的3月15日，是最后一个“战役”。以保试车投产为目标，全厂大打了工程收尾和保试车投产的歼灭战。根据工程收尾和试车的需要，在现场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了有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参加的三结合领导小组，下设了计划方案和试车调动两个组，领导小组负责安排试车计划，制定试车方案，检查试车进度和解决试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把生产、设计和施工的力量合在一起，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统一计划，统一布置，统一调度，使安装进度和试车进度统一协调，克服了过去三足鼎立、互相影响、顾此失彼的现象。在试车领导小组下面建立了工种齐全的三个专业配套队：突击队、试车战斗队、安装收尾队。在坚持高标准的前提下，实现了两个全歼：主体与配套工程全歼；两个未留：工程未留尾巴，质量未留隐患。在试车上做到了该坚持的程序一步都没有省掉，该达到的质量标准没有降低，能争取的时间都不放过，按计划达到了试车投产的需要。

三、坚持高标准，确保高质量

这套装置的施工建设，我们始终坚持了“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方针，把质量问题作为工程的生命线来抓，特别是进入安装大决战和试车收尾阶段，全现场连续开展了质量大检查，大讲搞好质量的重要性，质量不好的危害性，发动广大职工查思想、查隐患、抓管理、想办法、添措施。全现场确立了三级（指挥部、工程处、施工队）管理体制，执行了五项交接制度：每一项施工前都做到了施工有方案，有措施；技术有交底；设计变更有手续；施工试车前有施工、设计、生产三结合的班子检查确认；交工时有完整的档案。坚持了七项检查验收制度：工程的测量定位及图纸会审、设备材料的检验、隐蔽工程验收、设备校正、管道焊接、试压吹洗、仪表调试，都要逐级检查验收签字，重要部

位还要拍照记录。

在全体职工中牢固树立三种思想：第一是对工程质量负责一辈子的思想，为社会主义建设干保险活。在焊接氨合成塔上部构件时，操作人员不小心把一把钳子掉进了塔内二十多米深、宽只有十八厘米的夹层处，日方当时认为影响不大，意思是可以不作处理。我们安装一处设备队的工人为保证质量，主动召开三结合会，专门制定方案，结果用磁铁把钳子吸出来。再如安装一处为了把好氨球和管道工程焊接关，坚持三不原则：焊工不经过培训、考试合格不上岗；上道工序不合要求下道工序不施工；材料没有合格证明不使用。焊工们为革命苦练基本功，施工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终于使氨球焊接的一次合格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四点四。在液试压的管道中，高压管的焊接一次合格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点六。第二是高标准的思想，为社会主义干过硬活。比如在空压机配管时，安装一处的王坤班坚决纠正了过去“千分眼，百分手”，凭感觉施工的做法，使用千分表测定设备因配管后产生的斜度。日方要求不超过三丝，工人们在工作中仔细测定，精心调整，最后达到了一丝。日方人员很佩服，认为中国工人很了不起。铸炉队在砌筑一段转化炉炉顶时，为攻克二十种型号的耐火砖、几千只抓钉、几百个预留孔的计算关，专门办了训练班，根据炉顶尺寸、砖的位置，在地面上反复预习，并在砖体上划上预留孔的符号，各人按照指定岗位操作，使砖孔几何尺寸、沙浆饱满度和预留孔的方案符合设计要求。为了把好收尾试车的质量关，我们实行了三级检验制度：队组、工程处、指挥部，逐级检验合格并经日方确认后才行试车。第三是我们是建设的主人的思想，做到要求比日本人严，标准比日本人高，工作比日本人认真。比如离心式合成气压缩机高压缸，是由日本整体进口的，日方只提供了安装图，不供给内部结构资料，无法了解内部构造，给今后的检修和配件带来了困难。我们安装一处设备队打算做解体检查，但日方不同意，也不介绍内部结构。经过向日方有关技术人员做工作后，终于由他口授安装程序和有关技术问题，而且还同意进行解体检查，给今后的维修等工作提供了重要条件，也保证了安装质量。

讲到开车有两个插曲，一个是惰性气发生装置的开车，日本东洋工程公司从日本请来了两位专家，一位叫原田，一位叫水原。在开车前他们两位到街上买了香、酒等供品，在惰性气装置周围划了一个圈，烧香进供，洒酒祭奠，祈求开车成功。但那天车就是没有开起来。日本的总代表井上，在现场急得不得了。我们事前也作好了准备，看他们怎么样。日本人看不起我们，我们也观察他们。最后我们的一个老工人把它开起来了，结果井上当场就给那两个日方技术员两个耳光。那天是元旦的前一天，晚上我们请日方的专家们过新年，井上不让那两位技术员参加，我和我们现场的尹总为他们两人说情都不行。这说明我们在搞引进工程时，无论如何也要有自己的一套，洋为中用嘛。还有一个例子是快装锅炉点火，当时日本人没来，我们找到日本管设备的专家高桥，对他说，高桥先生，开车你看怎么办？你们的人没有来，我们要往前赶。他龇着牙说，这样吧，你们要能开就你们开，你们要开不起来，我们日本人再来。结果我们的工人开起来了。

试车是对设备质量的重要考核，也最容易暴露设备的缺陷。从已试过的装置来看，日方的设备总的来讲是好的，但是也有不少设备有不同程度的问题。对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我们采取坚持原则，区别对待，严肃处理，不留隐患的态度。当时归纳起来大概有四种不同的情况和处理办法：一种是问题较大，必须由日方派人来现场处理，使其达到要求，或者予以更换；二是虽然有问题，我们可以处理的，就由日方确认以后，提出委托，由我们代为处理；三是有些问题日方企图蒙混过关，我们坚持彻底检查，发现问题后，经日方确认，我们代为处理；四是虽然有问题，但不影响使用，经日方确认，可以不作处理。燃化部在川化召开的现场会上我作了汇报。杨副部长很肯定川化的这一套做法，认为很严很细，也很实事求是。那次汇报我并没有讲多少经验，而主要是讲遇到的问题 and 处理办法，会上反映，很有借鉴意义。

四、群策群力，攻克难关

我们在这套进口装置的施工建设中，怎样对待遇到的困难，经历了一个认识转变的过程。开始时，有的同志认为这个工程的设计设备和主要的材料都是由日方提供的，他们让干什么，我们

就干什么，什么时间来就什么时间干。究竟是坐等条件，让外国人牵着鼻子走，还是以我为主，创造条件？这是我们指挥部当时讨论的重大问题。我们组织干部职工学习毛主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洋为中用的思想，传达学习中央领导关于这套引进装置建设的重要指示，统一认识，激发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最后大家一致表示，外国人能造出的设备我们就能装好，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应该做到。我们组织了五大班子，攻克五道难关。

第一，攻大件卸车安装关。当时我们在和日方进行大件技术谈判以后，遇到几个问题。一是需要进口吊装设备因没有外汇进口不了，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我感到燃化部当时也不太相信四川，认为我们不是专业队伍。二是时间很紧，不能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做了两件事，在大件吊装上我们组建了一个三结合技术攻关组，由我们局包其国总机械师挂帅，由当时重庆建工学院、省建筑科研所和德阳建工学校、安装一公司、机械化一公司的技术人员、工人和基层干部参加，专门解决大件吊装问题。经过近半年多的反复研究、试制，把原来一个起重四十吨的旧塔吊改装成起重四百吨、起吊高度六十米的塔桅起重机，在川化铺设了专门的轨道，用两个多月组装起来。经过试验，不但可以吊大件，还可以吊装管廊及管廊附近两边的建筑预制构件。

1974年的10月中旬，开始吊装重三百二十五吨、高二十九米七的尿素合成塔。吊装那天，周围的农民、现场的工人足有两三千人围观。吊装前遇到了一个问题，按照我国的要求，设备螺栓孔的直径要比设备基础的螺栓大十几毫米，但是国外制作的设备只有两个毫米，给吊装就位造成了很大困难。吊装前有的同志建议把设备扩孔，但没有扩孔工具，另外设备扩孔以后就不完善了，也显出中国人没有本事。经过三结合小组反复研究，安装公司一位老工人（贾广德，八级起重工）提出我们精心施工，可以不扩孔。在吊装过程中我们充分发挥了塔桅起重机的优越性，调好了桅杆的角度，吊直了设备，使十六只孔眼对准螺栓，只用了十分钟，就吊装就位，没有一个扩孔。做到了“完整无损，万无一失”。日方总代表井上禁不住拍手叫好，说中国人真有本事。这件事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四川日报》、四川人民广播电台

当晚就作了报道，省委、燃化部当晚就发来贺电。

卸车问题也是贾广德老师傅组织了一个三结合小组，想出了两个办法解决的。第一个大件是一百七十六吨重、三十五米高的二氧化碳吸收塔，他用十几天的工夫，研制了一个人字桅杆，架到铁路专用线的两边，用八根无缝钢管，两根一组，对搭四副人字抱杆，用四组卷扬机提升。1974年8月的一个下午，安安全全、稳稳当当地将吸收塔卸下来。当时燃化部驻川化联络组的负责同志竖起大拇指对我说，你们这套方法最安全、最节省、最可靠。其他六套装置建设单位来参观的同志说，你们没有用洋设备，用了几根管子、几台卷扬机就把大件卸下来了，土办法解决了大问题。后来他们都用这套方法解决了同类问题。当时日本人很担心，怕出问题。有两个地方出过问题，一个是大庆，一个是江苏南京栖霞山化肥厂（同样是引进装置，起吊时钢丝绳断了）。从这以后燃化部转变了对四川的看法。

第二，攻地下循环水管道的工期关。1974年2月在与日本举行的技术谈判会上，日方提出的设计进度满足不了施工进度的要求，相差六个月。我们要将原定1975年元月开工，6月完成的地下水管道提前到1974年8月下旬开工。如果不提前施工，上部工程就不能如期进行，上部工程不能如期进行，塔吊就竖不起来，大件就不能吊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技术人员和设计院几家共同研究，提出我们自行设计、自行制作的方案。这个方案提出来以后，川化厂很赞成。方案报到燃化部，燃化部采纳了这个建议，由燃化部和日方谈判，本来应该给我们的材料后来大概给了云天化。这套方案就由省第一化工设计院设计，我们制作，省里调剂钢材，使这项工程提前到1974年8月中旬开工，用了六十五天就把地下循环水管道铺设完工，而且一次试压成功，为我们施工赢得了主动。我体会到，我们在搞引进项目时，第一是要学习别人的长处，第二也要洋为中用，自己能办的事还是要自己办，既可以节省外汇，又可以赢得工期。

第三，攻焊接技术关。这是管道工程最要害、最关键的一道工序。当时我们并没有掌握国外二十五种钢材与焊条的焊接技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集中了一百多位技术比较强的焊工，按照

日方的要求，利用日方提供的管材、焊条和焊接方法、焊接检验的程序，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实战培训。考试合格一个，上岗一个，攻下了焊接等难关。比如我们焊接五千立方米的球罐时，国外提供了一千零二块钢质球片，要焊接成形，坐落在十二根钢管支撑的基础上。担任焊接任务的十五名焊工，三分之一是小青年，而且有四名是女工。当时日本技术人员见了以后直摇头，说在他们国家只有“神仙”焊工才能焊这种球罐，妇女根本不行。我们的焊工听了以后很不是个滋味，他们战高温，斗酷暑，连续战斗不下火线，焊接合格率一次达到百分之九十八，焊接质量完全符合标准。日本人对我们的焊接工人很钦佩，一是能吃大苦，耐大劳，认真负责；二是基本功过硬，操作一丝不苟。

第四，攻仪表的校正和调试关。原来和日本商定，川化要派两名技术人员到日本学习仪表调试，不知怎么的燃化部把一个学习指标给了沧州化肥厂，一个指标燃化部自己去了一个人，川化就没有人去学习。当时的仪表车间主任刘资甫他们憋了一口气，发誓说，我们虽然不能到日本去学，但是日本人能够造出来，我们就能调试好，也能把它用起来。川化决定由刘资甫带队，于1975年5月带十二个人，到洛阳煤油试验厂学习。他们的仪表是从日本进口的，当时他们的仪表从日本回来以后一直放在仓库里，还没有进行调试。刘资甫他们去了以后，便翻译了仪表说明书，到仓库里一台一台地对照进行检验、校核、调试的学习，这等于借桥过河，用别人的产品进行实际操作。足足在那里干了三个月，完全掌握了仪表的性能、技术难点、调试方法，回来以后就干起来了。等日本人来了以后，到现场一看，感到很惊讶，看到中国人没有到日本去学习就熟练地掌握了技术，他们很佩服。日本人曾经说过，他们的气动仪表是世界上的金字塔，没想到也被我们掌握了。

最后是攻离心透平调试关。101-J离心式空压机是三十万吨进口装置的“心脏”设备之一，这台空压机在其透平的带动下输送压缩空气，吹扫原料天然气以及工艺管线，向合成系统和尿素系统提供工艺仪表空气，使生产正常运行。透平试车和调试是整个装置投产的关键一环。安装公司为了打好这一仗，抽调优秀的钳工与

川化工厂二化肥车间一起，经过反复研究，制定方案，充分准备，严字当头，一丝不苟，先后对油系统进行清洗，对蒸汽系统管理进行试压、吹扫，做透平连锁、仪表调试安装等一系列试验运转，于1975年12月26日按预定目标取得了试车一次成功，为整个空压机的开车铺平了道路。

原来我们解决压缩机和基础螺栓的灌浆需要微膨胀、无收缩的砂浆，这本来应该由日方供给，一时到不了，省建筑科研所的同志就承担了这个课题，经过几个月的科研和试制终于成功，得到了日方的确认，未从日方进口。

五、排除干扰，保证建设

我们开工的时候正值“批林批孔”，总的形势对我们搞这项工程不利。但是我们抓住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这项工程是周总理提出、毛主席圈定的工程，是我们国家要改变农业落后面貌的一项工程。我们指挥部充分利用这一点，排除干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我们把一切因素都引导到三十万吨工程的建设上来。“批林批孔”我们提的口号是：“批林批孔”促大干，齐心建设三十万。毛主席关于学理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要安定团结的三项重要指示发表后，我们提的口号是：学理论、抓路线、大团结、大会战，提前建成三十万。“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们提的口号是：提前建成三十万，提前出化肥就是最大的政治，就是贯彻毛主席指示的具体表现，就是为毛主席争光，为中国人争气。工人们把这一仗作为志气仗、政治仗来打。工人们说，为毛主席争气，为中国人争光，就要善于时间上争，任务上抢。就要像大庆工人阶级那样，迎着困难创造条件上。在川化工地人们处处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民族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还有广大职工忘我劳动的奉献精神。我们所以能攻克这些难关，就是靠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勇挑重担，肯攀高峰，战胜困难的精神。

“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川化工地也有动静，有人说，你们指挥部要注意，不要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燃化部派了一位司长匡永太到现场来帮助我们开车，他很有头脑，技术上有一套，作风也很好。当时保温需要超细玻璃棉，从南京往这里运，铁路卡壳

了。他就对我说，万里和王震气得不行，我们别受影响。我就说，我们赶快派人出去联系。最后是在省内到处搜罗，把这种玻璃棉搞齐了，算是没有受到影响。

六、领导高度重视，各方大力支持

川化三十万吨引进装置能够比较顺利地建成投产，是和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省内各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支援分不开的。国务院抓得很紧又很严。1974年的5月上旬，在全国基本建设会议期间，谷牧、王震、余秋里开了一个有引进装置工程的几个省参加的小型会，会上谷牧点名辽宁辽阳的维尼纶厂进展很慢，拍着桌子让建委主任回去向省里汇报，要省委书记亲自出面，上不去要负责任。我是随省建委钟炳昌主任参加会议的，也点到了四川。当时四川有“三化”工程，焊工等技术工种的人手不够，要求国家支援。谷牧说，你们四川的建筑队伍很强，还要从省外调，你们能说得过去吗？钟主任说，现在无政府主义严重，纪律松弛，劳动生产率低。谷牧说，那不行，这是毛主席批准的工程，你们回去给徐驰（省委书记）说，省里要做工作，要排除干扰。一个工人也不给你们，你们自己解决。队伍要限期进场，限期开工，限期把工程搞上去。当时我还没到川化去，还在局里。给我的总的印象就是，会上强调，引进工程进度只能提前不能拖后，质量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工程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全局，也关系到我们国家的信誉，给我到川化去工作打下了一个思想基础。

工程开工以后，国家建委副主任韩光于1975年5月12~17日亲临现场调查研究，指导工作。他对川化的进展表示满意，鼓励我们要再接再厉，为快速建成三十万吨而努力。燃化部派联络组常驻现场，掌握情况，沟通信息，帮助工作。并先后于1975年1月11~13日，在蓉召开了前六套化肥进口装置的施工布置会议。1975年9月16~26日又在成都召开第三次生产准备会议，杨叶澎副部长在会上特别勉励川化，要在建设和开车中起带头、样板和大学校的作用。1975年12月5~10日，在川化现场召开了前六套进口化肥装置工程扫尾、试车领导干部会，我在会上作了汇报，大家认为我们这套做法非常成功，所以杨副部长在会上又

说，希望川化发扬三老四严、一丝不苟的作风，通过试车培养一支思想技术作风过硬的队伍。一年在川化开了三次会，对我们鼓励很大。

省委书记徐驰、省委老书记杨超和成都市委第一书记许梦侠1975年8月下旬、11月5日、1976年3月15日先后三次深入现场，考察工程进展，对施工建设、工程扫尾、生产准备都作了明确的指示，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当时省“三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何郝炬、杨乐斋经常深入工地，协调关系，解决实际问题，有力地推动了工程建设。特别是他们每次到现场都要解决一批实际问题。当时的省委省革委多次召开专门会议下达文件，明确国内供应的材料设备配套定点供应，打通各种渠道，为川化建设大开绿灯。省计委、省建委、省物资局还专门召开各种会议，亲自主持借拨和调剂各种物资，省里各部门都是打开账本、打开仓库解决川化的急需。仅1974年、1975年就借给钢材300吨，又先后借拨别人的指标961吨，木材1000多立方米。省交通厅听说工地缺两台卷扬机，马上派车送到现场。成都市压缩了几十个单位的砖瓦计划保证现场施工用砖。省市物资局对水泥等物资采取包下来的办法，保证供应。

七、加强党的领导，统一现场指挥

加强党的领导，实行统一指挥是工程顺利建设的组织保证。为了加强川化现场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经省委批准，成立了现场党委和现场指挥部。现场党委书记由成都市委副书记冯焕武担任，党委成员有我（当时在省建工局）及川化厂的党委书记周焕光、省化工局副局长刘征鸿、川化厂的副厂长张世德、总工程师尹学进、成都市建委的副主任唐永成。指挥长由当时成都市革委副主任姚体信担任，副指挥长是我、刘征鸿、唐永成，还有化八院的一位领导及建工局下面三个公司的领导。

党委的成员和指挥部的指挥长坚持坐镇指挥，深入一线，随时解决建设中的问题。当时我们局有三项引进装置，我主管“三化”办公室。川化刚开始时出了点质量事故，燃化部有一位司长到现场看了以后，把情况夸大了。省里就着急了，要建工局一定要派一位领导到现场。我们局里的领导年龄都比较大，就派我去，又定了一

半在川化，一半管局里的事。我根据多年的经验觉得不行。就给局党委建议，现场指挥部的指挥长不坐在现场，开完会一拍屁股就走，不行，既然要去，就一心一意地搞好。把这个项目搞好了，我们局也就主动了。党委接受了我的意见。下去以后我们和职工战斗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使职工们看到领导是真正要把工程搞好，所以我们布置的每一项工作都畅通无阻。

现场党委和指挥部实行民主集中制，既分工又合作，做到五讲：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实现了真正的五统一：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我们的材料供应、施工管理、技术设计、生活服务这几个部门坚持三个面向和五到现场：面向基层、面向现场、面向群众，思想工作到现场、技术设计工作到现场、材料供应到现场、各项管理到现场、生活服务到现场。那时工人们没有奖金，加班加点也不给加班费，完全靠一种精神。

1974年刚开工，日本人没有来的时候，纪律有些散漫，下午3点钟以后现场就看不见多少人了。日本人来了以后，就问我，焦先生，怎么3点钟人就不多了？我说都开会去了，这话说两次行，说三次就不行了。后来我们就召开紧急会议，进行大动员，大讲工程的重要性，讲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丢脸，很奏效。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领导要关心工人，体恤工人，搞好生活服务。那时候是哪里有工人哪里就有干部，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领导。哪里有夜班哪里就有领导干部送夜饭到现场。那时候的工人能吃上一碗红烧肉，一碗木樨肉片，喝上一碗热汤就是最大的满足了。1974年冬季我们搞会战时，市里想尽办法给每人发了一只冻兔，大家感激得不得了。干部关心了工人，工人很体谅干部。就这样群策群力，团结一心，使工程得以顺利完成。

回忆泸州长江大桥建设

何郝炬^① 口述

黄友良 录音整理

泸州长江大桥工程是列在川汉输气工程项目下的一个子项目，1978年由于川汉输气工程停建和国民经济调整，大桥建设资金的来源中断，工程面临停工。何郝炬同志建议集中财力修桥墩，完成了水下基础建设。停工不到一年，随着四川省财政状况的改善，很快又恢复了大桥的建设。泸州长江大桥的建成促进了泸州市的全方位发展。

泸州长江大桥工程项目是一个不在省属计划之中的项目，实际上是列在川汉输气工程项目下的一个子项目。这个项目的设立与我有关。

1964年5月，中央决定进行“三线”建设，石油部为此在四川组织开气找油会战。1965年，调集全国石油系统力量来川进行以川南为主的开气找油会战。旋即“文化大革命”开始，会战被迫中止。1970年，四川石油局调集所属单位四千多人，在盆地南部开展泸州古隆起会战，勘探三叠系气藏。年底，先后在盆地西北部、南部钻获工业气流，一些试验井可日产几十万方气。国家和石油部门都对四川天然气生产前景抱十分乐观的态度。康世恩当时有个估计，一口井按日产二十万方气计算，四川一年可产二百亿至三百亿方天然气，并由此认为四川天然气有很大潜力可挖，国家计委也对此作出系列规划，其中一个很大的项目，就是决定进口六套化肥生产设备，全部以四川的天然气作原料。1972年底，国家燃料化学工业部专门集中讨论了大规模开发四川

^①何郝炬，时任四川省革委生产建设办公室副主任。

天然气的问题，次年，开始制定勘探开发规划。在此期间，国家已着手在四川作大规模开发的准备工作。1974年，我陪同国家建委副主任韩光视察了川南几个县的气矿，走到泸州，要过长江，在渡口等船，排队过江的车排成长阵，等几个小时是常事。那时小车过江不排队，优待，但也要等半个多小时才能过去。沿途等车的司机都埋怨，过江还要等天气、水情，经常封江封渡。车排在路上，无法掉头，人不敢离车，附近又没有饭店、旅店（不像现在这样方便），司机只能吃干粮，喝凉水，在车上过夜，实在是很辛苦。川南矿区的队伍也驻在长江南岸，每天也要排队过江，很不方便。韩光见了这种情况，也说不行。我建议川气出川工程川南矿区项目下加一个子项目，建一座泸州长江大桥，经费在川气出川工程项目中列支。这个项目现在看来是个中小项目，当时算是个大项目，一次投资几千万。当时四川自己的基建项目只能搞中小型的，一年总规模不过几千万，不可能一下子拿几千万给地方搞一座桥。

1975年，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联合提出的开发四川天然气年产三百亿至五百亿立方米和铺设出川输气管道的建设方案（通称川气出川工程）。1976年，川气出川工程按总体设计部署全面开工建设。泸州长江大桥顺利地列入了这个工程之中，由北京拿钱建设，未列入四川省的计划，说是个未列入计划的项目即是指此而言的。

1976年4月，国家地质总局为配合川气出川工程，在成都成立了四川石油普查勘探指挥部，同时，川气出川工程按总体设计部署全面开工建设。当年有三十多个气田的气井连入管网，扩大了成都、重庆两个供气系统的规模，年产气能力达五十三亿八千万立方米。1976年10月，成立川汉输气工程泸州大桥指挥部，项目预算总投资四千四百五十万元。1977年1月，省建委批准大桥初步设计，设计负责人为四川省公路勘察设计院工程师臧棣华（后为省交通厅总工程师），1977年10月开工建设。搞了不到一年，大桥水下基础尚未完工，这时川汉输气工程出问题了。1978年9月，国家建委发现燃化部对四川天然气资源的远景预测有误，也就是算多了，总体设计中规划的储量与实际可开采储量相

差甚远，遂报请国务院批准，停建川汉输气工程。这一年，正好碰上国家调整国民经济，全国停建、缓建了一大批工程，各地也跟着调整。大约是11月，国家计委为此在昆明召开西南地区计划会，提出各地清查、处理。这次会议我没去，省计委去了人。会上，四川提出重庆长江大桥是计划内的，泸州长江大桥项目是计划外项目，意思是四川不管。省计委去开会的人也不吭气，后来省统计局出简报，说泸州长江大桥是非计划项目，叫“何郝炬项目”，这句话是写进了简报的。泸州大桥建设因此出了问题，建设资金来源断了。当时我和泸州的同志都认为，这个桥确实该修，但当时解决不了建设资金问题，四川自己的公路建设中小型项目经费都是用四川征收的养路费维持，大桥要续建，只有用养路费。但泸州大桥没有在计委立项，出钱无名。这时赵紫阳到泸州视察工作，泸州的同志提出续建大桥的问题。他也知道这个事，说这个项目该搞，但现在搞有困难。这样，事情就更难办了。后来泸州市的几个领导找到我，问这事怎么收场？我当时算了算账，工程款已花了千把万，工程下马，石油局又给了一千多万的收尾款，如果其他的工程（引桥等）都停了，集中力量搞桥墩，钱是够用了。我说，今年冬天枯水期搞两个江中桥墩基础，拼死也要做出来。泸州的同志问光搞两个墩子有什么用？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了桥墩就有了基础，只要把墩子搞起来，桥就一定修。至于今后该不该修，修不修，后人可以处理，我们总之是尽到责任了。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横下心这样搞了。为了省钱，泸州的市长徐明国找到重庆市市长，想借重庆长江大桥的施工设备，结果碰了钉子。重庆提出要相当高的费用，徐明国到后来说起这件事还说重庆太抠门了。其实是当时重庆的建桥经费已经超支了，想利用这次机会找些钱回来。徐明国和公路勘察设计院的女工程师臧棣华一起在工地守着搞，千方百计地省钱，一个冬天总算把桥墩搞完了。

1978年，四川的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很好，财政增收，局面繁荣，加上省委书记赵紫阳到中央要了些政策，包括将1977年、1978年四川财政增收部分全部留用，所以四川的建设开始有了条件。此时到泸州仍然交通不畅，过江堵车，排队依旧。

这时省里有人说话了，为什么桥搞了一半就不搞了？交通厅长何仲明也去看了，回来跟省里说，这桥确实该修，而且桥墩已经好了，只铺桥面，花不了多少钱。他一说，省里也有人去说，我对泸州的同志说，有人说话就行了。最后省里决定了，泸州长江大桥由省交通厅负责建设，经费用养路费解决。这时大桥建设指挥部还未撤，名称改为四川省公路桥梁建设指挥部，继续建设，从停工到复建不到一年时间。因水下基础已完工，1980年3号桥墩提前一个月完工。陆上引桥及桥面施工进度很快，1982年9月，大桥竣工，10月1日通车^①。

后来泸州的同志说，没有泸州长江大桥，就没有今天的泸州市，这话有道理。如果没有长江大桥，泸州市区就不能南北连成一片，发展规模、规划都受限制。有了桥，很多事都好办了，而且方便了贵州、云南的交通。泸州长江大桥开工后，贵州省还有一些汽车司机主动捐钱给指挥部，钱虽不多，但表明了他们盼望有桥的心愿。从泸州、云、贵方面的反映看，这座桥是十分需要的。泸州大桥完工后，省了几百万，又搞了一座沱江二桥，等于多修了一座小桥。这个项目算是一个很争气的项目。大桥通车时我没去，张爱萍去了，桥名还是张爱萍题的。

^①泸州长江大桥被视为国内深水、高墩、大跨桥梁的一个范例，荣获1984年四川省优秀设计奖、国家优秀设计金质奖，二号墩深水基础施工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升钟水库建设^①

何郝炬 口述

黄友良 录音整理

升钟水库建设于“文化大革命”中上马，1980年底，由于国家压缩基建项目，升钟水库被列入撤销项目之列。四川省决定保大坝建设。大坝于1983年建成，为整个水利工程后续建设奠定了基础。经过四川省几届政府的努力，1998年升钟水库第一期工程通过验收。

20世纪50年代以后四川的水利界有“吃亏论”之说，即全国各省都搞了大型水利工程，而四川没有。这与国家对四川的水利建设重视不够有关，同时四川的水灾与其他省份相比相对不重，也是原因之一。50年代国家大规模整治淮河、海河，浙江上了新安江水利工程，四川当时没有向国家提出项目，立足自己努力。还有一条，四川的“水库派”挨过大批，所以言论较少。四川搞水利建设有一套经验，就是搞小水库、塘堰蓄水，往往可解决大问题，所以四川一般认为不必搞大项目。李林枝当副省长时搞了一些引水工程，都是“文化大革命”中上的。升钟水库就是“文化大革命”中上马的一个项目。扩大都江堰灌区的引水工程，如简阳三岔湖、仁寿黑龙滩、蒲江玉溪河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开始搞的。

1973年，南充地委书记卫广平带着升钟水库的全套计划书来省计委汇报，我参加了，事情这时已酝酿得差不多了，以后很快

^①升钟水库大坝位于南部县升钟乡碑垭庙，拦蓄嘉陵江右岸支流西河流域内当地径流，总库容十三亿三千九百万立方米，设计灌面二百万亩。主体工程由大坝、溢洪道、放空隧洞、放水隧洞、左右总干渠及左分干渠进口、电站等组成。

就上报国家计委。1976年3月国家计委批准立项，这是四川建国以来批准上马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项目，蓄水十三亿方，属特大型水利项目。四川当时一年的水利建设投资只有几千万，最多一年七千万，只能搞中、小型项目。按蓄水量，一千万至一亿方是中型项目，一百万至一千万方属小一型，一百万方以下为小二型。1976年4月南充地区组成升钟水利工程指挥部，开始作准备。水库淹没区涉及南充、绵阳两个地区^①。卫广平到省计委汇报工作，要求将剑阁、盐亭的两个区（淹没区）划归南充地区管辖，以便于协调移民、受益问题。升钟水库开工建设是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开始，工程建设领导以南充地区为主，指挥部主任是南充地委一个姓李的书记，省水利局派了燕征副局长驻工地。1977年，省水利工程处参加施工。一开工就上了南充、南部、蓬安、西充、阆中等地两万个农村劳动力，搞了一年多，进展不大。与升钟同时开工的陕西省石头河，也是一个大型水库工程，陕西省去了一个省长亲自管，上得快。1978年夏天，燕征到省委汇报工作，非要找省委书记赵紫阳汇报。赵紫阳说可以，又把我叫上，一起去听（我于1977年底任省革委副主任，驻省政府，管常务）。燕征的汇报主要是针对省里对工程没有直接抓而来的，情绪有些过激，他讲了陕西石头河的情况，讲其省上如何重视，如何上得快等等。最后，赵紫阳问到底该怎么办？燕征说，除非书记亲自担任指挥长，否则不好办，弄得汇报现场气氛很僵，赵紫阳也不好为此批评他。中间我出来上卫生间，书记跟着出来，说：老何，这事你去抓一下如何？第一书记怎么可能做现场指挥？我问他我搞的常务工作怎么办？他说你抽点时间去指挥一下就行了，他知道我是能干这事的。他从卫生间出来以后就说：你们说的意见直截了当，很好，成立一个工程领导小组，要把这个工程搞上去。我看这样，还是请郝炬同志抓一下这个项目。这样一来，这个项目就从南充地区“升格”为省管项目了，并组织了一个工程领导小组，我是组长，成员有李林枝、卫广平

^①1976年3月，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曾到南部县视察升钟水库拟建的坝址，研究水库建设问题。

(已调任省委农办主任)、李吉泰(计委)、杨乐斋(建委)、苗逢澍(水利厅)。11月,又成立现场指挥部,开始每月跑一次工地,小组成员都去,主要处理了一件事:抓质量。我们去看了大坝工地,坝址选得很好,沟很深,淹没区少。但施工现场狭隘、陡峭,几百平方米的工地,挤了两万民工,又没有机械设备,材料全从坡下用人力车往上推。几万人上上下下,现场混乱,既危险,效率又低。我对水利局工程处的同志说这样不行,我给你点钱,买点挖掘机、翻斗车、风钻什么的,这个工程公司因此打下了机械化设备基础,家底搞得不错了。关键工程采取包给专业公司的办法,没有再让民工去搞。送水隧道包给铁二局,大坝基础先让省建机械化公司去搞,这样工地基本上顺了。对此南充地区的同志当时还不太同意,主张用“大办”、“大跃进”的办法搞,因为当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开始,平调农村劳动力基本不用花钱,后来农村改革以后,这个办法就不灵了。

1980年底,国家紧急调整经济发展政策,各省的基建规模都压缩了,压缩的面和规模都很大。国家对水利的总投资规模从一年六七个亿压到二三个亿,计划内项目也同时压了,升钟水库和陕西石头河项目都在被撤销之列。这下子问题来了,如果要保升钟水库工程,四川的中小水利工程的钱就没有了,各地纷纷反对保升钟,省里有些负责同志也质疑升钟是不是需要搞?一时众说纷纭。要保升钟,规模不压不行。我主张让铁二局负责的送水隧道、渠系配套工程停工,坚决保大坝工程。我对水利部门同志讲,大坝只修了半截,还不具备蓄水功能,洪水一来,就全毁了,大坝一毁,整个工程前功尽弃。讨论的结果,是保了大坝,也保住了工程,但升钟水库工程因此出现了曲折,多搞了几年。1983年大坝基本搞完了,又接着搞隧道,工程一直没停。我在离开省政府之前,提出由财政每年拿一亿,安排基本建设投资,搞了几个重点工程,主要有升钟水库、锦城艺术宫、成都体育馆、省肿瘤医院。原准备搞省电视塔,因投资太大放弃了。规定升钟每年从中安排二千五百万。省里为升钟工程也派专人去北京找赵紫阳,赵紫阳也赞成保,给国家计委打招呼,每年安排了三千多万资金维持。四川后来接任的同志做这个事都很积极,张中伟也

经常跑北京，工程就这样延续下来了。1983年大坝完工，隧道又搞了两年完成，接着搞干渠。第一期工程1998年验收，从开工算起，搞了整整二十年，总投资十个亿以上。而与升钟同时上马的陕西石头河工程，就是那次调整下了马，停了，1990年才复工。

修了升钟水库以后，修建武都引水工程（简称“武引”）尤显必要了。因为升钟设计可灌溉两百万亩，但蓄水量不够，必须修武引，给升钟送水。升钟右干渠只灌十几万亩，水出来以后就到南部，再走西南支渠，到西充，再往南灌南充，第一期工程是灌南部、阆中、西充、南充。二期工程在南充搞个大渡槽，水送过去可灌蓬溪，实现灌两百万亩目标。当时省委第一书记的观点是升钟要搞，“武引”也同时上。武引到冬天上游无水，后来的办法是在绵阳陈抗搞了个水库，洪水期蓄水，枯水期放水，扩大了灌面。“武引”1978~1979年立项，绵阳很积极。因为钱不够，几下几上，但总算搞起来了。现在陈抗水库成了绵阳一个风景旅游区。

升钟水库建成，受益最大的是西充。西充历史上因缺水，不能多种水稻，只能多种红苕，有“红苕国”外号。1956年、1957年，西充县委一个书记在省党代会上发言，说我们西充穷，只有红苕，走到街上，放个屁都是红苕味，就知道是西充人，说得大家大笑。西充现在吃好水，吃大米，都不吃红苕了。

第五部分

气坐封公鱼金县天
司商点社革西册丑

023

广汉县金鱼公社生产责任制改革试点前后
广汉县农村生产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溯源
重庆市计划单列与综合改革的由来
重庆市综合改革试点亲历记



|| 全国首个“撤社建乡”的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挂牌。



|| 重庆军工企业的民品生产线。

广汉县金鱼公社生产责任制改革试点前后

| 岳忠^①

改革开放后农村社队如何实行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1977年年末四川省在广汉县的金鱼公社进行了改革试点：十人左右为一个组，超产组里分，短产少分口粮。到1978年底，金鱼公社粮食总产量比上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点六，高出全县比例近一倍；亩产一千五百斤，增产三百斤。金鱼公社的联产计酬试点突破农村多年来的生产责任制“禁区”，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

1977年，四川省按照省委提出的“一批两打”^②中心工作，在农村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结合实际，批判“四人帮”的极“左”思潮，揭露批判群众称之为“南霸天”、“北霸天”的帮派头头，群众高兴地称为“第二次解放”。7月，我去德阳了解省委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团的情况，晚上在县委碰到省委书记赵紫阳。闲聊时他问我1978年省委工作应如何提法？问题提得很突然，也很大。我不好回答，只说在孝泉与群众座谈工作团工作时，群众反映：工作团领导我们批判“四人帮”，批判帮派头头，搬掉了压在我们头上的大石头，大家高兴，但是基本路线教育工作团，不像“四清”工作团，使我们得到实惠。其意思是没有帮助社队整顿经营管理。现在工分值不高，大家的生产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出工不出力。赵紫阳听后说：明年工作可不可以这样提，叫“一批两整顿”，就是批判“四人帮”，整顿机关作

^①岳忠，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调研处处长。原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②“一批”，即批“四人帮”；“两打”，即打击帮派头头、打击刑事犯罪分子。

风、整顿经营管理，我说这样可以解决群众的经济实惠。赵紫阳回成都后，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1978年省委工作设想“一批两整顿”，就是批判“四人帮”，机关整顿作风，农村、企业整顿经营管理。

我当时琢磨，农村整顿经营管理抓什么？“拨乱反正”的口号还没有提出，农村社队经营管理应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但究竟怎么搞心里也没有底，只有下到群众中去听意见。9月到广汉的北外、西外、中兴找了些基层干部和群众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到县委同常光南同志谈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认为川西坝子的生产队一般三四十户，劳动力七八十人，每天由生产队长调工派活，“出工人等人，干活人看人”，“出工一窝蜂，鸭儿翻田坎”，工效不高。加之实行大寨式记分办法，出工画圈圈，叫“圈圈工”，“你下田、我下田，大家圈圈一样圆”，“你上坡、我上坡，大家圈圈一样多”。工分膨胀，工分值只一两角钱，分配平均主义，影响农民劳动积极性。常光南同志说：西高公社有个生产队，年年增产，用的办法是十来个人划一个组，超过了产组里分，短了产少分口粮。我们认为这是个办法，可以试个点。常光南同志是个急性子，他想全县都这样搞。那时“左”的思想还没有得到清理，我说这实际上是“包产到组”，1960年省里批判过张凤吾（江津地委书记）的“四固定作业组”，你全县搞，搞对了没说的，搞拐^①了，我作为省里来的，还可以说是试点，你是县委书记，全县都搞就不是试点了，你小心脱不到手。还是搞个大队来试点，有几个生产队作比较。常光南同志说搞一个公社，从小春点播开始到明年大春收割，试验一年看效果。这就是金鱼公社试点。由县委农工部部长杨正芹同志蹲点，具体如何搞当时也说不清楚，具体到点上去摸索。

1978年10月19~24日，我请杨万选同志并约请了农业组谢自均同志去广汉调查试点情况，我们在金鱼公社分别召开了十一大队、七大队以及一些生产队作业组的干部群众座谈，一致认为这个办法好，搞得好的队谈得眉飞色舞，没有坚持到底的表示要

^①拐：四川方言，错。

从头搞。全公社预计粮食总产量达到二千七百万斤，增长百分之二十点六，比全县增产比例高出近一倍。亩产达到一千五百斤，增产三百斤。搞得好的十一大队，粮食总产二十九万一千七百万斤，增长百分之四十一·六，亩产一千八百斤，增产近五百斤。至于具体做法，七嘴八舌，各说不一。当时我归纳为：坚持生产队五统一（统一生产计划和主要技术措施、统一调配劳动力、统一调配肥料、统一调配固定财产使用、统一分配）的基础上实行分组作业。生产队对作业组实行五定（定劳力、定作物地块、定肥料、定产量、定工分），作业组对生产队实行超短产奖赔。总的就叫“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干部群众都说就是这样。试验中断的生产队，主要是干部思想不通，群众的说法是吃不到粑粑^①工分了。

金鱼经验的三句话，每句话都潜伏着一个“怕”字。“分组作业”强调在生产队的五统一下的作业组，回避“四固定作业组”；“定产定工”，以定代包，回避一个“包”字；“超产奖励”强调生产队统一分配，作业组不是核算单位，只是超产部分奖励给作业组成员。

金鱼公社试点经验写出后，10月27日报送赵紫阳书记，他当天批示：“金鱼公社建立明确的生产责任制和奖励制的经验，是运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具体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使社员的劳动同自己的物质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从充分调动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看来，这种办法是可行的。各地、县委可以选择有条件的社队，参照金鱼公社十一大队九队的办法，进行试点，摸索经验，不要一哄而起，以免出现金鱼公社七大队七生产队的那种混乱现象。”他要我用电报发各地委、县委。我说这么长的材料不好发电报，还是通过省委办公厅的《工作简报》印发下去，得到他的同意。三天后，他问简报发出去了没有？我说工厂还没有印出来，他说你打个电话给各地委书记，10月30日我以省委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办公室名义召开电话会，请各地委办公室主任迅速将金鱼公社经验向地委书记汇报。当天晚上，有的地委书记

^①粑粑：四川方言，指容易获取的。

记就打电话质问赵紫阳，说“这么大的事省委讨论没有”？可见极“左”思潮积弊甚重，搞改革困难很大。

1978年11月初，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之一是讨论《关于加快发展农业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草案》）。这个《草案》，由农业部起草，四川曾派人参加，约一年时间，会议要赵紫阳牵头修改，后决定将《草案》下发各地试行。在生产责任制方面，当时的说法叫“可以，可以，也可以，两个不准”，即可以评工记分，可以小段包工，也可以联产计酬，不准包产到户，不准分田单干。两个“可以”是多年来农村通行的办法，唯有“联产计酬”是新的提法，这个提法在197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正式决定中改为“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这就是说金鱼公社经验为全国所接受。而对当时一些地方搞的包产到户，在正式决定中说法有所缓和，改为“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

1980年，包产到户进一步发展为“大包干”，在全国比较普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逐渐被取代。但是金鱼公社的联产计酬突破农村多年来的生产责任制“禁区”，在全国影响很大，其对推进全国农村生产体制改革是功不可没的。

广汉县农村生产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溯源

常光南^① 口述

张继禄、马善思、江红英 整理

改革开放之初，四川广汉县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肯定农民群众包产到组（户）的实践，并经省委领导的同意，在金鱼公社成功地进行包产到组（户）的试点；之后，又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大胆探索包产到组（户）后农村社队管理体制的改革，从成立农工商组织到考虑建立行政组、乡公所，并在向阳公社第一个摘掉人民公社牌子，建立向阳乡政府，彻底改变了政社合一、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

关于广汉的农村改革，一个是金鱼公社（现为金鱼镇）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一个是向阳公社（现为向阳镇）的摘牌，这是我一生中最为满意的两件事。

一、金鱼公社联产责任制始末

1977年10月10日上午，天下着雨，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传达中央和省委领导同志的讲话。这个会上一共讨论了三个问题：以整风的精神讨论工农业大上的问题，总结过去工作中的问题，讨论下年工业农业咋个搞的问题。在讨论农业大上的时候，我介绍了我在农村所了解的西高公社（现为西高乡）的情况。五大队（现为金光村）的一个生产队，生产相当好，水稻、玉米都比周围生产队的长得要茂盛些，要高一些。我问一个老人，这儿生产咋搞得那么好？他光看着我而不回答我的问话，只叫我问晒坝里的队长。我就到晒坝里面去问这个队长。他是个副队长，当时他也不说实情，只说肥料多嘛，给我卖关子。后来我就自我介

^①常光南，1926年生。时任中共广汉县委书记。原德阳市政协主席。

绍说我是常光南，县委书记，来总结一下你们生产好的经验，他才说了实话：他们把生产队分成三个组，包产到组，人分了、土地分了、任务分了，什么猪呀、牛呀都跟着组走。

我把这个情况一介绍，会上讨论得相当热闹。有的公社党委书记说，如果你常书记同意我们这样搞，包产到组，一亩田就能增加一百斤，如果增加不到一百斤，撤我的职。有的说，这个办法只要常书记同意，同样的人，同样的肥料，我们广汉粮食就会来个丰收。有的同志提出来，你说的这个“包”字咋敢搞呢？是不是叫“定产到组”？散会吃饭的时候，有的同志就说这个“定产”跟“包产”是一回事。我听了心里有点虚，“包产”这个事遭过批判，咋敢搞呢？

后来，我就叫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夏埂坤到上面去请示^①。他带上农业局的陈继荣同志两个人跑到温江地委，一位领导同志说：“那怎么搞得？”后又去省委找到调研处长岳忠，岳说试点还是可以搞的。并带他们去找到杨万选书记，万选同志当时的分工是农村工作。夏埂坤给他汇报了县委扩大会上的情况，准备搞包产到组。万选同志指示，可以搞试点。

夏埂坤回来给我汇报后，我们不敢在全县范围搞了，就准备搞一个点。因为省委万选同志既没有说在大队搞点，也没说在一个公社搞点，我就想，既然同意搞试点嘛，就在一个公社里搞，其他的公社暂时不搞。

时任省委办事组（办公厅）调研处长的岳忠同志到北外、西外、中兴公社搞农村调查，那时候叫“基本路线教育调查”。我就跟他说，我们想全县搞包产到组。虽然万选同志说了搞个点，但我心里还是不服气，想全县搞。我想通过给岳忠同志汇报，看能不能同意我们全县搞。岳忠同志就说，我倒好说，不过还是搞个点好！于是我们在院坝里商定，按照万选同志的指示精神先搞个试点，并定在金鱼公社^②。

搞金鱼公社这个点的事情，为什么我当时很积极呢？我想，

^①夏埂坤赴省是在1978年2月。

^②金鱼公社包产到组责任制的试点，是1977年11月20日以后在小春田间管理时铺开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心大快，我也很高兴，特别是领导叫我当县委书记，组织广汉县委这个班子，当然我的心情既高兴又觉得担子重。还有一个，我觉得，我在基层搞了几十年，工作没有搞好，群众还贫困，不富裕，特别是还有一部分很困难。川西坝子过去说的是“天府之国”，广汉又是川西的一部分，水利这么好，土壤这么好，气候这么好，自然条件这么好，不富裕是我们的工作问题。农民群众也在想改变贫穷面貌，天天盼望富裕起来。我也天天都在想，咋个能把这个工作搞好。传达中央领导的讲话，其中就有一个重要的精神，叫解放思想。要解放思想，多想门路，多想点办法，把经济工作搞上去。中央领导叫解放思想，省委书记的讲话里面也反复地讲，要解放思想，把农业搞上去。群众当中有部分就偷着搞包产到户，金鱼公社把河边、田坎、路边、空的地方都分给社员。我在全县看了十几个公社，都转完了，凡是我看到的河边、路边、沟边，还有自留地的庄稼长得都相当好。为什么这些地里的庄稼能长得好，生产队的却长得不那么好？这是我之所以积极地要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一个思想。本来让群众搞就能搞好，关键就是没敢让群众自己搞。

粉碎“四人帮”过后，我们领导干部不挨批斗了，我认为当时条件、政治气候已经可以搞了。有人追问我，你说你敢搞，为啥还要请示呢？当时我还是有点怯火^①，过去也是整怕了，将来遇到麻烦，我总请示过嘛。

1978年10月初，金鱼公社党委就把这一年的包产到组情况给我画了一个表，一部分包了，一部分没包，一部分包得不好，把这三种情况，还有增产的比例，给我报来了。当时我就把上面的主要数字，用给省委写信的形式，把情况反映上去。这年10月初，温江地委决定在大邑县召开播种小春的现场会，参加的人是公社党委书记、县委书记。我把这份材料带到省上，送给了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汝岱同志。他当时看了过后就说：啊！这个材料重要。他说要给省委书记汇报，他就走了。我也到大邑去报到开会。

就在报到的那个晚上，吃饭的时候，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来

^①怯火：四川方言，害怕。

了，和大家一块儿吃饭，他对地委领导说，今晚饭后开一个县委书记座谈会，你们地委的常委都参加。那时候地委书记是王德功。吃了饭休息了一会儿，就在大邑县县委的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赵紫阳坐在会议室的东面，我坐得离他比较远。他看见我就说：“常光南，来来来，跟我坐拢来点。今天晚上你唱主角，你就把一个公社一年增产五百多万斤的情况给大家作个介绍。”他说了这么几句。当然我就如实说：当时请示了省委，搞个点，我就搞了个公社。试点中，省委副秘书长宋文彬同志带着工作组来这儿驻了一个多月。现在这个产量基本落实下来了。金鱼公社两万多亩土地，增产了五百零三万斤粮食，一亩田平均增加了两百斤还多点。我讲了这个情况，大家都很高兴，纷纷议论开了，说一个公社才两万多亩土地，一年就增产了五百多万斤，不简单嘛。赵紫阳趁势说：“你们大家讨论，大家都可以说，你们的看法如何？”这个会讨论得热闹得很，十二个县全部都发了言。最后赵紫阳就在会上说了，其实一开头就说了，广汉金鱼公社责任到组，从方向道路上讲没有问题，想搞的可以推广，多搞，有的可以搞个试点，成功了过后再推广。当然也讲了很多其他的情况，但是这个会上要害问题是对包产到组点了头了，说可以推广，我心里一下就放心了。这个小春播种现场会，实际上成了一个包产到组的会。

回县以后，我就召开大队的支部书记、生产队长开会，准备在全县推广。正在这个时候，杨万选书记带着岳忠同志和省农业组一个女干部谢自均同志，还有秘书张继禄，来广汉搞调查研究^①。

^①杨万选率领的调查组，在广汉时，白天下队座谈调查，晚上熬夜整理调查报告。杨万选回到成都的第二天，即10月25日，廉即向赵紫阳报告了。赵紫阳指示，给各地委打电话招呼一下。杨万选考虑到电话不大好讲确切，故在征得同意后把这件事加按语刊登在《工作简报》上。于是省委办公厅于10月27日发出第七十一期《工作简报》，刊登了省委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办公室的调查报告《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金鱼公社建立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并加编者按语：金鱼公社建立明确的生产责任制和奖励制的经验，是运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具体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使社员的劳动同自己的物质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充分调动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看来，这种办法是可行的。各地、县委可以选择有条件的社队，参照金鱼公社的办法，进行试点，摸索经验，不要一哄而起，以免出现混乱现象。这份简报一发到各县委，联产责任制在全省就逐步推开了。

他们先在县上听了情况汇报，然后到金鱼公社去实地调查，整整调研了一个星期。那时正是金秋时节，稻子已经收了，从10月19~24日，他们深入到大队、生产队的院坝、田间与队干部、社员群众座谈，一谈就是一个星期。走的时候，我看万选同志很满意，第一这是他批准搞的点；第二看到大丰收了。生产比过去好了，我也很高兴，至于全县推广的问题，他说：大生产队可以搞，我负责；面上的要请示省委以后再说。

我们当年就搞包产到组，过去叫定产到组，称“三定”：定人员、定土地、定任务，任务就是定征购任务，比如这个生产队二十万斤的任务，三个组，一个组里几万斤，实际上包产到组说的“三定”，核心是产量包了，当然，不定人咋个分呢？土地不定了咋个派任务呢？这个“三定”，产量是基础，是核心。

二、向阳公社撤社改乡的前前后后

包产到组搞下去过后，大队、生产队就空了。正在这个时候，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到广汉调研了一个星期，我陪他在全县看了工业、农业、城市，到处看。在谈话当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离开广汉的那天，是个星期天，他在院坝里走来走去，问我还有啥子要说，我就说需要我说的我都说了，看书记还有什么指示没有？他说我们现在这个机关呀，我们现在这个机构呀，钻到牛角里面了，回头都不好回，这个必须要改变。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两句话：一是我们的机构已经走进牛角里面了，死胡同；一是说今后要改变这些行政单位，让行政单位都成为干巴巴，把企业权力扩大，中国才有希望。他在这个院坝里说的很多，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提出要改革。

他走了以后一段时间，1979年6月初，他的秘书通知我，说书记要出国，叫我也去，我当然很高兴。走的时候到省委金牛坝招待所报到，我就去看他。当时他问我农业生产如何，我说现在缺水。他当时同意我的看法，先把川西的好水田栽上，然后再往下输水，并当即给省委的一位领导打电话。

我们出了国后，他给我说了几次：常光南你要关注两个问题，第一个你看人家农业咋个搞上去的，第二个你看人家那个领导机构咋个组织的。那次杨汝岱同志也去了。到了英国以后，去了一

个农场主家里，农场主就带着我们到那儿一个丘陵地带去，山这边栽的葡萄，那边长的草。书记就问人家：你这边是葡萄，那边为什么尽长草呢？这山都是你的吗？农场主说都是他的。他说这边阳光好，葡萄的产量高，质量高，含糖高，才能卖高价；那边没什么阳光，种葡萄含糖分少，所以就种草，养牛。书记回头就对我说，常光南，来来来，你来看，人家就晓得因地制宜，我们行不行哦？我说只要书记说一句话就行。他问广汉有啥子特点？我说广汉嘛，栽菜籽就比点小麦划算，但那有任务，不完成那么多任务是不行的，层层下任务，省上给地区，地区给县上，县上给公社，公社给大队，大队给生产队，都分了任务的，不能变，不能因地制宜，叫你种啥你就得种啥。他就把汝岱同志喊到跟前说，这个问题你跟光南同志商量一下。我就提出来，我说菜籽种植面积能不能给我们十三万亩，给我们分配的是八万亩，我们要求少种五万亩的小麦，多栽五万亩的菜籽。书记说可以，并问汝岱同志看行不行啊？汝岱同志说，只要书记说行就行嘛，就这样定了。

我为啥说这个例子呢？就是说人要务实，看了人家搞得对我们就要学。回来过后，我们马上就调整了五万亩麦子种菜籽，所以第二年（1980年），我到东北、到山西用一斤菜籽油换七斤玉米，就做起生意来了，群众很满意。这里面有个因地制宜的问题，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不是说要把我们这个行政机构的权力弄小点吗？这其中就有这个问题。书记到一些公司里面看人家咋个管理，他说人家那个厂长经理，又是采购又是厂长，又是技术员，你看我们好多人，行政人员弄那么多。他说你回去，把你们那里按照这个改一下。

1979年6月出国回来以后，到了向阳公社搞试点。至于为什么定点在向阳？那是因有一天我在向阳公社碰到党委书记叶文志，他跟我一起转。在场口上碰到一个老人，这个老人眼睛红红的，我问：“大爷，你眼睛咋个那么红？”他说：“嘿，你问他（叫我问公社书记叶文志）。”于是我就问：“老叶，他咋个的呢？”老叶说他是酒厂的厂长。那老人也开始说了：“叶书记给我分的五万块钱的上交任务，我为了这五万元，好多晚上睡不着

觉，不能睡觉，我太紧张，我的责任重大啊，我还想超个一两万，大家再分点嘛”我说我这几年想了好久的办法，就没有想到这个办法，我们现在当领导的责任心还没有这个厂长强，我看这个厂长责任心就强。叶文志就说，关键是要包！利益要挂钩！后来我跟叶文志说，你除了这个厂，其他有没有包的呢？他说三个厂都包了，沙石厂包了，还有个厂也包了。这就是为什么在向阳搞试点的原因。向阳农业包产搞得不好，工业包产也搞得不好，所以决定在向阳搞。

这时全县的生产队基本上都包产到组了，一部分包产到户。这个时候公社的体制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个“三级所有”也停下不动了。当时公社的同志对这个问题有点看法。我们就打算组织一个跟人家外国学的好办法，成立一个董事会。刚开始成立了一个农业公司，管农业，包括种子、防治病害和技术；后来又把供销社作为基础，把街上的商人组织起来，成立商业公司；还把公社的工业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业公司。三个公司组织起来之后，又组织农工商联合总公司。这个总公司受谁领导呢？最高领导当然是共产党。不过这要发扬民主，那时候叫官办改民办，选董事会，说谁的股份大，谁当董事长，股份第二就排成第二，叫董事，一直往下排。我后来给赵紫阳同志汇报了，说我们成立了农工商联合公司，农业公司、工业公司、商业公司，还成立了个董事会，把官办改成了民办，谁的股份多，谁当董事长。他说，你这个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意思是谁的钱多谁当这个董事长，他说外国也不一定是这样。他笑了，说可以，你们就这样定。他批准了，我们就更大胆一些，继续搞。

这样一来，都去搞董事会，搞农业的搞农业，搞工业的搞工业，搞商业的搞商业，这个公社就空了，成了空牌子了，架空了，平调粮食，也没得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基础没有了，瓦解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咋个办？我们就决定公社光挂牌，实际弄个行政组，这边是农工商联合公司，那边是行政组，分成两大块。我是这样想的，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体制走到了牛角里面，走进死胡同了吗？我把这个行政单位搞成千巴巴，公社就少干扰，没有这个权了嘛。行政组是管什么的呢？就是政

府的那一套，行政方面的那一套。大队改成村，生产队改成居民组，行政组下面就管村，村里面就管居民组，把这一套树立起来了。这个行政组没有权力，就成立一个政府嘛，我就提出来把行政组改城乡公所。我查了记录本上是这样记的。

1980年3月30日上午，赵紫阳通知广汉的县委书记去成都谈改革的事。会一开始就说，他要走了，到北京了，广汉这个试点要继续搞下去。后来他就点我的名，把想法再给大家说一下。我就说到一个体制问题，说我们向阳这个试点，已经把农工商联合公司成立起来了，另外想把行政组改城乡公所，才有权力，行政组没有权力，过去政府、企业都是公社一把抓，我们想把它分开，这边是乡公所，那边就是联合公司，也就是说这个管行政，那个管经济，分个工。当时赵紫阳说，我看可以，搞个试点嘛，搞一个乡嘛，问题不大，就是有问题，将来也好纠正。他给新任第一书记谭启龙以及其他几位书记说，让他们搞个点吧。当时其他同志都点头说可以。

由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进一步发展深入，把“三级所有”打乱了，把公社架空了，然后就往政经分方向发展，经济用经济的办法来管，行政用政府的办法来管，逐步就分开了。从省上回来过后的第二天上午，县委开了个会，专门研究向阳改革的问题，当时县委意见都比较一致，都同意这个办法，既然省委同意我们就搞。

前面我提到做生意的事，1980年的7月30日我到东北吉林去做生意。为什么到吉林去呢？吉林的省长张根生从广东调到东北工作时，曾问国务院领导怎么开展工作？领导们说可先到四川看一下，特别要到广汉，所以张根生省长就带着他的全部厅长，大概二十多个人，到广汉住了一个星期，看了广汉的情况。走的时候带了两个人跟去，就是介绍咋个实行定额、包产。张根生省长在广汉时就同意卖给我们三千万斤玉米。为什么买玉米呢？买玉米回来我们可以烤酒，广汉烤酒的多，酒糟子可以喂猪，猪多肥多，当然生产容易搞好。所以张根生省长同意给三千万斤玉米，叫我去一下。我去了，给张根生省长汇报了，省委常委讨论了，同意给我们广汉三千万斤玉米，全是国家牌价，我很高兴。

当时赵紫阳恰巧也在那儿，传话晚上叫我去，我就去了。吃了晚饭就在南湖宾馆里面转，他叫我汇报广汉的改革情况。当时大概是晚上8点钟，一直谈到将近10点钟，大概一个多钟头。其中就谈到关于公社的牌子问题。走的时候，他问我还有什么说的，我说没了，都说完了。他问，群众有啥反映呢？我说就是对这个公社反映大。他说，你的意见呢？我说我的意见是把公社的牌子取了，换成乡政府。我这时就没有再说乡公所了，这个是县委常委讨论了的。因为政府的权力才大，在群众中威信才高，工作才能搞好，这是常委讨论的，所以在那儿我汇报就提出改成乡政府，公社的牌子取掉换成乡政府的牌子。他说：“可以的嘛，势在必行。”“势在必行”，这句话说得重。回到县上后，我就给常委说势在必行，推着你搞嘛！在金牛坝招待所时就同意搞，现在又说这个事情，推着搞，快点搞。

关于向阳摘公社牌子的具体时间，现在各说不一，有点乱，这肯定是1980年8月^①。8月6号我从长春回来的。开了县委常委会议过后，很快到了向阳。到向阳去的有夏埂坤、叶文志、皮荣树、郑学成共五个人。叶文志兼的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公社里有李国寿、钟太银，还有其他几个，我都记不清了。当时我说今天找一个比较僻静的地点，能保密的地点去。他们说，那好，走，河边上供销社有一个旅馆，二楼上没人，我们就去了。会上，我把国务院领导的谈话精神以及县委讨论的意见给大家说了一下，哪个当乡长呀，这个牌子咋个换呀，这个会上讨论得比较具体。讨论完了，我说了三条：第一，不登报；第二，我们不往外介绍情况，不宣传；第三，不造声势。这个会开的时间也并不长，但是内容比较集中，布置第一书记叶文志，去组织木匠做牌子，找漆匠，先把牌子弄好。会上定了先挂牌子，后开大会，每一个生产队选三个十八岁以上的代表，然后把牌子换成乡政府牌子，选乡长、副乡长，过去公社的主任就作废了、不要了。

换牌子的这一天，很热闹，我没有去成。我到温江地委开会

^①向阳乡撤销人民公社的时间，当年对外讲是10月1日。据《广汉县志》记载是6月18日召开乡人代会，同日摘掉公社牌子的。事前经省、地、县领导同意，正式报批手续是11月补办的。

去了，换牌是啥情况我不清楚。后来他们给我说，邻近成都市青白江的人都被吸引过来了，街上到处都是人，都在看这个乡政府的牌子。公社改成乡政府了，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很新鲜、很奇怪。也有的说，哪个这么胆大，敢把这个公社的牌子取了？街上热闹得很，人们一面看一面说，还放了鞭炮。放鞭炮是自发的，劈里啪啦的，放了很多。谁放的，我也弄不清楚，反正不是乡政府组织放的。

我本来给他们说不要造声势。事后第三天，北京就打来电话了，是郑学成给我说的。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的一个姓李的同志打电话问：

“你们广汉是不是有个向阳？”

回答：“有。”

“是不是把公社牌子换成乡政府了？”

“我们搞一个试点。”

“谁叫你们搞的？”

“我们自己搞的，我们搞个试点，试验，不行就把它换了。”

这个电话既没有肯定对，又没有肯定不对，但说那话的口气让我紧张了。他如果说不对呢，那我马上就把牌子换回来。人大嘛，权力机构，他说你不对你就不对嘛，就把它换了。他又没有说不对，又没有说对。郑学成给我说了这事后，我觉都睡不着了，我想，糟了，这个东西到北京了！说不往外宣传不往外宣传，咋个又到北京去了？我心里头想阴^①着搞，搞成功了再说，事实上办不到。后来才晓得是新华社一个记者听说向阳很热闹来看了，他一看那牌子，就照了张照片，给北京寄去了，很快人大知道了，就来问。这是后来新华社的记者给我说的，照片是他寄的。

大概过了没几天，民政部也派人来了。派了两个人，我还接待了，给人家汇报当时咋个搞的，他们又到向阳去调查，走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说对，也没有说不对。

后来日本《读卖新闻》来了六个人，开着个越野车，到了广

①阴：四川方言，不张扬，悄悄地。

汉，说从北京来的，要调查人民公社的牌子换成乡政府的事。我就不敢出面了，我的原则是不准往外说，可是日本记者来了！咋个办呢？我就找了县委副书记苏治良，叫苏书记带着他们看，但是不能到向阳，政府的牌子无论如何不能叫他们看到。苏书记就在周围几个公社转来转去，介绍这是什么公社，那是什么公社，转了好几个公社。记者就问：那个乡政府的牌子呢，怎么没看到？苏书记说，这个就是嘛，这就是公社的牌子嘛。回避这个问题。日本记者中有一个懂中国话，对他说：这是万里（国务院副总理）叫我们来的，万里说四川广汉县有一个公社换成乡政府牌子了，我们就是来看这个的，你们不让我们看！好嘛，走了！开着车很不满意地就走了。因为之前通知日本记者要来，我就跟苏书记说：第一不准到向阳；第二不准说，不能通过我们的嘴说出去。所以苏书记很为难，他也不敢领着去，也不敢说把牌子换了，因为我给他下了命令了，最后人家很不高兴，就走了。走了不久，日本《读卖新闻》还是登出来了，就是那个记者写的。你不让他看，人家还是写出来了，写了很多，其中有两句话我印象最深，一句是说“毛泽东的体制已经开始改变”；第二句话是“震撼了世界”。咋脱得了手？！

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人给我打电话来了，还是全国人大，当时就把我喊去接电话。他说公社摘牌这件事请示了中央领导，你们可以搞试点，给你正式通知。他也没有说他是哪一个，可能下来调查的那两位同志给领导汇报了，我估计请示了国务院领导。

我总结这两件事，一是包产到组的问题，二是摘掉公社牌子的问题，之所以能够作出决策并坚定决心，且最终收到良好的效果，主要是中央的方向明确，特别是邓小平提出要解放思想，后来又提出胆子要大一点儿，把经济搞上去。并有省委的大力支持，以及群众的推动，加上我们广汉县委这个班子相当团结。

现在想来，当年做的这两件事是我这一生几十年中最高兴的事情。

重庆市计划单列与综合改革的由来

辛文^① 口述
王林 录音整理

重庆市是一个地位非常特殊的城市，它的计划单列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抗战时期它就是国民政府的陪都，成为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新中国成立之后，它曾经是中央直辖市之一，干部都是按省一级干部配备的。在经济方面，它的计划也曾直接纳入国家计划平衡，业务上由国家计委直接领导。20世纪80年代初，借经济体制改革的东风，中央批准重庆市实行计划单列。

重庆的计划单列，从1954年中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机构时就有一些说法：

1954年6月，在西南局召开的一次西南一级机关党员、负责干部和重庆市委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上，西南局的主要领导同志就讲过：重庆市同省合并（讲的是合并），并未降低它原来的地位，省委书记或副书记兼市委书记（阎红彦^②同志一直兼书记，直到他调走为止）。大市也可以参加中央会议，这是宋任穷同志讲的。

1963年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第一、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国家对于重庆实行计划单列体制，重庆市的计划直接纳入国家计划平衡，可参加全国计划会议和全国性的各种专业会议，业务上由国家计委直接领导。

1965年重庆市计委提出了一个《计划经济工作中的管理体制

^①辛文，1931年生。原四川省计委副主任、计经委党组书记，原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②1959年9月，阎红彦调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问题的报告》，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中存在计划多头，难以执行；领导多头，厂长难当；计划互相矛盾，难以综合平衡；现行经济体制集中过多，层次过多，部门过多，各自为政的弊端，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他们提出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和“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体制建议。这在当时来说，既反映了重庆市对体制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深切体会，又反映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提出者的胆量、胆识和知识、水平的超前。在1965年能指出体制弊端的见解是不容易的。

1971年5月21日，当时的省财政局作出规定，1971~1973年，在财政体制上对重庆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超收分成，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新办法。在1971年省财政局有这样的思想也还是很不简单的。这是为了照顾重庆这个有贡献的城市。

1971年8月，省革委批准省计委《关于工业企业下放问题的请示报告》，其中将原由省直接管理的包括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在内的冶金、机械、煤炭、化工和轻工等四十四个企业，下放给重庆市管理，扩大了重庆市直接管理经济的一部分权限。这里有这样一个背景，全国当时企业管理有两种体制，一种是山东的办法，由省集中统一管理；一种是江苏的办法，把管理权下放给地区，毛主席当时支持江苏的办法，不赞成山东的办法。

1974年5月省革委批准省财政局《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报告》，从1974年起对重庆市实行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比例分成，支出按指标包干的办法，这也是为了照顾重庆的实际情况。

1975年5月省委又作出决定，将在重庆、成都、自贡三个直辖市由省直接管理的一批企业下放，其中重庆有四十九个，进一步扩大了重庆管理企业的权限。

1976年省财政局对重庆又实行“收支挂钩，差额分成”，1978年改为增长分成。1980年省政府决定，从该年起，对重庆实行“收支挂钩，增收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规定重庆市以上年的收入决算为基数，本年实际收入比上年增加的部分，重庆留

45%，上缴省 55%，分成比例一定三年不变。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第一次正式提出重庆市实行全面计划单列是 1978 年初。当年 3 月，省委在重庆召开了一次农业机械化会议，会议期间由重庆市计委提出来，要求省计委研究。当时省计委就在重庆作了研究，由省市计委的同志共同起草了一个报告，并请示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经分管计划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徐驰签发，正式向国务院写了重庆市实行全面计划单列的报告，报告中提出计划单列采取“先二后一”，即在国家计划中，将各项经济社会的发展计划，在年度计划制定开始就按四川、重庆两个户头分列，正式下达计划时在四川省的计划中列出其中重庆的数字。国务院收到了这个报告，据说当时小平同志表了个态，由国务院打电话给省里，说重庆计划单列现在条件尚不成熟，以后再议，这样就被搁下来了。

1980 年上半年，省委决定搞一个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由我来做组长。当时的省委书记刘西尧分管城市改革，要我们组织力量选择一个城市进行体制改革试点。我们当时也提出过重庆，请示刘西尧同志，他说我们吃不下。我觉得他的这个意见是对的。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给优惠条件，四川当时也曾提出过财政改革试点，但是中央没有同意。据说时任财政部长的王丙乾同志曾说，要想进行改革试点，我就必须给一些优惠条件，但我没有这个条件，于是他就采取了“分灶吃饭”的办法。在这之前，有几家已经实行了包干制，一个广东，一个江苏、一个福建。同样道理，四川省要给重庆优惠条件也不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经过研究就选择了泸州市作为改革的试点市。那时泸州市还是宜宾地区的一个县级市，省上派出了以财政厅常务副厅长乔梓荣为组长的研究小组到泸州开展改革的试点。工作进行了一段时间后，8 月 30 日~9 月 10 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会议期间中央主要负责同志见到了鲁大东省长，询问四川的城市改革情况怎么样，鲁大东省长说，我们正选择在泸州进行试点。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就提出说泸州太小，搞试点指导意义不大，提出在重庆搞试点。会议结束以后，鲁大东同志从北京直接坐飞机到重庆，布置试点工作。后又因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改革试点被

放了下来。

1982年底蒋一苇、林凌同志又重新提出重庆改革试点问题，推动了重庆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实施。蒋一苇同志过去是地下党员，在重庆工作过，对重庆很有感情；林凌同志是改革的积极分子。

1983年1月10日，重庆市委、市政府向四川省委、省政府提出并转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试点意见。在批文中指出：在重庆这样的大城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决策。认真搞好这个改革试点，对于进一步搞活和放开我国西南的经济，探索军工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路子，以及组织好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都有重要的意义。综合改革的时间从1984年起，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享有省级经济管理权限。

为了解决和具体落实重庆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意见，1983年3月2~21日，由国家体改委、四川省委在重庆召开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中心就是具体落实改革方案。薄一波同志、国家体改委常务副主任安子文、财政部长王丙乾、四川省委刘西尧书记等参加了会议，研究制定了二十多项改革的具体方案。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经济条件下，重庆市提出许多具体意见和要求，除国家支持解决的问题以外，应该说省里尽了最大的努力给予支持，包括养路费给重庆留百分之七十，压缩成都、泸州平价用天然气指标数给重庆，全省仅有的一千万美元的外汇指标给了重庆数百万。重庆提出的供电量、煤炭分配量指标和几个基本建设项目投资缺口也给予基本满足。

在综合改革试点中，没有解决的、也是重庆最不满意的有三件事：一是电力体制，二是煤炭体制，三是石油体制。以前的规定是这样，达县的煤调给重庆，重庆的煤调给成都。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重庆的煤质好一点，二是运输距离近和价格低的问题。三个问题的核心是，重庆要单独成立电力局、煤炭管理局和石油管理局。这三个问题，不属省上的权限，是属于国家管理

的。1984年3月2~5日，赵紫阳到重庆视察，在一次小型会议上，市委书记王谦又提出这三个问题，我将情况作了汇报，赵紫阳表示由省统一平衡，重庆不能设立专业管理局。

1984年重庆正式实行计划单列，在执行过程又反映出来一些问题，应重庆市的要求，7月由刘西尧书记率领省级有关部门同志赴重庆协助解决问题，将一些关系理顺。在一次会议上，王谦书记又重提电力、煤炭、天然气三个问题，并要我马上表态。我说，对不起，3月赵紫阳说过了，仍由省平衡，我没有资格设管理局。

1984年12月，王谦书记到成都，向刘西尧书记汇报重庆的情况，刘书记对重庆的情况表示关心，并指示重庆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刘书记还指示重庆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刘书记还指示重庆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1985年1月，王谦书记到成都，向刘西尧书记汇报重庆的情况，刘书记对重庆的情况表示关心，并指示重庆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刘书记还指示重庆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刘书记还指示重庆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1985年2月，王谦书记到成都，向刘西尧书记汇报重庆的情况，刘书记对重庆的情况表示关心，并指示重庆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刘书记还指示重庆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刘书记还指示重庆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1985年3月，王谦书记到成都，向刘西尧书记汇报重庆的情况，刘书记对重庆的情况表示关心，并指示重庆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刘书记还指示重庆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刘书记还指示重庆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王谦

重庆市综合改革试点亲历记

林凌^①口述

王林 录音整理

20世纪80年代初，首钢以年利润“递增包干”的方式开始了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参与这场改革的经济学家蒋一苇、林凌等认为，企业改革不能孤立地进行，而应与城市的综合改革齐头并进。并建议在重庆进行城市综合改革试点。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重庆实行计划单列，拉开了重庆市综合改革的序幕，并为以后重庆成为直辖市奠定了基础。

1983年进行的重庆综合改革试点，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当时的赵紫阳同志和薄一波同志既是决策者，又是试点的直接推进者。省里涉及的领导人有谭启龙、刘西尧同志，重庆有王谦、于汉卿、廖伯康同志。我和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同志是这项改革的倡议者和参与者。

事情还要从1979年说起。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四川改革搞得热火朝天。当时中央新建一个机构叫“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是陈云同志。中财委派出调查组到各地调查，四川调查组由刘明夫同志带队。刘明夫“文化大革命”前是国家计委的副主任，改革开放后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我们陪他们先在成都调查，后来又到了重庆。

重庆是我们国家一个很有名的城市，其工业在全国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到重庆一看，城市破破烂烂，市一级的财政收入一年也不

^①林凌，1926年生。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学术顾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过十个亿。这十个亿还得拿一块出来支援三州少数民族地区，根本没有能力进行基础设施的改造和建设。在经济体制上，重庆的行政地位和当时的江津、万县、涪陵等是一样的，都是地市级，经济活动被封闭在行政区划范围内，无法发挥城市对周围地区的经济带动作用。当时重庆有几百家大中型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但大部分归中央各工业部和省各工业厅局分别管理，大都是条条垂直领导，重庆市政府对这些企业没有任何管理和协调的权力，企业间难于形成专业化和协作关系^①。而且我们长期实行的是抑制城市发展的政策，根本不了解城市的作用，更没有城市化的概念。

调查组研究了重庆这些情况，觉得城市和专区是不一样的。城市有一个作用，就是区域经济中心的作用，还有几个特殊的功能，就是经济的集散功能、吸引功能、辐射功能、服务功能等等。如果把一个城市搞活，不仅城市的生产力能够大大提高，而且可以带动周围地区经济的发展。当时我们形成了一个“城市是经济中心”的概念，主张对城市的体制进行改革，发挥重庆的经济中心作用，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

调查组回到成都，要求向省委汇报。汇报的中心内容是提高对城市经济中心作用的认识，实行城市改革，积极发挥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赵紫阳同志非常赞赏这个观点，也同意推进城市改革。他在离开四川到中央工作时，又一次到过重庆。他对重庆的领导同志说，重庆是一个大城市，行政上是省辖市，在经济管理权力上，今后凡是省有的重庆都应该有（他讲的是经济管理权力）。要给重庆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力，对重庆来说是一个大改革，对四川省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改革。省上各部门基本上是不赞成的，所以，这位领导一走，这件事就搁下来了。

1982年初，四川大学有位老师给中央领导同志写过一封信，

^①重庆是一个条条块块关系极为复杂的城市。全市在当时就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七百三十七个，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绝大部分应由市来进行统一管理。但在旧体制下，直接管理这些企业的却是中央二十二个部和总局、省二十四四个厅局。几十个渠道直接向企业下达计划、分配物资、拨付固定资产投资、调集产品等。条条块块各自为政、自成体系，重复建设、盲目生产相当严重。城市根本无权也无法统一组织协作和综合平衡。

他认为我国国有的小企业有机构成低，人的作用大，可以扩大企业自主权；大企业有机构成高，人的作用小，对国民经济影响大，不宜扩大自主权。当时国务院成立了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是由经济学家组成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同志为总干事。中央将这封信转到发展研究中心，请大家讨论。讨论的结果，多数人不同意这个观点。大家认为，大企业有机构成高，人的作用更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大，更应当扩大自主权。但怎么改，还需要实践。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1982年4月，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同志，各带了几位研究人员组成联合课题组，到首钢进行试点。我和蒋一苇同志是在改革开放中认识的。由于认识一致，性情相投，很快就成了合作伙伴。

为什么选择首钢呢？第一，首钢是当时国家确定的全国八个试点企业之一；第二，首钢本身对改革有很强烈的要求；第三，我是从首钢出来的，熟悉情况，一些领导人都是原来的老同志。

到首钢进行大企业改革研究是我们的自发行为，不是政府决定的。我们在首钢紧张地工作了四十天，研究的结果是大企业应该给以更大的自主权。我们和首钢的同志一起制定了一个改革方案，取名为“上缴利润递增包干”。当时国有企业叫全民所有制企业，决策者是国家，首钢的生产计划由国家下达，原材料由国家调配，产品由国家销售，利润全部上缴国家，基建和技改投资由国家拨付，亏损由国家承担。我们与首钢共同研究，这种吃大锅饭的体制，对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很不利，首先应从上缴利润开始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我们的意见是，企业上缴给国家的利润要定一个基数，然后再确定一个每年递增的比例，由企业包干，若干年不变。留给企业的利润用于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职工的奖金，国家不再拨付。当时我们的意见是以1979年首钢上缴给国家的利润为基数，每年递增百分之五，一定十五年不变。剩下的钱用于首钢的技术改造，改造后的资产仍属于全民所有。

我们提出的这个方案是个好方案。过去企业搞技术改造是由财政拨款的。企业做一个计划，向财政部门要钱；财政部门审查一下计划，给企业一笔钱，企业就按照这个钱来做。由于钱是国

家拿的，企业计划做得一般都比较小，条件也提得多，特别是减产、停产的条件提得多。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后，国家不再给企业拨款，企业要用留下的利润来搞技术改造，就会尽量节约，能不停产就不停产。同样的技改工程，不但用钱少，而且工期短，还可以做到不减产。省下的钱，给职工增加工资和奖金。对国家、对企业、对职工都有好处。

经过四十天的工作，写出了实施方案。我就和蒋一苇同志商量，这样的方案冶金工业部和北京市委都不可能批，干脆把这个方案作为一个建议报到国务院最高领导层，请求批准试点。我们就以蒋一苇和我两个人的名义，写了一个报告给赵紫阳同志。当时马洪同志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岗位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他也赞成这个方案，我们又请他写了几句话，转报给中央领导同志。

在这个报告里我们阐述了在大企业搞改革的必要性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的好处，同时在报告里又附带提了一条建议，就是请批准在重庆进行城市综合改革试点。我们所以提这条建议，是因为企业改革和城市改革有密切关系。城市不改革，企业改革很难搞好。

当时中央、国务院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国家体改委选了湖北的沙市和江苏的常州两个城市进行改革试点。我们感到，这两个城市都是中等城市，绝大部分是小企业，而且是集体所有制企业，经济关系非常简单。在这样的城市进行试点，很难找到改革城市体制的途径。所以我们在报告里就提出要选择一个经济关系比较复杂的大城市进行试点，并建议选择重庆。

我们的报告送上去后，很快得到赵紫阳同志的批示，赞成在首钢进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试点，而且批给国家经委、财政部、北京市委、冶金部、国家计委，请他们按照我们的建议支持在首钢进行改革。当时财政部认为企业的利润都是国家的，怎么能留给企业呢？留给企业不就成了企业的资产了吗？所以不赞成这个方案。他们拖，我们就通过各种渠道催。大约经过五六个月的时间，方案终于批准了。我们在报告中提的是每年递增百分之五，经政府有关部门协调，改为每年递增百分之七，增加了两个百分

点。在批准首钢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的同时，赵紫阳同志在批示中又批了一句话，要国家体改委对在重庆进行综合改革的建议进行研究。

报告被批准，我们非常高兴。在解决了首钢试点问题之后，我们原班人马又赶到重庆进行调查研究。重庆市委的王谦、于汉卿等同志听了我们的介绍非常高兴，积极为我们的调查提供条件。在北京，国家体改委也在研究如何在重庆进行城市改革试点。当时薄一波同志是国家体改委的第一副主任，他在关于首钢试点的报告上批得密密麻麻，其中一个疑问，就是重庆具不具备试点的条件？还有一点，就是催我赶快到国家体改委去工作。

我们一看薄一波同志的批示，担心重庆改革试点得不到批准，就决定兵分三路：我在重庆写调查报告；蒋一苇同志回北京，寻找渠道给薄一波同志介绍重庆的情况；另一部分人南下沙市、常州，了解试点情况。我把报告写好后，寄给蒋一苇同志修改，然后用我们两个人的名义，通过马洪同志，送给赵紫阳同志；同时，通过薄一波同志的秘书贺光辉同志送给了薄一波。

在报告中，我们突出了四点：一是突出了重庆经济关系的复杂性，搞好了重庆市的改革，可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实践经验，有利于发挥重庆及其他城市经济中心的作用。同时，重庆又是国防工业集中的地方，搞好了重庆的改革也有利于发挥国防工业的作用。二是突出了重庆是改革最早、改革领域最为广泛、改革坚持最好的城市之一，领导和群众对改革有强烈的要求，有了一支粗具改革经验的干部队伍。三是突出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重庆实行计划单列的意见。1978年邓小平视察四川时指出，重庆的计划可以单列，为此，四川省委向中央打了报告；1981年国家计委准备对重庆实行计划单列，曾致函省、市征求意见；1981年四川省委决定在泸州市搞城市改革试点，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认为泸州没有代表性，指示将试点改为重庆。四是突出了“点”内“试”的原则。将“点”封闭起来，在“点”内打破常规，大胆试行一些特殊的体制和政策。在试验成功以前，其他城市不得仿效。以上四点意见，对中央下决心在重庆进行试点起了

重要作用。

关于国防工业体制和军工企业的改革问题，四川省委和政府的领导人都非常关心。有一次我找鲁大东省长谈调动工作的事，顺便谈到重庆的改革，鲁说，重庆要改革，如果中央同意军工企业一起改，我就赞成；如果军工企业不改，我就不赞成。后来四川和重庆的改革都没有包括军工在内。

我们关于在重庆进行综合改革试点的报告是1982年11月送上去的，一直没有消息。突然在1983年年初，中央下达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文件”，批准在重庆进行改革试点，重庆狂喜，我们也很高兴^①。

中央批示下来以后，紧跟着就有一系列行动。中央是由薄老带队，有各部的正副部长几十人来到重庆；省里由刘西尧同志带队，有关各厅的厅长、副厅长参加；重庆由王谦、于汉卿带队，重庆市有关局的负责人参加，加起来有两百多人，一支庞大的队伍，来讨论重庆的改革。

为什么要三方面的人都来参加呢？因为重庆要实行几项涉及三方权力和利益的重大改革。

第一，重庆要实行计划单列，赋予重庆市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力。当时国家还在实行计划经济。在国家计划中，还有分省计划。重庆要实行计划单列，就必须把重庆的计划从四川的计划中分离出来，在国家计划中单列。计划涉及许多项目，必须三方算账、谈判、衔接，才能建立起计划单列体制。

第二，重庆企业的隶属关系非常复杂，有中央属企业，有省属企业，有市属企业，有区属企业，还有街道企业，在改革中要求中央属、省属企业尽可能下放给重庆管理。这就要求三级政府部门进行谈判和交接。

第三，财政计划单列是计划单列中的最重要的项目，涉及中央、省、市三级财政利益。重庆是财政上缴单位。改革前上缴

^①198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的报告》（简称《报告》）。《报告》要求将重庆市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国家计划中单列户头，并赋予重庆市相当于省的经济管理权力。

省，改革后要直接上缴中央。与此同时，必须减少四川上缴中央财政的份额。这样复杂的利益关系，必须三方算账、谈判，才能达成一致。

所以那时我们开玩笑说，重庆开的是骡马大会。

看到中央文件以后，我们就想到给重庆的改革定一个方向，回答一些同志特别是省级部门同志的疑虑，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发挥重庆经济中心的作用》。那时郭元□同志做我的助手，我们多次修改文章，并送刘西尧同志审阅，后以我和郭元□两人的名义，于1983年2月19日在《四川日报》和《重庆日报》同时发表。在文章中我们把重庆市定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从历史考察中，我们提出重庆不仅现在而且在历史上就曾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抗战时期是重庆最繁荣的时期。

经过近一个月的工作，形成了一些具体的改革方案。比如哪些企业要下放，哪些权力要下放，重庆上缴财政，交省里多少、交国家多少等等。根据这些方案，中央又下了文件正式宣布重庆实行计划单列，重庆可以直接和中央各部打交道，可以参加中央召开的经济方面的会议，同时给了重庆一些比较优惠的政策。

重庆实行计划单列的同时，还有一项改革就是实行市带县的体制。与重庆市相邻的是永川专区。中央确定将重庆与永川专区合并，原永川专区的县由重庆市领导。地委书记叫白兰芳。我记得省委半夜通知白兰芳同志到成都来开会，我也参加了。会上，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宣布了省委和中央关于永川专区与重庆合并的决定。白兰芳同志立即到重庆，参加了重庆的改革。

中央作出决定后，重庆大张旗鼓地开展了落实决定的工作。我和蒋一苇同志被聘为市政府经济顾问，在重庆的各种会上作了许多场报告。重庆的综合改革试点就这样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①。

重庆的改革试点对我国的城市改革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①这次在改革中重新提出的计划单列，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把中心城市作为一个相当于省级的计划单位，在国家的整个计划中单列户头；二是在国家计划中，对所有指标，包括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计划实行全面单列；三是在制定和执行计划、管理经济上，赋予中心城市相当于省的经济管理权限。但是，在行政上和党的领导关系上，中心城市仍然作为省管辖的一个城市，在经济上仍然要与省保持密切的联系。

各种各样的发挥城市经济中心作用的研讨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全国召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在重庆、武汉、沈阳联合召开了三次全国性研讨会，把我国城市理论和城市改革的研究推向一个空前的高潮。我的两篇关于城市改革的理论文章，于1984年、1986年连续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在重庆实行计划单列不久，胡耀邦同志到贵州考察，在贵州召开了川、云、贵、藏、渝四省五方会议，在他的建议下，决定把这个会议定为经济协调会，每年召开一次，各省轮流坐庄。协调会在重庆建立了经协大厦，成立了联络处，出版了报纸。现在这个协调会已召开了十七次，成员扩大为六省市七方（增加了广西和成都），成为我国办得最好的区域经济协调组织。